南　非　史

〔法〕路易·约斯著

史陵山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SUD

PAR

LOUIS C. D. JOOS

Éditions du Centurion

Paris, 1966.

内部读物

南 非 史

〔法〕路易·约斯著

史陵山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850×1168毫米 1/32 13 1/4印张 300千字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06 定价：1.2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路易·约斯(Louis C.D.Joos)，法国记者，曾在非洲住过十七年，比较熟悉南非的阿非里卡语。

本书是一部南非(阿扎尼亚)简史。它概括地介绍了从1652年到1965年南非三百多年的历史，对英、荷殖民主义者的种族压迫、种族歧视和屠杀南非人民的暴行有一定的披露；对南非人民反抗殖民压迫、争取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英勇斗争作了简要的叙述。本书提供的史实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南非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必须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限制，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比如，他提出所谓“积极的”种族隔离，美化种族主义统治；还说英、荷殖民主义者“拯救”了黑人，为殖民压迫和掠夺辩护等等。

本书中译本根据 1966 年 1 月巴黎法文版译出。

1973 年 5 月

目　　录

引　　言

南非已经不符合世界的潮流了。它如今在现代国家中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独一无二而且处境孤立！长期以来未受其他国家舆论注意的南非，现在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的政府的行动、属于这一国家的各个种族的各种反映、该国同联合国的关系、南非生活的所有这种种方面，今天都成为世人交谈的话题，成为报刊和国际会议讨论的对象。

了解南非政府态度的根源，现在比以往更加有用了。这一态度的根源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因此，一部南非历史——在地理概念上的南非的历史——看来是必要的。可是，自从所谓布尔战争（1899—1902年）结束以来，在法国再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的著作。其原因不难猜测。

阅读原始材料有困难。不仅需懂英文，而且

需懂荷兰文和日耳曼语系里最新产生的阿非里卡语。有条件克服这些语言障碍的法国历史学家不多。当然，我们可以满足于仅将专论南非历史的英国人沃尔克的基本著作翻译过来。他的《南部非洲史》写得很好。但是，自从该书问世以来，已经发生许多变化。此外，该书作者在叙述中所引用的浩繁的科学论证，使对原始材料的考据很少基础知识的一般读者看起来吃力，而且由于上面讲过的语言上的原因，他们也无法加以利用。

因此，我愿意克服困难，为一些有兴趣但并非专业的读者提供一本“历史书”。这些读者，在欧洲和法语非洲都有，他们都想了解情况，以便弄清问题。我知道，做好这件工作要遇到重重困难。尤其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不容易得出一个完整而令人满意的认识：

（1）法国人所不清楚的南非语汇，需要加上注解以避免产生大的误解；

（2）在居民中占多数的“黑人”的作用，长期遭到忽视，尽管由于某种别有用心的缄默使“黑人”的作用在历史上长时期遭受埋没，我们还是应当确切地加以阐述；

（3）必须从丰富而几乎总是带有偏见的材料中理出事态发展的总线索。

用 字 问 题

关于专门名词问题，我采用了下面的解决办法(通融的办法)。

原属联合王国的白种人，本书称作"英国人"。对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也使用"亲英派"一词，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即使原籍英国的南非公民也有了南非的民族意识。对"荷"裔南非人，[①]我在荷兰殖民时期使用"荷兰人"，南非联邦成立(1910年)以前使用"布尔人"，现代时期使用"阿非里卡人"(形容词为阿非里卡)，[②]但区分并不严格。我不认为有必要取消"布尔人"一词，这个词是被某些英国作家所摒弃不用的。由于"布尔"(Boer)一字同发音相同的英文字"乡下佬"(boor，等于法文的

① 诚然，阿非里卡人在文化方面虽主要受荷兰的影响，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荷兰人、佛来米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血种。本书以下各章将加以说明。

② "Afrikaners"是指现在南非所有非英国血统的白人，本书译为"阿非里卡人"，其语言译为"阿非里卡语"。——译者

rustre）在含意上易于混同，确带有贬意，但在法文里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南非共和国，现在官方统称纯粹非欧洲人的各个部族为“班图人”，尽管在贝专纳的边境地带，还存在有“纳马人”和很少的布什曼人，而他们并非班图人。然而在本书为了叙述上方便，我遵循惯例，接受大家公认的这一说法。但是，在西南非洲，纳马人部落和布什曼人家族迄今仍然很多，对那里的整个有色人部落，我比较喜欢使用“非欧洲人”一词。“纳马人”这个词指直至最近时期被叫作“霍屯督人”的各个部族，纳马人自己不喜欢“霍屯顿”这个名词，认为含有贬意。但必须区别多少世纪以来一直保存着自己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原始”纳马人和在十八世纪时脱离了原部落去开普敦谋生、接着迁移到西南非洲、同白人混血后重新组成部落的其他纳马人。对后者，我使用了“新纳马人”这一名词。在两种情况下，白人血统的影响在这些新纳马人里占主要地位，结果成为具有阿非里卡文化的混血种人。我将这两种人叫作“格里夸人”和“私生混血儿”，尽管这个词带有若干贬意。我这样做是为了将这些“私生混血儿”同

在开普敦的大批"混血种人"区别开来，英国人和阿非里卡人将后者称为"有色人种"（英语为 coloured，阿非里卡语为 kleurlingen）。这些混血种人至少来自四个人种：马来人、纳马人、班图人和欧洲人。现在，这个人种已经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新的种族。

以上大略叙述的有关种族方面的词汇远不是简单的问题，各个作者对这些词汇的选择并不一致。除去这些分歧以外，还有人名、族名或地名的非常不同的拼写法。关于地名的写法，我赞成凡有英文名字的地方，一律使用英文名字，理由很简单，因为法国地图一直使用这些英文地名。① 出于同样的理由，对那些本来只有荷兰文名字的地方，我保留了荷兰文的拼法，而没有使用现代阿非里卡语的拼法。这样，读者看到索特潘斯贝赫这个地方使用 Zoutpansberg 的拼法，韦雷尼京使用 Vereeniging 的拼法（阿非里卡语现在的写法分别为 Soutpansberg 和 Vereniging），便不会感到奇怪。

---

① 为了保存英文的发音，我有时改换了几个字母。因此，我用 Touguéla 代替 Tugela，用 Basoutoland 代替 Basutoland。

专有人名的拼写法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字母无法拼出某些南非方言里常常出现的“卷舌音”,[①]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在这方面拼法也很不一致。农夸斯(Nonquase)可以成为农夸西(Nonquasi),莫谢希(Moshesh)成为莫舍舍(Moshoeshoe)。关于马塔贝莱人酋长莫赛利卡蔡(Mosélikatsé)这一个名字,我就找到以下不同的拼法:翁西利加德西(Oumsiligadsi)、西耳卡次(Silkaats)、姆西利卡戚(Msilikatsi)。祖卢人国王塞太瓦约(Cetewayo)有时以凯切瓦约(Ketchewajo)这个名字出现,斯威士人国王翁班迪奈(Oumbandiné)有时以姆班济尼(Mbandzeni)这个名字出现。我选择译名的根据是南非大使馆长期散发的半官方书刊《南非史画册》。这一选择只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我也不愿查考南非各族人民的“科学”名字,因为那会带来新的困难。但是,为了使南非当局目前散发的材料(常常是法文的)易于为大家弄懂,我只好在书中采用苏陀族(sothos)一词而不用巴苏陀族(basoutos),用茨瓦纳族(tswanas)一词而不用贝专纳族(bechou-

① 卷舌音一般可分为三种。

anas),同时对这些部族的国家名仍保留巴苏陀兰和贝专纳的译名。然而,在这里要提一下,巴苏陀兰从1966年取得独立时起即自己改称为莱索托(Lesotho),这是从"苏陀"字根正确地演变出来的名字。再者,对住在巴苏陀兰本土的苏陀人,我在本书中便称之为"巴苏陀人",以区别于在巴苏陀兰境外生活的苏陀人。最后,我对非洲人名字加上了法文字尾,而没有考虑班图语的表达方式。读者将会看到,我将班图人多数写成 Bantous, 而 Ba 这个字首本身具有复数冠词性质,因此,S 在这里是多余的。同样,我将"班图人部落"写成 tribu bantoue, 而阴性已纯粹是法文的传统表达方式。我这样写是因为我想这种写法使人阅读起来更方便。

关于某些组织或地理名词的南非特殊用语,这里再交代几句。对公民(volk)、农村(veld)、区长(landdrost)、山包(kopje)等词,所有南非人,不论是讲英语的还是讲阿非里卡语的,现在都接受。但词的拼写可以不一样。英国人保留荷兰文的本来写法,阿非里卡人则用现代阿非里卡语代替。于是,牛车阵(laager)这个词现在用阿非里卡语写

成 laer，战斗（vechten）写成 veg。本书后面所附的小词汇中的专有名词，我列了两种形式；在正文里，我使用荷兰的一种。这种形式，读者在往后阅读时的确会更多碰到。

这些解释可能显得冗长了。但最好从一开始就将用词讲明白，以免落到南非词汇的陷阱里去。由于没有事先在这方面注意，艾伯特·卢图利所写《回忆录》的法文译本有时会造成一些含混不清的和将意思弄错的麻烦。例如，法译本几次提到“自由国家的代表”（les délégués des Etats libres）（第 171 和 179 页），从上下文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如此！实际上这是指奥兰治省的代表，南非公众将该省叫作“自由邦”（Free State 或 Vrijstaat）。在另外一处（第 187 页），译者显然弄糊涂了，将“自由邦”译为一个城市名。在译文中“N.A.D. 总部”（L'état-major du N.A.D.）一语同前后文（第159页）连起来，给人以某种盖世太保组织的印象，其实原意不过是“土著事务部工作人员”（Staff of the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集团住区法”（Group Areas Act），即关于城市里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法，在同一译文中变成“地

区集团法”(la loi sur les groupements régionaux)。

重大的遗漏:黑人

我前面讲过,另一方面的困难是,在手头很少的材料里来观察南非的黑人发展情况。除去各种行政报告以外,在1902年至1950年这段南非历史里,黑人好象并不存在。举几个例子。很受欢迎的作家阿姆斯特朗在他所著关于史末资将军一书中,对土著问题不多不少整整写了十二行(第217页)。德韦特将军在他关于1899—1902年战争的二百五十页的回忆录中,只有四句话提到黑人。另一作家斯图尔德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叫《神圣的使命》的小册子,其中对1904—1907年叛乱期间赫雷罗人遭到种族灭绝一事只写了整整两行半:“接着同土著人的一系列冲突开始了,发展成为赫雷罗人领导下的总暴动;到1907年才镇压下去。”对这场残暴的战争中赫雷罗族丧失了五分之四的人口这件事,竟一字未提。

在埃里克·罗森塔尔编的《南部非洲百科全

书》1962年版中，A项下找不到"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L项下也找不到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艾伯特·卢图利（Albert Luthuli）。

因此，要在最近五十年的南非史里稍微准确地看出非洲人的作用，那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南非当局在国际会议中非常不愿提供官方情况。私人去调查，也会碰到同样的困难。

研究南非最近的一般发展情况，也并不容易些。以往的仇恨远没有消失。阿非里卡作家将过去写得理想化了，那确是个英勇的过去，但是多么混乱的一段时期啊！英国作家很难做到对阿非里卡人没有偏见，即使在最无可非议的细节上也是如此。例如，阿姆斯特朗在谈到南非国旗时，就忍不住要加上一句毫无道理的讽刺："这是一面丑恶的旗子，同南非不相称。"大概是因为南非国旗取代了英国国旗吧！鲁思·弗斯特在她所著关于西南非洲的书中实际上认为，她所遇到的每一个南非官员同她讨论非欧洲人时，都没有最起码的诚实。甚至外国作家也会卷入偏袒一方的斗争中去。以色列记者保罗·季涅夫斯基不久以前写了

一篇很生动的文章，题目是《另一个南非》，表面看来，完全是坦率和独立的见解。我现摘引下面一段：

> 1954年以前，对班图儿童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教会控制。宗教课程占有重要的位置。学校和家庭的配合微乎其微。大部分教会的总部设在国外，有的设在几千公里之外，因此教育常常没有深入当地的实际情况。它们要班图儿童死背统治欧洲某一帝国的历代国王的无尽无休的名单，但是却没有要儿童记住保持土壤和水利资源对班图人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学校没有推动为社会服务的兴趣……

这种个人感想看来完全值得尊重。但是，我在一本南非官方的小册子里看到下面一段（《班图各部族成为国家》）：

> 1854年以前，对班图儿童的教育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对教会来说，这是一件对它本身的发展不可缺少的辅助工作。人们首先强调宗教教育。绝大部分教会的总部设在国外，离开非洲土地有几千公里之遥。这种来

自国外的情况常常对教育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班图儿童死背欧洲皇室的世袭表；但关于保持水土的重要性和类似问题，则根本不讲。教学内容和社会需要之间是不太协调的。

这两段文字如此类似，使人不禁怀疑，《另一个南非》的作者对班图人的教育的判断只是简单地依据一个官方材料而没有根据亲身的体验作出来的。这是不好的！

从以上情况得出一个肯定的看法：对南非进行各种判断时，必须极为审慎，在研究一部材料浩繁、情况复杂、矛盾重重的历史时，必须丢掉一切感情上的冲动——这有时是很不容易的！

持这种审慎态度，只能使一个独立思考的作者经过对史实进行冷静分析，所得的结论更为切实可靠。

第一章　地理环境

南非的正式名称是“南非共和国”，它只是南部非洲的一部分。非洲大陆南部还有相当广大的地区并不完全属于它主权所有。但是它在这些地区直接行使权力，或者至少是实际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因此，不把这些在地理上邻近的地区或飞地包括在内，就难以谈这个政治整体的历史。

范围这样划得比较广一些的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岬角，包括西起库内内河河口，东止林波波河河口一线以南的地区。这个巨大的半岛处于两个空旷的大洋之间，西面是大西洋，东面是印度洋，伸向同样空旷的南冰洋。南非是旧大陆的一条“真正的死胡同”，不能通往任何地方。它似乎是注定要与世隔绝的，只是由于苏伊士尚不能通行，它才在几个世纪内摆脱了这种隔绝状态。由于苏伊士不通，洲际航行不得不绕道非洲的南端。

难以接近的海岸

但南非的气候和海岸地形使南非海岸不易靠近。本格拉寒流,[1]沿着几乎是直线的和没有港湾的整个西海岸，由南而上，使海风干燥，这就造成了大片完全荒芜的和无法接近的地区：纳米布沙漠。东海岸的情况比较好一些。从北面来的莫三鼻给暖流[2]使一直往南很远地方的气温提高，并在南半球夏季的几个月里——11月到4月，带来比较丰沛的雨量。但这股强劲的暖流也曾经是使南非与外界隔绝的因素之一。阿拉伯航海家们从未敢冒险越过莫三鼻给海峡，因为对当时设备还不太好的船只来说，回航是极端困难的。由“厄加勒斯”暖流增强了的莫三鼻给暖流在厄加勒斯角离开海岸沿线，消失在南冰洋中，而本格拉寒流

① 本格拉寒流是南大西洋东部的寒流。在非洲西部外海自南向北流。经安哥拉西岸本格拉等地北上，最后汇入南赤道海流。对非洲西岸气候有降温和减湿的影响。——译者

② 莫三鼻给暖流是南印度洋西部的暖流。南赤道海流遇非洲大陆转向而成。在非洲东岸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莫三鼻给海峡南流。其延续部分直达非洲南端，称为厄加勒斯暖流。——译者

则是在好望角一带接触海岸的。在厄加勒斯角（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是这个地方，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好望角）和好望角之间有一段长二百公里的得天独厚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气候象地中海的气候，比较干燥，但仍有足够的雨量，致使在沿海地带就能从事北半球温带类型的农业活动。正是这个地区成了欧洲殖民活动的核心。但即使在这个地区也不容易靠岸。尤其是冬季(5 月到 9 月)，西北方向来的暴风雨使没有屏障的开普港湾不很安全。总之，由于海岸地形，由于海流和气候，南非沿岸是不容易接近的。

内地也不易进入

起伏的地势使进一步深入内地更加困难。南非的地形的确象个盆，边缘全是高山。向东的一边特别陡峭，在巴苏陀兰[1]东部边境的德拉肯斯堡山脉，高达 3485 米。西边，在西南非[2]的温得和克地区，高峰正好超过二千米。湿润的东风越

(1) 巴苏陀兰现称莱索托。——译者

(2) 西南非现称纳米比亚。——译者

不过德拉肯斯堡山脉，因此内陆大盆地雨水不足，越往西越干旱，最终形成卡拉哈里的沙漠性气候。由大西洋吹来的微弱的西风给西南非山脉面海的山坡带来了雨水，但对于山脊后面的卡拉哈里的干旱却无济于事。[1] 好望角地区面海的山坡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即使紧靠着这一地区的背后，也由于沿海山脉如屏风一般挡住了雨水进入内地，在卡罗台地就又是草原的世界了。

南非的河流相当少，无助于克服进入南非的困难。最大的河是奥兰治河，横穿整个盆地，在西部山脉峡口夺路注入大西洋。但奥兰治河不能通航。至于林波波河，它逶迤于东部德拉肯斯堡山的北麓，流量也很不稳定。此外，在林波波河的河谷地区，寄生昆虫猖獗，传染诸如疟疾和昏睡病等各种疾病。

所以南非的内陆也并不比海岸更容易到达。南非地理为人们进入该地区提供的唯一有利条件是大部分地区没有森林。广阔的草原对于小群人

---

① 即使是西南非雨量最多的高原地区也常常遭受旱灾。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十二年的周期，每六年有一次最高雨量和最严重的旱灾。

来回走动形成不了多大的障碍，在这些荒凉的草原里有少量的水，还可以供应小群人的需要。

归根到底，还是南非的地质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去克服各种地理因素所造成的重重障碍。原始的矿脉在德兰士瓦露头，就从这种矿脉上建起了著名的拥有原始金矿的威特沃特斯兰德，[①] 靠边一些的金伯利有金刚石的“管状矿”。此外，奥兰治河河口有丰富的、由河水带来的金刚石冲积沙矿。当然，只有技术已经进展到能把简单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结果的时代，这些王牌才能为人们所利用。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宝藏，南非会一直处于世界上的大潮流和大冲突之外。

① 简称兰德，是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工业地带，其基础是金矿。——译者

第二章　1484 年白人到来之前的南非

一个如此难于接近和栖息的地域怎样会不仅对非洲人的进化，而且对整个人类的进化起过重要的作用呢？当我们想到南非对史前时期的贡献时，脑子里就马上出现这个问题。的确，我们现在知道，至少在五十五万年前南非高原已开始住有人类的远祖或至少是人类的近亲。但是当时的南非大概不过是更北边一个地域的“移民区”。这北边的地域才是人类某些最初“雏形”的发祥地。然而非常古老的残骸却仍然从南非发掘出来。这就是在德兰士瓦州、斯特克方丹、斯瓦特克兰斯、马卡潘斯加特等地的洞穴所发现的南方古猿类(australopithécidé)的骨骼。其中迩人(plésianthrope)具有人类所专有的某些特征，例如：身体直立，尤其是一副已很进化的牙齿。但是后一种特征使某些学者特别感到怀疑。按照直生论进化

学说，如此“晚”的一副牙齿似乎标志着很高度的进化，因此也标志着没有完全演变为人。打个比方，这些南方古猿(australopithèque)仿佛是在最后一刻“错过了”驶向“智人”(homo sapiens)的火车，这智人是现在的人类给自己定的一个谦逊的称呼。无论如何这些南方古猿好象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征途中已跨出了一大步。他们大概已经创造了最初的工具。这是著名的李凯教授所发现的。他于 1959 年在东非奥尔杜韦峡谷发掘了东非人(Zinjanthrope)，旁边有一些稍经修整的石块，① 还有些被打碎的骨头。他还从他的发现中得出结果，把这块化石命名为“anthrope”(只有在称呼那些人类特征多于其他特征的生物时，才用这个语尾)，虽然这块化石同南方古猿很近似(有“pithèque”语尾说明猿猴的特征胜过其他特征)。因为东非人比南方最古老的南方古猿稍微“年轻”一点，我们可以设想在南非，最古老的砾石文化也是属于南方古猿的，特别是属于并人(Paranthrope)的。并人是布鲁姆教授 1940 年在约翰内斯堡

① 这些修整过的石块是人类以“硬的物质”制成的最早的工具。这种石块是“砾石文化”的标准要素。

图 1　班图人入侵南部非洲

附近的克罗姆德拉伊地方所发现的。

人类的祖先

最初的人类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一支移居到南非。他们在那里住了若干万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期间，非洲交替地经过了干燥和潮湿的时期。技术的发展极为缓慢，而各种类型的人则趋向分化，主要的因素是尼安德特人（Néanderthalien）的出现。在距离好望角不远的萨尔达尼亚湾发现了一副近似尼安德特人的骨胳。当然还难于确定这副骨胳的年代。但是在离奥尔杜韦峡谷不远的埃亚西湖地区发现了一块以后命名为非洲尼亚腊萨人（africanthropus njarasensis）的化石，这块化石兼具猿人（pithécanthropien）和尼安德特人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另一种尼安德特人是在非洲产生的。远古的漫长干燥时期在当时的非洲中部和南部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因之当时的欧、非两大洲实际上是隔绝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上面的那个设想。

但是一个新的类型的出现丝毫也不意味着更

早出现的一种类型的消亡；同属人科(hominidé)的许多种类似可同时存在。如果说尼安德特人曾在非洲长期存在，这并不妨碍智人在相当早的时候也出现于非洲舞台。这仍是在奥尔杜韦地方发现的。但是东非好象不如从前那样有力地推动着南方了。自纪元前两千年开始，撒哈拉地带又经历了一个多雨的时期。通向北非从而通向欧洲和东方的道路恢复了。正是由于这种接触，石器的技术才得到相当迅速的改进。

最初的占据者

相反地，南非仍然处身局外。文明的各种潮流都弃之不顾。很可能就在南非当地逐渐形成布什曼人这一类型的人。由于处于孤立状态，这种人逐渐衰弱。布什曼人大概在长时期内是南非大草原的唯一的占据者。最后又来了纳马人。① 虽然后者的身材远远超过布什曼人，但从人类学和

① 纳马人就是过去人种学家所称的霍屯督人。他们拒绝接受欧洲人给他们起的这个称呼，霍屯督的来源好象是模拟该族人跳舞时打拍子的喊声。

语言方面看，两者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纳马人和布什曼人语言的某些特征的确也传到班图语去了，例如那有名的“卷舌音”)。

关于纳马人的来源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最普遍的意见认为他们是很早以前布什曼人和含族人在东非的混血种人。这种混血种人可能由于受到班图人的压力而迁往南方。班图人在纪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到达了非洲的东部。但是大多数作者都认为纳马人到达非洲南部是在十二或十三世纪。有些作者甚至认为是十五世纪。

布什曼人和纳马人各部落的文明，即使不是停滞不前的，也可说是极为稳定的。这两种人的生活方式相当不同，他们占据着相当广阔的土地，人口增长也相当缓慢，因此两者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而冲突实际上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早在欧洲人来到以前，这两族人所占据的地区是迥然不同的。纳马人拥有牲畜（其品种足以说明是来自非洲的东北），所以占据了适于放牧的大草原地带。他们来自东非，避开莫三鼻给的森林和卡拉哈里的沙漠，跨进大草原，这片大草原使东非经过罗得西亚同西南非洲联成一片。他们沿着西南

非洲山脉的山坡继续前进，终于到达非洲大陆的南端，然后又折往东面。

布什曼人以狩猎和采集野生物品为生，不象纳马人那样选择住地。因之他们的行踪遍及赞比西河之南，直到难以进人的沙漠和密林的边缘。他们分成至多五十几个人左右的若干小群，奉一个最能干的猎手作为他们的首领。其主要武器是短弓和毒箭，用石或骨制成箭头。后来他们在与黑人接触后，才有了金属的箭头。他们既不会制作陶器，也不知布设陷阱捕兽，除了那根用火烤硬并系上一块石头的木棍，供搜索之用外，他们也不制造工具。他们只有用树枝搭成的小棚，顶上覆以树皮或草，以供栖息。狗是唯一的家畜。

“布朗伯格夫人”

布什曼人在其精神世界中承认有一个万物之主，但他们的膜拜仪式属于巫术之类，符合狩猎者文明的特点。或许他们的艺术创作的源泉来自描绘他们所追逐的兽类的形象。除了在石窟内部或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画的各式各样的打猎场面

外，也有关于战斗甚至各种人物的壁画。在西南非北部的一个石窟里所发现的“布朗伯格夫人”壁画是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有些激情有余而辨别不清的研究人员看了这幅壁画，竟然认为是入侵该地的克利特人的作品。这幅壁画甚至光荣地出现在西南非洲的一种邮票上，一个“土著”的作品居然得到南非当局的欣赏，这是个独一无二的事例。

纳马人的物质文明远较布什曼人广泛，他们具有较大的和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各部落在最古老的氏族中选出一个共同的首领。氏族内部又按年龄分为各种等级，类似班图人许多部族的组织形式。另外，他们对密授教旨的宗教仪式和多妻制的重视，也类似班图人，而布什曼人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纳马人圆形的窝棚顶上铺着编织的席子，食奶保存在从整块木头雕出的碗中，牲畜则圈在有荆棘的围篱内，一直到尼罗河上游谷地的整个东非的牧民也使用这种带刺的篱圈。

由此可见，纳马人同布什曼人很不相同，但是在外形上二者具有某些共有的特征：皮肤淡黄，象羊皮纸；头发好比“胡椒子”似地卷曲成绺；他们的

语言具有同样的结构。因此这两种人常常都被叫作“科伊桑人”(红种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他们适应外界的能力已经减退，抵御不了外敌。一旦有人侵者——班图人或荷兰人——他们的脆弱的平稳生活就会遭到严重破坏。

在荷兰人之前是否有其他欧洲人或地中海沿岸的人到过南非的沿海地带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十九世纪末叶流传着各种浪漫主义的传说，或根据在罗得西亚的津巴布韦废墟，或凭藉上面说过的那个“布朗伯格夫人”壁画，或者依照一个名叫法里尼的“探险家”的叙述；后者曾谈到在西南非洲有一个神秘的“城市”，但这似乎完全出自这位杜撰大师的幻想。现在这些传说都已证明是不确实的。犹太人并未远征南非去开采“所罗门王的矿山”。克利特人也没有到西南非洲拓地殖民：况且这些不幸的克利特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势最为险恶的海岸登陆呢？什么城市、矿山、殖民地都是子虚乌有！在漫长的年代中，谁也没有来打扰这些稀稀落落地散处在南非这条“死胡同”里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在“外部世界”的边缘同班图人打交道的地区，一直

到十五世纪似乎是在林波波河。就在该河南岸的马蓬古布埃山岗发现了一种类型近似纳马人的骨胳，但佩带着具有班图人风格的许多宝饰。至于白种人，我们可以同意下面的说法，萨伊斯[①]的内肖法老的腓尼基人曾经环行非洲；但是，即使他们经过这里，却也没有留下痕迹。据说阿拉伯人也曾绕过好望角一直航行到美洲（！），但也同样未留踪迹。

直到十五世纪，南非才开始遭到外界的入侵。班图人分两股慢慢地由北南下：某些部族，如奥万博人和赫雷罗人，沿着过去纳马人走过的故道向西南前进。其他的部族，如阿马津巴、苏托、茨瓦纳、凡达等族，则穿过印度洋沿岸的平原，或者是与海岸平行，顺着德拉肯斯堡山脉的西麓南下。但只是在欧洲人（在当时是葡萄牙人）来到南非的时候，才有了最早的具有确切年月的纪录。

① 萨伊斯是古埃及的一个城市。——译者

第三章　欧洲登上舞台

1484—1652

自从葡萄牙人占领休达①（1414年）以后，葡萄牙国王的兄弟、航海者亨利亲王曾耐心地推动他的船队和船长们沿非洲海岸航行，希望能从南面绕过非洲大陆，同约翰王②这个统治着伊斯兰教障壁以东地区的强有力的基督徒国王取得联系，以便开辟一条通往印度富源的道路。

他没有达到目的，于1460年死去。但葡萄牙国王阿方斯五世亲自继续了他叔父的事业。然后他的继承者若昂二世又加速了探险事业；不久还开展了一次广泛的外交活动，其结果是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尔季阿）颁布了关于瓜分欧洲以外世界的敕书。

---

① 摩洛哥北部港口，1580年起又被西班牙侵占。——译者

② 中世纪后期西亚基督教徒传说中的人物，谓东方有一信仰基督教的约翰王。——译者

巴托洛梅乌·迪亚士

这时候，葡萄牙船队已经有可能到印度去了。早在1484年，刚果的发现者迪奥戈·卡昂已到达本书所要讲的地区了。他在西南非海岸沃尔维斯贝北面的克罗斯角立了一根“界柱”，①但因为荒凉的海岸线还是绵延不断地往南延伸下去，他就回航了。他一回来，一个新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就吸取了他的经验。1487年8月，迪亚士带着三艘帆船驶离里斯本，沿非洲海岸航行。

他到达沃尔维斯贝地区时，碰上风暴，不得不离开危险的海岸面驶向远海。帆船随风飘流了十二天，以后迪亚士想重新转回海岸，但发现东方已没有陆地了，他折回向北，于1488年2月3日到达莫塞尔湾，已越过好望角大约三百五十公里了。葡萄牙人在莫塞尔湾附近看见有“肤色不太深的野蛮人”在那里牧牛。因此迪亚士把这个地方叫做牧牛人湾。毫无疑问，这些牧牛的是纳马人（因

① 这根“界柱”于1893年被一艘德国船运走，现在保存在柏林，另有一根复制的“界柱”仍在原处。

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布什曼人是没有畜群的)。迪亚士似乎没有在莫塞尔湾停留多久。他又出海往东航行，到达阿戈湾，离现在的伊丽莎白港不远。他按照习惯，也在阿戈湾立了一根“界柱”。1938 年人们发现了这根“界柱”的残块，目前保存在开普省的博物馆里。在阿戈湾，迪亚士开始同船员发生争执，船员不愿意再往更远的地方去了。经过谈判，迪亚士终于带动船员继续航行到因芳太河(现称大菲什河)。但水手们不愿再远航的态度变得没有商量的余地。船长不得不屈服而回航。这次他是在看得见海岸的情况下驶过海角的，他给海角起了个名字：风暴角。据另一说法，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多难角(言下之意是多灾多难，幸而度过)。如果是后一种说法，那他是以消极的态度表达了、后来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用积极的态度所采取的命名，葡王摒弃了迪亚士所起的名字，代之以“好望角”。

从迪亚士回国到葡萄牙船队完全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大约过了九年。在这期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尔季阿)于1493年6月4日颁布敕书在格林威治以西约四十度处划了一条参考子午线，

将这条线以西[1]有待发现的东方世界拨归葡萄牙所有。翌年，在同西班牙签订托尔代西拉斯[2]条约的时候(1494年6月7日)，若昂二世甚至还成功地把这条子午线往西移了六十浬。此外，他还收到了佩罗·德科维朗的鼓舞人心的报告。德科维朗是奉派到东方和东非去进行探察的，他不仅访问了阿拉伯半岛，还访问了非洲整个东海岸，一直到莫三鼻给的索法拉，几乎到了南非的门口了。若昂于1495年10月突然死去前，已经在着手准备有决定意义的开往印度海岸的航行了。他的堂兄弟"有福人曼努埃尔"继承王位，确认了已经进行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批准了新远征司令官的人选。这次的司令官已不是巴托洛梅乌·迪亚士了。人们责怪他过去对付抗命的船员时明显地表现得太软弱。新的人选是瓦斯科·达伽马，他既是外交家，又是战士，既是航海家，又见闻广博，既精力充沛，又敢想敢干。他的船队包括四艘帆船，都是选的中等吨位，以便可以在非洲险恶海岸有暗礁的小港湾里避风。船队于1497年7月8

① 原书有误，应为该线以东。——译者

② 西班牙的一个小城镇。——译者

日驶离里斯本，船上有一些已经熟悉非洲航线的领航员。其中如佩罗·德阿伦克尔曾经陪同迪亚士航行，而佩德罗·埃斯科巴尔则曾经是卡昂的旅伴。达伽马所选择的航线最清楚地表明了在迪亚士远征以后这几年中所获得的信心。他没有一直沿非洲海岸航行，而是到佛得角后，他就离开海岸，乘定期而来的东北风，向西南方向航行。在巴西外海赤道附近，他往南转，然后借斜穿南大西洋的定期而来的风，又回到非洲海岸。这是一次杰出的航行，整整三个月未接触任何陆地。但当达伽马重新到达海岸的时候（1497年11月7日），特别精确，正好是在距好望角以北不到一百公里的圣赫勒拿湾。到达后，一面修补篷帆，一面同正在海边放牧的纳马人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瓦斯科·达伽马抓了一个纳马人，把他扣留到第二天。别的一些放牧的人，看见有外国人到了，也都到海边来。有一个葡萄牙船员，费尔南·维洛佐，带着几个纳马向导，进入内地，但不久就回来说有人想抓住他，还提到非洲人打下埋伏想消灭葡萄牙远征队。

这是第一次事件，现在已难以弄清究竟谁应

该负责任。接着有一次小冲突，双方都有负伤的人。这次冲突本身倒是微不足道的，但其结果却传播出去这种风声：南非整个海岸都是不安全的，纳马人是狡诈的，成了促使葡萄牙探险家们远远避开这段海岸线的原因之一。

瓦斯科·达伽马烧毁了已无用途的供应船以后，于1497年11月16日离开圣赫勒拿湾。船员在剩下的三只船之间重新分配了一下。11月22日船队驶过好望角，于25日到达莫塞尔湾，并决定在这里再作停留。这里虽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但同纳马人的关系也不很好。葡萄牙船队一离开海岸，纳马人就当着海员的面，把达伽马所立的界柱和十字架都推倒了。船队越过大菲什河口，终于在12月25日到达从来无人到过的海岸，达伽马给它起名为纳塔尔。[1] 1498年1月11日，又一次登岸，并同纳马人和平交往。然后船队离开南非海面，更往北去。到了索法拉，他们就到了印度的大门口了。当地阿拉伯人小王国已经同印度有所联系。

---

[1] 纳塔尔的葡萄牙文是 Natal，意即耶稣诞辰。达伽马正好在这一天到达纳塔尔，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译者

大约两年后，达伽马仍沿南非海岸航行，回到葡萄牙。从此，前往印度的航线不再是新发现了。葡萄牙航海者航经好望角的越来越多了。卡布拉尔于1500年经过好望角，而且还有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同他在一起，迪亚士是他的船队里的一只船的船长。但迪亚士的船在好望角外海连船带货沉没了，象一个奇怪的预兆，十三年前迪亚士曾把好望角称作多难角。1503年，安东尼奥·德萨尔达尼亚就在好望角北面的一个海湾登岸，这个海湾现在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爬上就近的桌山，以便了解当地的情况。他觉得这个地区比起印度或巴西来是空旷而贫瘠的。而且还不断地同纳马人发生冲突。1510年，印度总督德阿尔梅达[①]在目前是开普敦的那个地方于一次小的战斗中死去。

由于以上情况，所以在整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没有想在南非海岸立足。葡萄牙人没有在南非建立任何堡垒，任何商行，而安哥拉的罗安达却早在1600年前就已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了，在莫三鼻给，葡萄牙人也已越过赞比西河中游的太特，深

① 德阿尔梅达是葡萄牙的一个海军将领。——译者

入内地很远了。

“七省”的兴起

在葡萄牙终于想到要在南非立足之前，它的东方帝国已经垮台了。荷兰和英国已经取而代之。荷兰的兴起，更确切地说是政治上还比较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的“七省”①的兴起，是同当时欧洲所发生的事件有直接联系的，我们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事件。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从东方进口的商品由荷兰航海者转销北方各国。但在1580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去世，他的远亲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夺取了葡萄牙王位，荷兰人的上述买卖受到严重影响。因为那时候荷兰指责宗主国西班牙排斥新教，正在同它进行公开的战争。②1585年，菲利普还把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港口的所

① 即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加尔德兰和欧佛赖塞耳。

② 荷兰自十六世纪初起受西班牙统治，因此称西班牙为宗主国。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运动后，荷兰和英国的多数人改信新教，英、荷就不再是天主教国家了。——译者

有荷兰船全部扣留。三年后，他企图入侵大不列颠，结果他的无敌舰队遭受惨败。这就不但使他的敌手荷兰人、而且也使英国人有了勇气。这两个国家从此感到它们已经强大到可以无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敕书和托尔代西拉斯条约了，尤其因为它们已不再是天主教国家了。西班牙方面新的敌对行为又迫使荷兰迅速采取行动。1590年，马德里政府又一次把在伊比利亚半岛港口的荷兰船扣留了起来。翌年，第三次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荷兰人不得不放弃代销的贸易，而从此设法直接取得东方的产品。

他们起先想通过北冰洋打开东北方向的航线。但未成功。反之，取道非洲南端的路线却有成功的希望。荷兰拥有某些有经验的航海家和学者，熟悉葡萄牙的经验。他们最有名的船长是范·朗斯霍顿和德霍特曼。加尔文教派的牧师普兰西乌斯在宗教理论上给予了鼓励。最后，在里斯本的犹太侨民于1590年被驱逐，逃亡到阿姆斯特丹，其中有些是香料贸易的杰出专家。1594年，阿姆斯特丹有七个巨商创建一家公司，直接从事探测去印度的航路。公司派出了四只船，共有人

员二百五十名，由德霍特曼任队长。这个船队尽可能地避开葡萄牙人。船队不在非洲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岛之间逆莫三鼻给暖流而上，而是转向马达加斯加的南端，绕过这个大岛，然后直插印度尼西亚。1597年，这次远征的幸存者满载胡椒而归，这批胡椒足够抵偿远航的化费。这次成就虽然不大，但却推动七人合伙的公司又进行了一次远航，并促成了别的一些公司的建立。这样，到1598年，就已有二十二只荷兰船驶过南非了。

东印度公司

1602年，七省联盟当局，[1]经过繁难的谈判，终于成立一家统一的公司，以代替分散的行动。这就是"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的资本在当时来说是很雄厚的——近六百五十万荷盾。阿姆斯特丹的股份在其中占优势，出资一半，派八名董事。泽兰省出资四分之一，派四名董事，其他的省或城市(德耳夫特、鹿特丹、侯恩和恩克霍伊曾)各出资

---

① 1579年，荷兰北部七省(见前节注)独立，联合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译者

十六分之一，各派一名董事。此外还有一个第十七名董事，这些董事组成“十七人董事会”。在将近二百年的时期里，这家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一直是由“十七人董事会”管理的。这家公司以后占据了荷属东印度，并在公司成立五十年后，建设了开普敦这个城市。但是，开始时荷兰人对于在非洲南端定居，似乎不那么感兴趣。有一个时候，人们甚至还以为英国人可能先在那里立足。

本书前文已说过，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败绩使英国获得新的力量。英国的航海家，由于进行了两次绕全球的航行，他们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一次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于1577年到1580年间进行的；另一次是托马斯·卡文迪什于1586年到1588年间进行的。因此，1600年成立“英属东印度公司”，那就不足为奇了。该公司的一个职员于1613年向公司老板建议说，遣送一些罪犯到南非去，确切些说送到好望角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常常有船只在那里停泊，补充淡水和牲口。老板送了十个人到桌湾去，但他们一有机会就乘过路的船跑掉了。1615年，一个英国大使馆的牧

师爱德华·特里，在去莫卧儿帝国[1]朝廷的途中，也曾在桌湾登岸。对这一地区他热情地描绘说："气候温和，地上长满野生的芳草。"但不应该忘记，这种良好的印象是一个不得不在几个星期内忍受当时船上的肮脏和简陋生活的旅客所感到的。

一面英国旗

1620年，杰克一世国王陛下的两个军官，希林和菲茨赫伯特，在桌湾升起了英国旗，想以此强使英王承认既成事实。但伦敦拒绝承认这种未经许可的行为。所以好望角那时仍然没有欧洲主人。一次航海事故终于促成了占领该地的决心，并使葡、英、荷这三个竞争者显出了高低。1647年，一艘从印度回航的荷兰船哈勒姆号在桌湾遇到风暴而搁浅。船员上了岸，抢救了一部分货物，临时在海滩上安顿了下来。直到1649年才来了另一艘船，把这些遭难的人送回国。来救这些受难者的船员中，有一个人叫扬·范里贝克，不久

(1) 十六至十九世纪的印度王朝。——译者

以后，他就成为好望角的第一任司令官。哈勒姆号的船长伦德特·扬斯宗一回到荷兰就建议在好望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据点，以免将来别人再遇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幸。值得注意的是：扬斯宗和同他一起提建议的尼克拉斯·普鲁特在他们的报告中曾提到有可能不必化很多钱就能保证一小批欧洲移民的安全，同时着重指出，必须建几个堡垒，并任命一个“公正和善于应付土著”的军事指挥官。这同葡萄牙人给纳马人造成的坏名声恰好相反。

“十七人董事会”经过长期犹豫，接受了扬斯宗和普鲁特的建议，并决定送第一批移民去桌湾。他们把司令官的任务交给了扬·范里贝克，后者曾在好望角逗留，并带回了丰富而有用的材料。1651年12月，三艘船在须德海入口处的维林根集中。圣诞节的前夕，小船队启锚出航。范里贝克在单峰驼号船上，另两艘船，白鹭号和好望号，装着设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第一批移民中有四名妇女；其中有范里贝克的妻子，她是法国新教徒，名叫玛丽，娘家姓德拉凯勒里。这就最清楚地指出了这次航行已不再是一次一时的冒险行为，而是开始在该地生根了。

第四章 范里贝克时代

1652—1662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形成一个民族呢？才能形成一个具有它自己的特点、习俗、语言和本能的民族呢？用不了多久的时间，至少在南非是如此！在这个辽阔地区的整个历史中，不论是“白人”、是“黑人”、甚至混血种人方面，我们都可看到，显然并不怎样稠密的若干人群很快地形成非常团结一致并且迅速具有坚定意志的“民族”。我们仅仅看到结果而难以弄清其原因。也许可以认为，由于土地辽阔，在长时期中不受空间限制，从而便利和促进了民族“汇集”的过程。

三支荷兰船载来的新到移民也并不例外。仅仅十年的功夫，后来形成为“布尔”民族的过程已经开始了。然而在起初，东印度公司绝对无意去建立，甚至也不允许别人去建立一个新的民族。

利 润 和 人

东印度公司是个资本主义企业，是最早的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一，其目的完全在于谋求利润。对于它所派遣到开普的那些人，是漠不关心的。它所关心的只是它认为这些人应当提供的劳役。一个简单的例子充分说明该公司目光只看到物质利益：它竟然拒绝派遣一个牧师，认为这是无用的、花费太多的举动。荷兰当时刚刚以反抗西班牙的国教——天主教的名义获得独立；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竟从“世俗”方面着眼，是意味深长的。公司不肯派牧师，而只给那些移民派去一个“病人安慰者”，一则费用较少，二则还可充任在该地出生的孩子们的教员。

当时的移民也仅限于公司的雇员。这个一百多人的小团体包括下级行政人员、士兵、建造简陋住屋的工匠及一些园丁，后者负责迅速生产一些过路停泊的荷兰船只以及外国船只需要的东西。只此而已。东印度公司的重心是在巴塔维亚或阿姆斯特丹而绝非开普，开普只是一个“歇歇脚”的

停泊所而已。

但是有必要对在开普定居下来的这些人的情况很快加以注意。这些人并不都是荷兰人。例如我们上文提到，范里贝克的妻子就是一个原籍法国的胡格诺派信徒，她的家庭早在撤消南特敕令[①]之前就迁居荷兰。另外有好几个比利时人，他们来自在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②]后仍处于西班牙控制下的荷兰南部。其中有佛来米人和华龙人，例如，有人姓迪普雷，有人姓瓦内。还有一些德国人，例如，克勒滕·德科伦这个人后来就作为第一个“布尔公民”而名列史册。这时正是1652年，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那些领半薪的退伍军人大概向往到海外去冒险，以便能在那里依旧度兵士的生活。由此可见，开普移民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

在范里贝克的三方鼎立时代的开普还有第三方面的因素：非洲人。布什曼人是不会冒险到正

① 南特敕令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在南特地方颁布的敕令，保障法国新教徒有信仰自由，并享有一定公民权利。1685年路易十四下令撤消，此后大批新教徒被迫流亡国外。——译者

② 三十年战争后，1648年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省签订的和约。西班牙承认荷兰北部各省独立。——译者

在建立开普村落的海滨来的，但是他们却遍及内地各处，纳马人和白人移民都对他们又怕又嫌恶。在这些纳马人里首先同范里贝克的当局发生联系的氏族是“比区兰格人”或“斯特兰洛普人”，这个氏族当时已很衰弱，大概是被别的一些组织较好的部落打败了。他们甚至没有牲畜了。这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团体靠拣食海里的蚌蛤等为生。但是他们的首领哈里却成了范里贝克的重要助手。他懂得一点英语。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早在荷兰人定居的最初的日子里，英国的阴影已经在开普出现，即以哈里的洋泾浜英语的形式出现。

在离海滨不远的地方有组织得较好和较强的几个纳马人部落：果肖夸人，他们生活在桌湾以北，首领叫奥伊迪西阿，不久人们就称呼他们为“萨尔达纳人”；在小小的白人殖民区之东有果林海夸人或“开普人”；最后有果腊舒夸人，又叫“偷烟草者”，这是他们的部落的名称。这些部落都拥有开普和过路船只所需要的牲畜，因此他们很快地就同荷兰人打起交道来。

最后，开普殖民区在定居之初就不得不办理它自己的“外交”。当英国或法国的船队经过开普

时，如何接待它们，当然无法立即得到阿姆斯特丹的指示。因此不得不自己拼凑起一套道地的外交，并且还有一支小小的军队作后盾，这支军队驻扎在最初几个月内就已修好的堡垒里。

以上是各种人的情况，以开普为名的新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发展起来的。范里贝克当务之急是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公司对这个非常简单的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也有过规定。这个机构主要是"政策会议"，由"司令官"主持（到1672年开普的行政首长才取得总督的头衔）。政策会议是制定法令的立法机关，又是审理一切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庭，而且审理案件更多地是依据公正的原则，而不是依据成文的法律。① 会议成员是公司的几个官员和军官。遇有荷兰船只在开普停泊，则船上的军官当然有权参加政策会议的讨论，会议这时就叫作"扩大会议"。一般移民没有任何代表。但不久这种专制的办法就被打破了。民主的精神战胜了"十七人董事会"的意志。从1657年起，当政策会议作为法庭审理案件时，警察和驻

① 例如，在1656年审理一个过失杀人案，仅仅判处被告停薪一年。

军的两个班长得参加会议。到1675年，三个“布尔公民”也得到在同样情况下出席会议的权利。可是当时很多移民已经取得“布尔公民身分”的特殊地位。

移民的地位问题成为最初的“内政”事件之一。在1652年，所有到达开普的移民都是公司的雇员，领取定额工资。这完全符合在阿姆斯特丹的领导者唯利是图的想法，他们把畜牧和园子里的全部收入都攫为己有。

但不久出现了移民个人可以在纳马人那里获得牲畜的情况。这些移民直接把牲畜卖给过路的船只而获利不少，但公司却受了损失。因此需要制定惩办的措施。当时的制度还有一个缺点。园丁既然领取定额工资，便对努力提高农业生产丝毫不感兴趣。这些明显的经济法则很快地促使范里贝克要求公司的指示适应当地的现实情况。

布 尔 公 民

1656年阿姆斯特丹当局同意授与某些雇员“自由经营证书”。他们从此成为“布尔公民”，但

从一开始这种自由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公司同意给他们土地，但对于产品如小麦、蔬菜以及牲畜，却依然只有公司才能购买。当公司出的价格太低时（这是经常发生的），移民就试图私下交易。结果当局的利益受到侵蚀而农民则向往自治。

新制度于1657年开始实施，当时有二十多个农民取得“自由”地位。农业生产迅速提高。范里贝克本人也经公司同意在开普半岛上开辟了两个农庄种植葡萄。[1]

但是独立农庄建立不久就引起同纳马人的纠纷。要知道纳马人放牧的地方从来不是买来或租来的。荷兰人把这些牧地看作荒地，以前已经引起一些事端。1653年“开普人”偷了四十头牲口并且杀了放牧人。又一次有几个荷兰人的孩子在村外附近玩耍，他们衣服上的铜钮扣引起了纳马人的注意，后者跑来把钮扣扯下逃掉了。但必须说明孩子们本人并未遭受伤害。范里贝克向阿姆斯特丹当局要求准予出兵讨伐。“十七人董事会”拒

① 一般人都认为葡萄是由胡格诺派教徒于1688年传到开普的。其实不然。但当地最早的职业葡萄种植者是法国人维利埃兄弟二人，原籍法国拉罗舍尔地区。

绝了。司令官怀疑哈里与几起窃案有关，把他辞退了，换上一个年青的纳马女人作翻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夏娃。但是夏娃代替不了哈里，他到1655年又回来供职。和平又行恢复，而且与萨尔达纳人的关系还是近乎友好的。

自由农庄的建立又引起了冲突。农民们抱怨"开普人"常来盗窃，他们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但阿姆斯特丹当局不肯改变政策。不久人们就常常既责备阿姆斯特丹当局胆小怕事，又非难公司不肯提高价格。最后缺乏劳动力也使移民感到恼火。

第一次"输入"奴隶

关于最后一点，范里贝克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1658年他取得公司同意后批准输入第一批奴隶，这样南非"团体"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分。这些奴隶来自安哥拉。其中有几个一遇机会就逃走了，而且通过哈里同开普人拉上关系，鼓动开普人又来盗窃牲畜。这一次哈里被流放到开普外海的罗本岛。同时，农民们自己主动——这是未来时

代的另一个先兆——把开普人的首领果果塞阿抓起来，而且在几次拖延后才把他送交当局。又发生了几起盗窃尚未收割的烟草的事件，范里贝克不但不允许农民去惩罚偷盗者，反而禁止种植烟草。过了几个月，他又禁止纳马人与“布尔公民”之间交换牲畜。

积怨既深，小事就足以引起轩然大波。“布尔公民”联合起来提出一项控诉书，指控公司对他们的压迫。幸而范里贝克善于周旋，才得避免一场真正的革命。司令官向阿姆斯特丹当局打了一个报告，当局一方面责备范里贝克不够果断，但另一方面提高了收购自由农民小麦的价格。这是“布尔人”① 对外部势力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另一场胜利几乎随之而来。由于开普人掠夺不已，自由移民迫使范里贝克正式向纳马人宣战(1659年5月19日)。几年前曾经领导首次向东北部探险的阿布腊姆·加贝马担任指挥。除了公司的职业士兵外，还动员了农民参加作战。从此产生了为布尔人所乐用的“民团”制度；它直到现在还是南非军事组织的基础。战争一直打到1660

① 布尔人在荷兰语中意为农民。

年4月，以取得一项妥协办法而结束。殖民区移民把他们被盗窃的牲畜作为他们取得的土地的代价，从此这些土地完全归他们所有。划定了边界，范里贝克打发人树立了一道篱栅。

停战以后，自由移民立即又越过边界活动。明着是说去寻找新的市场以取得牲畜的供应。实际上新农田的发现不久就将那些最坚决的农民吸引住了。“大迁徙”的精神那时已经露头了。1660年一个远征队就在这种情况下到达皮奎特伯格地方。第二年范梅霍夫和埃弗兰德越过了奥利凡茨山，而克鲁伊特霍夫则致力于同小拉马兰地方的部落建立联系。殖民区当时有欧洲人三百九十四人，其中九十三人是“自由”农民。但是在自由农民中有五十七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正是在那些人中出现了一些冒险家，他们总是要求往前推进，想一钱不花占取土地。尽管公司反对，他们终于成功。在1662年年底以前，公司把范里贝克调回了。这个卓越的人物用了十年功夫成功地使他所领导的小小团体在当地扎下了根。他看到了以后发展的有力线条已经勾划出来：由于反抗专制主义的统治，由于同时经营农业和牧畜

业的"农民"的自由扩张，以及由于建立了一个能攻能守的民兵制度，阿非里卡人的萌芽已经出现了。

第五章　开普的扩张及其问题 1662—1770

范里贝克离职后，“司令官”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再一次尖锐起来。前司令官还懂得同移民保持一种带人情味的接触。他以后的继任者：瓦格纳、范夸尔贝、博尔格霍斯特、哈基乌斯、果斯克和巴克斯，都不是这样。尽管阿姆斯特丹几次派了检查团，而且在1672年给了司令官以“总督”的头衔，但这些总督更替频仍，其中有两人还几乎经常患病，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加强他们的权威的。

民族和畜群

农民与地方当局间的关系只是待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另外还有同纳马人的关系问题。开普对

其邻近的地区开始发生侵蚀的作用。那些离开普最近的纳马人氏族牺牲他们的牲畜和土地，换取很快就用掉的消费品，如棉织品、玻璃制的装饰品、烧酒等等。在这种经济关系的影响下，这些氏族迅速解体。到1663年已有一些纳马人完全脱离自己的氏族，全家来到开普，以卖劈柴或作仆人为生，从而逐渐沦为奴隶。

另一方面，当时开普成立了学校，瓦格纳允许纳马人的儿童也来上学。应当指出，象当时开普殖民区那样一些远远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还想致力于对非洲人的教育，这的确是不简单的。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总督显然有意给土著人一个好机会。还有一个决定也明显地表示出这一点。自从1660年订立协定以来，殖民区的边界到处都被打破了。不但在范里贝克所树立的界栅之外建立了一些私人农庄，而且公司本身也创办了一些"牧畜站"，尤其是在萨尔达尼亚湾。因此荷兰的领地需要重新划定。阿姆斯特丹派来的一个"专员"（按照现代的语汇说就是一个殖民地督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正确地认为对土地照章给价购买，就可解决一些不明不白的争执。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合情合

理的价格，一千六百镑，① 作为购买下列地区的代价：这个地区将划定为由萨尔达尼亚湾直到福尔斯湾以东的荷属霍屯督人所住的群山顶峰。但是这项交易的结果却与人们所期待的正好相反。地方当局答应作价一千六百镑，却只给了九百，而且还是以几种货物充抵现款，货物的价格又由欧洲人“估定”。这是第一次严重地违反规定，并且由于一件更激怒人心的笨拙举动而使情况更加严重。一个名叫果尼马的萨尔达纳人部落酋长没有被邀请参加购地的安排。可是此人却自命为萨尔达纳人所有民族的最高领袖，公司的畜群也是在属于他的一部分土地上放牧的。很难确定果尼马的要求有多大根据，但是如果把他约来一起签订1672年的条约，其实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个酋长就是因为未能得到贩卖纳马人土地的利益（虽然是很小的利益），他就决心要赶走欧洲人。他派人在“谋杀谷”袭击并且杀了几个“布尔公民”，进而侵入在萨尔达尼亚湾的畜牧站，杀死了另一个欧洲人。殖民区于是同两个纳马人酋长克拉斯和库普曼结盟，对果尼马进行了一场相当长和艰苦的

① 原文为 livre，此处作者未写清是哪国货币。——译者

战争。同以前一样，荷兰巡逻队的成员主要都是“布尔公民”，因为他们比开普堡垒里的士兵更熟悉当地的情况。但也正是巡逻队在冒险深入内地的时候首先遭到布什曼人的袭击而受到损失。在巡逻队一次追击中，布什曼人成功地袭击了他们，杀死三个队员。人们认为果尼马是这次袭击的煽动者，便发动了一次更加强有力的战役。1677 年果尼马要求停战。但是战争已把其他的纳马人部落都吓得逃往北方去了，从而忽然使殖民区有了更多的活动地盘。纳马人在开普附近的使命已告结束，荷兰人从此加速扩张。

种族混血的最初情况

这一段期间在居民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1667 年东印度公司曾把一些反抗当局的爪哇人流放到开普。他们被看作是自由民，当然他们的情况是很贫苦的。因之他们很快地同那些脱离部落的纳马人接近，那是不足为怪的。马来人与纳马妇女结合，生育了第一批有色人混血儿。不久由于荷兰人与纳马妇女结合，有色人混血儿日

益增多。南非的那些官方历史学家对混血儿一事讲的非常谨慎。他们再三强调马来人同纳马人的混血，但不将全部事实都讲出来。七十年以后，住在当时殖民区北端哈米斯山的一个名叫亚当·科克的混血儿得以集结了一个混血儿的部落：这就是格里夸人。按照当时南非的"法律"，格里夸人很快地组织为部落，后来又成为国家。对这个混血儿集团的形成，很难认为是马来人起了主要影响，因为东方人一般都住在开普敦，而这个混血儿集团却是在距离开普敦很远的地方产生的。

但这已是十八世纪的事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十七世纪吧。由于当时有一个卓越的人物作总督，而且此人长期任职，有时间推行一个前后一致的政策，因之在十七世纪结束时殖民区展现着美好的前途。此人是西蒙·范德斯坦尔，[1]他领导开普的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使殖民区的生活焕然一新，开辟了新的远景。他早就是国外的移民，其父曾任当时归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毛里求斯岛的总督。范德斯坦尔很快看出来只有开辟新地才能

---

① 现在的斯特伦博希就以他的姓命名，意为范德斯坦尔小树林。

满足“布尔人”的欲望，才能满足荷兰船队和殖民区本身对给养日益增长的需要。当然十七人董事会对出售货物依然要保持有利于它的垄断，但这种垄断愈来愈为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易及走私所打破。对此范德斯坦尔听之任之，装作没有看见。

新的公民权

他开始允许集体取得土地，不把土地交给私人，从而推动了新的居民点的产生。离开普三十公里的斯特伦博希在成立的那一年就有九户（五十人左右)居民。三年后此地居民增加了相当多，已经可以开设一所学校。1687 年德拉肯斯坦建立了。

范德斯坦尔给了居民土地以后，又给了居民最初步的公民自由权。对斯特伦博希这个村子，他在 1682 年把过去属于政策会议的民事案件审判权划归当地的地方委员。这样一来，这个调解法庭的成员便完全由“布尔公民”充任。在开普，他让两个“布尔公民”参加了初级民事法庭。

当时又来了一个名叫范里德的“督察”。他负

有使命来调查荷兰帝国里的贪污事件。他路经开普，过问了这个帝国的前哨的事务。他正式规定了地方委员的权限，后者除了充任法官外，还是地方上的行政官。为了使公司看来是保持了严格的合法性，范里德任命了一个区长，作为地方委员的领导人，对开普的总督负责。但是随着土地的逐步扩张，一个不得人心和远离权力中心的区长，就愈来愈不容易在意志坚决的布尔人中间站住脚。虽然如此，但这个在1682年由范德斯坦尔和范里德几乎是仓卒制定的制度却一直保持到1902年布尔共和国的覆灭。

范里德的使命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果。为了使开普的财政达到收支平衡，他建议接纳新的移民。因为这一回建议是由一个从荷兰派来的高级官员提出的，公司遂表示同意。不知是否由于不同种族的混血引起了公司的不安，一些失去父母的少女开始被送到开普给新的移民作妻子。[1] 不久来了大批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是在南特敕令撤销

---

① 女人当时很少。1687年殖民区有二百五十四个男人、八十八个妇女（其中包括一些寡妇）、二百三十一个儿童。此外还约有四百个奴隶和二百个东方人。

(1685年)后由法国逃亡到荷兰去的。他们的到来使移民中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他们性格坚毅、不太苛求。满载法国流亡者的三只船接连地从荷兰的港口驶往开普:沃尔科滕号于1687年除夕启锚,过了几天奥斯特尔兰德号和齐翁号也接踵而来。到次年五月这批大约二百人的新移民全部到达开普。范德斯坦尔立即建立了一个新区:法兰西角。但他不想只把法国人集中在那里。他的政策旨在实现迅速的同化。这自然就很快引起争执。法国人在他们的牧师皮埃尔·西蒙的领导下,想成立一个单独的宗教团体。在总督对此拒绝以后,西蒙牧师上告到阿姆斯特丹。三年后十七人董事会基本上同意了牧师的要求。法国可以有自己的宗教团体,但须接受政策会议的监督。

在这次妥协后,荷兰人同法国人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了。现在只有在不少布尔人的姓上还可看出他们的原籍是法国,有时由于荷兰文拼音,原姓有趣地变了一些模样。例如,原籍法国曼恩的皮纳尔(Pinard)改写为皮纳尔(Pienaar),原籍奥尔良内的莱蒂夫(Rétif)改写为雷提夫(Retief),原籍弗罗尔区的克罗斯尼埃(Crosnier)改写为克隆

日（Cronje）。别的一些法国姓保留着原来写法：例如来自普罗旺斯省梅兰多尔的马兰（Malan），同样来自普罗旺斯省拉莫特代格的儒贝尔（Joubert），来自拉罗舍尔的德维利埃（de Villiers），来自普瓦提埃的迪普莱西斯（du Plessis），还有来自梅斯的诺代（Naudé）和来自巴黎的德马雷（de Marais）。在整个南非历史中常可看到这些姓名。当1699年范德斯坦尔辞职时，法国人同荷兰人已经开始通婚了。

范德斯坦尔辞职后，东印度公司任命其子继任总督。它以为是个适当人选；结果却糟极了。威廉·阿德里安·范德斯坦尔确是一个能干的行政长官，但既贪污腐化又独断专行。在已很"民主化"的布尔人中他是干不好的。但开始时他却很能干地向殖民区以北开拓新地。新地是需要的。移民不断到来，不但有荷兰人，还有主要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奴隶。很多新到的移民不想经营传统的农业而愿从事畜牧业，因为这样可以逃避体力劳动而获利颇大，尤其是自1699年底开始，以物品换取纳马人牲畜的交易已成为合法的事情。在这些新牧民中，很多人根本不再理会殖民区官方划

定的边界。有些人甚至拒纳捐税，成为真正的无法无天的人，有时还变成土匪。1702年，其中某些人同纳马人合组的一个“民团”，在菲什河与一个科萨人的类似集团发生冲突。后者也是他们部落中受大家嫌弃的人；他们不遵守本族的规定，超过了班图人南下的“前线”。因此这两邦人间发生的小规模战斗预示有一天白人同黑人将要冲突起来。

“布尔公民”的请愿

但是，在当时布什曼人成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正规的士兵[1]无法制止布什曼人偷窃牲畜，在边界的居民再一次自己起来处理这个局面，组织了一次讨伐。小范德斯坦尔不是一个能容忍这种违犯纪律的行动的人。他下令逮捕了这次反布什曼人的“民团”头目克勒特(1702年)。因此引起整个边界居民的普遍不满。不久范德斯坦尔的另一

(1) 这些士兵主要是从德国和瑞士招募来的，他们习惯于驻守某地而缺乏在“南非田野”作战的经验。他们是后来由各方面人组成的布尔人的另一成分。

措施又激怒了住在殖民区内地的"布尔公民"。他趁当时长期干旱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使用了不能容许的压力以及由于他的左右的行贿，巧取豪夺了愈来愈大面积的土地。他还强制农民把产品依照规定价格卖给他，然后他和他的部属把这些产品以高达三、四倍的价钱在市场上出售。到1705年这种舞弊的行为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叛乱。斯特伦博希区六十个农民集结在一个名叫塔斯的人的周围，起草并签署了一个宣言，控诉总督枉法肥己。这个文件将要送到阿姆斯特丹去。此事被范德斯坦尔知道了。他竟然想出一个笨拙的下策，把"布尔公民"召集起来，叫他们签署一个反宣言，称赞他对公众事务治理得好，企图以此抵销宣言的影响。他用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讹诈手段在反宣言上得到了二百人签名。但塔斯和其同伴并未被这一着吓倒。总督于是下令搜查塔斯的住宅，发现了"叛乱者"宣言的一张草稿。"罪犯"塔斯和他好几个同伴立即被捕下狱。但是其中有四个人要求到荷兰受审。范德斯坦尔考虑不周，召集了一次"扩大政策会议"，后者认为这个要求符合法律规定。这四个人于是被解往阿姆斯特丹。然而

命运却同这位总督开玩笑，“叛乱者”终于把他们的著名宣言交给了船上的一个心腹密友，因此宣言和这四个人同船去荷兰了。

被告人虽然走了，但骚乱并未因此中止。某些农民因为拒绝接受总督的传讯，总督便决定把他们驱逐出殖民区。但这些人得到边界居民的支持，又跑回殖民地来，表示他们蔑视当局。最后在1707年4月阿姆斯特丹宣布了它的决定。范德斯坦尔、他的副手和斯特伦博希的区长一律罢官，他们的财产大部充公。所有下狱的农民立即释放。“布尔人”胜利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胜利。

哈姆的子孙[1]

继范德斯坦尔之后任总督的范阿森堡赫也忘不了这一事件。他避免采取任何不得人心的措施。相反地，他听从了一个过路督察的劝告，公布了一个只会使“布尔公民”高兴的命令。在这之前，奴隶只要改信基督教就可自动地获得自由。

---

[1] 据圣经说，哈姆是诺亚的次子，他的后代是非洲人的祖先。——译者

但因对被解放的奴隶的生活如何保障毫无规定，获得自由的奴隶几乎总是扩大了当地无产阶级的队伍，而且还时常变成罪犯、尤其是小偷的后备军。因此命令规定，奴隶获得自由后，他以前的主人有义务在十年内负责他的生活。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奴隶获得解放的情况就极少了。这个措施还提出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在这之前，当时人认为实行奴隶制是“有理由”的，因为它有可能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自范阿森堡赫公布了他的命令以后，奴隶制成了只是在经济上提供方便。怎样为它辩解呢？

这个问题逐渐才得到解决而且解决方式是令人惊异的。南非的某些神学家竟然相信：“哈姆的子孙”天生地要过劣等人的生活。他们信什么教没有多大关系。这些神学家大胆地解释圣经，在某些章节仿佛找到根据。十九世纪的一个极端的教派“浸礼会”更进一步，这个教派的牧师竟然教诲人们说，黑人是没有灵魂的。

远在提出这样的奇谈怪论以前，奴隶的命运已经很悲惨了。按照十八世纪中叶的报告上的说法，有23%到35%的奴隶死于转运途中（奴隶上

要来源是从马达加斯加运来，相对来讲航程不算远)。其中有一个报告述及一个英国船长曾在开普声称，因为奴隶在船上发生骚动，他不得不下令把相当数目的奴隶抛到海里去。在1754年一个最得人心的总督、虔诚的教徒里克·土耳巴格发布了一道对待奴隶的命令，规定：凡奴隶打了他的主人，即使是徒手，不论男女一律处死；奴隶犯了最轻微的过失，也要受到鞭笞的处罚。因此，在埋葬尸体的时候，如果在墓地遇有奴隶，后者就要受若干下的鞭打；照一个作家说，“因为他们吵吵嚷嚷，扰乱了葬仪的严肃气氛”。最初还要奴隶的小孩到学校读书，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但在1710年后，这种习惯也丢掉了。连边境农民的孩子也常常上不了学。这种放弃对奴隶进行基督教教育的情况，使奴隶以他们自己独特的形式提出了抗议，他们纷纷改信马来人所输入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徒甚至还组织了一次朝圣，从开普到1699年死去的约瑟夫“教长”的陵墓。后者是一个被荷兰当局流放到非洲的神秘主义的宗教改革家。

纳马人的大量死亡

荷兰人、非洲人、马来人、自由人和奴隶！1713年一场可怕的灾祸表明他们虽有社会界限，但都是人，在根本上没有区别。一支从印度回来的船带来了天花。四分之一的移民因此死去。纳马人则一死就是几千。在殖民区周围生活的某些部落全部死亡了。于是纳马人不能再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发挥作用了。[①] 这只能鼓励人们去从事“迁徙”，即愈来愈向更广阔的土地扩张。殖民区本身也进行了官方的扩张。它占领了莫三鼻给的拉瓜堡，把它作为进入莫诺莫塔帕帝国[②] 的根据地，这个堡垒是在大约二十年前被葡萄牙人放弃的。但殖民区这支远征队人数太少，注定要遭到失败。1722年一群海盗袭取了这个堡垒。当时有十八名兵士竟然参加了海盗的行列，这也足以说明这支队伍的质量。

---

① 十九世纪初在西南非洲重新出现的纳马人“部落”实际上是些新的集团，几乎全是混血种人。

② 班图人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在非洲东部和中部建立的大帝国，至十七世纪实际上已沦为葡萄牙的保护国。——译者

纳马人大部分被消灭后，布什曼人就成了布尔农民在十八世纪的主要敌人。当时政府不得不给予布尔人所组织的复仇“民团”以一个半官方的地位。区长如果认为他们的讨伐是有理由的，就可以供应军火。布尔人的部队这样得到承认以后，就对布什曼人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歼灭战。有些时候，行政当局想限制屠杀，答应每生俘一个布什曼人就可得到奖金。但只有那些最小的儿童才得幸免，他们被送交农民作“学徒”。有一个叫戈特利布·奥佩尔曼的北部“丛林地指挥官”作了个报告，人们只要读一下这个报告就可了解当时的大略情况：仅仅在一次战役中(1774年)他就打死了五百个布什曼人，俘虏了二百三十九个，而他的部队只阵亡一人。

作为对手的班图人

1774年屠杀布什曼人达到最高潮。不久在东边出现了另一对手班图人。但对于开普敦的公民说来，危险离他们还很遥远。城市本身面向大洋，向往欧洲，成了一个真正的都会，1775年公布

的有关礼仪时尚的几个命令足以证明。命令规定：除总督外任何人不能拥有金色的马车。只有官吏夫人及在各种会议或法庭里占有席位的“布尔公民”的妻子才有权用大阳伞。只有政策会议的成员才能带一个穿制服的跟班仆人。但是和别处一样，这些规定是无效的。开普敦的奢华竟使该城得到“小巴黎”的称号。这种繁华生活往往同外国舰队在此停泊有关，例如在1781年就是如此。

由于法国帮助美利坚合众国而引起的英法战争把荷兰也卷进去了。路易十六派絮夫兰率领一支舰队去开普以保护该地免受英国的袭击。法国海员在那里住了一个长时期，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并使浮华时髦的生活习尚得到新的推动。人们修建了一所法国剧院。

可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范围的战争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趋于贫匮。开普最末一任总督范德赫拉夫又恰巧是一个挥霍成性、妄自尊大的人。1792年公司宣告破产，从而整整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差不多同时，南非被卷入革命时期大动荡的洪流之中。

第六章 班图人的入侵

1600—1770

对中部非洲来说，十六世纪后五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那些从遥远地方观察非洲大陆内地的巨大动乱的葡萄牙人，把各部落的迁徙移动归咎于“亚加人”(Jaga)，这些迁移的浪潮一直波及通向外界的海滩。葡萄牙人说到处都有“亚加人”：在刚果河的入海口、在几内亚的海岸、在桑给巴尔的对面。这种粗线条的讲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当时的中部和东部非洲的确是处于沸腾的状态。班图人波浪式地不断向南推进。这些迁徙的原因至今不明，只能推测。是否由于含族人逐渐前进的结果呢？是否由于葡萄牙人沿非洲输入了玉米而玉米的种植迅速遍及大草原地区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从而不得不迁徙呢？是否大湖区的牲畜病疫——尤其是牛的昏睡病发生了作用呢？还是由于蝗虫成灾所致呢？也许这一切因素

都对部落的迁徙有影响。不论原因为何，总之约在1600年最初的一批班图人强行越过了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这两道屏障向南推进。

赫雷罗人

第一个因其迁徙而引起人们注意的部落是赫雷罗人的部落。这个部落属于班图族系中以放牧为生那一类型。后者大概在含族牧民的影响下放弃了在东非的传统农业。为了寻找放牧地，他们大致上沿着过去人们推测纳马人走过的道路，避开莫三鼻给的森林，向西南非前进。他们从北面绕过卡拉哈里沙漠，在1600年后不久到达西南非地势最高的地区，该部落的大部分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赫雷罗人的另一支继续前进直至西濒大西洋、北处库内内河下游的考科弗尔德地带，至今仍有名叫奥瓦欣巴和奥巴津巴的两个部落在那里过活。

赫雷罗人到达考科弗尔德时，从另一个大概比他们先到的班图人部落——奥万博人前面经过。后者虽然也有不少畜群，但主要以务农为生。

按照另外一种说法，奥万博人只不过是赫雷罗人来到后定居下来的一支。

在赫雷罗人和奥万博人占据的土地之间的空隙处住有一些布什曼人和纳马人的部落，如托普纳人和斯瓦特布瓦人。也许由于奥万博人、纳马人和赫雷罗人的混种结合，而产生了勃达马拉人吧?这个人群组织非常松弛，说着纳马人的某种方言，但夹杂着班图语。塞利格曼教授认为这是班图人到来以前便在那里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真正黑人。他们善于冶铜（或许是纳马人的影响?）和炼铁（或许是班图人的影响?）。

赫雷罗人行迹所至，很快地战胜了原在那里的人群，把他们赶走或消灭。但再往南进却未能越过温得和克地区。到十九世纪，早被赶走的纳马人甚至还夺回一些地方。这一复兴是一个新纳马人的部落奥尔拉姆人的功劳，这个部落在开普地区重新形成，吸收了布尔人的某些文化，如阿非里卡语和使用火枪以后，夺回了西南非洲一部分土地。

苏陀族

赫雷罗人迁徙不久之后，其他班图族人在更东的林波波河地带又有两次更大的移动，牵涉的氏族更多。在西达卡拉哈里，东至南非高原山麓之间，苏陀人的各部落开始南进。一个半传奇式的人物、苏陀族的创始人马西洛据说曾在十七世纪中叶领导了这次迁移。按照传统的说法，马西洛有两个儿子：一叫马洛普，一叫莫胡鲁奇。后者是巴胡鲁奇人的祖先。马洛普有子三人：克文纳、恩格瓦托和恩格瓦克兹。他们被认为是巴克文纳人、巴曼瓦托人和班瓦克兹人的祖先。巴胡鲁奇人在迁移中到达德兰士瓦西部后就停留下来。另外有几个较小的部落，例如巴克加特拉人、巴马累太人和巴特洛克瓦人的部落也在那里停留。这些部落在那里一直住到十九世纪初，而巴塔翁人则一直南进到恩加米湖周围的地区。约在1700年，向南推进最远的苏陀人曾到达瓦尔河流域。但是在这个现为德兰士瓦省南部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地区，他们并未能居住很久。在十九世纪初，祖卢

人的进攻打乱了苏陀人这些部落的分布情况。

祖 卢 人

祖卢人属于班图族系阿马津巴人的一支。阿马津巴人的入侵几乎与苏陀人同时。他们顺着一条与苏陀人平行的道路，但偏东些，沿南非高原底下的海岸平原前进。在中途有些氏族分道向东，直抵海岸定居下来。最初走这条路线的是斯威士人，他们还在那里遇到苏陀族和其他族未随部落大队继续前进而留在该地的一些人群。现在较为了解的头一个斯威士人国王叫恩格瓦恩三世，他于十八世纪末叶在现今的斯威士兰的东南定居下来。

当时还有为数不多的祖卢人停留在纳塔尔地区内更南一些的地方，而庞多人和顿布人则继续沿着从纳塔尔起就非常偏西的海岸前进。在班图族系中走得最远的是科萨人，他们首先在1700年到达凯河。六十年后他们一直推进到大菲什河畔。

布什曼人和纳马人丝毫没有办法抵抗班图人

的入侵。他们的部落比较松弛，根本没有军事组织。他们实际上还不知用铁，只有一些低级的武器。因此他们命定要被消灭或被同化，正象在南非的另一端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也是徒劳的一样。甚至可以说，班图人是下了最大决心去消灭布什曼人和纳马人的，因为在现今班图人的殖民区已经找不到以前占据者的遗迹了；可是，在白人住地却至今还有布什曼人和纳马人活着。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被打败了的纳马人有一部分为班图人"吸收进去了"。欧洲人因为人数太少，不能在南非"白人"地区实行同样的解决办法。倒是纳马人把某些白人吸收过去，从而形成了以纳马人血统为主的"奥尔拉姆"人和在生物学上来说是处于白种人和纳马人之间的格里夸人以及所谓"私生混血种人"。

约在十八世纪末，这些混血种人虽然已经说欧洲人的话了，还是逐渐北移以避免和欧洲人接触。"奥尔拉姆"人曾把一个阿非里卡人拥为他们的头目。这个人于1792年毛遂自荐为开普政府效劳，领导了一次进攻布什曼人的战役。开普政府给了他不少军火，但这个阿非里卡人却用这些

军火打败了由另一个欧洲人率领的一邦纳马人。开普政府不喜欢布什曼人，但也厌恶那些欧洲人暴徒，因之对此事不闻不问。但不久这个阿非里卡人同政府疏远了：他又率部下北迁，越过奥兰治河，在这条河中间的一个岛屿上，他创建了一个近似共和国的组织，专门盗窃牲畜。

格里夸人和私生混血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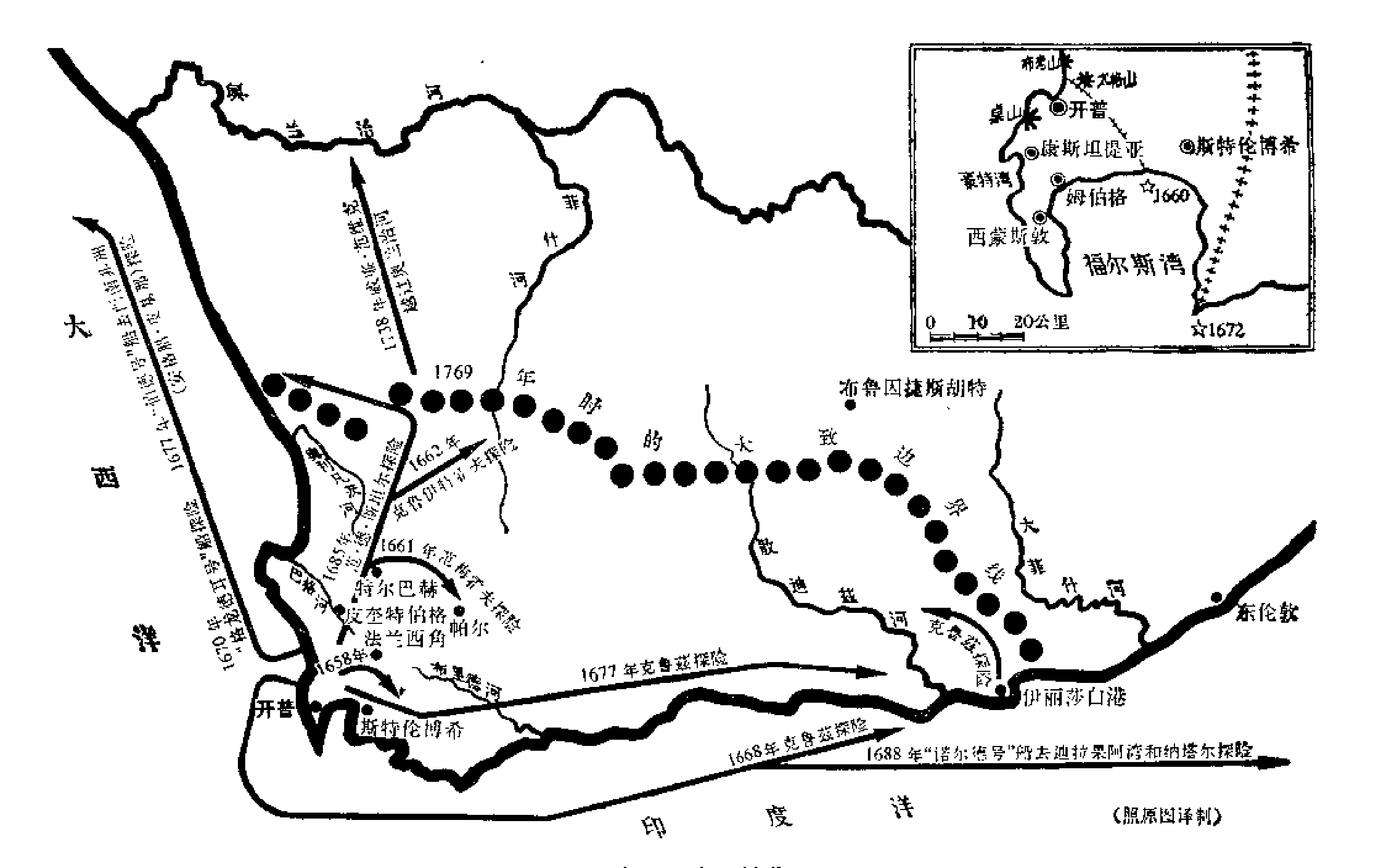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大约与此同时，在亚当·科克领导下的格里夸人也越过奥兰治河，仿照布尔人的特有方式成立了一个雏型的国家格里夸兰。最后，那些“私生混血种人”经过向西北长途迁徙后，在西南非的雷霍博斯（温得和克以南百公里左右）周围自己组成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初步形成的国家尚未巩固，德国人就吞并了这块地方。

布尔人同班图人在费什河相遇必然要引起严重的冲突。在这以前，他们在荷兰殖民区同班图人占领区之间的广阔的无人地带早就有了接触。1769年开普政府了解到布尔人同黑人非法进行

着规模不小的交易。政府下令禁止，但却无法实行制裁。三年后，情况证实，已有不少农民越过殖民区的东部边界定居，有的直到大菲什河的两岸。这些农民在一个名叫普林斯路的捕象人率领下要求政府准许他们就地定居，愿意照章纳税。六年后总督到该地区巡视，了解情况。在巡视之际，他正式接见了科萨族的某些"代表"。这些人仅是一些属僚，他们的首领还在大菲什河的另一边。虽然如此，总督依然予以隆重的接待，这些科萨人允诺尊重菲什河这条边界。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欧洲籍的亡命之徒已经越过这条欧洲人向前深入的新界限，到科萨人的住地定居。一个叫作科恩腊德·布伊斯的人在一个当权的科萨人氏族中做了顾问，暗中出谋划策。在行将爆发的双方冲突中，此人不久扮演了一个极为暧昧的角色。

黑人与白人的对峙

自1775年始，布尔人同班图人总算正式有了一道共同的边界。第二年，开普政府在斯韦伦丹区与菲什河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农业殖民区格腊



大西洋
印度洋
1769年时的大致边界线
布鲁因捷斯胡特
菲什河
大菲什河
敦迪兹河
东伦敦
伊丽莎白港
克鲁兹探险
1677年克鲁兹探险
1668年克鲁兹探险
1688年“诺尔德号”船去迪拉果阿湾和纳塔尔探险
1662年克鲁伊特夫探险
1661年范梅霍夫探险
特尔巴赫
皮奎特伯格
帕尔
法兰西角
1658年
巴格河
布里德河
开普
斯特伦博希
布考山
大加山
桌山
开普
康斯坦提亚
斯特伦博希
豪特湾
姆伯格
1660
西蒙斯敦
福尔斯湾
1672
0 10 20公里
(照原图译制)

夫赖内特，从而奠定了这个共同边界。从此白人与班图人这两个征服者有了接触。

从一开始，两者的关系就不好。当时布尔人的农民大部分以畜牧为生。而牲畜对于科萨人具有一种无法抑制的诱惑力，尤其是对于那些由于内部纠纷被迫离开其部落的逃亡者，他们一无所有，便到对岸荷兰人这边来。很快地发生多起偷盗牲畜的事件。此外，虽然农民反对有组织的黑人部落在他们认为归自己所有的地方定居，但又绝不错过机会雇用那些脱离部落、失去牲畜的单身班图人充当奴仆。在1790年前，一直到斯韦伦丹都已有科萨人作农庄里的仆人。这样一方面把黑人拒于一道壁垒森严的边界之外，另一方面却又追求役使黑人所带来的好处。这在布尔人对待黑人的态度上已经是一个矛盾了，这个矛盾的某些方面依然留在主张种族隔离者的思想中。照格特鲁德·米林[1]的寓言[2]的说法，那时的欧洲人

---

① 南非女作家，1892年生于开普。——译者

② 以下是保罗·吉涅夫斯基译为法文的这个寓言的概要：白人叫黑人。黑人来了。黑人上了路，背着白人的东西。白人仔细观看这个被他叫来的人，这个跟随着他、附属于他而且在旅途中要他养活的人。他想有别人替他背着东西倒是不错。黑

刚刚踏上了那漫长的旅途。

另外一场冲突来自科萨人历史上的一个事件。约在1785年，科萨人的大酋长腊腊布死去了。他生前曾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臣民遵守纪律。但他指定的继承人盖卡却仍在童年，酋长们于是让比他年长的叔父恩德兰比摄政。但有不少氏族拒绝承认这种安排。因此引起一场长期的内战，

人耐心地跟着他走。吃饭的时候到了。白人把吃剩下的面包屑扔给他的仆人。他们又上路了。黑人对白人是有用的，但黑人左吃一点，右吃一点，对白人的资源也逐渐取得了一些权利。主人开始有点抱怨；他自忖如果全面权衡一下，不要仆人也许更合适。旅途是漫长的。白人再一次打开了他的食粮袋。这次他决然不能再分给别人了，因为他本人也需要呀！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能把他摆脱开该多好。"他开始感到上当了。他开始怀疑黑人没有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自信，他怕黑人了。他很清楚这个土著人没有吃饱。那么如果黑人忽萌歹念，抢走他的粮食袋，把他扔在中途，他就会活活饿死。他于是开始向土著人暗示，叫他返回家乡！

——回去？土著人说，但你明明知道人们把桥都烧掉了。我怎么能够回家呢？

——你吃我嘴里的食，白人抗议说。

——但是我给你背着东西啊。

——我本来可以自己背。这样好得多！

——那么当初为什么你叫我来呢？

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进退两难。

——如果我当初不叫他来多好，白人自言自语地说。

迫使愈来愈多的科萨人逃往"白人"的地区。恩德兰比身边有一些象专门想混水摸鱼的阴险恶诈布伊斯那样的欧洲人顾问。

黑人和白人的战争因此几乎无法避免了。这一次可是不同于布尔人对纳马人和布什曼人惯用的突然劫掠。纳马人和布什曼人在人数和武器方面都处于劣势，只有打埋伏才能使他们侥幸打败骑马带步枪的农民。反之，班图人在数目上居于优势。他们很有纪律，按年龄分别编队使他们有了行动一致面且常常指挥得不错的部队，他们还有铁制的武器。除了一些标枪外，一种顶端较宽的长矛是他们主要的进攻武器，皮制的盾牌是他们的防御武器。然而骑着马的布尔人可以躲开大队班图人的进攻，用步枪从远处射击，而班图人则不得不靠短兵相接。但黑人在人数上颇占上风，因此在平坦的旷野上，布尔人无论如何是抵抗不住的。

布尔人的战术

但在双方最初交锋时，这个新的军事问题就

巧妙地得到解决了。当时（1779年—1780年）指挥布尔人队伍的是阿德里安·范雅尔斯弗尔特。这次战争在南非历史中称为“第一次卡弗人[1]战争”。范雅尔斯弗尔特创造了牛车阵。他把若干牛车摆成环形，在空隙处填满荆棘，所有战士包括家属在内都集中在这个环形阵里。车轮之间用牛皮连上，更加强了防卫。这样一个活动的堡垒足以挫败敌人的进袭，使之无法进行短兵相接的作战，而牛车阵内的战士则可以不断的射击。打退敌人进攻后，骑兵便出阵追击班图人，从远处向他们开枪，而且总是注意保持一定距离，使他们不能近战。遇有反攻时骑兵就撤回躲在牛车后边。

班图人对这个新战术一直无法招架。他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是一味企图用他们的传统战术进行决战。即使在察卡领导下已经大大改进了作战办法的祖卢人也未能想出新的冲锋方式。只有那些新纳马人例如格里夸人，虽然人数少得多，但一直到大约十九世纪末叶，始终保持着一个近乎独立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很快地学会了布尔人的战术。

① 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黑人土著的蔑称。——译者

布尔农民虽然在军事上占优势，但不愿总是过着不断同科萨人打仗的生活。他们觉得既然已经纳了税——虽然下文将指出，他们远未如数缴纳——就要求当地政府对在1775年到1776年划定的边界予以必要的保障。可是东印度公司此时已处于破产的前夜。它主张用外交方法同班图人谈判而不使用武力。1789年在一场新的入侵的威胁下，格腊夫赖内特的区长批准召集民团，但总督不同意，命令区长组织一个调查团。在调查团的一个成员、区书记官迈尼厄的影响下，该团作出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布尔人明显地不尊重科萨人对其牲畜的产权，而科萨人也随意拿布尔人的牛。

调查团的结论使农民大为恼火。他们尤其怨恨迈尼厄。骂他是卢梭"邪说"的信徒。当1793年迈尼厄被任命为边境地区区长时，农民更加不满。在这一任命的同时，发生了一个新的危机：布伊斯和他的几个白人朋友鼓动恩德兰比去抢掠盖卡的牲畜（以便这些白人将牲畜的大部分并为己有）。在几次劫掠中，布尔人也有一百一十六个农庄遭到抢劫，有几个农民被杀害。经过一番

无效的调解后，迈尼厄不得不动用民团。那一年大旱，队伍缺水不易进展；牲畜也多死于饥渴。布尔人获得几次小胜以后，不得不中止战事。

妥　协

迈尼厄同科萨人达成一项妥协。凡是活着的家畜，经查看烙印认出是布尔人的财产，科萨人应予归还，科萨人并应撤回菲什河彼岸。但因这年干旱，只收回了四千头牲畜。农民们怒不可遏，他们硬说失去的牛达六万五千头之多。迈尼厄公正地指出，前一年他们在纳税单上只报了八千头家畜。他们对此论据难于作答，不然就得承认自己偷税漏税。

迈尼厄回到格腊夫赖内特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冲突起因的报告，着重提到了布伊斯及其阴谋，列举了农民们对科萨人奴仆的虐待，并证实有二十八家被抢劫的农庄座落在菲什河彼岸，从而明显地是在科萨人的地区。公司当局欢迎这个报告，尤其是因为这个报告可以使它避免准备一场新的讨伐，而农民们正在大声疾呼要求进行讨伐。原来

此时公司已经正式宣告破产，无力支付战费。它于是再度宣告双方以菲什河为界，迈尼厄仍任区长。这对边境农民说来是个彻头彻尾的侮辱。他们公开谈论要搞分裂活动。第一个布尔人共和国即将诞生了。

几乎同时，一场严重的外部危机在开普爆发了。殖民区一直长期处于舒适的孤立状态，但这种状态已告完结。世界历史在非洲的南端登上了舞台。

第七章　破产、革命和英国人

1770—1806

从 1782 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不再向股东付股息了。旧的垄断贸易制度已临末日。1781 年对英国宣战更使它趋于崩溃。战争是由于英国舰队干涉被它疑为向反英的北美输送给养的中立国船只而引起的。许多荷兰商船被捕获或击沉。十七人董事会债台高筑，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1778 年公司欠债七百五十万荷盾，1790 年增到八千一百万。在开普，范德赫拉夫的挥霍特别骇人听闻。供总督私人使用的马就有一百二十四匹，马车约有十二辆。开普的收入仅够支出的五分之一。

最后的挣扎

在债权人和荷兰的三级会议[1]的压力之下，东印度公司在1791年作最后的挣扎以免彻底破产。2月份，公司调回范德赫拉夫，命令停止一切建筑工程，大批裁减开普的卫戍部队，把大部分办公房屋出卖或出租。最后，公司同意把官员“役使”的奴隶大部分卖掉。结果立刻引起经济衰退，只能使居民更为不满。1792年7月到了两个“特派员”，他们来研究采取上述措施后的效果和进一步节约的可能性。“布尔公民”的一个代表团立即把他们包围起来诉说苦情。由于这个代表团毫无合法地位，从而被拒绝接待。特派员于是开始工作。他们的如意算盘不外乎增税及发行纸币，后一办法不久酿成前所未有的通货膨涨。为了平息居民日益增长的愤怒，特派员作出一些“让步”：满足公司需要以外的小麦得自由买卖；鲸鱼得自由捕捉（但是在开普没有捕鲸的专家）；开辟三个

(1) 即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举行的会议。——译者

港口以便向印度自由输出商品，但须由荷兰船只运输(但荷兰船所余无几)；允许直接向马达加斯加和莫三鼻给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奴隶（但由于经济不景气大家都已几乎破产)。

正在经济完全停滞、居民不满达到顶点的时候，革命的法国同英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荷兰的执政同英国结盟，而荷兰的“爱国者”运动却同法国联合推翻执政，宣告成立巴塔维亚共和国。东印度公司也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垮台。

大革命的余波

但是这些消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到开普。几个月后，人们知道了宣战的消息，但到1795年初还弄不清究竟谁同谁作战。这一次在当地掌权的是新来的特派员斯吕斯肯斯，他部署了对开普的防卫，但信心不大。他只集结了一千三百人，其中还包括一个由二百一十名纳马人组成的步枪队；至于民团这个唯一有战斗力的队伍却不肯爽快地响应动员令。在三千被征人伍者中只有一千七百人去开普报到，其中某些人过了几个月还看

不见敌人到来又返回家乡。格腊夫赖内特区本定要提供三个连的兵力，却无一人去开普。

事实上在边境地带已发生了公开的叛乱。1795年2月，由范雅尔斯弗尔特率领的一个有四十人的“委员会”（或者说一邦人）把当地区长迈尼厄赶出官邸。斯吕斯肯斯因兵力不足，派了一个小组去想法妥协。但小组成员也被赶走。当地举行了完全非法的选举，选出一个叫格罗茨的人当区长，代替迈尼厄，而原来的地方委员就成了议员。① 当年3月，另一个边远地区斯威伦丹也起来造反，选出了一个总统并成立了“国民议会”。这两次革命毫无思想方面的基础，只是因为农民听人说过共和主义，又看到他们所憎恶的官员打着奥兰治王子的旗号，因此立刻宣称他们是共和派和“爱国者”。

当时特派员对此即使想加以惩办，也力不从心。1795年6月11日，从开普半岛的另一端来了一个信差，报告有一可疑的舰队开进福尔斯湾。这是英国人到了。不久斯吕斯肯斯收到指挥着四艘

① 格腊夫赖内特共和国有一千四百成年人、一千七百儿童和六百奴隶。

军舰——响尾蛇号、庄严号、阿美利加号和回声号的英国海军上将埃尔芬斯通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舰上去看执政奥兰治王子给他的公函。在公函中，王子要总督将开普交给英国人。斯吕斯肯斯拒绝离开陆地，在取得这封公函后，又推托必须等候阿姆斯特丹的指示。但他应允负责"英国盟军"的给养。此后在一个月中，在开普城堡和英海军主舰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言词彬彬有礼，但日益冷淡。后来到了7月，来了两艘美国船，带来荷兰的信件。埃尔芬斯通下令将船上的信件报纸扣留检查。因为他明白这些信件报纸将证实斯吕斯肯斯所怀疑的情况：荷兰已经成立巴塔维亚共和国，而执政奥兰治王子已被革命推翻，逃往英国避难。但是由于检查的人疏忽或不懂荷兰文，有几份报纸和信件为开普当局收到，后者从而获得他们寻求的情报。虽然当时开普大部分负责官员在感情上是亲奥兰治派，但他们不敢再把英国人当作盟军对待了。斯吕斯肯斯放弃了西蒙斯敦，把他的有限兵力集中在福尔斯湾北边不远的穆伊曾伯格。埃尔芬斯通立即命令一支有八百五十人的队伍在西蒙斯敦登陆，接着在8月7日炮击穆伊曾伯格。

军心涣散的荷兰兵一闻炮声立即溃逃，阵地被英军占领。但埃尔芬斯通对派兵登陆攻取开普一直下不了决心，因为他怕有荷兰舰队开来袭击他的无兵防卫的船只。幸运的是不久开来一支英国的舰队。克雷格将军率领三千海军陆战队来增援。9月14日英军开始向开普进军。只有布尔公民们的民团骚扰英国人的进军，正规军又是不战而溃。进攻第二天，开普在得到很有利的条件后投降。

英国人和共和派

埃尔芬斯通成为开普的主人以后，对自己占领的这块地方如何处理却心中无数。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对战败者给予宽大待遇。在英国这个海军上将的心目中开普不过是个海军基地。但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也不能容许在自己背后有斯韦伦丹和格腊夫赖内特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存在，这两个共和国，那怕是出于策略上的理由，都宣称它们是站在巴塔维亚共和国一边。埃尔芬斯通摆出一副架式，要派一支部队进攻斯韦伦丹，结

果这个地方的“共和派”马上屈服。格腊夫赖内特共和国则仗着距离较远，试图用迂回的办法应付。共和国的革命者在给克雷格的一封有礼貌的信中要求确认他们非法选出的格罗茨区长，并要求有补充军需品的自由。克雷格仅答以在新任区长到达前，格罗茨可暂时留任。1786年2月，一个名叫布雷斯勒的荷兰人被英国人任命为区长。此人就任后在该区办公地点挂上英国国旗，并要布尔公民来机关向英王陛下宣誓效忠。但数小时后有人通知布雷斯勒说，当地人已选出马廷·普林斯路为“人民之声的保护人”，后者以此资格禁止任何宣誓。当时英国国旗被扯下，布雷斯勒带着一封陈述农民条件的信被赶回开普。这是一封天真而傲慢的信。普林斯路要求与开普有通商的自由，并要求送去军需品和衣服。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服从英国人制定的所有“合情合理的”法律。克雷格将军看穿了反叛者的弱点是缺乏军需和消费品，立即下令封锁该区。仅此一着就足以使格罗茨和一部分居民屈服。普林斯路则逃至丛林地带继续抵抗。但不久荷兰援军一连吃了两场败仗使他认识到抵抗无济于事。一支来收复开普的庞

大的荷兰舰队在萨尔达尼亚湾遭到英国舰队和克雷格一支部队的夹攻，未战即降。另外从巴塔维亚开来一艘满载军需品、特来接济反叛者的船在迪拉果阿湾未及卸货就遭到袭击。这两次败绩结束了格腊夫赖内特共和国的寿命。1797年7月，布雷斯勒终于又来就任区长。但边界居民的反抗精神并未因此丧失。

格腊夫赖内特垮台一年半以后，1795年的积极分子范雅尔斯弗尔特因伪造了一张纳税收据而被捕。这一事件立即又引起造反，普林斯路再次担任指挥。甚至布伊斯也参加了这次新的叛乱，想借此在布尔人中间恢复自己的名声。但克雷格的继任者即达斯将军现在已拥有足够的兵力，他派遣了两支队伍开往格腊夫赖内特，很快迫使反抗者投降。布伊斯又逃亡到科萨人那里去，但普林斯路、范雅尔斯弗尔特以及十二、三个战士被捕入狱，听候审判。1800年9月判决，普林斯路和范雅尔斯弗尔特被判处死刑。但英总督拒绝执行判决，并向伦敦请求指示。指示尚未来到，亚眠条约（1802年3月）已经签订，此条约恢复了欧洲的和平，并规定将开普交还荷兰。在1803

年2月20日开普殖民区才正式归还。普林斯路立即获释，范雅尔斯弗尔特则已死于狱中。

新到任的荷兰总督杨森斯最初是听命于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特派员”，后来自己单独治理开普殖民区。他效仿法国的管理方法。民主和中央集权是当时一种时兴的口号。于是对布尔公民的上议院重新调整，减至五人，又成立了一个四人谘询委员会辅佐总督。官员人数也有增加。然后杨森斯立即开始工作以稳定边界，并告诫农民说，他不允许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总之新制度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困难。当然农民们也说主张民主——而且他们是诚心诚意的。在他们的民主(即使不说是反动的、也是保守的民主)的范围内，他们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在选举或投票时，他们总会保证得到同意他们看法的多数。但新从欧洲来的荷兰官员头脑中则充满了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种雅各宾式的严密行政组织这些原则。二者之间是多么不同！

到1803年3月底止，杨森斯一直在散迪兹河同科萨人谈判订立新约。当时盖卡已经成年，有

一大部分科萨人听命于他。但恩德兰比拒绝放弃首领的职位，不肯承认他的侄子。因此只能再次达成一项不牢靠的妥协。盖卡应允对凡是回到菲什河东边他的领土的民族皆给予友好的接待，禁止他的所有臣民越过菲什河向西发展，并答应除布伊斯外把为科萨酋长们出坏主意的那些欧洲投机者统统交出。但布伊斯对他的流浪生活已感厌倦。他自动回到殖民区，被软禁在斯韦伦丹。在杨森斯去边境数星期后，德密斯特特派员也抵达那里，确认了由总督所订立的协定。科萨人的代表们竟未出席。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菲什河畔的和约是多么不可靠。

至于在欧洲出现普遍的和平局面，那已经破灭了。拿破仑同英国又重新进行殊死的斗争。很自然地一支英国舰队于1805年7月又来进占开普。1806年1月，停泊于开普敦之北。霍姆·波帕姆爵士立即命令部队登陆。杨森斯措手不及，他的两千士兵到达布老山时，这个阵地已为英军占领。荷兰总督虽处境不利，但仍然应战。开普的卫戍部队又是一开火立即溃逃。由布尔公民组成的人数不多的民团、有色人种的部队以及当时

恰巧在开普的两只法国船[1]的海员抗击英军，但已无从挽回局势。1806年1月10日，开普投降，18日整个殖民区正式签订降约。英国人终于定居下来。他们在几个不同的宪法形式下一直留在开普，直到1961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国退出英联邦为止。

[1] 这是两艘在开普搁浅的船：战舰阿塔郎特号和武装商船拿破仑号。根据1806年1月10日的降约，两艘船上的法国人都回到法国。

第八章 仇恨的根源

1806—1835

当英国人第二次来到开普时，开普殖民地已有大约七万三千居民，其中仅有半数原籍是欧洲。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白人、混血种人或纳马人，住在首府开普或附近的地方，例如斯特伦博希。

这些城市居民同外界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就那时来说，白人算是文化水平很高的。虽然当时尚无义务教育制度，但事实上所有的儿童都到教区学校上课。在巴塔维亚共和国成立前一贯为民政机关所支持的荷兰改革教会对居民造成一种压力，起了普及教育的作用。[1] 在1793年甚至还成立了一所中学（但只办好了一段时间）。自1800年起有了一份报纸和一座戏院。去看戏的主要是

---

① 早在1754年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寡妇叫她的几个在开普学校念书的孩子退学，但当地新教牧师强使她又把孩子们送回学校。由此可见教会压力的效用。

英国卫戍部队的青年军官。

但是开普的市民并不向往荷兰本土。来往这个港口的船只，世界各地都有，以英国船为最多。在英军占领前已是如此。风尚服饰则主要是法国式的。至于经济方面，这个殖民地着重同印度来往。这许多特点说明为什么除远距开普的地区外英国人比较容易地在那里立足；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居民则不管对荷兰统治还是英国占领都一律反抗。

在开普城内，对英军占领，人民没有反抗的表示，向英王宣誓效忠也没有使那些官员过分伤心，他们一旦履行了这项手续一般都能继续工作。这些都最足以说明作为荷兰人的民族意识已为某种新的东西——一种认为他们是“非洲人”，是属于一个新的大陆的信念——所代替。

牛车、步枪和圣经

殖民地中心地带的这种情况，在内地尤为显著。在内地，人们除了圣经外不看什么书籍。他们讲的话已经同荷兰本国讲的荷兰语大不相同。

同荷兰的文化接触愈来愈少，因此容易产生一种新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的基础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独立感（这是世界各大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区所共有的特点）。这种情感后来终于把边区居民的恶习变成品德：顽固地强调个人——非常主观的——的"权利"，拒绝接受任何外界的决定，赞扬敢作敢为，蔑视弱者。具有这些品德者在边境地区是好汉，而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则无疑不是良民。这些普遍的倾向还从加尔文教派的教义中汲取了充分的精神食粮，认为该派关于上帝早已安排好人们永生或永劫的学说在现世即已发生作用。愈是由于远离物质文明的发源地或其传播站而感到物质文明的贫匮，他们对自然界和对卡弗人(对一切有色人种的称呼)的优越感便愈加根深蒂固。

的确在物质方面，不少布尔人"拓荒先驱"①的家庭生活得比非洲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只有三个客观上的优越因素：牛车、步枪和阅读圣经。直到最遥远的地区，到处都造牛车，工匠非常灵巧。步枪是由开普输入的。阅读圣经则使边境地

① 阿非里卡语直译的意思是：走在前面的人，即先驱者。

带的布尔人不脱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

边境居民社会生活的特点是：到首府去纳税，接受民团的军训，尤其是去参加宗教仪式。全家包括妇女、儿童、奴隶或仆人都陪着家长去。一连几个星期，一部分人睡在牛车上，另外一部分人则露天同牲畜睡在一起。

这就是正在逐渐演变中的布尔人。他们1806年开始受英国人的统治，当时对这种统治持一种无所谓的等待态度。

奴隶和有色人种

但过了三十年，对于英国人的仇恨竟达到了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致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共同生活在一起，至少一大部分住在农村的人是如此。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下列几点：

——英国当局改变了有色人种的地位；

——司法的改革；

——传教团的活动；

——取得土地的新方式；

——英国移民的进入。

前三个原因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

在1806年存在着三种有色人：自由人（纳马人或马来混血儿），徒工（纳马人或布什曼人）及奴隶（主要是马尔加什人或莫三鼻给人）。但三者的地位逐渐变得无甚差别。被收留在农庄的科萨族游浪汉，为了有饭吃，为了得几条破旧的裤子和一条被子而劳动，能说是自由的吗？到头来还不是变成了奴隶吗？

在英国人占领的初期还存在着役使奴隶的现象。甚至在1806年10月贝尔德总督[1]还批准了当地移民大声疾呼的要求，输入了五百个奴隶。但如果细看一下，这个批示是很可疑的，在宣布出卖奴隶的布告上写道：

> "鉴于有人向我陈述，输入几个黑人奴隶会对殖民地有非常大的好处；又鉴于提出此项请求是为了使葡萄牙的迪多号商船所载的奴隶得以登陆并加以分配，而这只商船由于在航行中发生故障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地停留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决定……"

(1) 见书后附录所列开普殖民地历届领导人名单。

这个文件的措词看来不大象是宣布贩卖奴隶，而是对贩卖奴隶表示谅解。文件缩小了奴隶的人数，并且干脆硬说这项贩卖奴隶的决定性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可怜虫呆在那只潮湿发霉的贩奴船中生活不舒适。如果我们想到1806年时那些传教士已在南非很活跃而且极力反对奴隶制的情况，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总督在处理这件事上是如此小心翼翼了。

传教团的成果

从1792年[①]摩拉维亚教派的人在格纳登达尔定居后，开普的现代的传教团开始活动。在1796年，这个教派得到英国人的允许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教堂。1799年，有名的伦敦传教团的第一个传教士也效仿摩拉维亚教派，前来传教。此人是约翰内斯·范德盖姆普博士。他虽是一个荷兰人，但是以英国教会名义来的。三年后经英国当局的同意，他在贝瑟尔斯多普创设了一个传教团，

① 1740年德人施密特曾首次在开普试图开展摩拉维亚兄弟会活动，但持续不久。

把那些脱离了部落的纳马人聚集在该地。这样就使本来可供农民雇用的劳工相应减少了。但是，不久英国人以他们惯有的实用主义又雇用了这些纳马人当警察。建立一支纳马人警察比白人警察花费要少。此事在布尔人中引起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直到1807年英国正式取消奴隶贩卖时，愤怒仍未平息。

但传教士的努力并非仅止于此。当时的总督卡利登伯爵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宣布了一项关于有色人种的新规定。为了使传教士满意，他规定纳马人享受殖民地一般法律的待遇，但为了不开罪于布尔人，又规定限制纳马人的迁徙自由。纳马人离开其住处所在的区域时必须具有通行证。①但总督这个命令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规定凡有色人被其主人殴打致伤时得向法院提出控告。

法院本身当时也刚刚进行改革。过去各地区有固定的法院，由当地人组成；现在代之以一些流动法庭，每年到各区“巡回”审理该区一年中累积起来的案件。

① 可见对南非黑人实行通行证制不是现在才有，甚至也不是出自布尔人的发明。

在1812年第一次“巡回”审理时，纳马人纷纷来法庭控诉，他们明显地受到传教士的鼓励。因为缺乏证据，很多控诉案件不了了之。但那些被开释的被告人往往是从几百公里外来法庭受审的，回去时非常愤愤不平，大骂这些法官应该关进疯人院。至于那些被判罪的人当然更加怀恨了。由于对英国司法的怀恨，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批布尔受难者的形象——从这些受难者的“形象”中那些“拓荒先驱”看到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怨恨和他们的希望。以下是事实的经过：

一个名叫布以斯的纳马人控告了他的主人弗雷德里克·贝佐伊登霍特。法庭传讯他的主人，但此人置之不理。一支纳马警察巡逻队被派去找他。他逃走了，藏在一个山洞中，被发现后，他刚要抗拒，即被击毙。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开普，也不外是个使人难过的社会新闻而已，但在格腊夫赖内特区却引起了一场革命。死者之弟扬·贝佐伊登霍特，当着别的一些布尔人的面，郑重宣誓要为其亡兄报仇。他的朋友普林斯路立刻写信给盖卡，信中说如果后者同意帮助这些密谋闹事的人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那他就可得到若干土地

作为报酬。这封信被截获，普林斯路被捕。他的朋友们措手不及，立即举行叛乱，但未能把他从监狱中劫出来。在同英国正规军的一场小战斗中，扬·贝佐伊登霍特被击毙。其他的人泄了气，在斯拉格特斯内克投降。1815年这些人被判处死刑。虽然法官是荷兰人，但这次审判及随后执行死刑成了英国人压迫的象征。行刑时这些人的家属还被迫到刑场观看。尤有甚者，行刑时绞架折断，因之不得不再度把犯人吊起来处死。

在这些事实之外，布尔人的民间传说又添上一些未能证实的戏剧性情节。据说叛乱者要求特赦已得批准，但有人却故意把有关文件压起来了。又有传说，行刑人因内疚自杀了。不论如何，斯拉格特斯内克事件铭刻在布尔人的心灵中，围绕着这一事件凝聚着对英国人和对自由派传教士的仇恨。

传教士从人道主义出发鼓动取消奴隶制度，使这种仇恨情绪更加滋长。伦敦传教会所属的各传教团的"总管"菲利普博士成为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反英的、保守的布尔农民的死对头。他在伦敦所享有的威信，使他在全英国都有影响，他的著作

推动着持续不断的反奴隶制的运动。与此同时，伦敦传教会的另一个代表坎贝尔博士通过他在开普当地的活动使布尔农民丧失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这就是那些荷兰人和纳马人的混血儿。他们原在亚当·科克的率领下离开哈米斯山到奥兰治河流域定居，大部分人过着放牧、劫盗、兼作买卖的暧昧不明的生涯。坎布尔成功地使这“一邦”人(他重新名之为格里夸人)到殖民地境外的格里夸兰去定居，并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国家，由巴伦德和亚当·科克二世两个“统帅”执政。建都在格里夸敦，设立了政府及初步的行政机构和法院，并有自己的货币。不久两个“统帅”的权威遭到格里夸人的另一个首领安德烈斯·瓦特布尔的破坏，后者因为成功地讨伐了那些埋伏在奥兰治河沿岸的偷盗牲畜的匪帮而声威大振。亚当·科克不愿接受此人的领导，率部离开坎贝尔敦，此城以纪念坎贝尔博士而命名；而其兄弟科尼利斯·科克则去菲利波利斯（以菲利普博士之姓命名）。这样三个按照布尔人传统成立的半国家组织，限制了布尔农民向北扩张的可能性。

对土地的追求

但是这些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却愈来愈强烈。英国当局在土地方面的改革确使他们难于取得新的地产。过去荷兰规定的制度很简单。一个寻求土地的农民到无主的地区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在上面打一个桩，作为地产的中心，地产的范围是乘马向四个方向各跑半小时。当局来检查一下这块土地过去是否确实无主，然后占有者每年向当局交付五英镑“租金”。五年以后，“租金”变为土地税，占有者从此取得那块土地的完全的所有权。

英国当局取消了这种必然使由它治理的地区不断扩大的制度。下令按照土地的好坏和开垦的程度来估价。对新占土地实行拍卖办法，出钱最多者获得土地。在1824年，为了限制辖地的范围，英国当局又规定以奥兰治河为殖民地北部的边界；禁止农户越界定居，违者法办。有一些英国移民恰在此时来到开普，因此这个限制取得土地的新规定引起更加强烈的不满。新来的英国移民也要占有土地，虽然不久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放

弃了土地，到沿海的城市去经商。

对英国移民的安置是行政当局用以减少开支的另一办法。英国政府认为，与其在菲什河边界维持一支部队，不如在该地区增加白种人的居民。他们会自己进行防卫。当地行政机关不愿把防卫任务交给布尔人，因为自从第一次企图在格腊夫赖内特建立独立共和国起，布尔人时常表现出对英国当局不够忠诚。因此后者想出一个有计划地从英国移民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促使这项办法的采用。第一、当时开普痛感缺乏能干的工匠，这种缺陷如此明显以致一个果敢的苏格兰人穆迪在1817年开办了一家移民公司，取得极大的成功。其办法是每一移民向穆迪缴费三十英镑。后者负担他到开普的路费并在三年中供给食宿和衣服，交换条件是此人在同时期的劳动所得为公司所有。但此人如果保证能在满期前缴纳一笔钱，也可提前脱离公司。在依此条件来到开普的二百名苏格兰人中，只有极少数在穆迪开办的作坊中干完这种半奴隶式的三年劳动。差不多全体都找到了收入不错的工作，使他们很快地获得自由。

英国的移民

第二个因素是在拿破仑同英国的战争结束后英国出现大批失业者。这是那些不适应和平环境的退伍军人或者是因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恐慌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他们对社会秩序是个危险，对地方当局是个负担，因为依照法律后者有义务予以救济。

虽然当时开普总督萨默塞特勋爵漠不关心，但英国政府在1819年拨了一笔五万英镑的专款以资助英国人向开普移民。当年12月第一批船驶离英国港口，[1]第二年3月到达开普海面。然后又继续驶往距菲什河边界最近的一个沿岸海湾即阿戈湾。新来的移民在不久以后建立起现在的伊丽莎白港的地方登陆。他们开始时住在帐幕中，然后行政机关向布尔农民租来牛车，把他们一队队地送往内地，开辟了一个新区叫沃尔巴尼，以格雷厄姆斯敦为首府。

这批移民的情况很不一样。其中有些人的家

① 共有二十四船次，移民总数为三千五百人。

庭相当富裕（在阿戈湾曾卸下属于他们的若干马车），但其他一些人则穷得一无所有。就在安置这些新到的移民时，萨默塞特勋爵不理会英国政府的通知，仍然想出办法去渡假。此项工作由他的副手鲁费恩·唐金爵士负责。从一开始，某些移民就企图避免从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农业劳动。他们宁愿安置在城市里经商或干手工业。因此英国的移民主要在城市而不在农村。这种情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都是如此。鲁费恩爵士仍使用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压力，把移民尽量多地安置在边境作农民；这是政府的指示。但不久为了使新来的移民得以生存下去，他只有把指示放到一边。一连两年小麦遭到灾难性的歉收，沃尔巴尼地区没有适合农作物的土地。只是后来在当地开始放牧绵羊获得很大成功时，英国移民才改变了贫困的状况，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但该地区的中心格雷厄姆斯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不及输出产品的伊丽莎白港；十五年后这个港口成为殖民地的第二大城市。

殖民地公民对当地政权的态度因大批英国人的到来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从1814年以来，殖

民地的政权就以萨默塞特勋爵这个既懒惰又专制的老牌贵族为代表。荷兰人，尤其是布尔人已经习惯于历届政府的专制，用阳奉阴违的办法以适应使他们感到头痛的制度。布尔人的民主是一种近似“平行”的民主，在远离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地区这样一个狭小范围内实行自己的民主。但是新来的英国移民大部分住在城市而且对英国的民主传统感到自豪，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何理由要放弃他们在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制中所得到的好处。

报刊的出现

他们之中有几个新闻记者不久就想创办报纸。当地总督对此不欢迎，那是容易想象到的。（在所有的殖民地、报刊总是受到怀疑，而且在非洲，二十世纪同十九世纪对此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有一个叫普林格尔的人同一个荷兰的新教牧师福尔合作，建议出版一种月刊名为《南非报》。他向萨默塞特请求许可。后者答以“对此建议不能同意”。不久另一个新闻记者格雷格发觉总督这个回答毫无法律上的根据，任何条文也未规定

报刊出版须预先得到许可。因此他就出版了一份周刊，名为《南非商报》，由普林格尔任主笔，费尔贝恩和另外一个新闻记者为其助手。萨默塞特很好奇，竟然糊里糊涂地定了一份报，这使他后来在报刊风潮中失去不少讲话的论据。

开始一切顺利。但在1824年，总督控告一个移民对他进行诽谤。总督因为怕《商报》把诽谤的内容在报上公布，他就规定对报刊要预先检查，而该报对此事尚未作任何报导。办报人对此决定作出反击，宣告该报暂时停刊，一直到宗主国当局承认他们的权利时为止。萨默塞特盛怒之下，驱逐格雷格出境。格雷格一到伦敦，议会中的反对派立即把他当作一个受难者来欢迎。他求见当时的殖民大臣巴瑟斯特勋爵。后者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终于承认格雷格有权返回开普。萨默塞特想方设法使格雷格无法执行记者的职务，并对在此期间发刊的《南非报》多次恫吓，但他的一切努力均是徒劳的。

事实上是总督自己反在1826年初被撤职，主要是由于这次报刊风潮。此事件的一个更深远的影响是在1834年设立了立法会议，但会议成员全

是任命的，因而没有什么代表性。在布尔人中间，萨默塞特爵士也很不得人心。1823 年，他下令禁止种田的奴隶在星期日劳动，命令在转卖奴隶时十岁以下的儿童须同他们的母亲同时出卖，并规定信奉基督教的奴隶可在宣誓后出席法庭作证。

伯克将军继萨默塞特出任总督。他到任不久就发布了另一个使有奴隶的人更加愤怒的命令。这道命令先是以在特里尼达宣布的一个决定作为样版，实际上是伦敦指示要这样办的。该命令允许奴隶在其主人作为被告的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检举被告人，并许可他向主人付出原来的身价后赎身。命令还规定，奴隶受到严重虐待时得立即获得解放。

当奴隶们被解放的时候

以上这些措施不外是贯彻实行对整个英帝国都适用的普遍规章制度，只是稍有差别而已。因此布尔人不能抱怨这是把矛头专指向他们（虽然他们硬那样说）。但在 1828 年颁布了一部道地的“纳马人法规”，系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在严格审查

了萨默塞特勋爵的一切行为之后，专为南非制定的。这就是那有名的“关于改善霍顿督人（纳马人）以及开普其他自由的有色人种的处境”的第五十号命令。该命令规定取消一切通行证，改革“徒工制”，废除关于限制纳马人“到处流浪”的单行条例，并使有色人种占有土地合法化。大家都知道这个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纳了菲利普博士的倡议。他满有道理地指出，既然不许纳马人占有土地而又责难他们“到处流浪”，这是自相矛盾的。反之，如果给纳马人以土地所有权，那么就无需制定单行条例来限制他们流浪。布尔人企图破坏菲利普博士的威信，但成效很小。[1] 他们在 1834 年甚至利用总督由别人暂代的机会取得了对第五十号命令“放宽尺度”的通融办法，但后来被宣告为违反宪法。

正在此时，奴隶制受到致命的打击。1833 年 8 月，在整个英帝国废除奴隶制，自 1834 年 12 月 1 日起在开普生效。但此时适值科萨人人侵楚尔费尔德。因此估计奴隶身价的报表未能及时完

(1) 1830 年菲利普博士因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攻击开普的一个公民，以诽谤罪，被判处二百英镑的罚金。

成，延至1836年才编好。硬行恢复自由的三万九千名奴隶当时估价为二百八十二万四千英镑左右。但不久那些奴隶的所有者被告知说，政府要付的全部补偿金只有一百二十四万七千镑，而且还是在伦敦支付。这种办法使布尔农民不得不将领补偿金的凭证减价转卖给一些中间人，后者从中捞取厚利。

照布尔人看来，此事完全说明了英国人的奸诈：英国人把英国语言和英国法律带进来，企图使布尔人失去民族意识。英国人禁止他们向远处扩展，使他们得不到土地。许下给补偿金，又不肯支付，欺骗了他们。尤其是英国人在整个统治期间，一直是有计划地强调并逐步实现在法律面前不论肤色人人平等的原则。

这就是布尔人仇恨占领者的根源。他们现在将脱离占领者，犹如古代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压迫。他们决心越过不毛之地去追寻新生，犹如天主钟爱的以色列人过去追寻迦南乐土。老实说，难道他们自己不就是这个由天主指引的可以进入天堂的人们吗？天主因为他们的罪过总是让他们先受外族的蹂躏，但天主在他们赎罪以后不

又总是把他们引导到一个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但已经由天主亲手准备好来接纳他们的人间天堂吗？

就这样，大迁徙的思想逐渐形成。在叙述此事之前，我们还应该谈一下在菲什河神秘的边界彼岸所发生的决定性的事件。班图族系的一大群人正在那里熙熙攘攘地生活着，他们的历史还仅仅依靠口头传说，没有文字记载。

第九章　祖卢人的崛起

1816—1826

1835年前后，殖民地东部地区的布尔人同英国人的关系已经濒于破裂。一大部分荷兰农民不肯适应英国人的新制度，决定放弃开普殖民地越过奥兰治河向北发展。可是北部地带在二十年中已由于祖卢人的崛起而完全改观了。

一个首领的作用

祖卢人是属于班图族系的一个部落。班图族各部落从十七世纪初期开始逐渐侵入南非。祖卢人当时人数不过几千。但到十八世纪末他们有了一个杰出的首领叫丁吉斯瓦约。他以铁的纪律约束他的部下，成功地把领土扩展到在土格拉阿伦图尔以北的整个纳塔尔地带；当地的民族不得不并入他的逐渐强大的部落。丁吉斯瓦约死于1816

年。他的一个与祖卢贵族无亲属关系的义子继为酋长。这就是那个有名的察卡。他首先把部落的名字改为“祖卢”(天空)。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事天才，他要武士们使用同样的武器，并彻底改革了该族作战的战术。

以前祖卢人作战同时使用标枪和长矛，察卡取消了这些各式各样的武器，而代之以短矛和兽皮制的宽大盾牌。他发明了一种作战的新阵式，把青年纵队放在两翼以便能从侧面包抄敌人。头缠巾带，插上羽毛，盾牌上有统一的图饰，作为这些纵队的军服。从少女里选拔一些女战士负责后勤工作，在作战期间不得婚嫁。察卡对待敌人原则上凡男性一律处死，反之，对女人则不加杀戮，分给战士。因此，尽管在战争中有伤亡，尽管有好几个叛离察卡的军事首领率其部下去另外组织部落，但是上述办法保证了本部落人口的增长。在征服外地的战争的间歇期间，察卡有计划地组织训练演习以保持其部队身体健壮。

因此，在这个可怕的君王当政时，战争不断发生，造成无数人的死亡，有人估计总数近百万人。当时，他的部队无人能敌。斯威士人是最顽强的

敌人，但也不得弃地退却。在察卡的一个叫兹威德的部将的进攻下，斯威士人从纳塔尔边境地带退往现在的斯威士兰的西北。他们的首领索布虎查一世是个杰出的外交家，他以娶兹威德之女为妻的办法制止了进攻。在1820年兹威德本人同察卡决裂。祖卢人又来进攻，但攻势不如以前猛烈。

在此期间，兹威德向北方进军，驱散了那些在林波波河河套地带定居的苏陀人部落。兹威德的部队在其子兹旺根达巴的率领下乘胜推进，占领了马肖纳兰，在那里毁坏了津巴布韦的遗迹，最后于 1836 年到 1838 年前后在尼亚萨湖的西南定居，改名为恩戈尼人。在这段非常混乱的时期内，索布虎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在1836年他的部下在一次战争中甚至还打败了祖卢人，从此最终保证了斯威士人的将来发展。那时察卡已经去世了。

交 锋

察卡从他掌权时起，就一方面进攻斯威士人，另一方面又向西进军，结果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彻底打乱了已在现今的奥兰治自由邦地方定居的南部苏陀族各部落的分布情况。1818年，一个名叫莫谢希的年青而又有毅力的酋长把该族的残余集合起来，不再逃跑，而是同往巴苏陀兰的山间设防固守。约在1830年他在该地区占据了一个天然堡垒撒巴博西戈作为国都。这个地方象平地突起的一个山峰，山坡陡峭而峰顶平坦，在峰顶这个平台上有足够的富源，可以抵御一切袭击。他刚在该地安置好就邀来一些法国基督教传教士，[1]但他本人从未接受洗礼。接纳这些欧洲人是他的一个政治手段，证明他确有天才。他是巴苏陀族的奠基人和至今仍在进行统治的那个王朝的始祖。他一直活到1870年。

莫谢希逃至巴苏陀兰山地后长时期仅能固守，但固守取得成功。察卡的另一大将莫赛利卡蔡曾来进犯防地未能攻克。然而莫谢希却无法阻止察卡的部队绕过他的难以攻克的堡垒而向辽阔的原野进军，这片原野向西展开，一望无际，一直

---

[1] 1829年最初的三个传教士伊萨克·比瑟、普罗斯佩·勒谬和塞缪尔·罗兰在巴黎领受圣职。1832年卡札利牧师首先到达撒巴博西戈，并设立了一个传教团。

延伸到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在察卡军队来到时，有一邦可怕的巴特洛克瓦人专门从事劫掠，由一个叫玛—恩塔提西的女头目和其子西科尼埃拉率领，在叫作茨瓦纳人或贝专纳人的西部苏陀族各部落住的地方大肆掠夺。其中一个是巴罗隆人的部落，他们想免遭玛—恩塔提西的劫掠，逃到库鲁曼地区（此地现在开普省之北）。巴罗隆人正在极端困苦，几乎陷入绝境时，忽然遇到一个意外的保护人。1820年伦敦传教会的苏格兰传教士莫法特在库鲁曼设立了一个据点。这个爱好和平的人不久就不得不临时充当战地指挥官。因为另外有一邦主要是巴赫拉克瓦纳人的饥饿的武士，后面紧跟着莫赛利卡蔡的部队，扑向巴罗隆人。莫法特迅速地向一小队格里夸人求援，组织了防御。这队格里夸人有步枪作武器，并且善于用布尔人的方式作战，打退了巴赫拉克瓦纳人的进攻。

这只是短暂的喘息时间。莫赛利卡蔡本人终于出现在贝专纳的边界。但正如过去教皇利奥[1]

[1] 即利奥一世，当阿提拉于452年进军意大利时任罗马主教，被派往游说阿提拉，使后者退走。——译者

对阿提拉[1]一样，莫法特也知道怎样引起莫赛利卡蔡的敬畏，后者放过了巴罗隆人而转向在德兰士瓦西部定居的茨瓦纳人的部落进攻。这些部落逃往西部的荒漠地区。约在1823年莫赛利卡蔡在他占领的地方建起寨子(在默塞加附近)。他从此完全放弃了纳塔尔。他拒绝将战利品交纳给察卡，而且急于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于是脱离察卡而独立。他部下的战士遂与随军的祖卢妇女和被他们消灭的部落中的妇女通婚，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马塔贝莱人。

在长达十五年期间，马塔贝莱人不断袭击蹂躏茨瓦纳人，尤其是巴克文纳人的部落。最后莫赛利卡蔡遇到从事“大迁徙”的布尔人，在遭受两次惨败后于1837年不得不退往北方，在退却途中对茨瓦纳人又进行了劫掠。但在进占巴曼瓦托人(茨瓦纳人部落之一)的领土时，他的部队为一个不受其威吓的酋长所挫败。此人为西克果马一世，是巴曼瓦托王朝的创始人，现在任贝专纳总理的塞里次·卡玛酋长就是他的后代。莫赛利卡蔡

---

[1] 匈奴帝国国王(433—453)，在位时占有里海至莱茵河间广大地区。——译者

在北部的苏陀族的部落中杀开一条血路，奔向赞比西河流域，一度同兹旺根达巴的部队取得联系，最后到达罗得西亚的布拉瓦约。

莫赛利卡蔡大军过后死伤盈野，满目疮痍，但不久就有另一个首领出来收拾残局。这就是塞克瓦提。他虽然不能与莫谢希相比，但在南非历史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把那些由于祖卢人首领两次过境遭受荼炭、劫后余生的受难者重新集结起来，组成一个叫作巴普迪人的新部落。后来在塞克瓦提之子塞库库尼的领导下，这些巴普迪人曾长期抵抗布尔人。一直到现在，这些人依然保持着他们部落的团结。

现在谈一下察卡沿印度洋岸向南进攻的后果。这方面的情况同我们前面讲过的北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差无几。从 1817 年起，庞多人和顿布人就开始南移以逃避察卡的入侵，而被打散的一些更弱小的氏族的残余则聚集在一起，取名芬果人（“无家可归的游民”）；他们企图在前两种人中间渗透过去。上述部族的这一移动不久就给科萨人以很大的压力。我们前面谈到的科萨人首领恩德兰比和盖卡在菲什河岸占有一块边境地带，但已

不能再任意扩展，因为在菲什河的彼岸有拥有步枪和马队的白种人。这两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进行争吵，除去个人地位之争外，政策不同也是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顿布人的压力危及科萨人的生存，应如何对付？盖卡倾向于寻求白人的支持，而恩德兰比则倾向于采取强硬的办法，准备打开菲什河的封锁。

结　　盟

1817年盖卡因其审慎态度几乎遭至灭亡。由于他的政策不得人心，他被一个会催眠术的巫师所推翻，此人名叫马卡纳或“左撇子”(他用左手持标枪)。盖卡被迫逃往英国人那里求援，英国人很快答应。马卡纳也找到一个同盟者恩德兰比。恩德兰比的军队得到听命于马卡纳的一支队伍的支援越过菲什河，在格雷厄姆斯敦附近对有盖卡军队支援的英国人发动进攻。正规队伍和他们在武器上的优势压倒了恩德兰比的气焰。科萨人退回到菲什河东岸。盖卡恢复了酋长的地位，他甚至把菲什河东岸的一大片地方割让给英国人作为缓

冲地带，由英国人巡逻。自十七世纪初以来，班图族蜂拥前进的浪潮第一次退了回去。

恩德兰比从此不再闹事了。马卡纳被俘后流放到开普敦对面的罗本岛。1820年他企图泅水逃走，淹死了。但他的救世主的梦想却长久遗留下来，本书后面要谈到的在1856年发生的悲剧就是个证明。

马卡纳死了八年以后，察卡这个使南非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主角被其弟丁刚和翁赫兰加纳二人暗杀。他生前幸而从未同白种人发生冲突。他同白种人的接触只限于发了几张租让书给定居在德班港海滩上的一些英国商人。[1]因此他生前从未吃过败仗。但由他发动的黑种人的迁移运动还远没有止息。被压缩在菲什河东岸的科萨人于1833年最后一次企图强行越过边界。圣诞节那天，他们大举渡过菲什河，烧毁农庄，盗窃牲畜。但一队民团很快挽回局势，把科萨人赶过凯河。在菲什河同凯斯卡马河之间的地区被合并到开普，命名为阿德累德省。一些破产的农民想到该地定居。但开普政府则认为这个新占领的地区仍

[1] 在1843年，这些租让书发生重要作用。

然应当是一个无人的缓冲地带。布尔人于是想瓜分从科萨人那里得来的战利品以补偿他们所受的损失。但在传教士们(尤其是菲利普博士)和当时在伦敦的东部区域总特派员安德烈斯·斯托肯斯特龙的影响下,布尔人的这一企图也落了空。英国议会确信,科萨人进犯是由于布尔人的一系列不公正行为所引起的。因此战利品以拍卖形式处理了。1836年斯托肯斯特龙不仅在东部区域留任,而且被授予副总督的新头衔。他到任后首先决定将阿德累德交还给科萨人。这件事成为引起第二批布尔人大迁徙的决定性因素。

祖卢人崛起的最后结局远非有利于班图族系的各个部落。当然,由于莫谢希的缘故,巴苏陀人不久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斯威士人经受住考验,加强了力量。巴普迪人也大体上愈合了由兹旺根达巴和莫赛利卡蔡所造成的创伤。但是茨瓦纳人依然处于分裂状态而未能超越部落的狭隘范围。[1] 庞多人、顿布人和科萨人都大大削弱。最

[1] 这些部落中最大的依然是巴曼瓦托人的部落。其余是巴塔宛纳人、巴克加特拉人、巴罗隆人、巴马累太人以及巴特洛克瓦人的部落。

后，在巴苏陀兰和贝专纳之间出现了一大片无人地带，而从1835年起那些可怕的布尔人"拓荒先驱"的牛车队就是通过那里涌向北方的。

第十章　大迁徙

1835--1852

大迁徙是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保证了布尔文明扩展到新的地方而不致被英国的文明所融化。但由于大迁徙造成了地理上的孤立，这种文明停滞在一种保守的状态，至今尚远远没有脱离出来。阿非里卡人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大迁徙看作是形成布尔人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似乎言过其实。实际上，驱使布尔人迁移的首要原因是他们不肯违背其传统习惯的生活，需要得到更多的土地以及他们的个人主义。意味深长的是，大迁徙的先驱者几乎全体都来自开普殖民地的东端，在那里个人主义最为突出，而且对过去格腊夫赖内特和斯拉格特斯内克两地的反英暴乱记忆犹新。大迁徙的领导人彼特·雷提夫出发前曾在格雷厄姆斯敦的报纸上说明了必须进行大迁徙的理由。他首先着重指出，大迁徙的意图

是在更远的地方建立一个国家，"制定一些适当的法律以保证真正的自由"，并"在绝对保证英国政府从此不再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和允许我们不要履行任何手续就在将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情形下离开殖民地"。

很明显，重点在于要求自由和独立，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比形成一个有意识的民族的要求强烈得多。而且以后成立的布尔人各共和国并不稳定，直到1863年为止它们之间不断发生争执，德兰士瓦同奥兰治自由邦第一次统一遭到失败等等，都足以证明这些从事大迁徙的布尔人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的观念。只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英国第一次占领德兰士瓦以后才产生了这种观念。

初期的失败

布尔人并非没有准备就进行迁徙。一些远征队进行侦察以后，提供了对北部地区的必要情报。根据情报排除了以贝专纳作为迁徙的目的地，因为该地过于贫瘠。那些迁徙的先驱者同时也知道

由于祖卢人屡次兴兵，造成不少荒无人烟的空地，因此雷提夫在他的宣言中说明：他没有任何想把非洲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的意图。另外，最初越过奥兰治河进行迁徙的几伙布尔人人数极少，而且没有任何武装护送，因此他们没有遇到大的阻碍。

青年时代就住在非什河附近的路易·特里卡特在1834年率领三十来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向奥兰治河前进。他在河边遇到汉斯·范伦斯堡所领导的有四十九人的另一伙人。他们会合后北进时遇到了一些非洲人。后者同他们的关系还不错，特里卡特同范伦斯堡两人不久就闹意见，结果两队人又分开来。范伦斯堡走在前头，抵达德兰士瓦以北的索特潘斯贝赫，最后宣称他将向东去莫三鼻给。从此再无音信。一般认为，这一伙人中许多人死于疾病，最后为班图人所消灭。

特里卡特沿着范伦斯堡走过的道路前进，在索特潘斯贝赫住了一年。1837年，因为缺乏弹药，他也想去莫三鼻给。但疟疾和牲畜昏睡病使迁徙无法进行。因妻子死去而意志沮丧的特里卡特，日益憔悴，终于也死去了。只有廿六个幸存者

到达了洛伦索—马贵斯。由于葡萄牙人的庇护，大部分得以生存下来，在1838年被送到纳塔尔，在那里当时已有其他的迁徙先驱者到达。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安德烈斯·亨德里克·波特吉特。他的一个同伴萨雷耳·塞利尔斯由于开普教会当局拒绝给移民遣派一个随行牧师，他本人就行使起牧师的职务。波特吉特于1835年从塔尔卡地区出发。到达费特河后，波特吉特在撒巴恩丘向巴塔翁人的一个酋长马克瓦纳买下了费特河与瓦尔河之间这块地方。但他没有弄清楚这个酋长同莫赛利卡蔡之间是何关系，而实际上马克瓦纳是马塔贝莱人首领的藩属，没有权利出卖其土地。

波特吉特在这样取得了——至少他相信是如此——头一块领地后，就赶紧去索特潘斯贝赫找特里卡特询问关于下一步迁徙的意见。他一回来就发现他的部下神情紧张。原来莫赛利卡蔡拒绝承认马克瓦纳所割让的土地，他刚刚来进攻并消灭了两批迁徙者。波特吉特立即采取行动。他和部下四十人环列牛车为营在后面坚守。1836年10月16日，莫赛利卡蔡的总司令凯利皮前来进

攻。这就是韦格科普战役，结果马塔贝莱人遭受惨败。在以五十辆牛车组成的车阵前，凯利皮的三、四千战士死亡数百，而布尔人仅死二人。

这首次血战立即证明了布尔人战术的优越性。但他们人数太少，是个重大缺陷。幸而由格雷特·马里茨率领另一批迁徙者不久来到。因此他们有可能对莫赛利卡蔡不承认马克瓦纳卖给的撒巴恩丘地区这件事进行报复。1837 年 1 月，波特吉特和马里茨率领一百零七个布尔人发动进攻。他们再次打败马塔贝莱人，夺回七千头牲畜和开始时被莫赛利卡蔡劫去的一些牛车。但胜利立即引起争吵。对如何分配牲畜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因马里茨想任命一个叫斯密特的人作牧师而波特吉特反对，双方相互责骂。

一个国家的轮廓

正在这时，彼特·雷提夫忽然来到了。他因临行时发表的宣言而享有盛名。由于他的威信，那些布尔移民可望重归于好。因此 1837 年 6 月 6 日这些移民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

仅是略具雏形，但已经勾画出以后成立的各个布尔人共和国的轮廓。它把过去在格腊夫赖内特和斯韦伦丹的反英团体的组织情况作为蓝本。大家选出一个人民议会、一个总统，另外有一个司令（军队统帅和作战部长）和一个区长（内政和司法部长）。这个雏形国家定名为新荷兰，在撒巴恩丘附近的温堡村成为首都。

选举总统并无困难，雷提夫当选。后者组成他的“内阁”，任命波特吉特为司令，马里茨为区长。波特吉特明白实权已落入其政敌之手，颇有怨气。雷提夫也就听任波特吉特带领一队民团去攻占德兰士瓦。购买土地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莫赛利卡蔡认为该地属他所有，而且他也尚未求和。经过一场长达九天的战斗，波特吉特终于在1837年11月攻占马塔贝莱人设于卡潘的主要营寨。莫赛利卡蔡灰心气馁，决定率部下两万武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和牲畜离开此地北上。从此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地的大门被打开了！

波特吉特回温堡后遇到雷提夫刚从纳塔尔作了初步侦察回来。纳塔尔土地肥沃，使雷提夫非常向往，他决定到那里去定居。他访问了住在该

地沿岸的英国商人，似乎看出这些人可以接受一个布尔国家的统治。

战　争

但是，还要解决如何以正当方式取得纳塔尔的问题。为此，雷提夫去见丁刚。恰巧这个祖卢人的王国在不久以前有几群母牛被西科尼埃拉(见第九章)偷去了。雷提夫抓住这个机会答应丁刚替他追回这些牲畜，条件是要丁刚让予布尔人一些土地。丁刚表示同意。因此雷提夫充满希望回到温堡。但是波特吉特坚决拒绝去纳塔尔定居。照他看来此地离英国人太近了。最后雷提夫把新荷兰国的"法统"连同他的拥护者都迁到纳塔尔去，而波特吉特则率领他的部下带着家属越过瓦尔河。他在波切夫斯特隆建立了一个新据点，也组成共和国，但并未同纳塔尔完全断绝联系(在波切夫斯特隆选出的人民议会只叫作分议会)。

与此同时，雷提夫已经成功地把祖卢人失去的牲畜夺回。他于是带领七十个壮士再次去见丁

刚，准备签订让地的协定，以取得北至土格拉河南达乌姆津布武河之间一大片土地。经过数日商谈，雷提夫达到目的。但在告别时，丁刚又把布尔人叫回来。按照习俗，这些布尔人的代表把他们的武器放在丁刚住营进口处，然后入营就座。丁刚借口请他们检阅军队，把他的全体武士集合起来。一声暗号，这些武士立即扑向布尔人，把他们全部逮住，然后解往刑场，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用粗木棍打碎脑壳。

这个影响重大的背信弃义行为是丁刚的故技重演。他不正是在暗杀了亲兄察卡后取得王位的吗？当然，布尔人的到来使他惶惑不安，吓得要命，但如果他是个正直一点的人或只要聪明一些，他本来还可找到应付的办法。试把他的态度同莫赛利卡蔡与波特吉特发生冲突时的态度比较一下吧！马塔贝莱人的首领提出了他对马克瓦纳拥有合法的宗主权。在韦格科普第一次战败后，他没有重新发动进攻，而是巧妙地设法推迟布尔人进犯他的营寨。最后他认识到敌人的优势，便向北方转移了。

丁刚则只想出一种卑鄙的背信行为。大概他

本人也深感到其行为的丑恶可耻：立即在这些受害的布尔人周围形成一种无法解释的令人恐怖的禁忌。他们的尸体未被埋葬，衣著什物均丝毫未动，刑场禁止进人。因此后来布尔人援军到达时还可辩认出一些死者，尤其是雷提夫，人们找到了他的皮背包。尤有甚者，丁刚竟如此冒失地把签订让地的文件也丢在那里，从而招供了他本人背信弃义的行为，也给布尔人提供了使他们在纳塔尔定居合法化的证明。

丁刚大概一度希望把在纳塔尔的布尔移民全部消灭。在上述屠杀之后，他命令部队四出搜索以消灭入侵者。那些布尔人没有遵守雷提夫的生前指示，当时已经开始分散在纳塔尔肥沃的土地上。他们遭到突然袭击。其中有三百人为祖卢人杀害。奇怪的是丁刚对住在他土地上的英国人却从未触犯，至少有四个英国人可能看见对雷提夫的屠杀。[1] 也许丁刚认为英国人与布尔人素来敌视，因此这些人不会出来作证。但他再一次估计错了。

---

(1) 此四人是住在营寨内的英国年青译员伍德，住在附近的英国牧师欧文，还有欧文夫人和一个女仆。

对布尔移民的援救

生命受到威胁而且力量削弱了的布尔移民，惊魂乍定，立即呼援。波特吉特带领几百人从德兰士瓦赶来。甚至在海边的英国人也成立了一个民团。但这些部队都被丁刚打败，遭到很大损失（二十个英国人里仅有四人生还）。有人责难波特吉特没有很好支持他的战友，后者激愤之余，退回德兰士瓦。在这一危急的时刻，马里茨又不幸去世，但是一支没有寄予很大希望的援军却从南方来了。安德烈斯·比勒陀利乌斯率领一大批来自格腊夫赖内特的布尔人赶到纳塔里，重新发动进攻。他于十一月末被公推为“司令”后，组织了一支四百六十四人的民团，经过精心策划进人战斗。1838 年 12 月 15 日同祖卢人的前哨遭遇。比勒陀利乌斯立即在一条河的河套处摆好牛车阵——这条河第二天就以血河得名。在河套摆阵就可使得战线更缩短。当日天气晴和。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因为这就使在战斗时不断分发的火药不致潮湿失效。傍晚丁刚军到，与布尔人阵地对

峙。布尔人怕遭到夜袭，在各处挂起灯笼。丁刚在政治上拙劣，在战术上也很蹩脚。他放过了进攻的时机。反之，布尔人这边则士气高昂。萨雷耳·塞利尔斯在不久以前曾说服全体战士向上帝许下誓愿：如果上帝俯允布尔人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他们情愿以后每年作一次表示感恩的祈祷以资纪念。他在战前最后一次又集合全体战士举行晚祷再次许愿。[1] 然后他下令把比勒陀利乌斯带来的两尊小炮安置好。

第二天丁刚发动进攻。祖卢人一如既往，非常勇敢，从凌晨开始冲锋，直到上午九时左右。结果损失达三千人，丁刚泄了气，撤退了他的部队。这时比勒陀利乌斯下令打开牛车寨门，放出马队冲锋。这次冲锋使已经败退的祖卢人溃不成军。丁刚本人虽然得以逃脱，但其威信从此一蹶不振。不久他的弟弟潘达率部离开，他只成了一小群人的头目。五年后他在斯威士兰边境被杀。

---

① 直到如今“丁刚日”还是南非的一个休假的节日(12月16日)。

纳塔尔和独立

布尔移民占了纳塔尔一大片土地后，已经可以组织他们的国家了，他们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叫纳塔利亚。为纪念战胜丁刚，按照许下的誓愿建起一座教堂，以此为中心慢慢地修起一座城作为国都，名之为彼得马里茨堡。又效仿荷兰国旗制定了一面有橙、白、蓝三色的国旗。召集了一个新的人民议会，布尔人分得了土地。他们甚至争取到与潘达和睦相处。潘达当时得到大多数祖卢人的拥戴，成为他们的国王。布尔人只剩下一件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使英国人承认纳塔利亚的独立。

这个要求根本无法成功。布尔人的大迁徙已使开普的东部边境大片土地荒无人烟，至少有七千人离开这些地区。必须用职业军人代替这些人守卫边境，这比起遇有战事临时动员民兵费用要大大增加。有一段时间，开普殖民地禁止火药运出，妄想那些布尔移民能够回来。但是由于边境延长，走私很容易，上述措施证明无效。由于苏格兰传教士的再三要求，新教教会表示不赞成布尔

人迁移，但也无济于事。英国政府于是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凡离开开普殖民地而在南纬二十五度线以南生活的移民，依然处于英国法庭管辖之下。这条纬线在比勒陀利亚以北八十公里，这就是说远在布尔人于1850年前所建立的永久性移民区之北。1838年，开普殖民地共至派了一个委员会到纳塔尔去调查布尔人是否确实没有带去奴隶。委员会没有能够证实那些跟随布尔人的奴隶是被强迫去的。事实上他们非常可能是在获得解放后自愿留下来的，因为他们除了给过去的主人当具有自由民身分的仆人以外无法餬口谋生。

使开普当局感到最大不安的是，纳塔尔沿海一带被布尔移民占领。开普因大量布尔人迁徙失去了不少的纳税者，而且因地产价格猛跌造成经济萧条，已经感到情况严重。如果布尔移民占的地方只限于奥兰治河彼岸的内地，则这些人至少还是开普商业的顾客。他们需要纺织品、工具、咖啡等等，还不得不向开普敦购买。但是，在布尔人掌握了一个港口的情况下，这个前景就会完全改观。开普的商人深恐纳塔利亚共和国一旦巩固，就要从外国直接输入它所需要的货品。另外，弄

不清是真是假，有人还说法国也想染指纳塔尔。有一个时候甚至还传说已经发现荷兰商人斯梅勒坎普是个法国特务，他在海岸进行煽动。因此开普的那些工商界人士一再强调必须由英国占领纳塔尔。

最后，还有一种摩擦来自布尔人对非洲人的政策。祖卢人现已不再构成一种危险了，但是他们企图重新渗入士格拉河与乌姆津布武河之间的地带。纳塔利亚共和国每次都迅速给予回击，用武力把这一批批人押送到南部边境。这就使得传教士谴责布尔人对祖卢人过于严酷，开普民政当局也提出此事在非洲人中引起了动荡，最后势必在殖民地的边界那里酿成事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雷提夫和比勒陀利乌斯先后为了确保人们对新生的布尔人政权的尊重而想尽的各种办法必然要失败。就在与丁刚作战的前一天，开普总督乔治·内皮尔爵士已经派遣查特斯少校去纳塔尔海岸占领纳塔尔港湾(后改名德班)。这次占领的法律根据——实际上很不可靠——是1825年察卡所授予的那个有名的租让权。纳塔利亚共和国立即同查特斯以及他的继任人杰维斯进行谈判，要

求他们撤退。到1839年末,布尔人似乎取得了胜利。英国政府不承认对纳塔尔港的占领,杰维斯随即撤走。

不久就发现,英国不可能把自己的责任只限于开普殖民地本土。开普边境始终没有明确的界线,有必要在这个未能严密控制的边界线之外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因此开普政府就发明了一个"条约国"的办法:在开普殖民地的周围,设立一系列黑人或混血种人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力量足以控制"外面的"部落的移动,但又不足以危及开普。在1834年开普已与由瓦特布尔所领导的格里夸人订立了一个条约,把守卫开普西部边界的任务交给格里夸人。

英国的拒绝

但在由格里夸人和班图人部落国所组成的屏障之外出现了布尔人的国家,使英国人的这个政策即便还可以实行,也变得很困难。当纳塔利亚的布尔人发动民团进攻一个由恩卡帕伊领导的庞多人小部落时,后者不得不往南逃走。开普当局

怕这样一来，在察卡死后刚刚重新建立起来的各个种族的均势又被布尔人所打乱。因此1841年12月开普总督内皮尔就派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去庞多兰，并宣告即将占领纳塔尔。彼得马里茨堡的人民议会提出强烈抗议，但不起作用。布尔人民兵未及集合，英国的史密斯少校已成功地到达纳塔尔港，他立即在那里筑成几个小堡垒。纳塔利亚宣布动员令并向内地的布尔人乞援。比勒陀利乌斯再一次企图不战而使英国人撤走，但未能成功。1842年5月23日，史密斯对布尔人发动进攻，但被挫败。虽然双方损失不大——英方死十七人，布尔人死一人——但此次交锋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布尔移民第一次与他们过去同属开普的英裔同胞作战。布尔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又添了一个新的因素。

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此次交锋也是意味深长的。史密斯虽被打败，但未被打垮，他退到防御工事里而布尔人竟无法攻克。在布尔人的牛车阵前班图人处于劣势，而在英国人最起码的工事面前，布尔人又处于劣势。两相比较，实在有点奇怪。1842年的先例以后又在1880年和1899年重

演。布尔人从来没有打好过一次包围战。

正当史密斯在他的简陋工事后面组织防御时，他手下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有名的迪克·金，偷偷穿过布尔人的防线，在十天内出色地骑马奔驰了九百公里到达格雷厄姆斯敦向英当局报警。史密斯显然对他派遣的密使的成功毫无所知。因为缺粮，他正要投降，这时在纳塔尔港外停泊处出现两只船。这是迪克·金报警后开来的援军。援军由布尔人血统的南非人克勒特上校任指挥官，这一着非常高明，在敌人阵营里立即发生影响。从德拉肯斯堡山脉西边来的布尔人都返回故乡。比勒陀利乌斯不得不放弃围攻。1843年7月15日，纳塔尔正式宣布为英国领地。三年后并入开普殖民地，但在1856年又成为直属英帝国的殖民地。纳塔尔的地产被重新划分。祖卢人获得广阔的保留地，据布尔人说，有时还侵占了他们的农庄。英国移民的到来更使布尔人加速离开纳塔尔。开始时某些布尔人还坚持留在德拉肯斯堡山脉的纳塔尔一边的斜坡上，于1846年还成立了一个克利普河共和国。但不久布尔人就完全离开了南非这条大山东侧向着印度洋的这个地

区。

纳塔利亚共和国从此灭亡。英国人的势力已经越过奥兰治河向布尔人藏身之处进展。开普政府再度实行它的"条约国"政策。它同莫谢希和格里夸人的首领亚当·科克第三（1843年）先后签署协定。第二年在酋长法库治下的庞多人也被承认为"条约国"。不久格里夸人向英国人请求援助。有一回科克的警察要逮捕一个住在格里夸人国家的布尔人，其他布尔人起来反对这个合法的命令的执行。他们认为不能容忍一个混血种人当局向他们的人行使权力。开普总督内皮尔支持向他求援的科克。一小队英军进入格里夸人的地方，打败了顽抗的布尔人。

为了避免有格里夸兰境外的民团支持的布尔人再度闹事，开普总督甚至命令沃登上校带了一连人驻扎于布隆方丹以便监视奥兰治河和莫德河之间的整个区域。这是一种变相的兼并，使邻近的布尔人温堡共和国（过去的新荷兰）的公民深为不满。

兼并的计划

在两年期间,双方处于互相猜疑的休战状态。但到 1847 年新到任的开普总督哈里·史密斯爵士结束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他在巡视奥兰治河彼岸的地区时遇到一个代表团,它代表温堡的七十二户居民向总督请求把一直到瓦尔河的全部地区合并到开普。史密斯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但他没有弄清楚此项请愿仅仅来自"少数"公民。他认为此地区由英国统治肯定会使布尔人、巴苏陀人和格里夸人之间的纠纷得到解决。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个兼并计划,于是史密斯就通知安德烈斯·比勒陀利乌斯说,从此住在奥兰治河与瓦尔河之间的布尔人成为英国的臣民。比勒陀利乌斯获知此兼并计划时,已离开纳塔尔,正要去德兰士瓦。他提出抗议,并在布尔农民中组织反英活动。

但这些都未奏效。1848 年这块地区成为英国属地,命名为"奥兰治河主权国"。比勒陀利乌斯立即从德兰士瓦赶来并组织了一个民团,并赴布隆方丹,赶走了沃登及其人数很少的部队。但在

撤退中途，沃登遇到史密斯派来的援军。英军于是又行开回。比勒陀利乌斯企图在博姆普拉斯阻击英军。他战败了，民兵死三十人、被俘一人。英国人把这个俘虏作为叛乱分子依法处以绞刑。这件事也是布尔人永远不能忘记的。

比勒陀利乌斯本人得以逃脱，回到他在德兰士瓦的波切夫斯特隆附近的农庄。当局悬赏二千英镑，要他的首级，但这仅是个象征性的姿态而已。博姆普拉斯的阻击战使比勒陀利乌斯在布尔人中间颇得人心。他被选为波切夫斯特隆共和国的“司令”代替该国的创造人波特吉特。实际上后者刚刚离开这个地方。在1843年他曾因侦察去过洛伦索—马贵斯。他确信，如果邻近有一个不属英国管辖的海港，那对布尔人是有用的，因此他想在该海港附近找到一块地方，同时又使他得以越过开普当局所规定的属于英国法庭管辖范围的南纬二十五度。因此他就在波切夫斯特隆东北边四百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村庄，名之为奥里格斯达德，以纪念曾愿安排荷兰与波特吉特进行贸易的一个荷兰商人。

波特吉特和他的同伴立即着手组织一个共和

国。后者把周围所有的土地都从斯威士人手里买回来，斯威士人对当地由塞克瓦提领导的一些巴普迪人弱小部落拥有宗主权。波特吉特被选为共和国“司令”。他出于个人考虑反对购买土地。原来这些土地的一大部分已经由塞克瓦提割让给他个人了，他不愿放弃这项廉价得来的财富。这件事使他同奥里格斯达德的人民议会发生纠纷。同时那个昙花一现的克利普河共和国的布尔人有些来到奥里格斯达德，使舆论有所改变，因之波特吉特在那里不能再行使其家长式的统治。他又离开此地向索特潘斯贝赫作最后一次迁徙。不久大家都放弃了奥里格斯达德，因为发现这个村庄处于虐疾流行的地区，居民都迁至较南的莱登堡。

这些先后迁移的结果出现了三个不稳固的国家：奥里格斯达德——莱登堡、索特潘斯贝赫和波切夫斯特隆。很明显，这样组织起来的布尔人绝无抵抗英国人的可能，何况这三个共和国还相互嫉妒，经常争执不休。

可是恰恰在看来自由最受威胁之时，布尔人却即将得到渴望已久的自由。1850 年关于在划界不清的边界上几个牧场的问题，莫谢希同“奥兰治

河主权国”的布尔人发生争执。这些布尔人向开普当局抗议，主要是说：“我们现在既是英国的臣民，英国应当保护我们！”因此沃登就去进攻莫谢希，但在维尔沃特遭到惨败。布尔人自己对此也要负很大责任，因为他们不肯响应动员，听英国人指挥。动员一千人，只有七十人应征，这说明布尔人心里对英国当局的仇视。当时英国当局不但在维尔沃特遭受屈辱，而且在开普殖民地东边也忽然受到进攻。

未预料到的和解

从1847年起殖民地之东已开展着一场冲突。哈里·史密斯爵士按照他的一贯作法兼并了科萨人部落的某些土地，把它变为英国的一个“属地”，名之为“英属卡弗里亚”，并派去了英国人作法官。但用英国的法院代替部落的司法机构一事不久就引起争执，尤其是在1850年废除“嫁妆”制（罗博拉）引起一场不小的纠纷。史密斯勒令科萨人的酋长散迪勒来开普同他讨论此事。后者拒绝。史密斯派了一支军队去抓散迪勒，但在布马峡谷被击

败。第二天全区都进行反抗。严重的是一贯反对班图人的纳马警察也同科萨人站在一起。顿布人也起来响应。只是到1851年5月由英国派来援军才打败科萨人，而且直至1853年2月从布尔人血统的农民中招募的几个民团开到后，才把游击战平息下去。散迪勒投降，仍然保持酋长的地位。但开普政府在设立了土著人保留区、试图实行间接统治后，又决定派白人去卡弗里亚定居以监督科萨人。当时正有一个机会。同科萨人作战结束两年后，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了。英国建议那些参战的“德国人军团”成员到南非去定居。因此在完全由科萨人居住的地区至今还有若干村落以典型的德文命名，如布赖德巴赫、斯图特海姆等。

英国人同巴苏陀人和科萨人发生纠纷，给比勒陀利乌斯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他从德兰士瓦的藏身之处给哈里·史密斯去信，表示如果英国承认布尔人独立的话，他准备与英军合作打垮班图人。史密斯毫不犹豫。他已意识到他的兼并政策的失败。他忘记了比勒陀利乌斯是被判过死刑的叛逆，竟同意后者的建议。英国女王

陛下的代表同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罪犯在散德河畔一个农庄中会晤。1852年1月17日比勒陀利乌斯终于签订了一个使老波特吉特非常高兴的文件。这个老领导人从遥远的索特潘斯贝赫跑到吕斯腾堡，向布尔人自由的缔造者致贺。

德兰士瓦的独立

这个公约规定给予"瓦尔河彼岸的布尔人以独立"。上述用语是不明确的，但实难找到一个别的用语。任何人也说不清比勒陀利乌斯在法律上究竟代表谁，甚至他本人也说不清。他以"德兰士瓦人民总司令"的名义签字——他显然并无这样的资格。在1849年德兰士瓦人确曾接受过一个统一的德兰士瓦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并未付诸实现。因此索特潘斯贝赫和莱登堡两个共和国对比勒陀利乌斯的"僭权"深感不快。但他带回的条约太珍贵了，布尔人不愿再打乱一切重新讨论。因此整个德兰士瓦共同推出一个大的人民议会于1852年3月16日批准散德河文件。几个月后波特吉特和比勒陀利乌斯先后逝世。正象圣经上旧

约中的先知们一样，他们在死前把人民领到了迦南乐土的门口。

但是德兰士瓦取得独立还有最后一幕。大家要记得，这个独立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在巴苏陀兰战败。那个热衷于兼并土地从而酿成种种困难的、暴燥的史密斯总督被调回以后，新任总督乔治·卡思卡特爵士来到南非。此人认为应当在莫谢希面前挽回英国军队的荣誉。他率领三千五百人再次进入巴苏陀兰。正如沃登一样，他也遭到惨败。于是他才相信要想制胜这些顽强的武士，最好的办法是把任务交给布尔人。换句话说，卡思卡特在承认了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独立后，又承认“奥兰治河主权国”的布尔人独立。1854年2月23日后者改名为“奥兰治自由邦”。几年以来已在布隆方丹的沃登住宅周围最早定居的一伙英国移民对此深为不满。

在南非两个白种人的新国家、即布尔人国家从此诞生了。

第十一章　共和国组织起来

1852—1863

对于忽然一旦获得这许多年来一直要求的独立还感到有点惊奇的布尔人来说，摆在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起来。开始时他们很难做到。但由于波特吉特和比勒陀利乌斯差不多同时逝世，这为统一北方排除了一个主要的障碍。这两个人生前表面友好而实怀妒意，那么辽阔的整个德兰士瓦却好象不能同时容下他们两个人。

比勒陀利乌斯的政策

安德烈斯·比勒陀利乌斯的儿子即将承继其父的遗业，而波特吉特的两个儿子赫尔马努斯和彼得却不久都死去了。名叫马提努斯·韦塞尔的小比勒陀利乌斯颇有雄心，而且他对布尔人为巩固新得到的自由应达到怎样的目标也有明确的看

法。但是他见识不广，性格粗暴，不适宜办当时情况所需要的外交工作。可是在1856年12月他做到了使大家都同意在比勒陀利亚宣布成立一个包括在瓦尔河以北所有的雏形国家在内的“南非共和国”。人口共有一千八百人。他被选为总统。总司令一职委任原属索特潘斯贝赫共和国一个名叫舒曼的人充当，以争取这个杂有猎户、投机商和农民的共和国。但舒曼得到莱登堡那批人的支持不肯就任。加以关于宗教组织问题各方仍有强烈的对立，使事态更加复杂化。小比勒陀利乌斯硬要他的一个朋友作牧师，而一大部分布尔人则对此人猛烈抨击。意见为此分歧，以致形成一场真正的内战。

内部虽然有不少困难，但小比勒陀利乌斯又看中了奥兰治自由邦。他在1857年去布隆方丹时提出占有该地的要求，但他所根据的“权利”很成问题。原来在签订散德河公约后，英国人也准备放弃“奥兰治河主权国”，当时英国人将此意告知老比勒陀利乌斯，建议他去把即将获得自由的奥兰治地区的布尔人组织起来。但这个建议书在老比勒陀利乌斯死后才送到他的农庄。小比勒陀

利乌斯却以此为依据要求把奥兰治自由邦合并到德兰士瓦。莱登堡共和国本来实际上已不把“南非共和国”放在眼里，这时更以反对小比勒陀利乌斯的要求为借口正式退出。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比勒陀利乌斯依然推行他的政策。他率领一个民团去“攻取”奥兰治共和国。但这时后者已经组织起来了，拒绝合并。大家记得，这个国家是在沃登撤退后于**1854**年通过布隆方丹公约建立的。通过了一个具有布尔移民所成立的各个共和国的一贯特征的宪法，选了一个叫霍夫曼的当地农民作总统。此人当选由于有两个大的长处：第一、在英国人离开布隆方丹时，[1]他是住在那里的人数很少而且有一点声望的布尔人之一；其次，他又是莫谢希的朋友，莫谢希刚刚两次打败那些未得到民团多大支持的英国人。

霍夫曼立即开始工作。他去拜访莫谢希以同巴苏陀人重建互相信任的关系。他到达那里时

(1) 布隆方丹当时的居民大多是英国人。

受到大鸣礼炮的欢迎。为了补偿主人在欢迎仪式中所消耗的火药，他认为应当赠送给莫谢希一桶火药。他又说服莫谢希的一个藩属对其部下在一次袭击边境上的布尔人时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然后他还经过莫谢希的同意，命令设一意见簿，将还没有得到巴苏陀人赔偿的布尔人的一切控诉登记下来。但是那些负责收集意见书的工作人员鼓动布尔人向巴苏陀人进行不折不扣的挑衅，故意加多所受损失的项目。霍夫曼对此有失体面的行为大发雷霆。于是有人想起他曾经给了莫谢希一桶火药。照布尔人看来，向班图人或纳马人出售武器或军需品是应处死刑的大罪(虽然在边境上盛行走私)。一场激烈的骚乱随之而起。霍夫曼被斥为人民公敌。他被包围在布隆方丹的家里，不得不提出辞职。

这一次人民议会请来一个住在开普的布尔人来主宰共和国的命运。这就是博斯霍夫总统。当他获悉那个鲁莽的比勒陀利乌斯快要来到时，他连忙召集了一队民团前去迎敌。两伙持有武器的人在犀牛河隔岸对峙。比勒陀利乌斯于是才明白他不能指望不战而胜，就放弃了合并的企图。他

同博斯霍夫作了一次合乎礼貌的会见，然后分手。但到1858年，巴苏陀人又来进攻奥兰治。博斯霍夫兵力不足，向比勒陀利乌斯求援。后者立即看出他会在这件事上捞到的政治方面的好处。他于是动员了一队民团，由保罗·克鲁格率领；但他提出的条件太高，以致博斯霍夫放弃了求援的要求，转而向开普总督乔治·格雷爵士乞援。格雷爵士在1855年曾去过布隆方丹，并划定了巴苏陀人和奥兰治自由邦的边界以制止两者的纠纷。因此，虽然英国政府根本不愿插手奥兰治河以北地带的复杂事务，格雷却觉得在道义上不得不去干预。可是他认为，通过某种不露形迹的活动可以推动南部非洲所有白人国家结成邦联的主张。这样，照他想来，既可使用来监督班图人迁移的各种力量不致分散，而且成立一个各独立国家组成的邦联也不会公然违反伦敦的意旨。

但英国政府明白格雷的这种用意，表示这一行动不能代表政府。同时，在奥兰治对巴苏陀人的作战又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承担这种现实情况的后果。于是才有北阿利瓦尔公约的签订(1858年8月)。根据此约，莫谢希在南部边境的国土扩

大了，而北部边界并未划定。博斯霍夫因作战败北，不孚众望，而且被怀疑支持了格雷的计划，不得不辞职（1859年）。

这说明比勒陀利乌斯所采取的立场是有道理的，因此他便自己提名作为奥兰治自由邦总统的候选人。他果然设法得以当选。从此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只有一个总统了。可是这两国还是分开的，仅仅有共同的总统而已。

现在回头来谈德兰士瓦。1858年终于在这个两年前已经成立的共和国里通过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完全与南部非洲那些从此定型的宪法同一类型，不同的地方只是有关宗教的几条。该宪法规定"布尔公民"不得同英国传教士（事实上主要指伦敦传教会的人员）发生任何接触，禁止天主教，容许信仰新教。

通过一部宪法并不足以使国家的权力转弱为强。那几个区长只拥有数目有限的工作人员来执行人民议会或总统的决定。这就等于说，如果没有"人民"一致同意，这些决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但"人民"究竟是指全体公民的有纪律的整体呢，还是指由某种固定的集体见解而骤然结合在

一起的乌合之众呢？有时也难于识辨。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并不能使德兰士瓦恢复和平，那是可以理解的。总统时常去奥兰治而不在本地使得事情不好办。因此又发生了内战。1862年范伦斯堡、克鲁格、舒曼等都有自己的民团的“司令”，几度易位，轮流执政。1863年比勒陀利乌斯的敌手威胁要罢免他，他只好放弃南方回到比勒陀利亚。这个决定结束了同奥兰治的脆弱结合，但至少北方的秩序因之稍得恢复。

奥兰治又没有总统了。它这一次选择了住在开普殖民地的布兰德作总统。这个选择是意味深长的。“殖民地”——布尔人各共和国都以此称呼开普——给新成立的国家的行政机构提供了比来自农村的布尔移民有学识的人材。德兰士瓦、尤其是奥兰治当局从这个贮藏人材的地方寻找它们的高级官员。但是这些开普人总是多少受到怀疑，因为他们出身于接受了英国“桎梏”的家庭。布兰德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他们这些人的暧昧立场。他一方面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元首，另一方面他个人却依然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因此后来被封为准男爵，拥有“爵士”的称号。照那些不妥

协的布尔人看来，这简直近乎“背叛”。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反英的德兰士瓦在需要专家担任行政职务时，常常是用荷兰人而少用开普人。这两种情况都有些类似现在的技术援助。

至于同非洲人的关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看法差不多一致。本书无法把布尔人同英国传教士对这方面的关系的争议一一详述。布尔人说他们是保卫优等文化，反对野蛮，而英国传教士则责备他们对非洲人犯下严重罪恶。本书对这不同的立场举几个典型例子不为无益。我尽量引证来自布尔人方面的材料，因为布尔人认为英国传教士举出的证据有偏见而不肯承认。

布尔人与黑人

一个布尔作家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曾愤慨地叙述祖卢人在杀害雷提夫后对布尔人的一次进攻。为了歼灭一伙布尔人，祖卢人把一群牛从前者阵地上面赶过去，把布尔人踩死。布尔人对格里夸人也作过一次类似的事，但我在布尔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对此事的记载。在1844年一些布尔人

想夺取属于一个叫安德烈斯·亨德里克斯的格里夸老人的土地。后者和他的六个儿子在一座小山岗上挖壕防守，同围攻的布尔人打了四天。最后布尔人由于一个茨瓦纳族仆人的献策对这七个格里夸人采取了与他们大加指责祖卢人所发明的那种“招数”完全一样的办法：用畜群把这些防卫者全部践踏死。这件事载于英国人查尔斯·贝尔所著的那本有趣的小书《南部非洲近况事例概述》中。

本书前面提过的在亚当·科克第三的格里夸国中发生的纠纷（见第十章），也可说明布尔人如何看待他们与所有非欧洲人的关系。格里夸国在1843年取得“条约国”的地位。格里夸人按照他们同英国人的协定，负责维持治安，但如罪犯系欧洲人时须送交开普区科累斯伯格地方法官审处。1844年一个欧洲人被控杀人，科克试图将他逮捕送交英国人的法庭。结果温堡共和国的布尔公民立即组织了一队以扬·莫克为首的民团。科克于是放弃行使其警察职权。第二年一个名叫克里瑙夫的布尔人因把人打伤，被告到法庭应行逮捕时，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事件。

1865年在索特潘斯贝赫有两个欧洲人被布尔人当局自己以盗窃非洲人牲畜的罪名起诉。布尔人一再说只有非洲人才偷窃的讲法，没有说出全部事实，有时布尔人也偷窃。当地区长判处此二人坐牢，但一群布尔人把他们放了出来，判决未能执行。这件事正是导致捣毁舍曼斯达尔的一场非洲人暴乱的重要原因(详见《南非史画册》)。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当时布尔人的心理状态。这些成立了共和国的布尔人不能容许非欧洲人审判他们，仅仅逮捕也不行，甚至不同意执行他们自己法庭的公正判决，因为被判刑的是白人而受害者是黑人。

因此，人们习惯于非常重视非洲人"暗杀"单身布尔人的案件。沃尔克查明从1838年到1843年这类暗杀案共有十起。其中六起的作案人是被布尔移民违法诱往瓦尔河彼岸的农庄去的非洲人。这些非洲人处于一种不合法的地位，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不能向法庭控诉要求制裁。这种情况必然要导致暴力行为。

在对待非洲人方面，还有一件比司法问题更为严重的事情：关于土地的规定。布尔人在开始

时是出钱买土地。当然，很少按照土地的实价付钱；那些英国传教士自己在买土地时也是如此。问题还在于非洲人对欧洲人购买土地的概念理解到什么程度。在欧洲人看来，土地一经购得，原主就完全放弃了所有权，而班图人却无此概念，他们常常以为只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这便酿成很多的纠纷。纠纷的另一原因是班图人社会极为复杂的封建结构，尤其在祖卢人兴起以后。大家还记得过去波特吉特买下了马克瓦纳的撒巴一温堡地区，莫赛利卡蔡说他对马克瓦纳有宗主权，而布尔人不肯承认。但在打败莫赛利卡蔡后，波特吉特忽然宣称他是前者的法定继承人，凡前者认为拥有宗主权的土地一概归他所有。这样他就无偿地取得了大片的土地。诚然，那些布尔人的国家中给了“藩属”部落一些保留地，但是毫无保障。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出德兰士瓦西部的塔瓦讷酋长的例子。此人在波特吉特执政时得到一片广大的土地。后来到德兰士瓦去的布尔人增多，有些人看上了他的这块地，不容分说便把另一块较小的、不如以前肥沃的土地分给了塔瓦讷(参看沃尔克《南部非洲史》)。从这些事例中可以归纳出

布尔人对待非洲人政策的另一基本原则：仅由于白人的宽容非洲人才能支配土地，随时可以收回。

奴隶制与“学徒制”

最后一点争执：某些黑种人在白人社会中的地位。更具体地说，布尔人是否依然保持奴隶制？我们已经说过，自1838年始就无法证实传教士们时常对布尔人提出的这种指责，而且我们也可以相信，布尔人的国家非常留心，不会让奴隶制继续存在。他们完全明白，保存奴隶制将使英国舆论界有一个最好不过的理由来迫使政府进行干涉。

但是有“学徒制”存在。在荷兰人殖民时期已有这种制度。其作法是：凡家里无人抚养的黑人妇女儿童都被看作是没有生活来源，应即由国家分配去当“学徒”，由国家开列专门名单，决定以后是否可以恢复他们的自由。布尔移民成立共和国后袭用了这种学徒制，并时常给它以一种极为广泛的解释。例如在同非洲人发生小规模的冲突时，只要男人一跑掉，布尔人闯进黑人村落后就宣布所有的妇女儿童都是“没有生活来源”的，随后

就把这些妇孺在他们之间分掉。再进一步便是把分得的多余徒工"出让"给别人。虽然官方禁止，但这种事却时常发生。加以有时非洲人自己也自愿"出让"儿童以取得一些现金。尤其是斯威士人常把被他们征服的部落中的一些儿童"出让"。有些儿童终于落到莫三鼻给的葡萄牙人贩子手中完全沦为奴隶。如果硬说布尔人同斯威士人中间的长期友谊来源于此，那也是不公正的。斯威士人团结得很紧，他们住的地方几乎属于热带气候，加上虐疾和马瘟，使布尔人在当时不愿去他们那里。这有利于两者间的和平。然而买卖徒工的确也是使两者保持和睦的次要原因之一。这也说明那些非洲人酋长同白人一样，都不能逃脱罪责。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仅仅指责这一方或者另外一方。

至少有某些部落不能忍受他们的儿童叫人夺去，因此不止一次发生流血的冲突。这些悲惨事件中最出名的马卡潘事件，对当时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完全经过证实的例子。波特吉特的儿子赫尔马努斯是个擅长招募"学徒"的人。他常常以猎象为名到贝专纳去寻找"没有生活来源"的儿童。知

道他的人很多，以致有时那些非洲的村民毫不抵抗地撤离，仅把儿童留下任他带走。但在1854年他遇到由马卡潘酋长领导的一个茨瓦纳人部落的抵抗。《南非史画册》上说："他的那个远征队包括十三个男人和十个妇女与儿童，公开说法是去猎象。可是马卡潘显然有根据怀疑小波特吉特想得到学徒。"沃尔克说得更明确："马卡潘……恨小波特吉特是有一些根据的。"总之这个茨瓦纳人酋长袭击了这队布尔人，把他们杀掉。克鲁格被派往该地去进行讨伐。经过几次交锋后，茨瓦纳人躲到一个山洞里，克鲁格得以封锁住洞口。他留下一队卫兵去"肃清"附近残敌，杀了约九百人。在布尔人方面，赫尔马努斯之兄彼得·波特吉特也被打死。在山洞中的茨瓦纳人则毫无动静。廿五天以后，布尔人闯入山洞，发现约有两千人死在那里，都是老人和妇孺。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不仅表明镇压的残酷，也说明非洲人多么怕布尔人。两千茨瓦纳人宁肯死于饥渴而不投降。

同时大家也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形之下何以英国传教士有时会向黑人提供武器；这件事在布尔人看来是桩不可饶恕的大罪。布尔人对贝专纳的

巴克加特拉人的住区发动过几次袭击，这里的人受到利文斯敦的保护。在一次袭击中他们占领了科洛本的传教会，果然在里面发现有一所修理步枪的作坊。此事只能加深他们对伦敦传教会派出的人员、首先是对利文斯敦的仇恨。早在1852年，波特吉特已经企图封锁贝专纳不许英国传教士过路，这样就会使到北方去的运输不得不通过波切夫斯特隆。但因国力不足未能使他的决定付诸实施。

反之，象马卡潘这类事件后来引起茨瓦纳人拼死抵抗。他们在六十年代终于把贝专纳彻底地从野心勃勃的德兰士瓦手中夺回。"南非共和国"未能使其政权建立在对土地的真正控制上面，竟乞灵于一纸空文的兼并。在1868年人民议会作出决定，并由小比勒陀利乌斯宣布了国家的"新边界"。这个边界差不多到处都远远超过德兰士瓦实际行使权力的界限。在西边划了一条通过格里夸敦的中线，[1]把全部贝专纳都划归德兰士瓦。在东边，比勒陀利乌斯力图把共和国的疆土沿马普

[1] 参看附图3：十九世纪直到1877年时的南部非洲。——译者

托河扩张到海边。德兰士瓦的边界过去在散德河公约中虽无规定，但英国拒绝承认比勒陀利乌斯这种想入非非的狂妄野心。在英国人的拒绝下，这种兼并只能是理论上的罢了。德兰士瓦共和国不但未能扩大而且不久在其西南部逐渐丧失权势，到 1877 年该共和国完全崩溃，在几年当中从非洲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第十二章　殖民地的历程

1848—1875

上文已经讲到，布尔人1835年到1838年的大迁徙引起了原开普殖民地严重的经济萧条。再者，这段期间种种动荡的政治后果是1842年英国人占领了纳塔尔，然后又扩展了“条约国”。最后在1848年开普总督哈里·史密斯爵士把“奥兰治主权国”和“英属卡佛利亚”兼并了。

同一年，有一个新的问题要求精力充沛、非常活跃的哈里·史密斯爵士予以充分的注意：英国决定将一批罪犯送往开普以便当地政府有必要的劳动力去修建公路。这些公路旨在将殖民地的中心地带同由于布尔人大迁徙而空无人烟的东部地区联系起来。可是谁也不愿到那艰苦的工地去劳动。因此英国的国防大臣决定派海神号运输舰把这第一批不体面的移民运往南非。运输舰已经启程去开普而英国政府对它这个解决修路问题的办

法竟没有征询一下当地总督的意见。但有几艘航速比海神号快的船在后者到达以前带来了这个消息。在当地居民中暴发了一场极为强烈的骚动。不论是说荷兰语还是说英语的南非人，第一次汇合成为一个强烈抗议运动的洪流。面对这一怒潮，总督答应向伦敦再行请示，但他坚持不能擅自命令海神号回航。群众的激情尚未平息而船已到达。该船在港口停泊，罪犯一律不许下船。但总督的这个措施不足以平息公愤。立法会议中有四个委员辞职。这个立法会议成立于1834年，以总督为主席，委员包括：四个行政部门的长官、财政督察官、以及由每届总督在到任后自行任命的五个到七个“公民”。

辞职的四个委员都不是现任官员。结果使立法会议丧失了所有的权威。史密斯爵士另外任命了四个新委员，作为权宜之计。但是这四个新委员刚去参加会议就遭到群众的袭击，群众还打算抢劫其中两个人的住宅。群众知道有的包工头曾建议使用那些罪犯作工，于是在这些人的房屋前也发生了殴斗。史密斯爵士设法避免了一场公开的民变，但骚动并未停止。甚至海神号离开开普

改向澳大利亚驶去后仍不能平息民愤；群众要求取消个人专断，建立议会制度。伦敦考虑到开普的财政情况，对此要求迟迟未决。史密斯爵士的“外交”政策和由于他放弃干涉瓦尔河彼岸而遭到的失败，也推迟了这项改革。最后在1853年3月11日英国政府终于通过在开普实行民选议会制的法案。

这个议会由十五个民选议员组成，所有英国臣民不分肤色原则上都可参加选举。但选举权受相当高的纳税额的限制，事实上是个白人议会。殖民地东部的选民也希望有他们自己的代议机关，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督受权可在任何地方召开议会。这样就开始了行政都会同立法都会的分立，一直沿袭至今。现在的南非行政机关在比勒陀利亚，议会在开普。

在政策实施以前(见第十章)，哈里·史密斯爵士于1852年被调离。继任的乔治·卡思卡特爵士在开普的时间不长(1852—1854)。上文已经提到，再下一任总督乔治·格雷爵士继续哈里·史密斯爵士未竟的事业，向奥兰治河甚至向瓦尔河的彼岸发展，但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不再兼

并而是用组织联邦的办法。虽然伦敦否认授权，但他不久认为自己不但有义务去干涉奥兰治自由邦的内政(见第十一章)，而且尤其应对科萨人的国家进行干涉。

一个部族的灭亡

科萨人关于救世主降临的传说由来已久，1817年曾通过那个奇异的马卡纳表现出来，这时忽然又以一个极为尖锐的形式出现。1856年该族一个名叫农夸斯的少女忽有一系列的幻觉，消息不久就在各个氏族间传开了，说是：科萨人的伟大祖先们向这个少女显灵了，他们将要回来打倒白人，把他们都赶出去。人们甚至指出确切的日期，说到某天一个新的时代就将到来，那时玉米不种自生，牲畜不养自增，所有的人都将富裕和幸福。但农夸斯肯定地说，要使这一切得以实现，必须在那个好日子的前夕毁掉一切牲畜和所有收下来的粮食。

农夸斯的疯言狂语不久便造成悲惨的后果。在整个科萨人住的地方，一直到顿布人的地方，这

些班图族系的人都把他们的牲畜和储藏的粮食全部毁掉，任凭田园荒芜。到了1856年3月预定的那一天，当然什么也未发生。但以后几个星期中有好几万非洲人饿死。科萨人口大概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二，顿布人以及已在英国控制下的边区居民则减少了三分之一。

开普政府全力以赴，想避免灾祸扩大，但等从西部用牛车拉来的小麦玉米运到时，已经太迟了。

科萨人从此不能作为一个有组织、能自卫的部族而存在了。那些长期"流浪"的芬果人这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占据了科萨人的一部分土地；庞多人也是如此。但受灾的面积如此之广以致还有余剩的闲地。开普政府于是说服亚当·科克第三率领的格里夸人迁移到这些空无人烟的地方去。格里夸人原来在菲利波利斯周围定居的地方已因布尔人的渗入而减缩，科克也明白奥兰治自由邦就是想把他完全排挤出去。于是在1861年他又一次向东方迁徙，把格里夸人安顿在一个新的"都会"科克斯塔德的周围。但是格里夸人不善耕耘而且嗜酒成性体质受损，他们已没有过去那种必要的毅力去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东格里夸

兰，人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一直到1878年被兼并时都是如此。

科萨人的大饥荒对纳塔尔也有影响。此地原来极为肥沃，种植甘蔗取得很大成功，但缺乏劳力。科萨人人口大减，祖卢人则在相当大的保留地里闭关自守，不肯给白人服役。1856年纳塔尔脱离开普的管辖而直属伦敦。一个开普类型的议会成立了，议员们立即要求输入印度苦力以发展甘蔗种植业。毛里求斯早已有使用印度人的先例。当局很快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在1860年头一批印度人到达纳塔尔。于是在一直毒化南非各种族间关系的种种问题中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英国再次推行扩张政策

在纳塔尔与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境之间，现在只残存一块独立的飞地，包括庞多人、芬果人和科萨人的领土。为了简化控制的办法，伦敦就想兼并这块地方。但开普的议会不同意。因为这些地区经过了大饥荒后，在1862年到1863年又遭受一场特大干旱，还没有很好巩固，开普议会怕一旦

合并要付出很大的费用。但英国政府坚持原议，于是在1864年这些班图人部落的独立的最后残迹也消失了。这些地区的黑人成为英国的臣民，对这个名叫卡佛利亚的地区的兼并有重要的意义，① 它表明英国的退却时期(以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取得独立为退却的极限)已告结束。英国在南非再次推行它的扩张政策了；至少当这个政策能够节省本来的开支或开辟新财源的时候，英国便进行扩张。扩张是以一个既模糊不清而又方便的理论为名进行的。英国宣布自己是“最高权威”。客观上说也确是如此，但在法律上就出现一个后果：对从好望角一直到中部非洲这个未确定的区域中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最高权威”都要负责。因此，如情况需要，英国便有权进行干预。这是作为十九世纪末叶特点的新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此外，从1847年起开普总督在其行政头衔之外又加上一个更含混、更广泛的新头衔：“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开始这头衔是同对“条约国”行使的职权相联系的，后来又被加上多种多样的解释。

① 卡佛利亚原被殖民主义者兼并，作为直属英国的殖民地。1865年，该地被并入开普殖民地。——译者

英国不久就暴露出它所谓的“负责”，对于它和其臣民来说，就是谋利的意思。在1868年布尔人就已从吃亏中明白了这一点。当时奥兰治自由邦已接近征服巴苏陀兰，被它掌握的地方已超过三分之一。八十高龄的莫谢希已经不再享有过去的权威，不能再从事一场有力的战斗。在他手中只剩下一张牌：投靠英国人以逃脱布尔人的统治。奥兰治自由邦长期以来徒然努力，英国人坐收成果。1868年3月12日英国人把巴苏陀兰置于其控制之下。奥兰治抗议无效。到1869年签订第二个阿利瓦尔条约时，奥兰治自由邦不得不承认英国的兼并，而且甚至还同意退出已被布尔人占领的一大块土地。巴苏陀兰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划定的边界一直保持到现在。两年以后，伦敦又不顾巴苏陀人的抗议，把管理该地的行政重担交给开普殖民地。

一块钻石带来大批钻石的发现

大约与此同时，一件出奇的事开始吸引一些冒险家对格里夸兰的注意。1867年一个叫作范

尼盖克的农民走访朋友时，发觉孩子们在玩弄一大块亮晶晶的石块，他请人加以鉴别，发现这是块金刚石。以后又有所发现。大约在1868年末，在瓦尔地区的哈尔茨河口附近、格里夸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交界的地方，发现有几处金刚石冲积沙矿。开始时，大多数勘探者都不过把这事当作一种消遣。全家坐上牛车来到藏有珍宝的沙滩上，把河沙取来过筛，聊以渡假。但到1870年忽然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发现。在瓦尔南边杜多伊斯潘附近发现了一个原生金刚石矿层；金刚石不再是以冲积沙矿的形式出现而是存在于原生火山岩脉中。开采的情况立即改观。几千个职业勘探家都跑来了。到1870年末，就有四千人居住在"大洞"的周围。这就是那个象雨后春笋似地迅速发展起来的金伯利城。[1] 到1872年居民已达四万五千人。

巨大的发现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波。这些神话般的宝地究竟属于谁呢？"南非共和国"认为一大部分应该归它。比勒陀利乌斯总统总是那样粗鲁，不但向沿哈尔次河的地区派去了一个区

---

(1) 该城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

长，而且还把开采专利权授予他的三个好朋友，期限为二十一年。那些已在那里定居的勘探者闻讯狂怒，宣布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命名为阿达曼塔。布尔人过去使用的手法现在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了。新共和国的公民把一个过去干过水手的斯塔福德·帕克选为总统。

奥兰治自由邦也向该地区派去一个区长。这个国家要求占有该地区，包括金伯利在内，根据是它已合法地购买了这块地方。亚当·科克第三离开西格里夸兰向科克斯塔德迁徙时，曾把他的土地连同坎贝尔敦周围的土地卖给奥兰治了。但是那个叫阿诺特的当时办理此事的人后来又影影绰绰地说，坎贝尔敦的土地并不包括在内，他已把这些地方又卖给在格里夸敦的格里夸人统帅瓦特布尔了。

因此，这是一种必然要引起纠纷的局势。除了德兰士瓦、奥兰治和勘探者的共和国三个对手之外，不久又加上第四个对手：英国"最高权威"。1871年，开普总督亨利·巴克利爵士巡视了金刚石的产区。然后他在德兰士瓦边境会见了比勒陀利乌斯总统，又在布隆方丹会见布兰德总统。他

向这两人建议将整个事件交给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仲裁。照巴克利爵士的意见，这个仲裁人应当是“最高权威”的一个代表，具体说来就是纳塔尔的副总督基特。

于是奥兰治自由邦就向伦敦申诉，但后者回答布兰德总统说，这件事纯属“地方性”事件。布尔人明白这一回答的含义：英国政府不过是有礼貌地表示，布尔人各共和国并非完全独立的国家，不宜同它们举行最高级的会谈。这是违反散德河公约的，但奥兰治自由邦只能抗议而已。巴克利爵士派了队伍去金伯利，布兰德一方面还是抗议，一方面撤回他的区长并同意交付仲裁。基特宣布——任何人也不感到意外——把所有的金刚石产地并入开普殖民地，后者被裁定为“该地区的合法所有者”、瓦特布尔的法定继承人。这只是在仲裁的伪装下进行直截了当的掠夺而已。

在德兰士瓦，此事的结果引起了比勒陀利乌斯的下台，因为他未能保卫国家的利益。一个过去是个神学家名叫伯格斯的开普人，被选为总统。在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总统还没有完全放弃证明他对该地拥有权利的希望。他耐心地搜集资

料。在1876年一个由开普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终于给了他一个好机会。审理这个案件是要决定开采金刚石矿的两个租让书——一次是由瓦特布尔给的，一次是奥兰治自由邦给的——究竟哪一次有效。法院判决奥兰治自由邦给的租让书有效(1876年)。

布兰德立刻去英国要求归还由于基特的决定而从奥兰治诈取去的土地。英国政府对于这个决定的不公正是难于否认的。但最后还是说服布兰德，使他承认奥兰治这个国家太小，不能使金伯利的几万居民服从它的纪律。不论如何，该地已由英国管理了好几年，要恢复过去的样子也不是易事。因此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勋爵就干脆向奥兰治自由邦建议承认英国对该地的兼并，由英国给予补偿。布兰德接受了九万英镑的补偿金。如果同以后在这块有争议的地方开采出来的金刚石的价值相比较，补偿金的数字实在少得可笑。单说金伯利这一个矿，到1914年封闭为止就开采出约值五千万英镑的金刚石。

两个巨头之外还有第三个巨头：谢西尔·罗德斯

可是，奥兰治自由邦，甚至德兰士瓦也间接地从金刚石的发现中获得利益。人口和需用品的迅速增加扩充了附近的布尔人的市场。在金伯利盛行狂热的投机活动，数日之间即可积资巨万，几天之后又会变为赤贫。很快就出现了几个头脑冷静的人，善于利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活动。这几个天才的实业家中，第一个是来南非疗养初期肺病的青年人。他是一个英国牧师之子，1853年生于比夏普斯—斯托尔弗德，名叫谢西尔·罗德斯。他的一个哥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早已来到南非。年轻的罗德斯来后就住在纳塔尔他哥哥的家里。但他听到格里夸兰发现金刚石矿后，就来到金伯利。开始时他用订立合同的办法，从小的个体租让地那里捞得利润。后来他开始购买股份。

另一个冒险家叫巴尼特·艾萨克斯，生于惠特彻奇。他也于1873年来到矿区，当时只带有几

盒廉价的雪茄烟，卖掉后获得厚利。他很快地扩大生意，然后购买股份。

还有第三个人，也是财运亨通，他是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名叫艾尔弗雷德·拜特。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在金伯利赚得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三个人都是野心勃勃、富裕、聪明，但性格不同。不久改名为巴尔纳托的巴尼特·艾萨克斯具有理财的天才，过去无人赏识，一朝发迹，就得意洋洋。惠特彻奇那个可怜的小犹太人现在成了有势力的人物。总之他是个乐天派，有钱可赚就于愿已足。拜特的能干不下于巴尔纳托，但其性格有些怯懦，对自己的才干缺乏自信。他需要效忠于某某人，使别人发挥他由于受过德国教育而具有的高度组织才能和他的专门学识，方能完全称心如意。在这三个人中，只有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钻石商那里呆过一段时期。

至于第三个人罗德斯则是一个幻想家。对于他来说，金钱不过是有助于实现"命运"——或曰"天主"、"天命"或"演化"——的手段而已。这个命运是什么呢？1872年患了肺病的罗德斯坐上牛车漫游旷野以恢复他在金伯利的过分劳累时，

他找到了答案：命[illegible]

地的军火交易。英国驻军总司令本人也觉得有必要提请开普总督注意有人拿步枪作为"酬劳"工人的方式。照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公民看来，这是一个危及他们安全的阴谋。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虽然到七十年代末班图人发动的战争又有了一定规模，但黑人不只对布尔人，也对英国人作战。

第一个较大的事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纳塔尔的赫路比人的一个酋长兰加利巴累累在1873年10月接到纳塔尔政府的命令，叫他交出他的臣民所持有的步枪。他拒绝听命。经过几次勒令无效后，正规军便派部队去进攻。这个酋长逃到巴苏陀兰。后来借助于一个叫马拉波的巴苏陀人酋长，才把兰加利巴累累捉住，未酿成一场流血的战争。一个不大象样的法庭判处他终身放逐。经过英国主教科伦索为他说项，他终于回到纳塔尔。

兰加利巴累累的叛乱仅是以后黑人同白人武装冲突的一个序曲。但时代变了。随着金刚石矿的发现，南非进入了工业时代。黑人在那里只有做粗活的地位。他们进一步成为"臣民"。均势终于打破，黑人再不能同白人分庭抗礼了。

第十三章　战神的阴影

1871—1884

到1868年英国人同布尔人的关系逐渐恶化。比勒陀利乌斯企图合并贝专纳未成，已使布尔人满腹怨恨。在“基特的仲裁”以后他们更是愤慨。上文已经说过，比勒陀利乌斯成为此事的牺牲品，他不得不辞职。

英国人期待着他的继任人会比较柔顺一些。1873年德兰士瓦总统选举的结果似乎证实这一期待不是没有根据的。新任总统伯格斯是原籍开普省的英国臣民。他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家，而开普的教会则是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1] 他未能使后者接受他的观点。于是他正好可以接受来自北方的布尔人的邀请，况且他在一次反对开普教区会议的诉讼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曾大大提高了

---

[1] 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反对较为近代的教义。——译者

他的威望。就全体布尔人说来，他们对自由派的神学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他们非常讨厌开普的教会。一个能在诉讼中战胜开普教会代表的人使布尔人感到敬畏。他们以为有这个人领导，就保险不会再上“基特式”英国人的圈套。

这是一个错误的估计。伯格斯就任总统后依然“牧师”气十足。当他应该保持缄默时，他却出来讲话。在他象比勒陀利乌斯一样，也想得到一个通往印度洋的港口时，他大吹大擂地作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演说。他甚至宣告应当从葡萄牙人手中把迪拉果阿湾买下来；这样就立即引起英国人对莫三鼻给的这个地区的注意。英国要求该港湾的所有权应属于它。但葡萄牙得以将争端交给当时的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仲裁。1875年7月，后者宣布所有权应归葡萄牙。

布尔人的失败和英国人的图谋

对伯格斯说来，这是个初步的成功。在理论上他是可以开始进行购买迪拉果阿湾的谈判了。但德兰士瓦没有这笔钱。伯格斯于是降格以求，

想出另外一个方案：1875年到1876年间他到了欧洲，同葡萄牙订立了关于修建一条从迪拉果阿湾到比勒陀利亚的铁路的协定。他又到荷兰和比利时借得三十万英镑的贷款。他随即定购了第一批铁轨。与此同时，他大肆鼓吹荷兰人和佛来米人去南非移民，并聘请了一些荷兰人到德兰士瓦充任官员。①

这番外交上和经济上的活动使伦敦更加不安。当时任殖民大臣的卡纳房勋爵刚刚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联邦，便想在南非如法炮制。这可能在南非解决布尔人的问题。从1876年开始他就打算和平吞并德兰士瓦。他的方案是把开普、纳塔尔、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组成一个联邦，以维多利亚女王为元首；为了实现这个方案，他选定了一个英裔的南非人，精通荷兰语而且在非洲人中很得人心。此人就是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他在1873年潘达去世后，曾使潘达的一个儿子塞太瓦约继承王位，从而避免了祖卢人中间的严重

① 1879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地理学国际会议上，一个荷兰代表主张发起一个运动，鼓励荷兰人向非洲南纬二十度以南的地区移民。这个决议草案被葡萄牙代表团暗地破坏掉了，因为葡萄牙害怕在上述地区中会出现布尔人的“迁徙者”。

骚乱。

为了完成他的新使命，谢普斯通爵士收集了一些王牌。其中有一封莱登堡地区居民的信件，正式向开普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提出合并德兰士瓦的要求。这封信来自一伙英裔的金矿勘探者，本身原没有什么说服力；但一拿到谢普斯通的手中就成为宝贵的论据。论据还不止此。伯格斯总统有些挥霍，使德兰士瓦的财源陷于枯竭，而当时正需要钱以结束一场德兰士瓦当局与巴普迪人酋长塞库库尼之间刚刚发生的战争。巴普迪人通过金伯利得到了一些步枪。他们手中有了武器，就于1876年拒绝交纳“房屋税”。德兰士瓦总司令保罗·克鲁格当时正在病中。伯格斯认为他应该自己出马。英国的报界已经责难布尔人，说他们横征暴敛引起战争，而且还着重指出他们无力恢复秩序。因此伯格斯亲自指挥民团去进攻塞库库尼。布尔人并不踊跃作战。他们对这个在宗教上具有先进思想的牧师缺乏信心。进攻遭到惨败。伯格斯只好限于用一连串的小堡垒将敌人封锁起来，然后回到比勒陀利亚。他向人民议会要求通过新的赋税以武装援军。当时德兰士瓦实际

上已经破产，国家无法发给官员薪金。邮电局长从出售邮票中取得报酬，地产局长自己占有了一些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运到迪拉果阿湾的第一批路轨因无法铺设就弃置于港口。

当报纸登载伯格斯被塞库库尼“打败”的消息时，谢普斯通正在英国。他连忙赶回非洲。1876年12月他带了一大批护卫去比勒陀利亚，在那里扎营。他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居民或居民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或者人民议会表示有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的愿望时，”就兼并德兰士瓦共和国。如果立即兼并证明并无必要或不适宜，则等候伦敦的指示。

可是，当他到达比勒陀利亚时，正值塞库库尼已经降服。和平已经恢复。立即兼并的借口落了空。但谢普斯通并不气馁。他的兵营变得类似沙龙，用组织盛大的招待会、大量供应威士忌酒来吸引布尔人。谢普斯通慢慢地使当地居民同他混熟了。有人问到他来此有何使命时，他就含糊其词地说，来研究情况，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健全财政，考虑组织联邦。那个不幸的伯格斯感到身陷罗网，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他在人民议会发表

演说，建议成立联邦。第二天他又大骂本国同胞。他贼叫说这是他们的过错，正是因为他们不肯缴纳拯救国家所需要的捐税，以致他只有采取这样的方案。

在造成这种惊惶失措的气氛后，谢普斯通便进行摊牌。1877年4月12日，他不再向伦敦请示就宣布兼并德兰士瓦。他甚至注意让人们不要忘记高声喝采和唱英国国歌——《天主保佑女王》。然后群众就散开了。伯格斯写了一个最后的抗议书就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他悔恨交加，于1881年死去。三百个全副武装的布尔公民来到比勒陀利亚，但不敢驱逐谢普斯通。后者在纳塔尔边境还安排了一支人数不少的部队，并且好象碰巧似地，塞太瓦约也在附近动员了三团祖卢士兵。

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公民在头脑恢复清醒后，认识到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布尔人固然遭受一场屈辱的失败，但英国也并未因此获得胜利；兼并使联邦的方案归于失败而兼并本应是实现联邦的第一个步骤。一直是相当赞成这个主张的奥兰治自由邦从此再也不理会此事了。一个建议就联邦事进行谈判的法案被人民议会否决。在1880年

首次出现了一支借助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技术援助训练和配备起来的炮兵部队，这是正规常备军的萌芽。这个举动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唯一可能的敌人只有英国。

民族主义的基础

谢普斯通爵士的蛮横举动促使开普省迅速出现了一个阿非里卡人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即将结束开普的荷兰优秀分子的逐渐英国化。在德兰士瓦被兼并的两年以前，一小伙知识分子，只有八个人，在帕尔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叫作“真正阿非里卡人会社”，其宗旨是以当时通用口语为基础创造一种新文字。理由很简单：阿非里卡语已经远远不同于荷兰文的书面语言，以致荷兰文已不再是自己的“本来”语言而成为需要学习的外来语。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文势必逐渐为另外一种在南非更为有用的外来语即英语所代替。为了制止这种演变只有一个办法：提高阿非里卡语的地位，作为正式文字。但在这些语言文字的考虑后面已经开始出现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它表现在下面的口号

上："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这个团体主编的第一种杂志在1876年问世，名叫《阿非里卡爱国者》。德兰士瓦被吞并使这个一向几乎是个秘密刊物的杂志有了意想不到的迅速发展。在德兰士瓦落入英国人手中时，该杂志仅有四百个订户，到1881年发展为四千个。

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况是：1878年新闻记者扬·霍夫梅尔成立了一个"保护农民协会"，开始时是为了支持开普葡萄种植者的利益。在德兰士瓦事件的影响下，这个组织很快倾向于政治活动。1879年霍夫梅尔当选为议员。同年那个以《爱国者》杂志为中心的团体创建了一个明显的反英组织"阿非里卡人协会"，努力在群众中扩大影响。霍夫梅尔起初没有下决心同这个组织合作，因为他主张维持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他还使一条许可在开普议会中使用荷兰语的法律得以通过(1881年)——在一个已由英国统治了七十五年的殖民地，这是件破天荒的创举。但在1883年他在使"保护农民协会"同"阿非里卡人协会"合并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语言文字问题便成为次要的，而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文化反抗则形成有力

的运动。以上这些事件使谢普斯通的胜利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祖卢人挫败英国人

那些班图族怎样了呢？英国人以保护“他们”为借口吞并了德兰士瓦。当时非洲人最强大的国王塞太瓦约看出他可以从这一政局中捞到好处。如果英国人对祖卢人的友好表示是真诚的，那么让他们开始先还给塞太瓦约那一块过去未经祖卢人同意就被德兰士瓦夺去的领土。开普总督派了一个调查团到那块有争议的地方，试图让塞太瓦约耐心等待调查的结果。塞太瓦约则鼓动塞库库尼再次抗英以便在他提出要求时削弱英国人的力量。他在芬果兰也制造困难。科萨人企图重新占领他们过去在大饥荒时期所放弃的土地，把已在那里定居的芬果人赶走。后者向英国人乞援。英国军队不得不进行干预。开普政府希望进行更严厉的镇压，没有征求总督的意见就招募了一些“民团”。这件违反宪法的行动结果使开普内阁垮台。然后总督把芬果兰和东格里夸兰都并入开普，因

图2 十九世纪直到1877年时的南部非洲

为这两个地方过于弱小，在塞太瓦约所造成的动乱中无法自保。

最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报告，认为祖卢人的要求是有理由的。但开普政府了解到德兰士瓦当时的气氛，晓得如将争议的地区简单地让给祖卢人势必加速布尔人的叛乱。它于是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塞太瓦约可以改划边界，但对被夺去土地的布尔农民必须给予牲畜，作为补偿。此外他还需交出他所持有的一切枪支。这第二个条件显然同领土问题毫无关联。何况这些武器能经过金伯利运到祖卢兰正是由于英国当局本身粗心大意，如果不说它是同谋的话。德兰士瓦人过去已多次对此提出抗议。塞太瓦约也反对把这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联在一起。但是开普总督的一个最后通牒命令他全部照办，塞太瓦约置之不理，战争于是爆发。

1879年1月，彻耳姆斯福特勋爵率领英军侵入祖卢王国。塞太瓦约懂得，白天正面大批冲锋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伊散德尔瓦纳地方，他发动了一次夜袭，大获全胜，八百多英国兵战死，还有几百个黑人搬运夫被杀。但不久在洛克滩的一

场难分胜败的战斗中祖卢人的锐气受到挫伤。作战双方慢慢地重新集结兵力。正是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拿破仑第三之子路易于1879年6月1日进行侦察时被打死。

对德兰士瓦的兼并不但使联邦从此无望，又在原籍荷兰的各界人士当中激起民族方面的反响，并且挑起了一场同非洲人的战争。为了从这个混乱不堪的局面里找寻出路，前总司令克鲁格和前司法部门长官约雷森建议恢复德兰士瓦的独立。1877年末他们已为此去伦敦，受到卡纳房勋爵有礼貌的接待，但只此而已。照卡纳房看来，他们仅是已被赶下台的一个小集团的头头。克鲁格于是试图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他在德兰士瓦散发两张名单要大家签名，一是反对合并，一是赞成合并。前一主张的名单得到6,591人签名，后一主张的名单只有587人。一个新的代表团带上这件武器又去伦敦，代表团此次包括克鲁格和儒贝尔将军，后者被公认为比老成持重的克鲁格“强硬”。但他们依然失败了。

克鲁格和儒贝尔回来时正值祖卢人与英国人开始打仗。1879年1月11日他们向在旺德方丹

召开的人民会议报告出使经过。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人抵抗决心的加强。“象一个半夜里的小偷，有人把我们的自由的共和国抢走了。对此，我们不愿也不能忍受。因此我们在此地集会，作为男子汉和同胞弟兄携起手来郑重宣誓：永远忠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为重新取得我们共和国的自由，眼望上帝奋斗到底，死而后已。愿全能之主援助我们！”

我们好象又读到一篇吕特利誓词，正如席勒在他的《威廉·退尔》剧本[1]中所描写的一样。但这一次却不是文学作品了。

向布尔民团乞援

英军在祖卢兰战败后，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去比勒陀利亚要求布尔民团的支援。他已经把谢普斯通调走了。他现在是除了独立以外，对布尔人有求必应：恢复共和国以前的四色国旗，设立法

---

[1] 德国作家席勒在这一剧本中，写瑞士三个州的人民，不堪忍受奥地利的残暴统治，在吕特利草原宣誓，准备起义。——译者

会议，在学校中设荷兰文课等。

但是得不到独立，没有一个德兰士瓦人愿意参加一场反对塞太瓦约的“英国”战争。但英军在未得到德兰士瓦支援的情况下终于彻底打败了塞太瓦约（1879年7月）。他在乌伦迪的营地被摧毁，他本人被俘，囚于开普敦。

不久从英国派来的援军在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率领下到达，但已无用武之地。加尼特·沃尔斯利于是以高级专员的身分被派赴德兰士瓦。他先打败塞库库尼，然后象对待一个普通的殖民地那样来治理德兰士瓦。在波切夫斯特隆和比勒陀利亚修建一些碉堡以保卫这两座城，防止可能发生的起义。德兰士瓦人对此深感愤慨，不过还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为。他们仅仅满足于不经英国人的许可设立了一个“临时的”行政机关。在1879年12月16日（丁刚日）召集的新的人民会议，一致选出了由克鲁格、儒贝尔和前总统比勒陀利乌斯组成的三巨头领导机构。

布尔人所以这样耐心的原因是容易猜出的。原来当时英国竞选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在野的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曾激烈地批评对德兰士瓦的兼

并。可是当他在1880年4月上台后，他就主张维持现状了。以和平方式恢复独立的希望落了空。同年9月那个已使布尔人深为厌恶的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又开罪了巴苏陀人。他要求莫谢希之子来特西交出他管辖下的部落所持有的一切枪支。同过去祖卢人一样，巴苏陀人给他的回答是：战争。

德兰士瓦人抓住了机会：趁敌人难于兼顾之际采取行动。12月16日在帕尔德克拉尔召集的最后一次"人民会议"，号召举行武装起义，选举了正式的人民议会并把作战指挥权委托给三巨头。当一队民团要在波切夫斯特隆印刷起义号召书时，最初的战斗打响了。驻扎在莱登堡的一团英军立即驰援比勒陀利亚。12月20日这个团受到布尔人军队的阻击，全部被击溃。在比勒陀利亚和波切夫斯特隆的英国部队不得不在布尔人的严密监视下据守在碉堡里。于是纳塔尔总督科利将军率一支生力军从德班赶来。在来因格斯内克，三巨头之一儒贝尔将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这支英军（1881年1月）。科利在重新集结部队后继续前进。2月26日夜间到27日凌晨，他终于占领了马

尤巴山冈，但在黎明时，他突然遭到布尔人大胆的袭击。他的部队完全溃散，死亡百余人，科利本人也被击毙，而布尔人仅有二人死亡。

在德兰士瓦边境，英国再无有组织的部队了。它只好议和。奥兰治总统布兰德怕巴苏陀人再行进犯，就出面调停。停战协定迅速签订（1881年3月6日）。但媾和的谈判进展迟缓。到8月才达成协议。布尔人三巨头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克鲁格强使他的同僚接受了一项妥协，开始时，他的同僚认为这项妥协过分有利于英国人了。

给 与 自 治

英国给与了德兰士瓦以自治的地位，但保留三项特权：对外事务的领导权、对德兰士瓦当局同非洲部落间关系的控制权和在战时英军借道德兰士瓦的权利。

克鲁格不得不施展他的全部影响使人民议会终于在这个比勒陀利亚协定基础上批准媾和。

但情况不久又有了变化。在恢复和平后，南非正巧遇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狂热的

投机而大大哄抬起来的金刚石矿业的股票价格猛跌，农村遭受干旱而木虱又损坏了葡萄园。开普政府因财政困难无力继续控制巴苏陀兰，要求伦敦直接担起管理这个保护国的责任。1884年巴苏陀兰遂直属英国。因此巴苏陀兰乃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后来才得以免于成为南非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恐慌而产生的厌倦情绪使德兰士瓦也放松了对非洲人部落的控制。对此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德兰士瓦同非洲人的任何协定都须经过英国的批准。德兰士瓦宁愿不订立任何协定以避免履行这个屈辱性的手续。因此自然会产生纠纷，而边境上的农民便自行予以解决。这样，比勒陀利亚协定不但远未能更好地保护非洲人，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安全。例如在1882年就有一些布尔人直接参预了祖卢兰在塞太瓦约被放逐后发生的暴乱。塞太瓦约不在，国中无主，经常发生内战。为了制止这种情况，英国不顾纳塔尔移民的抗议，决定要塞太瓦约重新执政。他于1883年回到故土，并且因为曾在伦敦作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客人而提高了威望。1月29日还是那个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再一次立塞太瓦约为祖卢人国王。

但他的儿子乌西贝普举行叛乱，并打败了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他于1884年死去了。乌西贝普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迪尼祖路又动干戈。迪尼祖路为了对付乌西贝普，要求布尔人派大队民团来支援。布尔人的参战使他获得胜利。为了表示感谢，他把一大块国土割赠给他的使人担心的同盟者。我们在下文就可看到他采取这个不妙的主动措施的后果。

布尔人同时又向贝专纳扩张。也是在1882年，由范尼盖克率领的一个私人民团参预了两个茨瓦纳人酋长之间的一场战争，从战败者那里得到一大块土地，并立即在那里宣布成立一个斯太拉兰共和国。差不多同时，范皮蒂乌斯在经过一番类似的冒险活动后也在更往北的地方成立了果兴(或戈中)共和国(1882年10月)。这两个共和国后来企图合并，但克鲁格迫使它们接受德兰士瓦的保护。

在1880年已成为开普总理的罗德斯以及英国的传教士们都对这种变相的兼并提出抗议。但克鲁格使出这个招数不过是为了有利于他在外交上的地位。在得到对斯太拉兰和果兴的保护权以

后，他于1884年又去伦敦要求修改比勒陀利亚协定。罗德斯则连忙赶到斯太拉兰以维护他的权益。照他看来，那两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在地理上是贝专纳的一部分，而贝专纳是通向北方的“苏伊士运河”，也就是说，是通向那个被认为富有金矿地区的走廊。罗德斯想把这个地区攫为己有以便将来向赞比西河流域扩张。经过那些传教士的要求，英国派去一个特派员向茨瓦纳人的酋长做工作，以便他们接受英国的兼并。这个特派员麦肯齐本人也是个传教士。他非常热心，竟宣布不但茨瓦纳人酋长的辖地而且斯太拉兰和果兴都属于英国女王。德兰士瓦提出抗议后，他被调回。这并非定局，仅是把问题拖了一下。过了几个星期，克鲁格放弃了那两个受他保护的共和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取消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这一次兼并只是完成手续而已。查尔斯·沃伦爵士率领的英国部队开进贝专纳。那些酋长签了字，一切照办。该地的南部成为直属英国的殖民地（1885年9月）。

英国的兼并差一点就错过了时机。另一个欧洲强国刚刚出现在南部非洲，从西边威胁到贝专纳。这就是德国。它在1884年将一个不来梅商

人卢得立次设在西南非洲安格腊·皮基那的殖民区置于其保护之下。

伦敦协定对于克鲁格是个巨大胜利。他在谈判中利用了德国的威胁和斯太拉兰及果兴的扩张这两张王牌。英国不得不答应德兰士瓦重新成为"南非共和国"。至于英国的宗主权，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阴影。德兰士瓦承诺，除奥兰治自由邦外不同其他国家缔结国际条约。

这是否还标志着英国的某种宗主权呢？英国认为是，南非共和国则说不是。这种意见的分歧在九十年代引起了几件关于外交礼仪上的奇闻。例如曾在欧洲六个国家长期（1897—1902年）任德兰士瓦大使的来德斯博士讲过一个故事。1898年他被邀请参加在英国沿海举行的盛大的海军检阅。在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他才得知指定他坐的那艘作为浮动观礼台的船上只有英国殖民地的代表。这就是向他表示，他并不代表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来德斯如果不出席势将引起一场外交上的纠纷。他随机应变，摆脱了困境。当检阅开始时，他在一艘荷兰巡洋舰上出现了，这艘军舰是威廉敏娜女王的代表团乘坐的。另外一次是在

帝俄的皇宫，来德斯必须参加一个王子的结婚仪式，但俄国外交大臣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没有邀请他。沙皇盛怒之下，仍然“以私人朋友的名义”请他来宫参加典礼。于是英国大使馆全体人员都谢绝出席。

这些在外交上的琐事表明，双方在表面上恢复了和平，实际仍然互相猜疑。伦敦协定不过是个暂时的休战而已。

第十四章　一个新邻居：在西南非洲的德国

1884—1904

德国在西南非洲的出现，使南部非洲的政局和种族纠纷更加复杂了一些。虽然它在西南非洲大部分土地的内陆边界，经同英国达成协议，不久便划定在卡拉哈里的沙漠地带，但这个新的邻居不会不对英国和布尔人的政治情况发生影响。对这两方说来，德国是一个新的因素，可以改变由伦敦协定所重新建立的不稳定的均势。

这还有待于德意志帝国在它刚刚取得落脚点的地区能否真正站住脚跟。西南非洲是一个不易进入的地区，它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它的自然条件在许多方面都使人难以进入，所以英国对这个区域不感兴趣而听任德国人捷足先登。

传教活动的先驱者

德国人从传教士的活动中取得经验。早在1805年，阿尔布雷希特兄弟已在南部的瓦尔姆巴德建立了一个传教站。但他们是作为“伦敦传教会”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的。过了六年，由于当地土著间发生战争，教会的房子烧毁了。原来那些新纳马人离开了开普殖民地的边境地区后，开始向北发展。他们在酋长亚格·阿弗里卡内的率领下，所向无敌，一直推进到达马腊兰的边界。1821年亚格·阿弗里卡内死于该地，由其子容克尔继位。

此后不久另一个传教活动的先驱者、“伦敦传教会”的施梅伦牧师到了沃尔维斯贝。从1840年开始，由于“伦敦传教会”所设各站改由巴门的莱茵传教会管理，传教士更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1842年在温得和克、1844年在巴门、翌年又在雷霍博斯分别设立了传教站。当时在西南非部落间的纷争严重地妨碍了传教事业的开展。这主要是来自南方的新纳马人和已在当地中部定居的赫雷罗人之间的斗争。纳马人因拥有较好的武

器，在1860年前一直占优势。但赫雷罗人自拥立马赫雷罗为酋长后情形有所改变。1863年马赫雷罗开始了一场长期和艰苦的战争以摆脱纳马人的控制。经过七年的战争，马赫雷罗终于迫使纳马了乞和；他胜利地在奥卡汉贾一个营地定居。在此次战争中，莱茵传教会派来的传教士第一次要求普鲁士给予保护。1868年一队纳马人抢掠了英国人安德森的货栈，后者曾设法使赫雷罗人任命他为他们部队的“司令”。照德国传教士看来，这个“野蛮”行为已使普鲁士有理由出来干涉。但当时柏林正在忙于准备同法国作战和实现以普鲁士为首的全国统一，对传教士的这项呼吁毫不注意。

英国人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险活动。1836年，“皇家地理学会”派遣了一个军官查尔斯·亚历山大爵士去西南非内地探察。十五年后，弗朗西斯·高尔顿和上面提到的那个安德森曾到该地各处探险，紧接着去的还有贝恩斯和查普曼(1861年)。只有安德森一个人留下来经商，而且如上文所述，成了赫雷罗人的军官。

1869年一个由荷兰人与纳马人私生的混血种人组成的小部落全体抵达雷霍博斯地区。他们

以布尔人各共和国的宪法为蓝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共和宪法。在1870年,他们取得了一直到现在还是他们的住区的那块地方。在定居后，他们又制定了一个新宪法(1874年)。同年和翌年，有两批布尔人离开德兰士瓦，也来到西南非，原因是他们认为新选出的总统在宗教上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因此有主张无神论的嫌疑而深感不满。他们差不多有五百人分乘一百辆牛车进入该地区。马赫雷罗见布尔人从东边来了就害怕起来。他就向开普政府征求“意见”。他说:“我们没有空地容纳其他国家的人。尤其对那些据说总是卑视和厌恶黑人部落并承认奴隶制的人们,我们更没有空地。布尔人和我们一样非常重视牲畜，因此他们一来必然要占用很大的地方……。”

这封信想必是在一个传教士的帮助下写成的。对奴隶制的谴责就是一个标志。大家的确都很清楚当时马赫雷罗的主要顾问是谁。他是一个名叫胡戈·哈恩的德国人，开普总督也向他征询过应如何行动的意见。

但是警报过去了。在1877年这些布尔人因缺乏饮水无法继续前进,折而北上,终于到达安哥

拉南部；他们取得葡萄牙人的同意后在距萨达班代拉不远的洪帕塔定居下来。虽然如此，但开普政府依然派了法官帕耳格雷夫以官方名义去西南非作系统的侦察。帕耳格雷夫尽管也晓得纳马人会起来反对，还是建议兼并该地以结束部落间战争的混乱状态。但伦敦和开普都感到那地方太大，管理起来费用过多，因之仅仅把当地海岸唯一的天然港口沃尔维斯贝兼并了。

在每一次探险旅行后总有一小批人留在当地，这些有时是不大体面的人自称以打猎和同非洲人作买卖为生，但却在干预当地的纠纷。就是那些传教士本人也常常不得不充当这个或那个酋长的外交顾问，因而处在这样一种并不舒适的地位。于是可以用混乱、不安全和私运军火作借口，从而占领该地使之成为殖民地的局面已经成熟。

1880年赫雷罗人同在南部过活的纳马夸人之间发生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如果说在此之前马赫雷罗和赫雷罗人在西南非的舞台上占主要地位，在这次战争中纳马人方面涌现出一个新人物，年青的酋长亨德里克·维特布伊。他是纳马人的另一个酋长莫赛斯之子，莫赛斯本人也以能

干和坚毅著称。1886年传教士鲁斯特曾劝他签订一项降服于德国人的协定草案，莫赛斯封闭了传教会，自己出来担任牧师的职务。其于亨德里克负责指挥作战。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因为他不但有军事上的才能，并且由于受过基督教的教育而喜欢思考哲理。他在当政的末期曾用开普的荷兰文写了一部"日记"，这对当时的一个非洲人酋长说来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个文件对他的思想和计划有一些珍贵的记载。

德国人的殖民活动

当亨德里克·维特布伊登上舞台时，卢得立次已经在安格腊·皮基那设立了一个商业公司代销处，并且把那个地方改名为"卢得立次湾"。为了扩充土地，他乞助于距卢得立次湾以东一百四十公里、在内地的贝塔尼安德国教会。由于传教士出面活动，在1883年他已经买到一块相当大的地方。到1884年正式挂起德国国旗。当时开普政府正发生内阁危机，未能及时干预。当英国海军部派了博亚代西号炮舰到安格腊·皮基那时，

它遇到一艘不久以前已经到达那里的德国军舰。英国只好作罢。布尔人试图使用建立独立共和国的老办法作最后的努力，想至少占据一部分土地，但失败了。诚然，在1885年有一伙布尔移民宣布在西南非洲北部的格罗特韦坦成立阿平顿尼亚共和国。但从1884年10月开始，欧洲各国都已接受了德国宣告西南非洲已为其占有的正式声明。这个共和国才一诞生就消失了。

德国见国际上已承认它对西南非的占有，便成立了一些大公司[1]去开发该地，并派戈林[2]博士作为“帝国专员”到那里要非洲人各酋长签订惯常的条约。马赫雷罗坚持到1885年10月不肯签字，他甚至还委托罗德斯手下的一个名叫刘易斯的不大体面的人，代理他向英国人申诉。但毫无效果，他终于不得不签了字。但三年后，刘易斯说服他把戈林从奥卡汉贾赶走。于是马赫雷罗就威吓戈林说，如果在夜幕降临后发现他还在营地，就

---

① 这些公司主要有：德国殖民公司（运输、牧畜业），德国西南非公司（矿业），土地、矿业和贸易公司，西南非公司（英国合资经营）。

② 即戈林元帅之父。戈林元帅于1946年作为战犯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自杀。

砍下他的脑袋。戈林走了，但他径直回到德国。几月后，第一批德军就在冯·弗朗索瓦上尉指挥下开到西南非。纳马人始终不肯签署条约。维特布伊虽然与赫雷罗人正在交战，但他还是写信给马赫雷罗提醒他不要同德国人缔结任何同盟。他写道："当然他们会援助你。但难道你真能相信，在你把我消灭（如果你办得到的话）以后，你还可以保持一个独立的酋长的一切权利吗？"

他观察得很正确。德国总督洛伊特魏茵在其190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就直言不讳地供出下面的话，我们对这段话简直不知道应当赞美其直率还是谴责其厚颜无耻："我尽可能地使那些部落为我们的事业服务并使之互相争斗。即使是一个反对这个政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挑起土著人互相残杀较之期待我们投入来自祖国的大量生命和金钱来制伏这些部落，固然是更难一些，但也更为有利。"

同当地的部落作战

但为洛伊特魏茵所称道的政策并未完全成

功。1892年赫雷罗人和维特布伊的纳马人签订和约。维特布伊在离雷霍博斯不远的侯恩克朗斯定居下来。当时已在实行直接统治的德国人几乎立刻就试图把他置于德国人的保护之下。维特布伊本人在日记中曾叙述他关于此事的一次谈判经过。现在读起来，好象是一篇泛非主义的宣言：

“你是否同其他的酋长一样接受德国人的保护？德国特派员对他说。

这保护是什么意思？保护我们防备什么呢？

防备布尔人和别的强国啊！他们想不经酋长们的许可就打开一条路，进入你们的国土。

照我看来，这是离奇的，不能同意的。我弄不明白。一个治理他的人民和国土的独立的酋长有责任亲自去保护他们，使之免遭任何危险和不幸……非洲属于我们红种人（纳马）酋长。如果一个酋长遇到危险而他觉得独力难支的时候，那么他会去向他的兄弟或兄弟们，即红种人的酋长去呼吁说：来吧兄弟们！我们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土！因为我

们是同一肤色，同一种族。整个非洲都是我们红种人酋长的国土，我们各个王国不过是我们的非洲的一小部分。”

对付一个这样顽强的对手，用说服的办法证明是没有用的。冯·弗朗索瓦于是决定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如果出自一个非洲人的酋长，就一定会被当作一个“背信弃义”和“野蛮”的新例证而载入史册。一支德军在1893年4月12日在没有提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袭击并占领了侯恩克朗斯。维特布伊当枪声打响时正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吃早饭，毫无准备。但他还是逃脱了并在身边集结了一些人。他很快派了一个使者到奥卡汉贾，呼吁赫雷罗人起来反抗，但马赫雷罗已于1890年死去，他的儿子塞谬尔按兵不动。维特布伊退往脑克鲁夫特的峭壁悬崖里，但还能坚持抵抗。德军新任总司令洛伊特魏茵[1]派去使者要求同维特布伊议和。维特布伊反驳说：“冯·弗朗索瓦向我进攻并不是想得到和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过着和平的生活。他想把我打死，并不是因为我的言行犯有任何罪过，而是因为我拒绝放弃理应

[1] 先后任德属西南非洲行政长官和总督。

属于我自己的权利。我不能放弃我的独立。”

洛伊特魏茵只有答应停战，等待援军。1894年8月德国援军开到。德军司令依然袭用冯·弗朗索瓦突然进攻的老办法，占领了维特布伊的阵地，把他赶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三星期后这个纳马人的酋长终于投降并签署了一个接受“保护”的文件(1894年9月15日)。然后他就退往雷霍博斯以南吉贝翁的旧营地。在1904年他又回到他的国土的血淋淋的舞台上。

不久这块德国新殖民地好象已经可以作为欧洲人长期定居之用了。虽然在楚梅布已经发现铜矿并加以开采，但该地矿藏是有限的(至少到该地南端发现金刚石矿以前是如此)。因此西南非洲成为发展畜牧业的地方，这一情况就自然地会使那些德国侨民采用常常不清不白的方式来取得大片牧地。

第十五章　黄金的诱惑

1884—1896

解放战争完全结束后,在1883年当选为总统的克鲁格依然奉行德兰士瓦的传统政策。但是,出现了新的情况。从1884年开始,德国人进入南非使英国人时刻保持警惕。英国深恐布尔人同新来的德国人采取共同的行动。铁路的迅速发展固然便于交通,但也因之产生了新问题。就是在内政方面,总统的任务也并非没有困难。他对凡属与英国有关的事物或人都不放心,甚至对开普殖民地的阿非里卡人也不信任。德兰士瓦是个农业国,总是需要技术支援,而他宁愿乞助于荷兰人。过去执政的三巨头之一儒贝尔将军指责他这种政策造成"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最明显的分裂。但在1880年到1898年的五次总统选举中,克鲁格一直当选为最高行政首脑。

然而,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金矿后,这些内

部和外部的问题都成为次要的了。金矿的发现使德兰士瓦得到意想不到的财富，但立刻就引起比过去更加蛮横、更加帝国主义的英国的觊觎。对金矿的勘探直到1868年在德兰士瓦还是非法的。那些虔诚的布尔移民先驱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对耶稣所说的不义之财是怀有戒心的。但德兰士瓦共和国因财政支绌，取消了这项禁令。不久就带来了种种后果。我们还记得，在1877年有勘探金矿的英国人来到莱登堡一事曾影响到谢普斯通的态度。然而在1882年这些初步的成果还没有能够显著地改善德兰士瓦的财政状况。克鲁格主动向开普政府表示，希望英国人降低由开普运往德兰士瓦的商品的关税。关税过高不但导致德兰士瓦的生活费用昂贵，并且使德兰士瓦政府自己一点也不能增加税收，否则就将使商业陷入绝境。克鲁格宣称如果英国人肯降低关税，他准备答应把铁路线从金伯利延伸到比勒陀利亚。

财政上的忧虑消失了

开普总理阿平顿(1884—1888年)拒绝了。他

希望以开普和伊丽莎白港为起点在1885年就已铺设到金伯利的铁路本身会对德兰士瓦发生很大的诱惑力，从而德兰士瓦早晚会在缔结关税协定时提出更有利于英国的条件。

但几个月以后在比勒陀利亚和瓦尔河之间那片光秃秃、充满砂砾的丘陵地带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的沉积结构里发现有长长的黄金矿床露了头，矿床的长度和深度还不能探测到。转眼间德兰士瓦的财政忧虑就一扫而空。在三年内(1885—1887年)，国家的收入提高了三倍。阿平顿本人慌了手脚，这次是他到比勒陀利亚去请求重开关税谈判。但已为时过迟了。布尔人不太客气地予以谢绝。纳塔尔以为可以乘开普总理此次碰壁之机从中取利。但克鲁格对于一切来自英国人的事情都怀有戒心。纳塔尔关于修建一条由德班到比勒陀利亚的铁路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如果说时代的发展需要有铁路，那么至少不要有英国参加！因此克鲁格总统再度提出原来的伯格斯计划：修建一条从洛伦索—马贵斯抵达德兰士瓦的铁路。开普殖民地当局仍不死心，就同

比较好说话的奥兰治自由邦商妥，把铁路线从金伯利通过奥兰治一直延伸到在德兰士瓦边境上的韦雷尼京。但克鲁格也在那里警惕着。1888年在他得到荷兰和德国的投资开始动工修建他那条铁路后，又使赖茨总统答应：奥兰治自由邦竭力推迟从开普通向约翰内斯堡那条铁路线的修建。①

黄 金 之 城

约翰内斯堡！这就是那个象幻术似地刚在黄金矿层上突然冒出来的重要中心城市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负责在兰德耶斯拉格特农庄的那些贫瘠的牧场上作街道规划的四个测量员名字都叫约翰内斯。最近的研究成果似乎查明城名的来源是由于当时该地的官员叫作约翰内斯·皮特勒斯·迈尔。另外那些测量员还在计算上出了个小错误：他们从外面往预计的大四方格子式的市中心划线时，“漏掉”一条主要枢纽的路线，从而直到如今在专员大街还可看到一个“拐

① 按即上述由金伯利到韦雷尼京的那条线，约翰内斯堡距离韦雷尼京很近。——译者

弯”，证明原定应当碰头的南北两条路连接得很不好。

当然这个突然兴起的大城市的居民对这种琐事很少注意。1890年，该城建立还不到四年，已有十万居民，一半是白人，绝大多数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布尔人把他们看作是一伙没有宗教信仰的亡命之徒，应该尽量避免同他们打交道。因此克鲁格直到1895年还拒绝使约翰内斯堡享有城市的地位。起初那些只想发财致富的采金矿者对此并不介意。但到了1890年，象在金伯利一样，狂热的投机引起了恶果。另外在深矿脉的金矿石中发现有杂质，特别是硫化物，愈来愈难于除掉。加以一场大旱影响到该城的供应，人们一度对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前途发生了怀疑。

这种不安全感在外国人[1]中间首次引起闹事。他们埋怨说：如果克鲁格让开普修建一条铁路，那么人们就不致落到全部供应品都靠牛车运来的地步！如果他设立了一个能办事的市政机关，那么孩子们就会有地方上学——而且用英语上课

---

[1] 原文为阿非里卡文 Uitlanders，系指在约翰内斯堡除布尔人以外的白人。——译者

了！如果他不把开矿必须用的炸药交由国家专卖，炸药的价格就不会贵得使开矿者破产了！

许多控诉是有理由的。然而也要理解德兰士瓦行政当局的处境。从外国象潮水一样涌来的这群人确在该国的心脏地区把布尔人的地位淹没的危险。因之人民议会远未对这种吵吵嚷嚷让步，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加入国籍的条件已从在该地居住二年改为五年，1890年又延长为十四年。这条法律使人担心会加深外国人的不满情绪。

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发明了一种廉价的方法可从金矿石中分解出硫化物，加以久旱后又降甘雨，而且铁路也快修好了；这一切都平息了那些人一时的怒气。然而此事表明，这些外国人的闹事对德兰士瓦的内政可以造成意想不到的威胁。这个经验教训以后就得到证实。

寻求一个通往印度洋的海港

除了这些内部的困难外，德兰士瓦政府在实行它的对外政策方面也碰到巨大的障碍。目标和

以前一样：获得一个通往印度洋的海港和使农民能向外扩张的地盘。可是周围的边境慢慢地都被封锁住了。在西面，1884年克鲁格已经放弃了果兴和斯太拉兰。但那一年在东部边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还记得，一个人数众多的布尔民团曾支持要求取得祖卢人王位的迪尼祖路同他的兄弟乌西贝普作战。作为交换条件，迪尼祖路把大块的土地割让给了这些士兵。于是这些布尔人在坚决反英的卢卡斯·迈尔将军领导下就在这片地区宣布成立了一个新共和国，而且还要求对祖卢王国拥有宗主权。迈尔成为首任总统。原先以私人名义租让给一个德国人的圣卢西亚湾在取得此人和迪尼祖路的同意后划人新共和国的版图。这样德兰士瓦终于通过兄弟共和国间接地获得了通往大洋的一个窗口。但是迈尔还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沿海地区立足，英国人就吞并了这个海湾。

但英国人还不满足，他们觉得这片沿海的屏障过于狭窄和单薄了。因此在1886年他们占领了整个祖卢兰。借口是迪尼祖路威信不够，引起国内动乱。布尔人的新共和国对此提出抗议。但纳塔尔政府正式承认了迈尔将军的国家的独立，

迈尔也就放弃了他自封的对祖卢人的保护权。迪尼祖路则比较难于说服，他进行反抗，兵败被俘。英国人把他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也许是无意中给他的荣誉。他在那里有充分时间象科西嘉岛的那个伟大的流放者一样[1]去思考政治生活的沉浮。布尔人的新共和国因为再无希望扩充到海边，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1888年它同德兰士瓦合并了。[2]

现在克鲁格要打通出海口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从斯威士兰通过。斯威士人从来没有同布尔人发生过大的纠纷。但在索布虎查一世之孙、姆斯瓦济之子、翁班迪奈国王当政时，斯威士人也开始同英国人接近。翁班迪奈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他大咧咧地把官爵和特权授予别人。他给了迈尔的同伴一些租让地；他不仅把一些土地给了那个到处出现的谢普斯通及其儿子而且任命他们为顾问(1886年)；他又答应给两个布尔绅士马里茨和费雷腊以租让地。这两个人按照布尔人改不

---

① 指拿破仑一世，他生于科西嘉岛，1814年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译者

② 英布战争结束后，这个地区于1903年转让给纳塔尔。

掉的老习惯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名之为“小自由邦”。这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国，人口只有七十二人，由三个人执政。翁班迪奈听之任之。

租让过多，有时还重叠矛盾，引起不少混乱，克鲁格和英国政府都决心要加以澄清。在这以前，每一方都想在这场混乱不清的租让权竞赛中改善自己的地位。租让权种类繁多，有土地权、开矿权、贸易专利权，甚至还有在可能铺设的铁路沿线开设酒店饭馆的优先权，连铁路线也是“租让”的。1887年5月小谢普斯通召集了一个获得租让权者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清理有关租让权的复杂问题。翌年，翁班迪奈授予委员会自治特许状。这种特许权多少有些类似奥斯曼帝国的治外法权制度。委员会增加五人，由斯威士人国王任命，有权处理有关白人间关系的一切事务，国王有否决权。但是获有租让权的欧洲人之间互相嫉妒，特许状不易实施。不少欧洲人要求德兰士瓦兼并斯威士兰。正当这种想法在这些移民中酝酿时，谢普斯通成了“不受欢迎的人”(1889)。这对克鲁格是个好机会。他开始先把“小自由邦”合并，然后积极着手兼并整个斯威

士兰。

克鲁格的失败

翁班迪奈忽然死去。克鲁格手里的王牌失去了。于是他企图通过协商使英国当局同意把斯威士兰让给他。他的计划如下：他知道罗德斯即将进占马塔贝莱兰(即现在的南罗得西亚)。在1888年，这个英国的财政家已向马塔贝莱兰国王洛本古拉(莫赛利卡蔡之子)夺得一项不很明确的开矿租让权；翌年，他就成立了英国南非公司。克鲁格也知道某些布尔公民非常想组织一次向罗得西亚的“大迁徙”，以避免同那些外国人混居一处。克鲁格想利用这个尚未进行的大迁徙作为交换条件。如果英国同意把在斯威士兰东部边界的科西湾给他作为出海口，他即禁止这些布尔人动身。

他就带着这项计划于1890年到当时任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的亨利·洛赫爵士那里开会，罗德斯也在坐。当然后者支持克鲁格以免妨碍他对罗得西亚的进占，但洛赫爵士却另有方案。他向克鲁格建议同开普缔结关税同盟作为换取出海口

的条件。克鲁格拒绝了这项建议。德兰士瓦所以要个出海口正是为了要抵制缔结关税同盟；缔结这样的同盟就是牺牲了国家的经济独立，更何况从洛伦索—马贵斯到比勒陀利亚的铁路还没有修好。克鲁格下不了这个决心。关于斯威士兰，由于英国人的阻挠，克鲁格只能满足于一个含混其词的两国共管制。1890年还未完结，克鲁格已经失去了他那张作为交换条件的王牌。罗德斯派了一批移民飞快地赶到马肖纳兰，① 从而英国南非公司占领了该地。

德兰士瓦总统觉得好象受了“欺骗”。于是亨利·洛赫爵士派了扬·霍夫梅尔作为一个公正的中间人去见克鲁格，并许诺在把那些重叠矛盾的租让权问题搞清之后重新考虑对斯威士兰的处理。特设一个专门法院审理此事。1893年克鲁格同亨利·洛赫爵士再度在开普边境上的科累斯伯格会见。

会见再一次地失败了。但翌年两方终于达成妥协：如果斯威士人同意，德兰士瓦就可取得对斯

① 马肖纳兰在马塔贝莱兰北面，是马肖纳部族居住地。——译者

威士兰的保护权。但斯威士人表示绝不同意。于是英国高级专员同德兰士瓦总统对协议仅作了一点小小的修改：他们干脆把规定须经斯威士人同意的条款一笔勾销。克鲁格好象大获全胜，但还没有等到他按照缔结的协定向斯威士人国王派去一个驻节特派员时，英国已经占领了汤加兰及科西湾。德兰士瓦被封锁在一圈英国领地之中。通向大洋的窗子一度打开了一些，现在则完全闭死了。对克鲁格来说只剩下洛伦索—马贵斯这个小天窗，它的开或关都只能听凭葡萄牙来全权决定。

至于那条铁路，从葡萄牙领地修起，一直还未修到约翰内斯堡。投资兴建铁路的荷兰德国公司甚至在财政上也感到支绌。罗德斯出来支援，但有个条件：德兰士瓦要许可从开普兴建的那条铁路延伸到比勒陀利亚。人民议会犹犹豫豫终于同意。1892 年秋季火车第一次从开普驶抵约翰内斯堡车站，1893 年 1 月 1 日，开普—比勒陀利亚线开始通车。

罗德斯以及他背后的英国高级专员都期待着这条铁路线通车对他们关于联邦的老主张会起新的推动作用。英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急于实现

这个主张。它的考虑不是没有私心的。它是想把威特沃特斯兰德的亿万财富抓到手。黄金的诱惑力是无法扼制的。

但是克鲁格还没有倒！1895年以洛伦索—马贵斯为起点站的铁路线终于修到约翰内斯堡。为了鼓励进口商使用这个体现民族独立的新工具，年老的总统想出一个主意，充分表明他那种农民的手段。他把从开普敦—威特沃特斯兰德线运来的货物在德兰士瓦境内这一段的运费大大提高，使这些商品的输入在经济上完全不合算。进口商们也有他们的一套巧妙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决定把运往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商品卸在奥兰治与德兰士瓦交界处。然后再装在牛车上从维尔绛斯德里夫特旁边的浅滩涉过瓦尔河，再沿铁路线旁那些颠簸不平的小道运到约翰内斯堡，而在铁路上却来往奔驰着空的车厢。

罗德斯和克鲁格之争

于是克鲁格又发明了一条新的"妙计"。他禁止一切牛车通过浅滩。这给英国人一个绝好的机

会进行干涉。克鲁格收到一个道地的最后通牒，一个月后他屈服了（1895 年 11 月）。但他这些行动依然成了英国人把外国人的骚动推向一个新高潮的绝好口实。在 1890 年第一次闹事以后，这些人的不满情绪本来已逐渐平息。但到 1892 年，他们当中最“死硬”的分子成立了“民族联盟”，指望得到罗德斯的积极支持。当时罗德斯权力很大，既是开普政府的总理，又是英国南非公司的董事。这个公司不只控制着罗得西亚，而且还控制贝专纳的一大部分土地，公司还养着一批警察。因此罗德斯拥有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从而有力地诱使他想利用这支力量去加速联邦的成立。对德兰士瓦金矿的控制有赖于这个计划的实现。罗德斯当时为心脏病所折磨，觉得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克鲁格的顽抗也激怒了他。这个乡下佬竟阻碍他实现生平的理想。

罗德斯又怨恨，又担心，加上对克鲁格的蔑视，不久就想出来一个狂妄的计划：用武力占领德兰士瓦。在 1895 年间这个计划逐渐形成。先把外国人重新煽动起来闹事；这些人向克鲁格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改革；事先知道最后通牒定会遭到

拒绝；于是这些外国人就举行暴动，占领约翰内斯堡。同时一队警察从贝专纳开来支援暴动者。为了使人相信这支武装是应约翰内斯堡的呼吁而来的，还按照这种口气准备好一封信交给他们的司令；他只要在信上填一个日子就行了。一旦威特沃特斯兰德被占领后，布尔人会接受英国高级专员的调解。高级专员就决定成立联邦。这就是计划的内容。有关暴动后德兰士瓦应如何组织的最后安排尚待拟定。

罗德斯和他的朋友、英国南非公司的在罗得西亚的行政长官詹姆森开始活动。外国人反应迟缓。但罗德斯(其兄定居在约翰内斯堡)坚决推行其计划。一个“改革委员会”成立了，实际上成为颠覆活动的参谋部。武器偷偷运入，神秘的书信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来往传递。最后，暴动的日子定为1895年12月28日。但日子快到了的时候，那些预谋暴动的人忽然发现年末最后一星期正值赛马周，而赛马在兰德的工商界人士间是很流行的。他们力求使罗德斯和詹姆森暂停行动。詹姆森已经在德兰士瓦与贝专纳交界的皮查尼集合了五百五十人和二百五十个非洲人车

夫。罗德斯了解到暴动延期，打了一个电报给詹姆森，恳求他暂缓向德兰士瓦进军。詹姆森没有收到这个电报。12月29日傍晚，他向约翰内斯堡出发。

几个小时后，他遇到德兰士瓦政府派来的一个使者。这人客气地问他为什么在和平期间率领一伙武装队伍进攻友邦。詹姆森把这个使者打发走了。他没有料到克鲁格数星期以来已经密切注视着这些暴动者的准备工作，而且已经采取必要的对付办法。当时克鲁格的助手一再要求将这些人立即逮捕，克鲁格总是回答："别忙，等乌龟露出头再说。"现在乌龟果然把头伸出来了。全世界都看清这是一支百分之百的英国乌龟。

詹姆森率部前进。布尔人东放一枪，西放一枪，迫使詹姆森的队伍在山峰与丘陵之间打转转，并把几处泉水封锁住，但是依然让他们抱有幻想，仿佛已离约翰内斯堡不远了。这样耍了他们三天。最后，詹姆森弹尽粮绝，被布尔人包围在离克鲁格斯多普不远的多尔恩科普旁边的一个小山谷里。他只得投降。

在约翰内斯堡，"改革委员会"听到了詹姆森

进行袭击的风声。他们好象大梦初醒，赶紧举事。但他们苦于没有配合。克鲁格的警察不费劲地就把这场徒乱镇压下去了。暴动者陷于绝望，要求停战。克鲁格装作莫名其妙。停战，同谁停战啊？“改革委员会”真正的头头们到底在哪儿啊？于是那些策划阴谋的人急忙乖乖地提供了一个六十四人的名单。警察正好按照名单把他们一一逮捕起来。强占兰德象一场闹剧一样宣告结束。

罗德斯表现出坚韧不拔。他在获悉他本人所排演的这场又可笑又可悲的戏剧最后一幕如何结束之前，就提出辞职。他只说了一句：“詹姆森把我的苹果车打翻了，”但他拒绝把责任推给他的朋友。英国高级专员亲自到比勒陀利亚吞吞吐吐地道了歉。许多阿非里卡人大声疾呼，要求把这些外国人一律吊死，并为此从斯拉格特斯内克把绞刑架运来(!)。但克鲁格没有忘掉“最高权威”还拥有可怕的实力。他把詹姆森及其同伙送交英国司法机关，后者态度偏袒，只判处詹姆森十五个月的监禁，而且过了几个月就以他病得要死为理由开释出狱。事实上他一直活到**1917**年，过了二十一年才死去。至于“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四人被

判死刑：弗兰克·罗德斯(谢西尔·罗德斯之兄)、菲利普斯、法勒、哈蒙德。[1]但克鲁格不敢执行判决。他把这些人特赦后释放，每人处以罚金二万五千英镑。罗德斯出钱付了罚金。

奥兰治—德兰士瓦“联邦”

一场危机虽然如此解决，但还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论在德兰士瓦，还是奥兰治，那些阿非里卡人现在都知道对于英国人所说的联邦不能再抱任何希望，而且应该继续留心英国人侵的危险。因此两国很快地接近。1898年甚至还成立了一个“联邦”会议。为了突出这种新的关系，克鲁格于1898年重新当选为德兰士瓦总统后，任命奥兰治自由邦前总统赖茨为国务秘书(外交部长)。在开普，扬·霍夫梅尔的“阿非里卡人协会”同罗德斯的党断绝了关系。霍夫梅尔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把他对本民族和对英国的忠诚调和一致，现在他感到绝望。当米尔纳勋爵被任命为英国高级专员兼开普总督后，他就预言说：“他的到来意味着将爆

(1) 哈蒙德是美国公民，其余三人都是英国人。

发一场战争。"

在德兰士瓦这种想法也很普遍 克鲁格在采取措施。在詹姆森事件发生后不久，他收到德皇威廉二世打来的贺电，从而产生一种幻想，以为一旦与英国开战他可以指望德国的援助，因此他更有了信心。德皇在1896年1月3日的电报中诚然有如下的话："我向您表示我诚恳的祝贺，因为您和您的人民，未向友邦要求支援，仅用自己的力量就成功地打退了入侵贵国的武装匪邦……。"可是当1898年来德斯博士作为德兰士瓦的无任所大使被派往欧洲时，他及时而又不合时宜地报告比勒陀利亚政府说，不能指望任何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但这已经太晚了。英国人同布尔人都已经认为战争注定要爆发。从1896年到1899年尽管谈判不断进行，但无济于事，奥兰治自由邦极力想找出一个妥协方案，也根本无效。对伦敦来说，那些外国人的诉苦依然是攻击对方的主要武器，但对其他的论据也毫不放过。克鲁格同德兰士瓦最高法官科茨意见分歧，后者因而辞职，此事也被英国人利用来作为揭露德兰士瓦没有法治的证据。英国报纸宣传：德兰士瓦已陷入"克鲁格主

义"的统治，这是一个愚民的、残暴的独裁政权。

克鲁格同约瑟夫·张伯伦进行一次会晤，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最高级会谈"，一度颇有希望。但当促成这次接触的努力即将成功时，张伯伦有一次提到所谓英国"宗主权"这个激怒人心的用语，结果使克鲁格取消了他的英国之行。于是人们仍在南非继续讨论。1899年6月奥兰治总统斯太恩和霍夫梅尔终于说服克鲁格和米尔纳两人同意在布隆方丹中立区会见。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再度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克鲁格建议外国人在德兰士瓦居住七年后即可取得完全的公民权。米尔纳要求减为五年。克鲁格于是提出其他改革方案。米尔纳拒不接受。现在已真相大白，在会议还未开始以前，英国高级专员早已写信报告政府说："进行干涉的理由是极为充分的。"在这种境况下，继续交换照会不过只是一种策略，英国此时已慢慢地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

德兰士瓦害了怕。1899年10月7日[1]赖茨作为德兰士瓦的国务秘书写给米尔纳一封长信。

---

(1) 原文如此。根据其他史书记载，应为10月9日。——译者

在信中他提请英国注意，尽管1884年伦敦协定已明确承认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权利，该政府还是一直征询英国的意见，以便使这个本来完全属于本地当局权限的外国人问题获得解决。这是为了表示"友好"。他在信中主要还说道：9月25日英国使人感到它对于南非共和国中这部分人的选举权要提出它自己的要求，这是对共和国内政的干涉，应予拒绝。他接着提出以下最后通牒：

"1.所有争议各点均通过仲裁或经我国政府与女王陛下政府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解决之。

2. 1899年6月1日以来开到南非的所有(英国)援军，在同我国政府商定的期限内一律撤离(……)。在此条件下，我国政府亦将从边境撤退其武装民团。

3.现在开往南非途中的女王陛下的部队，均不得在殖民地的海港登陆。

我国政府(……)要求女王陛下政府从即刻开始到1899年10月11日星期三下午五时为止，对(以上各点)给与肯定的答复。我国政府声明，如在此期限内未收到肯定的答

复，则不得不深为遗憾地认为女王陛下政府的行动是正式的宣战。”

10月10日张伯伦命令米尔纳拒绝接受南非共和国提出的条件。翌日下午布尔人德拉赖将军发动进攻，在贝专纳的克拉埃潘地方截击一辆英国的装甲火车。战争开始了。

第十六章　布尔人独立的终结

1889—1902

战争爆发后，许多南非人有点象松了一口气。从表面看来，打起仗来反而有使局面明朗化的好处。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打两年半之久，会搞垮那两个共和国，尤其是在集中营里会造成几万妇孺的死亡。

存有幻想的时期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同盟立即生效。这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自此形成一个集团。在约翰内斯堡，亲英的外国人大批离开，但没有丝毫反抗的行动。这情况也可在事后证明，这些人争取本身权利的运动本来规模有限而原系罗德斯挑起，后来又由英国政府在1899年的谈判过程中

为了当时的需要重新鼓动起来的。

在比勒陀利亚和布隆方丹，人们对战争前途非常乐观。那里的人念念不忘1881年对英作战的胜利，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当时战胜敌人、现在还统率德兰士瓦军队的将领已经年迈，比过去大了将近二十岁。总司令儒贝尔已达六十九岁的高龄，指挥面对金伯利金刚石矿的西部战场的克隆日也有六十五岁。这些土生土长的将军作战极为勇敢，但对攻取城池的战略思想却过于简单。尽管布尔人拥有很好的大炮，这种作战却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此外，他们所指挥的部队一般说来是既无正式军装又无纪律。布尔民团的成员事实上都是左邻右舍，由他们自己选举军官的办法并不能发挥指挥的效能。但这些缺点都被他们的特长掩盖住了：作战勇敢、对地形极为熟悉、适应环境的能力、尤其是他们非凡的射击才能。

布尔人开始取得的胜利似乎证明无需对军队进行改革。但后来遭受败绩时，再行改革已来不及了。只是到了作战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时候，布尔人士兵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因此在首都陷落之后战争还持续了两年之久。但如果要取

得最后胜利，布尔人还需要有更辽阔的土地，更多的人力和外国的援助。

布尔人“第二代”的年青将军们如德韦特、博塔、史末资和赫尔佐格都非常明白上述情况。因此他们认为作战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行，使布尔人的独立得到确认，即使为此割让一些地方也好。为了迫使敌人确认这一独立，他们力图一方面获得欧洲列强的支援，一方面鼓动在开普的原籍荷兰的居民起来叛乱。但这两种尝试都没有获得完满的成效。

在英国人方面，那些军官开始作战时目空一切，看不起“造反的乡下佬”。他们忘记了在1899年布尔人能立刻动员四万人而当时英国却只有二万二千人。英国的将军们按照军事操典上的规章部署军队而布尔人则很少依据固定的兵法。英军在移动时总是依靠铁路和公路干线，把自己暴露给敌人而遭到打击。而且英军身处敌国，他们一举一动都立即为对方所知。布尔人拥有一个灵活有效的通讯系统：回光信号机，这使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有线电报。

总　体　战

英军这种不安全的处境终于使英国司令部采取了某些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叶“总体战”的先声的作战方法。现仅举几个例子：凡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点，其周围十英里内的农庄一律摧毁；把妇女儿童囚禁在集中营；凡响应布尔人号召拿起武器的开普荷裔公民皆处死刑；把俘虏流放到非洲以外的地方；对“战犯”加以审判和处决。

现将战事的发展概述如下：

德兰士瓦的最后通牒的时间一到，布尔人西方面军在克隆日和韦塞尔斯的统率下向前推进，包围了开普省的马弗京和金伯利。[1]儒贝尔则在西部边界因克隆日的胜利而得到保障时立即进犯纳塔尔。但他缺乏一鼓作气穷追猛打的魄力，没有击溃弱小而且联系不善的英军。因此英国人得以逃进累迪史密斯城。英军阻止德兰士瓦和奥兰

① 金伯利被围时罗德斯正在城中，在整个围城期间他不得不留在那里。他总是想给驻军出谋定策，但军人对他表面敷衍，心实嫌憎。

治的军队会师城下的企图失败了。在1899年12月10日到17日这个“不祥的一周”内，英军的命运坏透了：在纳塔尔战线，英军在斯托姆山和科伦索连遭两次惨败，而在金伯利战线，一整旅的英军在马格斯方丹几乎全部覆灭。英国政府动员了后备军，接受了英帝国成员国提供支援的要求，并将总司令雷德弗斯·布勒撤职。接任的罗伯茨勋爵这时才领会到这次战争的真正规模。他在等待援军的同时，主要致力于运输系统的整顿。在1900年2月他发起反攻并取得英军的第一次胜利：克隆日虽然事先得到德韦特的警告和支援，但他从金伯利城下的阵地撤退过迟，又不肯放弃行动过于缓慢的牛车。敌军从两翼包抄过来把他的军队围住了，他不得不在帕尔德伯格同他的四千士兵一起投降。英军继续前进，十五天后占领了布隆方丹。

1900年3月5日克鲁格和斯太恩要求停止战争。他们唯一的条件是：承认两个共和国的独立。3月11日伦敦回答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同意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独立”。过了两个月，英国首相约瑟夫·张伯伦公开

向全世界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无条件地兼并这两个国家。5月24日宣布兼并奥兰治。数日后，英军越过瓦尔河向北进攻。6月5日占领比勒陀利亚。9月1日宣布兼并整个德兰士瓦。许多战俘在答应以后安分守己的情况下被释放。英国以为战争已经完结了。这个误解使得局面严重地复杂起来。因为英国的军队并未能够找到布尔人两个共和国的政府的下落。后者仍然保持着完整的组织,非常灵活机动,跟随着武装部队一起作战。自比勒陀利亚陷落后，克鲁格就在一节火车上进行指挥，火车停在通往洛伦索—马贵斯的铁路线上。9月他得到政府授权前往欧洲以便努力争取外国的干预。欧洲的舆论好象一直是同情布尔人的。

克鲁格在欧洲

各地都派来了医疗队。各国都有战斗人员赶到南非参战，但除去在马格斯方丹损失惨重的一小队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们实际上的作用不大。

克鲁格希望能够推动欧洲对布尔人的同情使

之成为实际的支援。他通过海路去欧洲的难题由荷兰坚毅的威廉敏娜女王解决了。尽管英国很不高兴，但荷兰女王还是派了加尔德兰号巡洋舰把这个年老的总统接到欧洲。

他去欧洲的使命实际上遭到失败。曾在1896年发出那份有名的电报，引起人们巨大希望的德国皇帝甚至不肯接见他。

在德兰士瓦，克鲁格的国家元首的职务由被任命为代总统的沙尔克·比格尔将军担任。在奥兰治，斯太恩总统在一辆牛车上办公，任命各种官员，在辽阔的地带行使着有效的权力。除去这些领导国家的班子以外，在儒贝尔去世（1900年3月）和克隆日被俘后还涌现出一些新的军事领导人，即德兰士瓦的博塔将军和奥兰治的德韦特将军。他们改组了为数不多的军队，放弃了用牛车运输辎重的方法，而改为就地获得给养或向敌人夺取物资。1900年9月德韦特决定重新动员那些已经宣誓中立而被英国人遣返回乡的布尔公民。他很快地就征集了三千人。后来德韦特在其回忆录中为此行为辩解说，英国人首先违反了他们的诺言，没有尊重布尔公民放下武器、保持中立

的地位。诚然英国人在布尔人进行破坏活动时已开始对私人产业进行报复，照德韦特看来，这样就没有履行保护财产的诺言。而且英国人还开始招募“国民巡逻队”(现在我们称之为“奸细”)。这就是那些甘为英军服务的布尔人，他们熟悉地理，确实给英国人提供了难得的帮助。

为了反击英国人的这种行径，德韦特侵入开普殖民地，在那里招募英籍的布尔人来打游击。虽然招募的成效不大，但别的布尔将军如史末资和赫尔佐格却深入开普殖民地的后方，牵制住不少英国的部队。[1] 在德兰士瓦的博塔和在更南边的奥兰治自由邦他的同伴一样，也一直是神出鬼没，无从追踪。

基钦纳勋爵的建议

但在1900年10月接替罗伯茨勋爵的基钦纳勋爵觉得布尔人已经显出筋疲力竭的样子。1901年2月他试图同布尔人总司令博塔进行谈判。但

(1) 在后来双方开始议和时，史末资还包围着在开普西北部的一座叫奥基埃普的小城。

因提出的条件没有包括对布尔人国家独立的承认，博塔拒绝接受。于是在3月7日基钦纳公布了所谓“米德耳堡建议”，即以前秘密提出的那些议和条件。虽然建议一再强调兼并，但建议的条件还是相当宽大的：在学校或法庭中得使用荷兰语，承诺以后授予自治地位，对为布尔共和国作战的开普叛乱者，只要他们不再回到殖民地，即免予追究。尤其是有关非洲人的那一条款是对布尔人主要让步。基钦纳勋爵宣布：“关于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中的卡弗人的选举权问题，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在上述殖民地未建立代议制的政府以前不给他们选举权。即使将来授予他们选举权亦应加以限制，以保证白种人享有公正的绝对优势……”

人们一定会预见到，如果有一个“代议制”，布尔人会在地方政府上台执政，而这些地方政府就会直截了当地排除非洲人享有选举权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在条款中提到黑人选举权问题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布尔人对米德耳堡建议的反应在一段长时间里动摇不定。德兰士瓦的国务秘书赖茨问奥兰治自由邦是否准备以此建议为基础进

行和谈。斯太恩总统表示拒绝。基钦纳采取了监禁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办法，借口加以保护，但实际上是使布尔人没有可能在国内重建兵力。集中营里卫生方面的管理很糟。虽然似乎并非有意采用粗暴手段，但确有个别虐待的现象。尤其是出现了瘟疫，很快地使这些集中营臭名远扬。甚至有一些英国人也感到义愤。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北美矿工“移民区”社会事业的积极分子的埃米莉·霍布豪斯小姐获悉这些集中营管理情况很糟。她来到南非，并证实确有不合规定、滥用职权和无能的情况。按照战时的惯常作法，她立即被当作祖国的敌人加以逮捕并驱逐出境。但她坚持斗争，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团体得到有力人物的支持。最后那些最使人激愤的弊端——在几个月以前军事当局还加以否认，说是纯粹捏造——受到制止。可惜这些措施来得太晚。据估计有二万到二万六千名妇女死于集中营。这种作法深深动摇了布尔人的士气。

为了抓住布尔民团，基钦纳发明出另一种办法，即：在当地各处建立若干由碉堡群组成的封锁线，然后用军队大举兜捕，把布尔人赶向封锁线。

德韦特将军肯定地说，这种办法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预期的效果。事实上直到1901年末两个布尔人政府还是无从追踪，而且他们的军事力量依然使敌人胆战心惊。但是粮秣弹药已经耗尽，他们只能依赖战利品为生。例如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所有英国俘虏剥光以取得他们的衣服。他们无法看守这些俘虏，只有把他们就地释放。

现在已到了1902年1月。荷兰政府从人道方面出发进行干预，企图使战事停下来。英国先是拒绝，后来建议就地直接谈判。

谈判与议和

这是一个奇特的解决办法。从理论上说，既然布尔人的国家已被兼并，他们的政府就应被看作不复存在；但英国人是实用主义的，对问题的这一面并不苛求。在获知英国的方案后，斯太恩总统于是要求给他一个通行证以便去同位于克龙斯塔德地区的他的盟友德兰士瓦政府进行协商。基钦纳接受了这个要求。斯太恩与比格尔两人在克勒克斯多普会见。1902年4月9日他们开始磋

国界
省界
首府或首都
1901—1902 年史末资袭击英军的路线

（照原图译制）

图 4 1899—1902 年战争期间的南部非洲

商，最后提出议和建议；在建议中只限于考虑缔结关税协定，解除共和国的武装和授予在他们领土上侨居的英国人以广泛的权利。基钦纳将此方案转报伦敦。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个方案，并指示基钦纳会同米尔纳高级专员一起参加谈判。英国政府显然对英军总司令的外交才能并不信任。基钦纳同布尔人两个总统再次接触，这两个人声称，没有人民的授权，他们不能讨论放弃独立的问题。

4月18日，双方对选派人民代表的办法取得协议。5月15日，这些代表明确授权给布尔人两个政府。代表就是正在作战的那些民团的指挥官，他们是在专为选举而安排的作战期间选出的。代表们在韦雷尼京开会，他们一直到最后还企图保住国家的独立，即使以放弃整个威特沃特斯兰德为代价。博塔将军宣称："因为这些金矿是我们国家的毒瘤。"同时也考虑把斯威士兰转让给英国。但英国谈判代表坚持原议。于是，5月30日布尔代表放弃了维持独立的要求。但他们总算争取到对米德耳堡建议作了几点改进，尤其是关于偿还战时借款以及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政府所征用的物资的赔偿问题。

身患重病的斯太恩不能参加和约的签署。德韦特将军被任命担任二十四小时的代理总统，代为在和约上签了字。很久以来一直在荷兰的克鲁格也未签署。德兰士瓦由沙尔克·比格尔代表，在和约上签了字。和约的签署好象奠定了英国的最后胜利。

人们注意到，既然兼并把整个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责任都转移到英国人手中，在韦雷尼京和约上就没有再提到战争的最初起因或借口。对非洲人的地位只作了一点暗示：这就是米德耳堡建议原来所包括的内容。事实上，英国把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非洲人交给"代议制"政权里未来的议会多数派处理，而这种政权只能使阿非里卡人占统治地位。

非洲人的审慎态度

研究一下阿非里卡人在整个战争期间对黑人持什么态度，是有意思的。照布尔人看，黑人同战争"无关"。他们依旧和从前一样赶着运输辎重的牛车，侍候他们的主人，但他们既未被动员，也没

有武装。当时确有一个祖卢人的酋长恩杜贝帮助布尔人作战，但恩杜贝是白种人。他本来叫迪比，原籍瑞士，娶了一个祖卢女人为妻，并成为纳塔尔边界上一个小部落的酋长。

布尔人领袖们自己不要非洲人支援，也要求英国人在战场上绝对不用非洲人作助手。如果逮住手持武器的非洲人，立即枪决。如果他们被证实或者也许仅仅被怀疑进行间谍活动也同样要被枪决。有两个布尔人民团的头目，洛特和沙珀斯就是因为在此情况下处决了一些黑人而被英国人判处死刑。还有第三个人叫克里津格，只是由于当时被布尔人俘虏的英国将军梅修因的干预才得免于死刑。梅修因后来不久获释。

尽管在战地服务对黑人有这样的危险，但还有一些非洲人的支队帮助英国人作战。在印度人中，有一个名叫甘地的波尔邦达尔的年青律师只给英国人组织了一个印度人担架队。这个后来享有盛名的人物在当时已经对从事暴力行为感到嫌恶，即使为了保卫他认为是自己的权利的事情。

非洲人自己是怎样对待这场战争呢？对此有一份最珍贵的材料，就是布尔人代表们在韦雷尼

京的会议记录。从这项材料中可以看出非洲人长期保持一种审慎态度，但在接近战争末期时，则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对布尔人怀有敌意。这种表现在纳塔尔边境地区比其他地方清楚得多，因为在那里祖卢人的传统精神犹存，远未泯灭。差不多所有的代表在报告他们地区的情况时都提到非洲人的态度。例如在索特潘斯贝赫，布尔人民团一直用工业品同非洲人交换必需的食物。在斯威士兰，两方关系也依然是不坏的，斯威士人提供了对方要求的食粮。一个代表宣称，在克鲁格斯多普附近，他们从卡弗人那里“取走”粮食，特别是牲畜；他又说：“但这并不是偷窃，我们只是收回布尔人在战争期间委托给非洲人代管的牲畜。”

在比勒陀利亚以北的地区、在别撒尔、卡罗利纳以及在祖卢人境内的弗赖海德地区的代表们都坦率地承认，非洲人对布尔人是敌视的。但在弗赖海德，布尔人仅同祖卢人真正打了一仗，有五十六个布尔人死亡。这个地区的代表还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

因此，虽然在材料中提到的地方很少，但好象非洲人的态度对于战争的终止起了不容忽视的

作用。

但他们的处境并未因此而得到什么改善。英国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英国许诺过在当地获得自治以前不给非洲人以政治权利，它必须实现这一诺言。此外，即使在一直归英国统治的纳塔尔地区，英国不久也引起新的不满。由于征收一种新税，1906年在酋长班巴塔的统率下，爆发了一次祖卢人的大叛乱。虽然叛乱终于被镇压下去，非洲人死了二千，[1]欧洲人死了几十人，但此次叛乱证明，英布战争打开了非洲人的眼界，使他们看出，白人是可以打败的。但班巴塔之死使非洲人最后一次公开抵抗告一段落。未来的五十年是白人的天下，首先是英国人的天下，其次也是阿非里卡人的天下，而人们本以为自1899年到1902年打得筋疲力竭的长期战争已经把阿非里卡人消灭掉了。

---

[1] 这次叛乱最痛苦的插曲之一是十二个非洲人因被控杀害两个警察而判处死刑的事件。伦敦先决定，未经审查在什么情况之下纳塔尔作出此项判决前，不许执行判决。纳塔尔政府提出辞职，对此表示抗议。于是英国政府允许不经再行审查便可执行死刑。

第十七章　过渡时期

1902—1910

在战争结束以前，引起这场冲突的主角已从舞台上消失了。维多利亚女王死于1901年，没有看到韦雷尼京的和议。虽然在英国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但女王死时正值英帝国短暂的极盛期。过了这一光荣、强盛和骄横的顶峰，不仅英帝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开始走下坡路了。日俄战争（1904年）就是即将到来的深刻变化的头一个明显的征兆。

在南非，离战争结束只有几天罗德斯死去了，这场战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的冒险政策的结果。他临死前看到的电报之一，是基钦纳告知和谈已经开始。克鲁格活到1904年。他从未再回非洲。他先住在荷兰的乌得勒支，后来迁居莱蒙湖畔气候温和的克拉朗，就在那里终其天年。

英国的臣民

自此成为英国臣民的阿非里卡人依然照常过活。他们最初茫然不知所措，随后就拼命从事重建家园的工作。一个由博塔、德韦特和德拉赖三将军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欧洲，为了在英国答应给的三百万英镑以外再募集一些款项以医治战争的创伤。代表团得到很多同情而得钱很少。

用于重新建设的款额证明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当时有二十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战前所经营的农庄荡然无存，又给十万非洲人带来灾难。因此不得不在财政援助以外再借款三千万英镑，以德兰士瓦和奥兰治铁路的收入为担保，不足时则用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这两个地区的预算收入来补充。可是1902年正逢特大干旱。实际收入远低于预算，而发给回乡种田的农民的补助金又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额。张伯伦在南非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巡视(1902年)后，承认除了书面承担的贷款外，有必要从速拨款赈济。

除了这些物质建设问题外，不久又加上一些

政治问题。伦敦要已成为勋爵的米尔纳不仅依然担任高级专员的职务，而且兼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总督。他的副总督负责新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布尔人当时对所有涉及"政治"的事务还无权过问，只能消极抵抗。对由外来官员组成的、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英国行政机关，布尔人尽可能地不加理睬。曾有几个月，过去的"大迁徙"精神又复活了，几伙布尔人迁往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另外有的去坦噶尼喀。但整个民族现在已有六、七十万人之多，想再次"开拔"是不可能了。

阿非里卡人的文化觉醒

这两个前共和国的公民还逐渐意识到军事上的失败倒也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现在开普、纳塔尔以及两个新殖民地的阿非里卡人之间不再被边界隔开。这些阿非里卡人加在一块，成为当地白人的多数。开普北方普遍存在的奇异情况就是个证明。在该地农村里，现在居民对那些在战时给"英国佬""当差的人"都看不起而加以抵制。当局逮捕那些应共和国号召拿起武器作战的布尔人

时，都遭到成群结队的居民的斥骂。

远远更有积极作用的是，不论在过去边界的南面或北面都出现阿非里卡人文化生活的觉醒。为了抵制由伦敦派来的一个教育处长萨金特所推行的英国办学政策，阿非里卡人成立了一个私立教育机关，叫作“基督教国民教育会”，经费来自南非和荷兰的捐献和募款。文化团体纷纷出现，例如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成立了“非洲语言学会”，在开普成立了“非洲语言协会”。早在1909年——当时甚至南非联邦还未正式成立——所有这些团体已经合并成为一个“南非语言文艺学院”。这就意味着荷兰语未能成为阿非里卡人的语言而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并在1925年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

米尔纳只看到布尔人复兴的这些最初的标志。他拼命做工作以图在最短期间实现他理想中的英国化。但他知道这些努力会招致布尔人的怨恨，便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筑，以博取人心。他使用一批年青的大学生为助手——被称为“米尔纳幼儿园”——多方努力，修建公路、铁道，开掘排灌沟渠，设立学校。他还成功地吸引来一批英

国移民。但这些英国移民并不象米尔纳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差不多都只愿在城市定居。不久有一些逃避迫害的俄国犹太人也移民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白人区逐渐地具有了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城市的性质，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城市的主要特征。

阿非里卡人政治上的觉醒

有一项经济方面的措施激起了阿非里卡人政治上的觉醒。经过长期的压力，当地矿业主在1904年获得输入中国“苦力”在兰德劳动的权利。当第一批到达时，布尔人反对在南非增多人种的旧想法立即对此有了反应。这种反应同复活了的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结果成立了一个阿非里卡人的政党“人民党”，领导人是博塔、史末资、德拉赖和沙尔克·比格尔。不久在奥兰治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政党，由赫尔佐格和德韦特领导，叫作奥兰治统一党。这些政党的基础是对那些受人尊敬的领袖的某种爱戴，而这些领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和睦的。群众对领袖个人的忠诚，以及领袖间彼此心怀敌意足以反映这些政党的性质。它们

不过是战争期间的民团在政治上的重现而已。

这种已经开始的演变情况引起了在开普的英国各界人士相当强烈的反应，这些英国人团结在进步党内。罗德斯死后，该政党由詹姆森医生领导。这个在1896年已经生命垂危的人现在依然身体很好。在开普有几千公民因在战时与布尔共和国有牵连而被剥夺了选举权，詹姆森利用这个机会，又加上他许愿提高物质利益，他的党在1904年开普选举中获胜。总的说来代表阿非里卡人的“阿非里卡人协会”的领导人全部落选。詹姆森成了开普总理。

一年后，米尔纳任期已满，离开南非。他的离职使英国的积极活动受到影响。继任总督的塞尔伯恩伯爵不象他那样精力充沛。当时正值英国本土进行大选。保守党失败，南非问题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自由党利用南非招募华工的事件，把它谴责为“复活奴隶制”并归罪于保守党。自由党成立了内阁。不久史末资就去英国拜访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在布尔人领袖中，史末资象个知识分子。虽然他在战时立下很大的功勋，人们却不大喜欢他；但他的才干使他成为不可缺少的人

物。他提醒坎贝尔—班纳曼注意英国在韦雷尼京和约中曾作过给布尔人自治地位的诺言。虽然丘吉尔反对，英国内阁还是很快地答应了关于自治的要求。原来自由党为了当时竞选的需要对这个棘手的“中国人”问题曾大肆渲染，但现在也怕开罪当地的资本家而感到自己很难处理了。德兰士瓦获得自治就使自由党人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

多数和少数

布尔人已经准备好了。按照1906年12月在德兰士瓦和几个月后在奥兰治宣布的自治新宪法举行了选举，两地的布尔人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德兰士瓦，人民党在六十九席中获三十七席；在奥兰治，统一党在三十七席中获三十二席。德兰士瓦议会所通过的最初的立法措施之一是强制印度人“登记”，以便过了一定期限后加以驱逐。实际上当时印度人进入德兰士瓦已不可能。中国人也已分几批遣返。但印度人有甘地作他们的领袖。甘地在1899—1902年战争中已因组织了一个印度人担架队而初露头角。后来在兰德鼠疫流

行时以及在班巴塔领导的祖卢人叛乱时，他又从事人道主义的活动，使他享有足够的威望起来反对这个种族歧视的立法。政府在形式上让了步，把立即强制登记改为在三个月内自愿登记。甘地特别指责当时开始担任教育部长和殖民事务国务秘书的史末资，批评他作了并不兑现的诺言。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政府（博塔和菲舍尔分别担任总理）在行使它们刚刚得到的权力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领导班子摆脱了自卑感，尤其是在经济力量较强的德兰士瓦。因此他们又把过去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合并成为一个联邦的老方案提出来。班巴塔的叛乱、华工的招募、印度人的闹事、运输税率问题以及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都表明合并是有益的。1908年开始谈判，不久在谈判中甚至就发现，有可能比联邦(Fédération)更进一步。因此，合并成为“南非联邦”(Union sud-africaine)①的四个殖民地，今后不再是“国家”而成为行省，其行政官员将由中央政府任命。阿非里卡人意识到他们这个民族在人

① Union sud-africaine 现在一般译为南非联邦，而实际上已是单一国家，不是国际法概念上的联邦。——译者

数上占优势，因此赞成南非的统一。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地的阿非里卡人仍然在省议会中保持广泛的权力，特别是关于教育、劳动立法以及非欧洲人的地位这些敏感的问题。通过把这些权力授予地方议会的迂回办法，就可以防止年青一代的英国化，并避免非欧洲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列入选举名册。关于非欧洲人问题，在谈判中起草的宪法很快也缩小了在北方给予他们政治权利的希望。只对开普的非欧洲人保留选举权——还有某些"资格方面"的限制。

还剩下一个棘手的领土问题，即三个直属英国国王的保护国：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的问题。在韦雷尼京条约中布尔人已经放弃了斯威士兰。理论上后者已恢复了它的独立地位。但斯威士人谨慎小心，要求英国同意进行改由英国保护的谈判。伦敦拒绝谈判，而单方面宣布斯威士兰为英保护国，从而扼杀了斯威士人一度恢复的主权。至于其他两个地方，倒没有什么有关宪法的问题要提出。但现在既然"南非联邦"成立了，这三块本与南非有如此密切关系的地方应如何处理呢？大家商定了一个妥协方案。英国许诺，如

果将来的南非政府提出要求，可考虑把三地并入南非联邦。但在答复提出的要求时须先行征求非洲居民的意见。方案一点没有提到英国政府是否应依照非洲人表示的意愿行事。

最后，还考虑在将来兼并另一块领土：南罗得西亚。该地一直到1914年将仍由英国南非公司管理。至少到那时可望当地白人移民投票赞成加入南非联邦。[1]

现在只剩下给这个新的联邦找一个首都了。在这个问题上各行省也同意一个妥协方案：行政机关设于比勒陀利亚，议会在开普，最高法院在布隆方丹。在纳塔尔不设联邦机关。所有的问题一一解决后，联邦方案为各省议会相继通过；此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又在纳塔尔举行了公民投票。1909年9月20日国王爱德华七世签署了英国议会通过的成立南非联邦的法案。在首任总督格拉斯顿勋爵到任后数日，南非联邦于1910年5月31日正式诞生。格拉斯顿勋爵委派博塔将军组

① 这个设想后来落了空。南罗得西亚因为不赞同在南非通用两种正式语言的制度，并怕阿非里卡"穷苦白人"的侵入，投票赞成延长英国南非公司的管理到1924年，此后又表示赞同实行自治，直属英国国王。

织第一届内阁。博塔成立的内阁包括各省和各政党的代表。各政党很快地结成一个单一的“南非党”。博塔从而得以进行有效的统治。

第十八章　南非联邦最初的考验

1910—1918

从地理上看，这个新国家具有一个奇特的外形：在这辽阔的次大陆当中，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广袤的贝专纳不属于该国的领土。

这个外形几乎象征性说明了在这个新的政治组织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最大问题：各个种族的关系问题。不久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诚然，在开普有着英国的比较自由开明的传统和虽居少数但人数很多的混血种人，在纳塔尔则有逐渐增多的印度人，还有大批祖卢人；而这两地同样都是南非联邦的一部分。在德兰士瓦，采矿业的黑人劳动力问题以及整个的工业化问题更使种族间的关系带上新的色彩。

博塔政府很快地着手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博塔几乎完全从政治上着眼，而不理会问题的社会

性。由于他对社会问题不了解，所以对以后十二年中的劳工纠纷，他的态度特别严酷，尤其在强硬的史末资的影响之下。史末资当时身兼三职，是内务部长、矿业部长和国防部长。

博塔团结了一切“有志之士”，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南非党。他的政府的第一项措施，便是处理在兰德劳动的中国苦力问题。它命令他们立即迁走，于是这个少数人种除去极少例外[1]就从种族繁多的南非居民中消失了。

用同样的办法处理印度人就困难了。印度人人数当时已达十五万。博塔禁止印度人再行移民，但这种措施并不足以减少印度人在南非的人数。相反地在南非已住有足够的印度妇女，可以保证这个族系的自然增殖。另外，由于在1889年就来到南非的象维达穆素夫人那样一些印度教育家的努力，使印度人知识水平提高，职业也多样化了；从而难于把印度人排除在社会之外。1913年甘地又倡导一个消极抵抗运动，反对限制印度人在纳塔尔和德兰士瓦之间的来往迁移和反对歧视印度人的捐税。这就是那有名的印度人的人头

① 在南非现在只有七千中国人。

税，每人需付三英镑。经过长时间的紧张局面后，史末资取消了这个特别捐税，建议印度人"自愿归国"，由南非政府支给路费。这条法律在1914年才颁布，但其效果并不符合南非政府的期望。大约与此同时，甘地本人返回印度，在那里去实行他在南非创造的一套办法，以便解放祖国。

班图人政治上的觉醒

至于班图人，他们好象没有怎样反对就接受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们的作用在慢慢增大。例如在1912年成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白人一般群众几乎没有理会。可是这个组织的成立是对1911年关于劳动的法律的反应，这条法律规定不准非欧洲人担任某些技术工作。

这个组织原名南非本地人国民大会，其真正的创始人是一个年青律师，在南非联邦成立后不久由伦敦毕业回国。国民大会的组织机构明显地受到英国的影响。它是按照英国议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有一个专由酋长们组成的"上院"，和一个

由其他黑人领袖组成的“下院”。后来国民大会失去其“影子议会”的性质，上院不复存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变成一个反抗白人的组织。但当它在1912年成立时，还没有任何人能预见到这种演变。

在同一年，白人组成的工党要求更彻底的种族隔离。翌年，政府就使议会通过了“土著人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保留地之外取得土地。按照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许诺在实行此禁令的同时将购买新的保留地，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

政府危机

欧洲人并不怎样注意保留地这件事。布尔人与英国人之争又成为政局的主要问题。博塔已经同意前奥兰治统一党领导人赫尔佐格将军入阁。在1910年以前赫尔佐格已因坚持在奥兰治以荷兰语为主要语言而在英国人当中很是不得人心。但对博塔成立的联合内阁，赫尔佐格的支持却是必要的，从而他得以在内阁班子中获一席位。1912

年赫尔佐格在尼尔斯特隆和德维尔德特作了两次引起很大反响的演说。他肯定地说，凡是把英帝国的利益放在南非利益之上的人都是不够格的公民。他的一个纳塔尔人同僚刘恰斯部长，是个极端的亲英派，退出了政府，对赫尔佐格的演说表示抗议。博塔希望赫尔佐格为了息事宁人起见，也提出辞职，以解决政府的危机。但赫尔佐格拒绝这样做。博塔不得不向总督提出全体内阁辞职。然后他又重新组阁，排除了这两个极端派。但这个事件还有余波。赫尔佐格愤然脱离"南非党"，成立国民党，并使该党成为一个纯属布尔人的组织。这个新的政治团体开始影响不大，但不久该党在开普有了一个坚毅顽强的领导人马兰博士，他是荷兰改良教会的一个严守戒律的牧师。在德兰士瓦，一个野心勃勃、嗓音洪亮的律师提耳曼·鲁斯成为该党不容置辩的领袖。赫尔佐格直接领导奥兰治的党组织。

面对社会风潮的史末资

博塔在政府危机刚刚渡过后，不得不对付严

重的社会风潮：有一个矿主决定降低某些工种的工资，引起了罢工。罢工很快地扩大，势将形成全国总罢工。1913年7月4日政府进行干预，在最后关头禁止罢工工人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一个规模极大的集会，罢工发展成为暴动。矿工烧毁了两座车站——在帕克车站烧死了一个黑人——砸了《星报》的编辑部，到处拦截火车，切断电源。政府不得不调来英帝国的军队以恢复秩序。军队开到后又发生冲突，有二十一人死亡。史末资于是违反宪法，决定采取单纯的行政措施，流放有英国国籍的工会带头人。然后在博塔的陪同下，他到约翰内斯堡去同罢工工人进行接触。这两个部长成为怒火冲天的工人手中的真正人质，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不得不答应恢复那些被削减工资的工人的原来待遇。但史末资不久就找到报复的机会。当1914年1月罢工再度爆发时，他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在镇压中有二人死亡，另外有九个领头闹事者不经审讯就押回英国。史末资命令趁夜间把他们抓走，押上即将开往纳塔尔的快车，并指示中途不得停留直送德班。一到德班，这些人就被押上乌姆格尼号轮船，而且不顾船长的抗议，立即开

航。当德兰士瓦的法官终于接到报告抗议这种专断行为时，已经来不及了。工会派了一只船去追赶乌姆格尼号，但没有追上。

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人

罢工这样镇压下去以后，议会表示赞同史末资的行动，但公众舆论仍然愤愤不平。使博塔政府感到幸运的是，不久国际上的严重事件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对外政策方面。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也夫遇刺。五星期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使南非陷入一场决定性的危机。英国一宣战，博塔就建议用新成立的地方防卫部队负责保卫南非，以便使驻在联邦的英国军队得以抽调出来（8月4日）。伦敦立即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由南非部队占领德属西南非洲。[1] 博塔犹豫不决。8月9日伦敦又电催速复。8月11日博塔答应了宗主国的要求，但决定只用志愿军。他知道，主动进攻德国人会引

① 当时施佩海军上将统率的德国舰队正在南美海岸附近活动，伦敦深恐德舰队在德属西南非洲停泊。

起那些坚不妥协的阿非里卡人的抗议。果然那些“老共和派”激动若狂，他们已觉得可乘英国的困难处境恢复布尔人的独立。防卫部队总司令拜尔斯将军本人也属于这一派。然而他恪守军队的纪律，先把那支很快就组成的远征军开到卢得立次湾。登陆成功后，他就辞职并加入那些要求放弃远征西南非的阿非里卡人的行列。另外还有一现役军官马里茨开始同西南非的德国人秘密谈判。德国人很快地答应帮助他恢复布尔人的共和国，只要他不再替英国服务。在整整几个星期里，由于一系列具有悲喜剧性质的社会新闻，群情日益沸腾。一个布尔人的老“先知”尼科拉·范伦斯堡曾在1899年—1902年战争中以其“幻觉”发现了敌人的阵地，从而帮助德韦特将军取得了几次胜利。现在他预言英帝国不久就要垮台。此外布尔战争中另一英雄德拉赖将军乘车外出，未遵守停车的警告，在约翰内斯堡附近被警察开枪打死。警察以为他们拦截的是在兰德进行抢劫的福斯特兄弟匪帮的汽车。但阿非里卡人自然认为这是对德拉赖将军的蓄意谋杀。

在这种白热化的气氛中，前奥兰治总统斯太

恩拼命想使这两部分欧洲人之间保持和平的努力终于失败。诚然，赫尔佐格是完全保持缄默的。但德韦特、比格尔、肯普这三个将军于1914年9月21日给博塔下了一个最后通牒，限令他放弃对西南非洲的进攻。同时他们在开普省北部和德兰士瓦西部集结民团。不久集结了约有一万名非正规部队，准备发动公开叛乱。9月26日政府得知马里茨和其一部分部队背叛的消息。博塔于是动员后备军，组织了一个由布雷茨上校指挥的忠于政府的布尔人部队。布雷茨跟踪追击马里茨，赶上了他，并于10月24日将他击败。马里茨率残部逃到德国人那里去。[1] 博塔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追击叛乱的民团。拜尔斯和肯普的民团在德兰士瓦西部的吕斯腾堡被打散。在奥兰治西部的穆什隆谷，德韦特也被博塔所击败。他逃至贝专纳，在当地被俘，解送到南非联邦受审。拜尔斯将军在逃跑途中企图泅过瓦尔河而淹死。在现役军官中只有富里上尉被捉住并处死刑。其余参加叛乱的人

---

(1) 博塔占领西南非洲时，马里茨逃到安哥拉。葡萄牙人把他送到葡萄牙。1923年他返回南非，被判监禁。一年后，赫尔佐格政府将他释放。

都被从宽处理而且不久被大赦，包括德韦特在内；在法庭上提耳曼·鲁斯曾为他作了极好的辩护。

危机结束了。为了避免再生事端，博塔亲自统率进占西南非的部队。1915年2月发动两路夹攻，一路从斯瓦科普蒙德和沃尔维斯港进攻，一路从开普省西北部的阿平顿进军；5月11日占领温得和克。两个月后德军被人数占优势的南非军队所打败，在科腊布投降(7月9日)。双方损失都只有几百人。

不久举行了1910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选举，结果证明博塔将军远未能得到全国的支持。马兰和赫尔佐格的国民党在议会得二十四席，但南非党依然有五十四席，继续执政。

虽然布尔人中有一个相当大的少数派对博塔的政策持保留态度，但博塔仍决定进一步在非洲以外参加英国方面作战。一支南非远征军派赴法国前线，但在代尔维尔森林战役中损失惨重。在参加作战的这个旅共有一百二十一个军官三千名士兵中，只有五个军官和七百五十个士兵生还(1916年7月)。另外还派了部队去东非支持英比联军对冯勒托夫—福贝克上校(后升为将军)的进

攻。在这些部队到达前线后，由史末资将军任该线总司令，因为他的前任英国人霍勒斯·史密斯·多里恩爵士未能挫败德军。然而史末资也没有能取得多大胜利。虽然德国的文职总督施内有些软弱，但冯勒托夫—福贝克成功地激发了很多后备兵和招募来的非洲人士兵所组成的德军部队的斗志。诚然，在坦噶尼喀中部偏西的塔波拉于1916年被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共同攻陷，但冯勒托夫—福贝克依然神出鬼没无从追踪。只是在1918年11月14日当他获悉在勒通德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才投降。

争取联邦的独立

不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的战场，博塔都使用了大批黑人和混血种人。但依照阿非里卡人的传统主张，这些人不用于作战而只能在后方从事劳役。他们组成了“土著劳工大队”，在四年的战争中参加该队的有六万班图人、纳马人和“混血种人”。

史末资在塔波拉取得胜利以后离开东非。他

被任命为英国“战时内阁”的部长，在成立国际联盟时曾起了积极的作用。1919年他得知战友赫尔佐格来到巴黎。赫尔佐格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来向英国政府申诉，要求恢复布尔人的独立地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宣称这是一个应在南非人之间解决的南非内部问题。

然而博塔和史末资对他们国家的前途另有想法。他们希望整个联邦获得独立，而不是把南非重分为二。从这样的远景来看，凡尔赛条约使他们有了机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同其他自治领一样，南非第一次同英国本土处于平等地位，在一个国际条约上签字。这两个政治家认为能以平等资格签署条约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尽管对条约内容有保留意见，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博塔认为条约的规定过于苛刻，事实上行不通(他估计得大致不错)。史末资认为这些规定对德国人不公正，因而在签字后发表了一个抗议书。这两个南非部长的态度所以不够明朗，除去原则问题外，关心选举也是重要的考虑。他们知道阿非里卡人中有一大部分同情德国，因此他们不想在预定于1920年举

行的大选中失去太多的选票。

在有关非洲本地的问题上，比勒陀利亚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中取得另一项胜利。西南非洲成为它的丙级——直接管理——委任统治地。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南非联邦这个新的附属地从1890年到1900年以来是怎样演变的。

第十九章　德属西南非洲的命运

1904—1939

南非联邦要求在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由它控制西南非洲，而且得到了满足。它所根据的理由，一是武力占领该地的“权利”，二是此地与它的国土在地理上是毗邻。后一个论据对南非的白种人并不是没有危险的，虽然他们并未理会到这一点。如果现在的泛非主义者也运用这个论据，那就意味着南非应当合并到黑人的国家中去，而这却正是具有欧洲人血统的南非人所极力反对的。

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

但在1920年协约国授予南非联邦对西南非洲行使丙级委任统治权时，任何人也未觉得南非提出来的论据有什么危险性。当地的黑人和混血

种居民只要对事态的变化有一些了解，都对改善他们的境遇怀有一线的希望。因为德国的殖民活动虽在喀麦隆和多哥（在这两个殖民地都没有大量的移民）获得成效，但在西南非洲却只带来战争和贫困。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在怎样的情况下新纳马人在十九世纪末被德国军队征服。后来发现白种人有可能去那里定居，这引起了更加巨大的纠纷。尤其是赫雷罗人由于德国商人大量购买牧地很快被逼得起来反抗。当时实行着一种用土地作抵押以赊购商品的办法，从而形形色色的投机者得以从赫雷罗人活动的地方取得愈来愈多的土地。那些传教士们、甚至行政当局都领会到无法谋生的赫雷罗人的无产阶级化的危险，但商人却认为没有坏处。赫雷罗人（其次是纳马人）生活贫困，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当他们拥有牲畜时就不愿侍候德国的移民。早在本世纪初，牧民的不满情绪已达沸点，发生了叛乱。但德国当局挑拨部落间互相争斗，唆使赫雷罗人反对纳马人，终于保持了它的控制，同时残酷地镇压任何叛乱的尝试。为了对付东部的赫雷罗人的叛乱，德国人把他们

的一部分土地割给了塞缪尔·马赫雷罗（自 1890 年始就承继了那个伟大的马赫雷罗的王位）所领导的各个氏族，从而把叛乱局部化而镇压下去。塞缪尔是一个软弱无能、嗜酒如命的人，得到德国人给的土地就目眩神迷，而他同族的两个酋长、卡菲库纳和卡希默努阿则在投降后被枪决了。但到 1904 年塞缪尔也抵抗不住部属的压力了。当时赫雷罗人部落的土地已有三分之二落到德国移民的手里。赫雷罗人乘德总督洛伊特魏茵正在当地最南方对付崩代尔斯瓦特人的纳马部落中发生的其他叛乱之际，于正月动手。值得注意的是，塞缪尔·马赫雷罗和他的同僚们在下达的指示中要求他们的武士不要伤害传教士、英国人、布尔人、勃达马拉人和纳马人。洛伊特魏茵本人在他所著的《出任德属西南非洲总督十一年》一书中也承认这些赫雷罗人酋长们的用意很象是要保护所有的妇女儿童。虽有此指示，但还有个别人遇害，这是由于在任何地方都有不讲人道的人。

赫雷罗人的叛乱

赫雷罗人的叛乱说明他们对德国人积怨之深。有一点特别重要，赫雷罗人表示愿意同他们的宿敌纳马人放弃前嫌。马赫雷罗甚至更进了一步。他写信给西南非洲很多非洲人公认是最杰出的酋长亨德里克·维特布伊，要求支援。这封信被德国当局截获。但维特布伊后来自动参加了叛乱。

赫雷罗人约有七千名武装士兵参加作战，其中二千多人持有步枪。在好几个月里，德国部队处境极为危急。只是由于崩代尔斯瓦特人、纳马人和赫雷罗人没有配合一致，德军才得以坚持到援军到达。1904 年 8 月赫雷罗人被迫向温得和克以北的瓦特伯格山地退却，在哈马卡里战役中遭受惨败。他们被驱往东部和北部以后，不但要抵抗武装精良、在人数上随后也超过了他们的德军，而且还为饥渴所折磨。塞缪尔·马赫雷罗及其随从终于穿过奥马埃凯－臧韦尔德，抵达贝专纳，英国人在那里给了他寄居避难之所。但那些武士、

妇女和儿童们则在不毛之地流浪，力竭身亡，死者数以千计。德国政府认为叛乱还未粉碎，派冯特罗塔将军代替洛伊特魏茵统率部队。此人曾于义和团造反时在中国指挥德军，是一个“强硬派”的殖民者。这个残酷的军人认为只有一个解决战争的办法：干脆灭绝赫雷罗这个民族。他命令部队在沙漠周围设封锁线，任何人企图越过此线，一律格杀勿论。当有些赫雷罗人的酋长来乞和时，他冷酷地命令将他们枪决。一个曾经如此自豪的古老部落所幸存下来的人竟几乎全部遭到屠杀或死于饥渴。

同时，崩代尔斯瓦特人的造反也被粉碎。这时八十岁的亨德里克·维特布伊奋起抗德。他不敢同德国人摆开阵势作战，而是同他们进行殊死的游击战争。冯特罗塔悬出赏格以图取得维特布伊的首级，但始终无法抓到这个老酋长。1905年他受到致命的重伤，死于克特曼斯霍普附近的策斯。他的武士们抗击着德国人使他们不能接近，以便很快地把维特布伊埋葬。雅各布·马兰加接任领导继续抗战将近两年。到1907年战争停下来。

非洲人死亡确数不详。只知道赫雷罗人在1904年共有九万到九万五千人，现只剩下一万五千到二万。德国人正式公布抓到一万五千“俘虏”，其中男人不满五千。在这些俘虏当中，很少有人幸免于死。例如在1906年9月把二百人圈禁在西南非洲海岸对面的鲨鱼岛上，到12月已有六十人死亡。作者本人曾在雅温得的档案中看到一些关于其他赫雷罗俘虏到达喀麦隆和他们在登岸时的健康情况的报告。医生在报告中指出这些俘虏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而且很多人患有急性结核症。加上赤道的炎热，他们恐怕全部都报销了。

种族灭绝的一例

西南非洲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种族灭绝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例。1918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揭发德国暴行的《蓝皮书》。德国也随即出版了另一本《蓝皮书》，详细披露英国人在英布战争中和在印度的殖民战争中的残酷行为。在战后，英国以维护南非联邦同1918年后仍留在西南非洲的德国人的良好关系为名，不再提

自己那个报告书了。

不论报告书所举事例的真实性如何，确凿无疑的是，冯特罗塔的暴行甚至使德军司令部本身都感到不安。在1906年他被调回。大约在同一时期德国下议院讨论了在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叛乱后德国军队和行政人员对非洲人施加暴行的普遍问题；马及—马及叛乱大约是与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造反同时爆发的。当时在野的社会党猛烈抨击殖民主义的作法，它使得德国纳税人付出几百万马克。此外，只是同赫雷罗人的战争，就使德军牺牲军官和士兵二千三百人。在1908年德国殖民主义者又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地方慢慢从事开发。在楚梅布发现了金刚石和铜，又使生产活跃起来。1912年，西南非洲的出口第一次超过入口。但德国并未能从这一发展中获得多大利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我们已知道在1915年西南非洲即为南非联邦所占领。

在此次战争中西南非洲的土著人的态度值得一提。他们虽然态度审慎，但对入侵者是同情的。例如崩代尔斯瓦特人就替南非部队担任侦察。至于雷霍博斯的“私生混血种人”则拒绝德国人的

动员，举出保护条约上规定他们不参加“白人之间”的战争作为理由。在德军的最后通牒的威胁下，雷霍博斯的一个密使去见博塔表示他们愿意帮助南非。但是博塔按照布尔人的传统拒绝接受一个非白人的部族的支援。然而他重申了他的政府尊重这些混血种人的权利。德军于是进攻雷霍博斯。在一次相当激烈的战斗中，由科内利乌斯·范维克指挥的混血种人被击败。不久南非军队的前进结束了这个小规模的战争。

在德军投降后

在德军投降后，南非当局为了争取土著人设立了若干特别法庭，审理当时还留在西南非洲的德国公民对赫雷罗人、纳马人或“私生混血种人”所犯的暴行。上面提到的《蓝皮书》的内容主要来自这些法庭上的证词。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事先安排好”的审判，案件的审理既然有着政治上的背景，便不是在完全冷静的状态下进行的。

再者，南非联邦很快地表明它对土著人的权利也并不那样重视。在占领西南非洲后不久，南

非的一支部队在安哥拉边界遇到由年青酋长曼杜姆率领的奥库尼雅马人的队伍。原来曼杜姆是在一次叛乱中损失了五千人后逃到西南非洲的，他向指挥南非部队的军官要求给予保护。他得到了南非的保护，但代价是签字向南非表示忠诚，放弃他在边界上处于葡萄牙管区的领土，并不再越过边界回到原地。曼杜姆后来违反了这些条件。经葡萄牙的要求，温得和克的南非当局勒令曼杜姆出庭受审。曼杜姆拒绝，南非当局于是派出一支军队去追捕他，同时事先得到通知的葡萄牙部队封锁了边界。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曼杜姆及其部下一百人被杀。

在1922年，崩代尔斯瓦特人再次造反。他们的一个酋长萨穆埃尔·莫里斯曾在南非军队中当侦察兵，立过功(他甚至还得到一支枪作为奖赏)。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可以回到他在1904年—1907年抗德斗争时逃离的家乡。但他被禁止去西南非洲。他违令前往，被警察扣押。当时正因新增一项养狗捐，崩代尔斯瓦特人群情沸腾。南非当局自己也承认增加这项税款，目的就在于强迫崩代尔斯瓦特人出卖劳动力，当小工或放牧以

得到必要的钱来交纳税款。在激愤的群众的威胁下，警察不得不将莫里斯释放。不久南非当局出动飞机轰炸了崩代尔斯瓦特人的营地，又派出一支军队杀死男人和妇孺达一百五十人，把造反镇压下去。

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常设委员会不久就过问这一事件。它强烈批评南非当局的态度，认为设立税捐专门用来逼迫非洲人去寻找挣工资的活计是违反委任统治的规定的，用飞机轰炸——共用了十六枚炸弹——同事变的规模是不相称的。委员会最后建议设立土著保留地，并起草关于非洲人劳动的具体规章。只此而已。那些“私生混血种人”也失去了从前在雷霍博斯所获得的表面上的自治地位。①

此外，南非的政界人物却更重视他们同留在西南非洲的德国人的关系。直到1920年，西南非洲一直由军人担任“行政长官”来管理，向南非联邦总理负责。以后又辅佐以一个被任命的“委员会”，但无表决权。从那时起某些德国的移民已经

① 在1924年他们企图恢复独立。但南非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在尚未举事之前就俘获了六百五十人。

被允许担任委员会的成员。但自从西南非洲被占领以来,欧洲人到南部非洲移民的人数很快增多,他们于是要求在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政府中有真正的参政权。可是一直拖到1923年,人们才有把握认为德国人在白种人中不再居多数了。于是史末资就同魏玛共和国①订立协定,确认愿意留在西南非洲的德国人有定居权,而且随着定居即成为英王的臣民。在1924年南非联邦通过一条法律授予这些德国人以南非公民的资格,从而使他们在1925年成立立法议会时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议会有十八个成员:十二个由选举产生,六个是任命的。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南非政府就能够使德国人继续处于少数地位。这种预防措施后来证明是完全有根据的。德国人在选举人中虽居少数,但由于选区划分的缘故,在1926年的选举中获得十二席中的七席。再者,一个新的移民浪潮又使德国人涌向西南非洲。然而,南非政府使议会通过了一道关于外国人入籍的新法律,使得这些新来的德国人不能立刻对选举权施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根据1919年在东部小城魏玛制定的宪法成立共和国,故有魏玛共和国之称。——译者

加影响。过去只需两年的居住期即可取得入籍的条件，现在则延长到五年。这项规定激起了德国人的强烈反应，他们觉得在议会中力量减弱，就对任何旨在提高议会职权的企图都加以破坏。但不久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使他们改变了态度。1929年和1930年西南非洲遭逢前所未有的大旱。大多数农民损失了一半以上的牲畜。随后采矿业又受到巨大的经济危机的打击：有六千非洲人和五百欧洲人失业。在1929年采矿业通过购买商品和发付工资还给当地经济提供了一百五十万英镑的收入，而在1931年这笔收入就减至五十万。因此非采取紧急措施不可。经济上的灾难使德国人与南非人重归于好。大家都赞成要求增加立法议会的职权以克服经济危机。议会特别取得了在官产、地方银行、关税、警察和初级、中级教育方面的立法权。但德国人以同意上述措施为代价换取到当局承认德语为正式公用语言，并对入籍规定了新的方便条件。

这些方便条件并未实行。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几个星期后第一批"组织工作者"从德国派到温得和克，使命是"掌握"西南非

洲的德国人。开始时组织了一些“希特勒青年团”支部，并改头换面地建立了“德国青年妇女联盟”的一些小组。不久国社党本身也出现了。有一次温得和克某个公共建筑物上所挂的南非联邦国旗给扯下来，换上卐字旗。接着国社党特务进行了广泛的恫吓活动。任何拒绝追随国社党的行为都要受到社会的抵制以示惩罚。任何人敢于宣称他忠于南非联邦就被称为“叛徒”。

赫尔佐格总理素来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恶感，但即使是他也不能容忍国社党人的这种宣传。1933 年 10 月他下令解散国社党的各种组织。四年以后南非联邦制定了一道法律禁止向英王以外的任何人宣誓效忠，违者重惩。

西南非洲议会中的南非人多数派为了彻底制止德国人闹事，通过了将西南非洲并入南非联邦的决议。但比勒陀利亚政府迟疑不决。它先将问题提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后将该委员会的意见转议会讨论。南非联邦议会终于未敢单方面地废除委任统治的制度。因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仍旧维持现状。

第二十章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

1918—1939

博塔由于过去在英布战争中的老战友对他疏远，使他处于孤立的地位，郁郁不乐，又在世界大战中耗尽心血，于1919年8月27日死去。南非党公认只有一个人能作他的后继人：克利斯希安·史末资。史末资曾在英国战时内阁任阁员，同印度谈判订立协定，又是东非战线的总司令，当时在国际上已卓有声誉。

走向种族隔离

史末资上台后不久就面临一个依然尖锐的多年老问题：种族问题。1920年他试图采取措施。在大选时，南非党失去了原来的一些议席。因此史末资为保持议会中的多数，不得不拉拢布尔人

的国民党员;后者逐渐同南非工党接近,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法律（土著事务法),设立一个土著事务常设委员会,并在某些保留地设立非洲人地方会议。这就是“分别发展”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开端，即将发展为“种族隔离”。在此期间，又举行了大选。史末资的南非党增多了议席。他为了更加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建议英裔南非人的政党即“联盟党”同南非党合并,得到成功,从而史末资在议会拥有七十九席,而国民党只有四十五席。没过多久新议会便不得不处理种族问题。原联盟党党员都来自纳塔尔，对印度人问题的解决尤感关切。政府根据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又组织了一次印度人的“自愿”回国运动,另一方面拒绝给印度人以南非公民权，并禁止印度人在纳塔尔沿岸一个限定的区域以外取得不动产。1921年召开的有英国和各自治领参加的“帝国会议”对史末资施加了压力,但史末资对以上各点拒绝让步。

印度人问题争论未已而一个严重事件又使班图人群怨沸腾。在东开普的昆斯敦,有一个叫“以

色列人”的非洲人基督教派未得许可就定居在布尔霍克郊外的一块属于官产的土地上。警察企图把这些信徒驱走，但未成功。这个教派的“先知”伊诺克使他的门徒们相信，警察所以没有开枪是由于“以色列人”教徒刀枪不人。史末资在此次失败后派了一营警察去该地执行驱走非洲人的命令。这些教徒确信他们受到保佑不怕枪弹，便向警察发动进攻。警察冷酷地、有组织地向他们射击。有一百以上的非洲人死亡，[1] 几百人受伤。这场屠杀引起了激烈的骚乱。史末资被迫答应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对警察一无责难，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是如此；但终于对非洲人某些异端的教会给予正式承认。

对印度人命运的讨论和布尔霍克事件的发生已经使天空阴霾四布，而兰德的采矿业公会忽然又引起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当时利润迅速下降，公会要求实行自1920年以来一个专门委员会所建议的措施，这些措施因不得人心，政府一直拖

---

① 各种资料来源所列死亡人数不同，约在一百四十到二百人之间。至于所用警察的人数，据《南部非洲百科全书》说有四百人，《南非史画册》则认为有八百人。

延。这些措施规定取消原来招募非洲工人在地理上的限制（北边极限不得超过南纬廿二度），并废除工会与矿主关于凡较带技术性的劳动均由白人担任的“种族界限”协定。1921年末，矿主同工会的一次谈判以失败告终。不久采矿业公会通知工会说，它从此不再受“种族界限”协定的约束。

“穷白人”与革命的罢工

罢工发生了。在纳塔尔的煤矿和兰德的金矿，罢工迅速大规模开展。这些采矿业中的白人下层职工——关于黑人从此可以担任半技术性工种的规定，自然使他们最受威胁——很多都是阿非里卡人的后裔。这些“穷白人”出身农民家庭，在大战期间才来到大城市定居，因为文化水平低只能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他们很快地使罢工带上革命的色彩。史末资向来不大了解工会的思想状态，他宣称，希望业主同工人达成协议是个妄想，建议先停止罢工，等候政府研究这一问题。1922年2月13日一度关闭的各矿又重新开业。但工人们很快地模仿过去的布尔人战斗小组，组

织了“民团”，把那些前去作工的“工贼”赶走。德兰士瓦的国民党领袖提耳曼·鲁斯支持罢工，企图从中取得政治上的利益。新成立的共产党也宣称赞助罢工，虽然这次罢工明显地具有种族主义的性质。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多数工人产生了下面的想法：占领各矿，从而促使政府辞职，只在新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后才把矿产交还原主。3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大会上宣布全国总罢工，选举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作为工人运动的执行机关。3月10日行动委员会的“民团”占领了兰德所有的警察局，只有在博克斯堡的和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警察局除外。

史末资宣布戒严，并突然在夜间赶到约翰内斯堡处于包围之中的市中心，亲自指挥战斗。他动员了由“布尔公民”组成的合法民团和六队常备军，又从德班调来一团步兵，并把警察力量集中在工人阵地的周围。3月14日革命的罢工被粉碎。二千多工人被逮捕，二百人被杀，内有三十个非洲人，大多数是被罢工者打死的；一千二百人受伤。部队死亡六十人。镇压是极其严酷的。好几个带头罢工的人被处死刑。

这次革命罢工标志着南非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罢工证明对经济问题不能采用经济的解决办法，因为种族主义改变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在1924年因阿非里卡人同英国人关系紧张而引起的议会选举时，史末资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国民党的兴起

我们还记得自1910年以来，南非联邦各省在安排教育方面拥有近乎自主的权利。因此在学校中依旧教荷兰语或阿非里卡语以防止实现英国化的企图。1924年史末资本人力求提高中央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权力，交换条件是对省办学校增加中央的拨款。对他这意见赞成与否成了当时在德兰士瓦争夺瓦克斯特隆市议席的地方选举的政治背景。支持史末资意见的候选人在竞选中惨败。史末资气急败坏地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大选肯定了瓦克斯特隆选举的结果。联盟党大败。由赫尔佐格领导的国民党人上台执政，他们得到工党的支持；工党虽以英裔的克雷斯韦尔上校为首，但党员中也有不少阿非里卡工人。大选结果不但肯

定了阿非里卡人在教育方面保持各省的自治权，而且是全国对镇压兰德罢工的答复。

赫尔佐格一上台就准备为国营工业打下基础（1928年实现了[1]）和制定保护关税来推动当地的工业化，以争取它的盟友工党。然后，他就逐步地推行一个布尔化计划。但他注意不被人抓住辫子，便宣称：“如果想违背一大部分国民的意愿而强使南非（脱离英帝国）分立，这将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和一场国难。”他讲了这番话以后继续执行了一种毫不含糊的“阿非里卡化”政策。这种政策常常表现为一些近乎象征的姿态：于是从1924年开始南非邮票上就没有英国国王的像了（但在硬币上还有）；1925年赫尔佐格向英国国王“建议”不再对南非国籍的人加封为贵族，伦敦顺从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年，他使议会通过以阿非里卡语代替荷兰语为南非第二种正式语言。1926年他把在1874年至1878年一次大迁移中迁往安哥拉的那部分阿非里卡侨民接回国内（参看第十四章）。1927年经过长期的争辩后，他使议会通过一面新的国旗，和从1902年起成为全联邦国旗的

① 这就是南非钢铁有限公司的大冶金企业。

英国国旗同时悬挂。在同英帝国的关系问题上，他在1926年伦敦会议上使南非联邦的独立获得承认。1931年的威斯特敏斯特法令庄严地肯定了英帝国所有自治领的独立。于是赫尔佐格设立了外交部(1927年)和一些驻外机构(1929年)。

种族方面的立法更加强化

赫尔佐格在制定关于种族问题的法律方面也满足了他的选民的要求。从1926年起议会就通过法律，在工业方面设置了种族界限，并规定了黑人农业劳动者的雇佣条件。为了平衡起见，赫尔佐格又使议会通过法律，设立一个“土著委员会”，有权处理关于保留地的问题；另外一道法律授权政府购买土地，以扩大非洲人的这种保留地。

某些措施不会不引起工会领导人的强烈反响。1927年制定的“土著管理法”把权力授予保留地的传统酋长，但另一方面也有几处针对着非洲人的工会活动家；该工会名叫“产业工人和店员联合会”，共拥有约五十万非洲人会员，影响很大。照工党看来，这是个歧视工人的措施(那怕这些工

人是黑人)。工党宣布开除克雷斯韦尔上校和博伊德尔的党籍，这两人都是赫尔佐格内阁的部长。另外一个工党部长马德利仍留在内阁。但1928年马德利违反总理的意旨接见了“产业工人和店员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团，因此赫尔佐格把他免职。

此后不久总理解散议会。新的大选使他得到绝对多数，但赫尔佐格仍然保留克雷斯韦尔和另一个工党的叛党分子作为内阁的成员。此外他提高了政府关于禁止妨害公共治安的集会方面的权力(1930年)，从而更强化了种族歧视的措施。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欧洲人妇女，不受任何纳税额的限制。这条法律使当时对欧洲人血统的男性选举人还实行的纳税额的限制，很快地被取消，但对于极少数还享有选举权的开普省的非洲人，则依然要求需有若干财产才能列入选举人名册。

由此可以看出，赫尔佐格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已是马兰的先导者。还有一些更加强化种族隔离的法案也已在准备之中。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上南非当时的毁灭性旱灾使赫尔佐格总理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的问题。

赫尔佐格长期主张保留金本位，希望南非这个最大的产金国可以顶住危机。但到1932年末，德兰士瓦那个好闹事的国民党领袖提耳曼·鲁斯抛出了一个货币贬值的纲领，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南非的实业家们惊惶失措。资金很快外流到伦敦。12月27日南非银行被迫停止以黄金兑换纸币。

史末资—赫尔佐格联盟

赫尔佐格为了渡过危机，免于辞职，于是向反对派、即依然是史末资领导的南非党建议结盟。史末资同意进行谈判。他使政府同意暂缓实行最剧烈的种族隔离措施，和调整中央政府与各省的关系。在这些基础上两党结为联盟，最后合组了一个新政府。赫尔佐格仍留任总理，但内阁十二个部长中有六人从此属于南非党。史末资本人任副总理。政府成立后解散国会。1933年5月17日大选结果在议会一百五十席中两党联合阵线获一百三十八席。

此外，在新政府成立时，幸而巨大的经济危机

渐归消失。货币贬值大大地提高黄金的价格，从而使过去低估了含金量的新矿得以开发。充分的降雨量使农民又有了希望。加以财政部长哈文加善于利用这个情况好转的时机。不久乐观与繁荣又接踵而至。在取得成就的欢乐气氛中，结盟的两党领袖——两人都是阿非里卡人的血统——决定合并。1933年还未结束，新的"统一党"已经成立。但阿非里卡人中的强硬派拒绝追随赫尔佐格，拥护马兰为其公认的领袖（提耳曼·鲁斯由于他的阴谋活动把自己搞臭，退出了政治舞台），创建了"纯粹的国民党"，吸引去议员二十人。另一方面，有几个坚持南非联邦与英国应有密切关系的英裔议员也以斯托拉德上校为核心另成一派。但统一党在议会仍占压倒多数。

两党虽在1934年1月完成合并，但史末资与赫尔佐格依然有很深的观点分歧。史末资一方面承认南非有主权决定联邦是否积极地参加一场由英国宣布的战争，同时他又认为英国进人战争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南非联邦在法律上与英国的敌手断绝关系。赫尔佐格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另外许多国民党人不承认英王是他们的元首而渴望恢复

南非共和国。新成立的统一党党纲有一条规定，允许每个党员有权宣传自己的主张。英国政府还签订了霍耳—赖伐尔协定(1935年12月)，更给南非国民党人提供了攻击的口实。这协定事实上结束了国联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后决定对意大利的制裁。南非当时是支持实行制裁的，它并非出于对这个非洲帝国的同情，而是因为自己是个弱国，也会有一天受到威胁。英国政府甚至并未征求南非政府的意见就放弃了制裁，此事对史末资是个侮辱而对共和派是个鼓励。

这样，国民党人攻击有关“土著”的立法有了适当的气候。这些顽固的阿非里卡人早就想限制非欧洲人的选举权。赫尔佐格和他们想法相同，但限于宪法的规定，不能完全把想法付诸实施。宪法确实规定修改土著的权利须经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通过。但史末资及其追随者接受了下面的要求：把开普省一切有选举权的非洲人从共同的选举人名册中勾销，另列入一个特别名册；然后由这些非洲人选出三名欧洲人为议员来保卫非洲人的权利。另外一个法案规定购买土地以补充非洲人保留地，使保留地达到全国领土百分之十二。

这两个法案在1936年4月为议会通过。非洲人强烈抗议，但是无效。可是他们的要求却逐渐更加确切而且文字也较前写得好。这是由于有日益增多的班图人受到教育。虽然班图人在经济上确是落后的，但当时已经出现富裕的家庭，尤其是在大城市的近郊。大学教育并无种族隔离的限制，有一些年青的班图人在大学毕业，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表达班图人的愿望。在一个非洲人新闻记者约翰·顿果·贾巴武的推动下，在1916年已经成立了黑尔堡南非土著人学院。1930年一个班图人破天荒地被任命为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讲师。这就是布尼迪克特·维拉卡济博士，一个当时仅有二十四岁的祖卢人，后来不幸在1948年去世，死时年四十二岁。非洲人中还有一些牧师、律师和实业家。黑人中虽然产生了一些优秀人物，但这并不能阻止政府的种族隔离措施；史末资本人为了南非白人的团结从此也同意了这些办法。

纳粹的影响

种族主义不但针对黑人并且也反对犹太人。

在1930年赫尔佐格已使议会通过一道法律，虽然并未明言，实际是反犹太人的。法律规定对原籍东欧的移民需有定额的限制。这就限制了从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来的犹太人移民。但自1934年起对从德国来的逐渐增多的犹太移民，南非却无法拒绝，因为他们具有德国国籍。他们不受1930年法律规定的限制。1936年有二千五百犹太人就这样进人南非。一场反犹太人的浪潮席卷全国，尤其是在阿非里卡人中间，他们得到为希特勒掌握了的西南非洲的德国人组织的支持。南非政府通过一道法律，设立了一个“局”，专门负责控制从英国以外的地方来的移民(1937年)。这道法律有条规定说明了它是反犹太人的，该规定禁止移民更改他们的姓名（以便可以在必要时查出谁是犹太人)。

纳粹和法西斯思想的渗入还有其他迹象。赫尔佐格政府国防部长奥斯瓦尔德·皮罗夫本人就领导着一个叫作“新秩序”的法西斯性质的运动。阿非里卡人的组织“防火车组织”虽然自称首先是保卫阿非里卡人的利益，但也流露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特点。这个组织成立于1938年，只是到

了1942年由于其成员采取了过于明显的亲德态度，南非政府才声明不支持这个组织。过去的叛乱分子马里茨也成立了一个反犹太人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幸而经济上的繁荣使这些组织不能集聚大批不满现状的人。另外，经济繁荣却使阿非里卡人迅速地由乡村流入城市，从而发生了一个新问题：白人贫民问题，这些人不能适应迅速城市化的情况。那些阿非里卡人的文化团体在1937年创办了一种救济基金，[1]以防止这些不适应环境的白人的贫困化。由于募集到的款项很大，不久这笔基金就超出其原来的目标而改向保险业、银行和储蓄所投资。现在南非的最重要的银行之一、福尔克斯卡斯银行就在这次运动中诞生。这次运动打击了英国人独霸南非的最后一个堡垒——金融和工业的堡垒。

1938年的选举证明统一党仍然得到群众的拥护，虽然它在议会里的多数稍为减少：在全体一百五十三席中得一百十一席；国民党仅得二十七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赫尔佐格和史末资的联

① 1937年适为"大迁徙"一百周年纪念。在当时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救济基金一开始就获得很大的成功。

盟突然结束了。总理主张南非中立；史末资坚持同希特勒德国断绝关系。议会赞同后者的意见。1939年9月4日议会以八十票对六十七票通过参战。赫尔佐格辞职，愤然回到自己的农庄，于1942年死去。过去的国民党人有的加入马兰博士的党，有的团结在哈文加的周围，在1941年成立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新“阿非里卡人”党。

第二十一章　史末资的胜利和倒台

1939 -1948

对南非历史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方面的意义不如它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大。除去潜艇战以外，南非是远离战场的。但是，按照史末资的意愿，南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以便在胜利时刻来到时能以胜利者的资格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正如二十五年前的博塔一样，史末资明白许多阿非里卡人是不大愿意参战的。因此他对在国外的作战避免使用义务兵役制的办法而仅限于招募志愿军。凡愿到非洲以外作战者都须宣誓，并领取一种特定的徽章。招募的部队总数近三十五

万人，包括妇女在内；部队中还有几万非洲人和混血种人。按照固定的习惯，班图人不能当战斗人员，他们只能充任司机、厨师、修路工人等，而混血种人则被派往中东作战。

南非部队参加了埃塞俄比亚的战役，由皮纳尔将军指挥，俘虏了八万意大利人。他们在利比亚战线上失利，在轴心国部队重占托卜鲁克时(1941年6月)，由克勒佩尔率领的一万南非士兵被俘。南非部队在改组后参加了意大利战役。同时在1942年普拉特将军的部队占领了还服从维希政府的马达加斯加岛。

这些远方的战役在国内很少反响。反之经济方面的变化则是显著的。在1940年政府成立了“工业发展公司”，由国家大量投资。这个公司以其建议和投资推动最有用的工业的发展。由于潜艇战争造成了运输上的困难，促成了南非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产品例如小麦的增产。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革命，但只在1945年后才为大家所察觉和从数目字上表现出来。但经济革命已在战时打下基础，那时不得不发展所有的经济力量以应付战争的需要。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黑人工人开始作为庞大的后备军流往城市，聚集在兰德、德班和开普的贫民窟。任何人也来不及使这一大批人有次序地流入城市，更无法加以阻止。这种情形也有好的影响。白人同非欧洲人两者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别有稍稍缩小的倾向。战前赫尔佐格—史末资政府接连通过了一系列的限制非洲人的法律，但在战时则不得不暂停一下，并使大家有个考虑问题的时间。正是由于战争，那些非欧洲人看到以下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南非政府在国际上为反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而作战，并且解放了象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一个非洲国家，但另一方面它又拒绝把最根本的权利给予它本国的大多数人民。卢图利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战争使我们意识到整个世界上和我们非洲大陆上的积极力量。"

对极端分子的让步

在非洲人当中出现这种重要的心理变化时，在欧洲人自己之间也发生了新的冲突。赫尔佐格已被排除于政府之外，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阿非

里卡人的想法同他一样，或者表现得比他还反英，从而间接地讲，比他还亲德。史末资所采取的国内治安措施只能更加激起那些强硬派的民族主义感情。政府确实下命令解散了一些组织，把很多德国人拘留起来，把一些不可靠的官员免职或调离。精明的史末资知道这些措施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同时又允许一个特设的组织“德非救济委员会”去照顾被拘留的德国人的福利。1945年他甚至允许这个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募捐以救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德国。阿非里卡人表现得十分慷慨，截至1955年，这个委员会共汇往德国一百五十万英镑。

对阿非里卡极端分子的这些让步并不足以避免他们同“亲英派”间发生一场新的对立，“死硬派”很错误地把史末资本人也归入亲英派。其实阿非里卡人从史末资那里得到很多好处。史末资毕生努力推动南非逐步向完全的独立发展。他的当政起着一种“安定人心”的作用，平息了激动的英国舆论，而且使任何反对南非与前宗主国的关系必然渐趋松弛的人都无能为力。那些民族主义分子最后只要把史末资本人推翻，就可以承继一

个已经准备好照他们意图行事的国家。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已经接近了。1943年的大选使这位年老的元帅最末一次担任总理。

不错，战争的结束确使南非联邦成为战胜国之一。但和平并未使民族主义分子得到任何满足，也没有给史末资带来多大报酬。重新适应战后的生活引起费用上涨。1946年发生了一次大罢工。在兰德再度出现流血事件，有五人死亡。班图人思想状况的改变，对于那些无忧无虑的欧洲人说来，更富有威胁性。在1936年成立的非洲人咨询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是相当听话的酋长，从1946年开始对政府关于种族问题的立法拒绝表示意见，直到1953年委员会被取消为止，它总是采取拖延的态度。与此相反，非洲人国民大会则表现得更积极，它的组织也更有实效。

在西南非洲的全民投票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非联邦远未能按照它的希望兼并西南非洲，而是看到联合国成了国际联盟的替身。史末资这一次在旧金山起草宪章时依

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有人要他考虑把西南非洲改为托管地时，他先是主张必须征询当地人的意见。在这以前，他许诺暂时按照“委任统治的精神”管理该地。对于西南非洲的欧洲人说来，征询他们的意见毫无困难。在战前他们已经要求合并到南非联邦。1943 年他们曾再次提出要求；这一次他们只是重提同样的要求而已。至于非欧洲人，行政当局很快地——有人说是匆促地——组织了一次全民投票：208,850 非欧洲人投票赞成合并，33, 520 人投反对票，[1] 56, 870 人未能参加投票。批评南非联邦的人指出，这次全民投票丝毫没有公正进行的保证。投票完全是在行政当局的控制下进行的，而当局目的在于合并，这是尽人皆知的。

另外有一个更客观的因素使人对投票感到怀疑。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计算有二十九万多的非欧洲人具备参加投票的条件呢？1946 年非欧洲人总数大概不超过四十万人。1960 年的人口普查才只有四十五万一千人。在不到四十万的总人口中就有二十九万多人参加投票，这就意味着不但包括

[1] 行政当局承认，赫雷罗人集体投票反对合并。

所有成年妇女在内，而且大概连不少未成年的人也算进去了。总之，关于这次全民投票有效与否的争论，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说照南非政府看来，西南非洲的非欧洲人有能力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作出判断，那么为什么这同一个政府却剥夺了南非联邦的班图人的选举权呢？但同一论据也可反过来驳倒那些对史末资提出批评的人，他们强调说投票结果毫无意义，因为那些非欧洲人的大多数根本不知道人们要他们干什么（这就是鲁恩·弗斯特在其《西南非洲》一书中的论据）。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够要求把选举权给予南非的班图人呢？

可见西南非洲的全民投票远未能澄清局势，反而只是把事态弄得更加混乱了。总之，联合国对这次投票并不认为有多大意义。反之联合国却听取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的意见。此人是那些主张西南非洲完全脱离南非者之一，他是迈克尔·斯科特牧师，曾在赫雷罗人的住区旅行过好几个月，搜集了他们对兼并西南非洲的各种主张的抗议。因此1946年末联合国大会以三十七票赞成通过决议，拒绝了南非兼并西南非洲的要求。有

九国弃权，无反对票。随后联大要南非提交一个关于托管协定的草案。史末资并未照办，但翌年他向联大提交了一份关于上一年度管理该地的报告，并通知了那些阿非里卡民族主义分子。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就在开普的议会再度要求兼并，并且警告政府注意“这个大部分由亚洲国家和象拉丁美洲那许多混血种人国家所组成的联合国的危险性”(引自埃里克·卢夫的一个很使人注意的演说)。史末资不但对联合国组织表现得“软弱”，而且照这些人看来，还犯了“错误”。1947年史末资接待了英国王室的访问，此事引起了“共和派”相当强烈的反应。

马兰战胜史末资

当时在世界上——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享有很高威信的史末资元帅，虽然本人没有怎么感觉到，但已经逐渐破坏了自己在南非政权的基础。他的亲英政策、他对那些在战时被疑为不忠诚的南非人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对外政策的失败以及班图人代表的挑衅态度等等，这些

因素加在一块终于使马兰博士领导的那些不妥协的阿非里卡人的政党取得政权。在1948年的整个竞选运动中，马兰主张在国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对外实行完全独立的政策。正是在这个时候“种族隔离”一词才为国际上所通用。史末资到最后承认了以色列国，企图以此争取在兰德人数很多的犹太人选民。但当1948年5月28日大选结果揭晓后，战胜者和战败者都普遍感到意外。谁也没有料到国民党会取得多数。可是由于马兰的“国民党”和赫尔佐格将军过去的战友哈文加博士的“阿非里卡人党”结盟，这一情况确实出现了。马兰得七十席，哈文加得九席。史末资的党仅得六十五席，它的盟友工党只得六席。即使假定代表非欧洲人利益那三个当选议员同反对党站在一起，那些“强硬”派的阿非里卡人仍有几席的多数。史末资失败得最惨的是：他在二十四年中连续当选为代表的选区斯坦德顿这次也没有选他，却选出了一个不知名的国民党人作议员。

当然，马兰的胜利只是在席位上占多数，而不是得到的总票数。统一党得到的票数比国民党多十二万五千票。但按照宪政的常规，统一党仍须

退位。统一党认为可以告慰的是，国民党仅有微弱的多数，因此马兰当总理后会表现得温和些。可是事实正相反。马兰觉得自己为群众潮流所拥戴，猛力开始推行他的“种族隔离”纲领。不久有六名代表西南非洲的议员进入南非联邦的议会，他们都是国民党人；马兰在议会中的多数又扩增了。

我们可以说，随着马兰的上台，“阿非里卡主义”对英国人进行了决定性的报复。自那时起不过十二年就连过去的布尔人国家的名称都恢复了。1902年在韦雷尼京和约时断掉了的线，又由“南非共和国”给连接起来了。不但如此，现今的南非还可以追溯到一、二百年以前，从昔日的叛乱分子组成的格腊夫赖内特和斯韦伦丹两个共和国中找到它的“前身”。

第二十二章　一个“工业巨人”的诞生

1939—1960

当史末资不得不下台时，他把一笔复杂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后继者国民党人。在1948年大选的胜利者所嫌恶的时期内，南非仍然从“不发达的”阶段达到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地位。这并不单是那些政界领导人的功劳。远非如此。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局势也促成了南非这种深刻的变化。可是，如果南非没有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资源，则变化亦不可能出现。南非这些资源，以前由于阿非里卡人的地方主义和英国实业界过分的专业化而很久未得开发。

直到1939年，南非政府主要为了捞取选票，其关心的重点在于使农民大众能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在这一点上史末资的阿非里卡人特色并不亚于赫尔佐格——

对本族人的形象总是保留着浪漫主义的色彩，把他们一直看作是农民，专事耕耘，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大战以前很久，事实证明这种形象就已过时。"白人贫民"问题也说明了时代正在变化。史末资—赫尔佐格时代的一部分种族主义立法的起因正是为了保护城市中的白人贫民和对付有色人种——混血种人、印度人或班图人——的竞争。

战争带来的好处

战争发生后，南非不得不迅速地使其经济适应战时环境。"轴心国"在大陆上的敌人的崩溃不久就使英国在欧洲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对英国来说，南非成了一个虽然遥远但极为重要的根据地。南非急忙发展煤炭生产，这比较容易，也不需要有很多专业工人。以后又制造简单军用品，例如小口径武器，必要时只好放弃工业中的民用生产。修理船只成了另外一种重要的活动。

同时农业生产也得到推动，因为南非必须对英国和盟军提供一部分给养，尤其是提供罐头食品。于是罐头业也"繁荣"起来，只是由于南非无

法供应足够数量的马口铁而受到限制。战争一开始，史末资就特设军需总监一职，任命范德拜尔担任。此人是最擅长组织工业的专家之一，也是南非联邦经济革命的一个缔造者。早在1941年，由于工资增加和领工资者的人数增长从而有大量通货投入市场，就已不得不控制民用经济以限制消费的迅速提高。

这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急剧变化也影响到过去一直在城市里充当"季节工"的非洲工人。由此开始迅速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非洲人工会运动。南非政府虽然受到阿非里卡人的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批评，它在第一年还是努力同这些工会保持正常的关系。在有决定意义的1942年，一阵罢工浪潮促使史末资宣布一切罢工为非法。到1943年政府甚至禁止在采矿区举行二十人以上的集会。从此工会运动的开展受到阻碍。

这时，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几乎已无问题，然而人们预料日本会长期抵抗。因此一点也没有减缓生产的速度。可是也要准备迎接和平的到来。史末资亲自过问此事。他了解到由战争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在纯属经济方面，也应当考虑整

个工业装备的更新问题，因为这些装备已经出现陈旧不堪的现象：在1944年政府已不得不减少公共汽车的班次以延长陈旧汽车的寿命；铁路运输网也仅仅勉强维持现状，因为铁轨和车辆的更换都有困难。

由战时经济过渡到和平生产与工业化

1945年5月8日战争已打到本土而无力抵抗的德国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使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后不久，日本也被迫乞降。战争终结后就是重新建设的时代。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经济的转变、在不损及国内市场的条件下推销战时剩余物资、为大批住进城市的工人修建住房、供应长期以来进行配给的消费品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缺乏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是个障碍。幸而有不少英国人由于长年处于经济管制和危险之中，战争一结束就逃离狭小的祖国而来到南非寻找出路。这样南非联邦就得到了一支难得的支援力量以继续发展它的

经济。

因此，在大战期间已经开始、而常常是应当时急需、仓促进行的南非工业化，事实上从1945年开始就加快了。国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试举一例即可说明。自1930年到1940年，国民收入从稍多于五亿兰特（二亿五千万英镑）增加到八亿。自1940年到1950年，从八亿兰特一跃而超过二十亿。

在以后几年中增长的速度更快。只是在1960年有一度停顿，那是由于沙佩维尔事件①使资本家突然失去信心。但自1962年起外国资本又大量流入南非共和国。

整个这一经济演变的过程是同南非的政治演变有密切联系的。因此虽然我的叙述可能把时间先后次序打乱，但先简单介绍经济发展过程是有用的。读者以后对南非在政治上的演变就更好明白了。

---

① 1960年3月一个以反对"通行证法"为中心的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在德兰士瓦洲的沙佩维尔镇爆发。南非政府对参加示威集会的非洲人进行镇压，打死打伤了二百多人。事件发生后在各大都市有五十万工人罢工，使许多重要工业区和码头经济活动基本上陷于瘫痪。——译者

当1944年—1945年"繁荣"开始时，南非也同任何现代国家一样，力图扩展它的经济基础，目的只在增加它的财富。当时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再者，南非确实也给外国的投资者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远景，即以劳动力而言，南非就有很多低廉的劳工，而且在法律上丝毫无法用罢工的传统手段争取改善待遇。此外，南非的自然资源也是吸引外资的因素。南非拥有全非洲已知的煤蕴藏量的87%，产量的80%，从而它可以比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更低廉的价格提供电力。兰德和奥兰治自由邦开采的黄金占整个自由世界总产量的66%。南非还拥有大量其他重要矿藏：在吕斯腾堡地区有白金；在北德兰士瓦区和西南非有铜；另外还出产锰和铀。铀在那里是黄金的副产品，成本很低。

随着非洲在政治上的觉醒，南非的领导人看到对种族隔离开始有了敌视的反响。这是加速国家工业化的新的理由。他们由于在舆论方面逐渐陷于孤立，就想把国家变成一个对外能抵抗任何经济制裁、对内能镇压任何反叛活动的堡垒。为达此目的，当然必须使生产多样化，尤其是在军事

生产方面。经济问题因此变成政治问题了。随着种族隔离政策的逐渐强化，随着南非先同非洲其他部分、接着同各大国际组织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南非便日益热衷于设法充实它的生产设备。政府采取了国外和本国联合投资的办法，得到了不少外国的技术专利权。即使将来遇到资金外流——而且采取1960年到1961年那样的立法措施也可很快地制止——制造产品的方法是走不掉的，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没有多大效果的制裁

南非担心别人会真正采取经济上的报复措施强制它放弃种族歧视，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1962年11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向会员国建议不在南非投资。翌年(1963年8月7日、12月4日和1964年6月18日)，安理会敦促各国政府停止把制造武器的专利权卖给南非，不再帮助南非生产军用飞机、车辆和军舰，拒绝对其武装力量提供训练上的方便以及不同这些武装力量联合演习。英美禁止了武器的输出；有几个国家也

随后宣布了禁令。至于非洲国家，它们更进一步地禁止南非的民用飞机经过他们的领空，不许其船只在他们的港口停泊，原则上决定断绝贸易关系。

应当承认，这些措施一点也没有损及南非的经济潜力及其军事力量。这些措施采取得太迟了，不能使南非感到震动。况且措施的执行也很不切实。在为联大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准备的一个报告中，报告员尼泊尔人克哈特里确认，从1962年起南非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又在加速进行，外国投资大量涌入。各国都有投资，首先是英美。法国主要投资于汽车制造业，在其他大部分工业部门没有投资，大概是因为资金不足。在联合国作出建议以后，德国、意大利、瑞士、加拿大和日本都在南非投资。1963年南非行政和商业研究所所长得意洋洋地宣告，与上一年度比较，当年向南非投资的外国公司多了两倍。人们还鼓吹在“班图”保留地边区的工资特别低，吸引了某些公司在那里开设，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嘲弄。比勒陀利亚政府一方面一再地说不把工业集中在大城市是为了加速班图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把居住在保留地

的班图人生活水平低作为理由去吸引外资。

固然在军事生产方面，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实行了禁运，但并未因此形成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压力。南非现在几乎能全部自造它的军需品、轻武器、甚至飞机。况且有时也难于区分联络用的飞机和轻便的战斗机，后者正是南非最需要的，因为南非政府的战备并非是为了同非洲以外的敌人进行正规的战争，而是为了镇压国内的民变或防止非洲邻国的渗入。

无论从生产的数量或品种、国民收入或个人平均收入来看，非洲其他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在内——都只是些力量薄弱的对手，还不能在经济上同南非抗衡。南非在非洲真正可算是一个“经济巨人”。国民党领导人正是依靠这种现实，从 1948 年开始极其严厉地推行他们的种族政策而毫不动摇。现在我们说一下走向种族隔离的几个阶段。

第二十三章　走向种族隔离

1948　1965

马兰政府很快把他向选民承诺的政策付诸实施。这个政策用一句话来概括，曰种族隔离(apartheid)。阿非里卡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译为种族隔离是错了，他们说这个字的原意应当理解为“分别发展”。但不论怎样翻译，这个字着重说明一个意思：全面分离。最近公布的依照种族隔离政策制定的最初的一道法律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种族的人们间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在阿非里卡人看来就仿佛同原始时代的禁忌一样，即使最不敏感的人也是如此。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再没有比这个更足以说明种族隔离具有出于本能、无法用理性来说明的性质。如果想只靠推理或从白人能得到物质利益——当然他们确得到过分的利益——方面去观察，那么对种族隔离是无法理解的。

这样抛出了新的政策以后就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勒祖尔把这些法律很正确地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关于警察镇压和政治统治的法律；

——旨在物质和文教方面进行种族隔离的法律；

——在以上限定的法律范围内发展非欧洲人团体的法律。

从1948年以来有过三次大选（1953年1958年1961年），换过三次内阁：斯揣敦代替了马兰博士，而维沃尔德先生又接替了1958年死去的斯揣敦。在此期间甚至还改变了宪法，把一个王国改为共和国。但这种种变化都未能使1948年确定的种族政策有所改变。相反，每次大选都加强了国民党的地位（1951年阿非里卡人党与国民党合并），而且历届总理都不断声明他们绝对恪守种族隔离的原则。他们在愈来愈明确的范围内推行这个原则时，从来没有对其事业的不可置信的困难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时常自称是怀有非成功不可的"顽固"意志的"狂热信徒"。因为他们坚信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政策可以代替。因

此，自1948年以来种族隔离政策就象雪崩一样愈益扩展。

首先是镇压

旨在镇压的主要法律，大概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0年)。这个条例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是如此的广泛，事实上任何人如果对政府的政策批评稍为激烈，都可用此罪名起诉。另外规定了一个有危险性的措施是，只要怀疑某人是共产党员，就可提出控告。最后，条例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权力；行政机关可以不经过法院审判对被指名为共产党员的人采取各种行政制裁。那些最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当然指出，这道法律原则上说是为了保卫“文明和民主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事实上则摧毁了民主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确导致了行政机关的绝对专断，而这正是与一般所谓的“文明和民主的”生活背道而驰的。

其他法律也相继制定，使镇压有了更多的武器。例如在1952年非欧洲人开始举行消极抵抗运动，在此影响下1953年通过了“犯罪行为法”

和"公共治安法"的修正案。另外还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者通过"独立宪章"后，政府颁布的"暴乱集会法"(1956年)，以及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而制定的关于非法组织的法律(1960年)。

最后，1963年在帕尔和特兰斯克发生流血事件后又通过了一道横暴的法律。根据此法，内政部长可把任何嫌疑犯关押九十天而且可于期满后再次采取这一措施。因此有的被告在拘押后经法院判决释放，但由于行政机关的一纸命令又立即入狱。这样的法律规定确实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是人权的保障者"的传统概念。法官本来由于象"共产主义"或"颠覆活动"等名词定义过于空泛已感到棘手，现在终于完全起不了作用而让位于掌握内政部这个关键位置的政界人物。

只在一点上国民党政府表现得比前几届政府宽厚一些。它废除了禁止向班图人出卖烈性酒的法律(1961年)。但这种宽厚表示的原因仍值得怀疑。照官方的解释，这是为了使警察能腾出手来致力于更重要的任务。政府早在1928年就说过禁卖烈性酒的法律是为了保护黑人的健康，现

在它自己间接地承认，黑人的健康对它说来并无多大重要性。这也等于供认过去法律的制定远不是为了关心保健问题，它本来是提供一个方便的办法使警察得以合法地在任何时间闯进任何非洲人的住宅进行搜查和“核实”，而搜查的范围远远超过是否私藏烈性酒的问题。自 1948 年来通过的镇压性法律对搜查住宅提供了其他合法的根据。因此就不必再利用搜查有无烈性酒这种机会了(说这种借口岂不更恰当吗?)。这个例子本身似乎是次要的。但足以说明一个法律现象如何会被一个不敢对其目的直言不讳的立法者所歪曲。当然在不少自称民主的其他国家里，其行政机关也采用同样的手段。我们不必列举实例了。但象南非立法者在起草法律时就这样自己要两面派却实在是少见的作法。对这道法律之滥用只能使南非的非欧洲人产生和怀有普遍的不安全感。

组织上的隔离

在制定镇压性质的法律后，政府极力采取措施将种族间的隔离正式规定下来；这种现象早就

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而且为赫尔佐格执政时代的立法所加强。在这方面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1951年通过的"集团住区法"(关于住区隔离的规定)。根据此法，市政府有权依种族之不同把市民住区重新划分为某某种族专用的几个特定区。这条法律也附带地帮助清除了由于战争期间及战后迅速工业化而产生的大"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早就被国民党人看作是闹事的中心地带。事实是有些年青人的无赖集团比如"曹吉斯分子"在那里招募同伙。另外在那里也有一些地下的酿酒厂和很多妓院。最后这些地方的贫困和难以置信的人口过多成了政治骚乱的理想场所。在战后复活的政治骚乱在那里愈演愈烈。虽然南非政府难于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笼统地说成是一个不体面的人的组织，但该组织确在那里收罗了积极分于并找到领导人：那些为贫民窟的污秽贫困的情景所激动的牧师、小学教师等。

在大都市中排除贫民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有某些非欧洲人取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是合法的土地所有者。但他们的地产在此情况下依然很快被没收；赔偿金也不总是迅速

和全部交付。保罗·季涅夫斯基曾举了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个成为"集团住区法"牺牲品的开普省混血儿被迫离开三十年的故居，迁到专供混血儿居住的"另一区"。对他的故居，市政府估价为四千三百英镑，而执行"集团住区法"的机关只估价为二千英镑。即使假定他能够以高于二千镑的价格出售他的房屋，对超额的部分他就要付出百分之五十的罚金。如果售价低于二千镑，对差价他只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的补偿。不论情况如何，他的不动产总要损失一半。

当然政府也创建了一些新区。例如在名字带有田园诗味道的米多兰常常被称道为兰德市的模范郊区。低估政府开办这些"新村"的巨大努力也是不对的。有一个极为主张种族隔离的理论家范·德·默韦甚至还因此责难政府。他指出，住在这些新区的非洲人失去了部落观念，说一口四方杂凑的通用语，产生一种新的心理状态，这样就使他们不能适应种族隔离的其他后果，例如他们在法律上仍然处于部落的范围中、或者（在失业时）他们要被驱回保留地。

尽管政府在住宅方面有很大的建树，但人们

常常忘记，由于新的郊区距离工作厂所过远，几千非洲人不得不乘坐公共汽车去上工，而过去他们是步行，其中最有钱的骑自行车。对于那些工资收入已经非常接近最低生活费的人，这种新的负担在很多情况下就会使之经济拮据变为赤贫。1956 年在兰德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就可明显说明这一点。这是班图人很少有的群众运动之一，而且以胜利结束。在公共汽车稍稍提高票价后，工人们决定加以抵制，改为步行。这就意味着很多人除每天八小时工作外要步行二十到三十公里。当时工人们成立了一些小组以便集体地向几个有钱人借用汽车或小卡车。艾伯特·卢图利讲到这段故事时，也叙及当局企图用捣乱的手段破坏这次抵制运动。警察把自行车的轮胎戳穿，或者对汽车进行长时间的搜查，故意耽误工人们的时间。当时也还有白人用自己的车载运工人，他们也被当局多方留难；但对当局这种行为，人们却无法直接地指控为滥用职权。

集团住区法最末一个后果是绝大部分靠经商为生的印度人特别受到打击，强迫他们聚居在一起，便使他们大部分人都破了产。这好象也是这

个法律的目的之一。政府显然希望，印度人会象法律所规定的那样，要求政府津贴他们回国。但它算计错了。从1946年直到1960年，在此情形下被迫要求回国的印度人还不到一千人。[1]这使南非政府得以肯定地说——他们并未说错——过细地衡量一下，印度人在南非比在本国生活得好。

种族区分的标准

自然，集团住区法如果事先对各种族没有一个精确的普查是无法推行的。因此必需规定种族从属的标准，1950年的一道法律对此加以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政府有权改变某人从属于某某种族。这种改变只是例外的情况，但确实有过；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决定对那些“被除名的”人会引起多大的悲剧。某一个白人可以忽然被宣告为“混血种人”并因之遭受一切后果：失去自己的住宅，失去原来的工资，朋友们都不再同他来往等

[1] 1949年在德班发生非常严重的骚乱，有一百四十个印度人被班图人杀死；此后政府想利用这次事件对精神上的冲击促使印度人加速回国，把归国津贴由二十英镑提高到四十英镑。但又一次落空，当时仅仅有二百九十个印度人回国。

等。著者在南非一次旅行中听人说有两兄弟，一个被认为是白人，另一个却归入混血种人。当然无法核对此事的真相，但出现这种情况却绝无足怪。这因为划分某人应属某某种族的规则极为简单，毫不科学，而且执行的人又可能是对这种工作没有起码常识的人。保罗·季涅夫斯基曾举了斯瓦次博士的女儿的例子：斯瓦次是混血种人的一个重要领袖，他的女儿一直到1950年都被看作是白人，后来却又被划分为“混血种人”。任何人进入南非时都要填写一个表格，表格上应填的项目又是“人种”、又是“种族”、又是“语系”，由此即可看出他们对这些概念是多么混乱不清。

根据1952年的另一道法律，非欧洲人被发给一个简化的“护照”以代替过去的通行证，到1956年这办法也适用于妇女。在这个新的证件注册中，除去注明所属种族外，还包括最近的房租收据和雇主所开的工作证明书，证件随时可以检查。政府把这项改革说成是减少了非欧洲人应办的行政手续。事实上证件册中第二和第三种证件远非为了检查某人的收入和其纳税的情况。的确，离开保留地来到城里生活的班图人只在有正式工作时才

能留在城里。一旦失业就必需在三日内告知当局。他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就有被遣返保留地的危险，而由于保留地地区的贫困，他在那里找到工作的机会是很少的。尤其是在1953年发表了"福利事业隔离法"[1]以及政府努力对保留地"重新殖民化"后，这种遣返原地的措施执行极为严格。这是使南非的非欧洲人产生不安全感的又一重要因素。

班图人的权利

按照老习惯，政府也拿出一些东西作为这些新限制规定的交换品。有一道法律规定提高非洲人在"新区"的权利。[2]他们可以在那里参预市政的管理。但这些权利是按照居民属于某某部落来行使的，而部落的观念常常已经削弱了。1953年在重新安排班图人的教育时，政府规定在小学按照学生所原属的部落来招生。[3]当局宣称法律的

(1) "福利事业隔离法"规定白人与非白人间在交通、公共场所等等方面的隔离。——译者

(2) 这一点也为范·德·默韦所激烈批评(见前)。

(3) 主要被承认的部落如下：科萨人（三百八十万人），祖卢人(二百五十万人)，苏陀人(一百万人)，茨瓦纳人(八十万人)。

规定是保证教育为班图人的各集团服务。另外，这次改革取消了对教会学校的补助，因为后者不肯把校舍租给政府。政府说，由于绝大部分教会的总部都在外国，因此这些学校的教学时常产生一种不良的教育环境。学校的利益同非洲人利益之间很少有所配合。[1]恰恰相反，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则说这是由于政府不欢迎基督教是为拯救整个人类而不分种族的教义（各基督教派中只有“荷德改良派”和“荷德改良教会”不信仰上述教义，两者本质上都是阿非里卡人的）。这种反对论调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天主教高级机关拒绝停办自己的学校，宁愿不要国家的补助。圣公会教徒也对这个规定班图人教育的法律提出强烈抗议。

这个法律对大学教育的改革也受到同样的批评，说这种教育纯为实用主义，是专门为了实现种族隔离而不是为班图人服务的。在这些反对政府措施的人看来，一个单纯以实用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就不成其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本质本来就

---

① 参看《班图各部族成为国家》一书，新闻部出版，无出版日期(1962年?)。

是"要求全面发展"。政府对此回答说:"政府的政策是为班图人建立能够培养为其民族发展所必要的技术人材和知识分子的大学,"① 因此便否定了所有西方国家一般公认的开办大学的普遍原则。于是又回到我们上面已提过的矛盾状况:一个高唱以保卫西方文明为其最高职责的政府,由于其"保卫"行动竟然否定了西方文明的某些重要方面。

还必需说明,自1958年以来,根据法律成立的班图人各个学院,照官方发言人的说法,还不是一个完全名副其实的大学。"这些学院终将成为名实完全相符的大学",② 而现在还不是。但同时,从1956年起"白人"大学就已拒绝招收非白人学生了,而新成立的非洲人学院显然又不能接受所有愿意或能够继续升学的学生。这就说明了那所"南非大学"的极为奇特的重要性,它是一所"函授大学"。在1960年它有一千一百七十一个学生而其他各大学(开普、纳塔尔医学院、威特沃特斯兰德、黑尔堡、北方学院、祖鲁兰学院)一共才有五

①② 参看《班图各部族成为国家》一书,新闻部出版,无出版日期(1962年?)

百九十个学生。同样意味深长的是，1958年的法律又规定对班图人的教育自此不属教育部掌管而由另外一个部门来管理。

在上述的"隔离"措施中，没有一个直接关系到非欧洲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的确，从1910年起他们的政治权利就极为有限。上文已提过，在1936年史末资—赫尔佐格政府曾规定，开普的班图人有权在某些财产限制条件下选出三个白人作为代表他们的议员。[1] 对这些选举人另立一个特别名册。混血种人则在开普继续列名于共同名册里参加选举。那些强烈主张种族隔离者认为这种情况不能接受。1951年马兰政府想排除混血种人于共同名册之外，使他们处于同班图人相近的地位。但他为此而提出的法案仅得到简单的多数。某些有选举权的混血种人于是就提出根据1910年的宪法规定，对"已经确立的条款"的修正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而选举权即属于此类条款。混血种人提出的这个控诉经南非最高法院判定是有道理的。结果法院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场长期的争吵，政府想在其措施的合法性上面玩弄手段

(1) 1959年班图人自治法通过后，这些议员就取消了。

而始终未敢公开违反宪法。为了对付最高法院，政府建议将最高法院的职权移交给议会。但这个企图失败了。最后斯揣敦用了一系列的“操纵手段”，终于获得胜利。到1953年，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已大大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西南非洲的四个参议员和六个众议员进入议会）。既然这样还不足以构成希望得到的多数，1955年便通过一个法律，将参议员总人数增至八十九人，把混血种人从共同名册中“除名”的法案才终于通过。这个措施有一个相应的补偿：混血种人被允许单立名册选举四名白人众议员；另外在1958年还任命了一个参议员以保卫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运用了即使不是违反宪法条文、至少也是违反民主精神的手段再一次取得胜利。

最后在1956年政府决定凡不接受在其内部实行种族隔离规定的工会不得享受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利，一个经常在遵守法律和独断专行之间不断摇摆的政府采取这样一个决定亦不足怪。这也并不意味着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的黑人工人就能享受这种权利。无论如何，非欧洲人是没有罢工权利的，因之他们即使可能谈判订立集体合同，也

缺乏这样一个主要的武器。

种族隔离的样板

种族隔离政策除表现为镇压和隔离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对班图人政治和文化单位的“建设”。1951年通过了关于班图人行政建设的第一道法律。法律规定设立一系列的立法会议，从基层的部落立法会议直到地区立法会议，后者是一个近似国家议会的先声。但立法会议的成员实际仍由行政当局任命。1956年在开普省同纳塔尔省接壤的一个班图人地区特兰斯克首先被允许设立地区立法会议。1959年通过了一个提高班图人自治地位的新法律。特兰斯克于是有了一个连议长也是班图人的立法会议。1962年又有进展：特兰斯克的立法会议通过了“宪法”，根据“宪法”设立由“总理”(当时是酋长凯泽·马坦济马)领导的政府和由一百零九人组成的立法会议，其中四十五人由直接选举产生，其余六十四人以酋长身分作为当然成员。该会议有一般立法权，但需经南非共和国总统批准，而且国防、外交、内部安全以及

某些司法和运输问题仍由比勒陀利亚中央机关直接管理。中央政府在特兰斯克有一个"总专员"为代表。1963年5月29日南非政府批准特兰斯克的新宪法。

按照种族隔离的理论，原籍特兰斯克的班图人即使住在"白人区"城市的"特定地"，都可在自治区的选民名册上登记。差不多有二十万特兰斯克居民要求登记。人头税以及在当地征收的一切赋税都送交特兰斯克的金库。1961年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贷款和一个叫"班图托拉斯"的特别基金补助。这个基金的目的是赎买尚在当地中间的"白人"土地、为班图人开办工业提供资金以及改进农业耕作方法。官方宣布在特兰斯克一旦取得必要的经验即将有计划地向其他"班图人"地区推广。目前特兰斯克被看作是种族隔离的"样版"以表明隔离政策的建设性。但特兰斯克的经验仍然引起不少的批评。首先那些反对自治的人说，只要地区内部安全掌握在充任总专员的欧洲人手中，这一套办法都不过是个骗局。白种人对黑人固有的猜忌和卑视并未排除。政府在特兰斯克依然拥有不经法庭审判就可将一个公民

囚禁九十天的权力。哪里有什么自治呢？很多观察家也认为把那些住在白人区城市的班图人（约占总数三分之一）也算到这一地区是“欺骗手法”。这些人大部分确是早与其出生地毫无关系，这个地区不过是他们在城里失业后被流放的地方而已。

积极的种族隔离和倒退的种族隔离

在日常生活中，在“自治”机关供职的白人职员，即使在特兰斯克，仍一直实行着种族隔离。在办公室、火车站或在交通工具上依然可以常常看见那种写着“白人专用”字样的布告牌，与别的地方一样。

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国民党政府认为建立一个班图人的教育制度也是属于它的纲领中“建设性”的一部分。因此它增设了一些学院、中学和小学。“教学委员会”吸收学生家长参加中小学的管理。

对混血种人就无法成立“民族之家”了。政府

对于他们只限于开办了一所特设的学院"西开普学院",使他们能够准备去担任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业。

这就是政府认为具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成就。然而它不能否认大多数非欧洲人的领导人并不赞同它的政策。它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一小撮失望的知识分子"。但真正的原因似乎在于非欧洲人对此缺乏充分的信任。非欧洲人不再相信这些宣传"积极的种族隔离"的人们,因为他们同一百年来鼓吹专门有利于白人的那种种族隔离的人是一丘之貉。

再者,只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种族隔离才慢慢地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著名的托姆林森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51年,在1954年完成任务,1956年提出了在比勒陀利亚大学托姆林森教授领导下所编制的洋洋大观的报告(共十七巨册)。设立班图人自治区的想法以及援助此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案皆出自这些研究报告。又过了五年,报告所建议的某些措施才付之实行。但人们指出,这些措施实行之时正值大批非洲前殖民地得到解放之际。这对那些非欧洲人

领导者说来更足以“证明”所谓“积极的”种族隔离不过是南非政府在非洲政局总趋向的压力下所想出的不得已的对策。

但最重要的不在于这些猜疑是否有根据，而在于有这些猜疑的存在，从而显示出当地政治气候的基调。还应指出，一些象前班图事务秘书和种族隔离理论家艾泽伦博士那样权威的政府发言人也多次承认：白人选举人只要觉得种族隔离的政策使他们稍受损失，例如增税或卖掉他们在应归班图人的地区中的财产时，他们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听政府的话的。这样只能加剧我们已经几次指出的非欧洲人的不安全感，这是国民党执政十年的最明显的结果。非欧洲人对以下情况得不到任何保证：那些自 1948 年就压在他们头上的一道道法律不再无止无休地继续颁布，不知哪个时候便使看来已经得到的权益又化为乌有。不论他们生活在班图人地区与否，都只能受这些法律的支配。专属于白人的职业范围可以不预先告知就加以扩大，关于规定居住权利的法律可以随时改变，应出示的证件愈来愈多，政治权利受到限制，财产被没收，人被逮捕……丝毫看不到这些无穷无尽

的歧视待遇何时能够终止。加以检查的方式时常吹毛求疵，近似侮辱，更使人激愤不平。虽然政府劝告官吏们对班图人要有点礼貌，但一般对班图人打招呼时不总是简单喊一声“卡弗人！”吗？

最后，就是那些对人的尊严不断受到侵犯并不介意的人们也指出，总是先有倒退的种族隔离措施，然后拖了一段时间才有“积极的”种族隔离措施所带来的“进步”。1956年禁止非欧洲人在大学报名；但自1958年起专供班图人学习的新大学才设立(对混血种人的新大学则是在1961年建立的)。1959年取消了代表班图人利益的议员，但特兰斯克只在1963年才获得有限的自治地位，而且其他地区还未达到这个阶段。今天拆除了贫民窟，但迁出的住户常常要住在帐幕里等待数月之久才找到许诺给他们的房屋。只限白种人才能担任的工作增加了，非欧洲人被排除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但他们回到其本族的地区后，并不能找到同样的工作。

非洲人的觉醒和其态度的日趋强硬

自1948年以来经过三次大选，种族间的紧张局面远未缓和反而加剧。当然种族隔离政策的推行不是唯一的原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非欧洲人，特别是班图人进一步的觉醒使他们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七年期间领导了这个反抗运动。在1948年国民党取得胜利后，非洲人国民大会振作起来，摆脱了它"学院式"的一面，而成为一个战斗性的团体。1949年谨慎小心的苏玛博士被解除了总主席的职务，由詹姆斯·莫罗卡取代，后者有一批年青的助手，如安东尼·蓝皮德、沃尔特·西苏鲁、奥立弗·坦博等。同时，虽然1949年印度人正遭受迫害，国民大会的领袖们仍开始谋求同印度人和混血种人接近。1950年开始举行非暴力的示威，反对正在起草的"集团居住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1年又起而反对旨在把混血种人排除于共同选民名册之外的法律。反对的方式是在二十四小时内拒绝

走出家门。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老年人”同“年青人”仍在争吵不休。在纳塔尔，老工会工作者艾利森·钱皮恩同领导人艾伯特·卢图利的斗争尤为尖锐。最后卢图利取得在纳塔尔的国民大会领导权。但已经来不及使在平民当中于1952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不服从运动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开端。这次运动表现为有意识、有计划地打破“种族界限”。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们事先通知了警察，然后有的坐在供白人专用的长凳上，有的从专供白人用的进口走进公共场所，随后听任逮捕。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逐渐组织起来。情绪逐渐达到沸点，1952年末在伊丽莎白港、约翰内斯堡、东伦敦和金伯利都酿成流血的民变。民变被残暴地镇压下去，约有四十人死亡，大部分是非洲人。

在纳塔尔，卢图利控制住了他的群众，实际上没有发生大的事件。因此卢图利的威信提高了，在1952年12月他取代莫罗卡博士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主席。他上台后首先作出的决定之一是停止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不服从运动。但这并不足以阻止“公共治安”法在几星期后获得通

过，根据这一法律可以放逐一切非欧洲人的活动分子。1954年国民大会企图抵制新的“班图人学校”，但失败了；因为家长们不愿使子女失学，宁愿在这种新型的学校中受教育。但在1955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功地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利普敦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通过了“独立宪章”。这个宪章集中表达了该组织的愿望，[①] 并谴责各种形式的“分别发展”。宪章在列举了要求实现的各种自由以后，以下面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为了这些自由权利，我们将毕生并肩作战直到取得独立。”

我们可以拿这个庄严的宣言同布尔人在1879年为要求恢复德兰士瓦的独立而发表的宣言相比较，两个文件笔调是一样的，贯穿着同样的激情。可是那些在1879年高喊要求独立的人正是这些在1955年拒绝给班图人以独立的人的直系祖先。这就是——可悲啊！——所有各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它们只看到自己受到的不公正而从来看不到它们对别人所施加的不公正。

“独立宪章”的语调虽然动人，但并不能保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团结一致。卢图利的审慎小心

① 表达了所有反对种族隔离者（包括白人在内）的愿望。

的方法，他通过充分准备的非暴力运动逐步前进的主张，遭到主要是原籍德兰士瓦的班图人青年的极端派的反对。这一派拒绝赞同宪章，慢慢地离开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在1959年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泛非大会”，由罗伯特·索布克韦为主席。为了搞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南非当局以叛国罪对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起诉。但此后种族隔离的某些措施依然遇到抵抗。内政部因此干脆地解散了这两个组织。在德兰士瓦省韦雷尼京附近的沙佩维尔和朗加两地发生的严重骚乱给内政部提供了解散这两个组织的机会。1960年3月21日在一次检查通行证时，正如卢图利所说的，再一次出现了“索链断了”的情况。群众怒不可遏的行动遭到警察的可怕的回击。按照官方的数字，在骚乱中有六十九人死亡。

这次事件的影响超越了南非的疆界。全世界忽然注意到这里的局势。外国投资者、尤其是英国人害怕起来。资金外逃开始了，南非政府不得不暂时恢复外汇管制以保护货币的稳定。维沃尔德博士从上述事件中得出了一个奇特的结论：“这些事件证明白人同黑人确不能混杂在一起生活。

应当更明确地把他们分开。”因此这些事件的结果只是复活了种族隔离的斗争精神。

在白人选民方面，他们对种族隔离早在沙佩维尔事件以前就已形成了明确的立场。议会中的反对派统一党已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在史末资—赫尔佐格政府时期，统一党对当时已经开始的种族隔离政策加以庇护。后来它一方面谴责这种政策的“过分”，但又提不出一个根本的政策办法，因此不能在历次大选中恢复过去的地位，甚至不能维持它已经削弱了的地位。1953年由于反对镇压共产主义的法律措施（其结果甚至把某些被怀疑为暗藏的共产党员的议员也排除出去了），成立了自由党，主要活动分子有一个在议会代表非洲人利益的议员巴林杰夫人，还有作家艾伦·佩顿。后者曾以其著名的小说《哭吧！亲爱的国家》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南非种族情况的注意。但是该党在议会仅有很小的影响，而且南非的选举制度（分区一轮选举制）也使新政党在议会中不易发展。自1955年以来一个与自由党联合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妇女运动“妇女保卫宪法联盟”（以“黑带联盟”著称）曾数次示威游行。每当这个组织认为通

过了一个不公正的种族问题法案时，该组织的成员就佩着表示葬仪的黑带去到议会前面进行沉默的示威。最后在1959年有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脱离了统一党另组进步党。这个党也希望有一个摒弃种族隔离的社会，但不象团结在艾伦·佩顿周围的那些"自由主义分子"激进。事实上这些团体没有一个能在选民中深深生根。它们只是削弱了议会中反对派的力量，尽管它们的成员觉得从获得的票数来看，可以发现自由主义思想有某些进展。

这仅仅是幻想呢？还是有根据的希望？无论如何，在目前支持种族隔离者还是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国家繁荣，治安无虞。在国内，国民党人的绝对优势好象还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威胁。但在国外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从国民党在1948年取得胜利以来南非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演变情况。

第二十四章 在世界上的新南非

南非人过去一贯认为“外部”世界就是英国。到1919年由于在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问题，南非人已间接地了解到国际上的力量可以影响——那怕影响是不大的——它的命运；从此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使他们一再注意到这一点。最后自1957年以来黑非洲的解放使南非的白人公民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在非洲大陆及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

因此，国民党政府自1948年选举胜利后就不得不在以下三方面展开对外活动：同英国和英联邦的关系、同联合国的关系、同非洲其它国家的关系。阿非里卡人对英国的嫌恶已经不是由于在实际利益上同它有什么重大分歧，而是属于感情方面的问题，即使这种恶感不是很强烈的。但国民党政府为了照顾它的拥护者的“感情”，便努力逐

渐解除它同英国已经松弛了的联系。1949年南非通过了一个关于南非公民身分的法律，规定对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同等看待。

脱离英联邦

早在1927年关于南非的国旗问题已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原来荷兰的橙一白一蓝三色旗同英国国旗并行悬挂。下一步就是如何取消英国国旗的问题，到1957年4月终于通过了取消英国国旗的法律。一个月以后，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不再是第二国歌了，从此南非国歌《南非之声》就成为唯一的国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成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两种人的共同国歌一直不许使用英语译文。到1957年又进了一步，把西蒙斯敦这个巨大的海军基地收归南非管辖。又过了一年，在政府公文上端所印的“为女王陛下效劳”(O. H. M. S.)的字样也取消了。

不久就提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南非联邦是否依然属英王管辖？有一些阿非里卡人始终幻想有一天成立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来，赫尔佐格就曾把成立共和国作为努力的目标。那些旨在消减英国影响的措施都具有反对君主制的色彩。在多少年里，总有一些坚决的"共和派"在奏英国国歌时一直坐着不站起来，有的人在1947年对来南非访问的英国皇室成员拒绝表示传统的敬意。可是阿非里卡人的领袖们却明确表示，只在有把握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赞成时才能在南非举行废止君主制的全民投票。到1960年维沃尔德博士认为时机到了，而且进行了细致的准备。他把选民的年龄限制从二十岁减为十八岁（当然混血种人除外，无论如何，对联邦前途问题不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允许西南非洲的白人选民参加投票。10月5日全民投票结果赞成成立共和国，而且共和国宪法已经准备好了。可是这个决定并未获得"绝大"多数：只有850,458票(52.3%)赞成，而775,878选民(47.7%)宁愿维持现状，相差不过4.6%。四个省中的纳塔尔甚至有大批人投票主张保留君主制。从这些分歧的立场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个民族的分界：阿非里卡人是共和派，亲英者是保皇派。

新的共和国宪法与过去的南非联邦的宪法并

无多大差别。共和国总统代替总督，第一任总统是查尔斯·罗伯茨·斯沃特而他本人就是原来的总督。对议会则是把参议员从八十九人减为五十四人。[①] 授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处理班图人各地区集团将来的组织问题。

这样，布尔人两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共和国又复活了。对韦雷尼京和约仇恨雪耻了。但这一阵狂喜不久就又冷却下来：新的争执发生了，这一次是同英联邦闹翻。看到印度于1947年成立共和国但未脱离英联邦的先例，阿非里卡人的领导人也考虑要南非采取类似的解决办法。维沃尔德政府因之提出了这样的请求。1961年5月各自治领的总理在伦敦开会时，已有迹象表明南非的请求将遭拒绝；不但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加纳，就是有些"白人"自治领也主张把南非排除于联邦之外。维沃尔德博士不愿遭受这样的判决，就撤回了加入联邦的请求。这样同英国最后的政治联系就割断了。

---

① 大家还会记得：参议员人数过去增至八十九人不过是一个手段，以便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以取消混血种人在共同选民名册上的投票权。

现在南非只是属于英镑区了，但在这方面，关于十进位的改革以及用兰特作为新货币单位代替英镑的措施，也使得南非在英镑区中只限于技术和财政上的合作，这种合作影响不到人民大众。于是“南非共和国”就只剩下自己一家了。

英国的保护国问题

南非脱离了英国，但英国的三个保护国：巴苏陀兰、斯威士兰、贝专纳，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1910年南非联邦的成立并未触及这三个地区的法律地位。但也并未因此使联邦与这三个地区明确地分开。当时各自治领的主权，包括新成立的南非联邦的主权，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同三个“保护”国一样，都从属于英国国王。因此只有一个官员同时在联邦及三个保护国代表英国国王，联邦的总督同时是被人称为“英国南部非洲”的那三个飞地的高级专员。他有三个“驻节专员”作助手。在南非联邦同三个地区之间仍然有着关税同盟。

英国对是否将这三个地区交给南非管理犹豫不决，但看来这些地区的经济情况使它们终究要从属于比勒陀利亚。在1913年博塔政府已开始进行把这三个地区移交南非管理的谈判。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谈判延期举行，而且南非参战时发生的那些情况更不能促使英国放弃它对三个地区的责任。因此这三个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临时状态，在五十年代末非洲普遍觉醒以前，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一直无人关心。

贝专纳在三个地区中面积最大，但人口并不是最多的，而且它同其他两个地区不一样，不是一个单一部落的国家。它是由茨瓦纳族若干部落组成的保护国。从伟大的卡玛在位时起，巴曼瓦托人的部落就是最大的部落。在该地区定居的欧洲人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到1920年英国在该地初步设立政治组织时，欧洲人谘询会议被赋予和非洲人谘询会议相等的权力（这些权力实际有限）。事实上行政当局虽然不在本地，但依然掌握一切大权。它设在马弗京，此地甚至不在贝专纳境内，而是在更南一些的“英属贝专纳”，后者于1895年成了开普殖民地疆土的一部

分。[1]

一个年青酋长的奇遇

贝专纳初期的政治动荡是与一桩社会新闻交织在一起的。1948年9月巴曼瓦托人酋长的未来继位人、年青的塞里次·卡玛告知当时摄政者他的叔父次黑基迪·卡玛说，他结识了一个出身小资产阶级叫鲁恩·威廉斯的伦敦少女，准备同她结婚。次黑基迪因其才能和治理本部落的果断态度甚受行政当局的赏识。他即向当局报告，并企图阻止他的侄子办这一桩不是“门当户对”的亲事。但这个青年酋长拒绝屈服于一切压力。人们甚至试图要求圣公会拒绝对这个婚姻行祝福礼。但塞里次依然娶了威廉斯小姐并带了他年青的妻子回到贝专纳。这场争执很快就把巴曼瓦托人分

---

(1) 当时英国政府本想把贝专纳的其它部分划归英国南非公司管理，该公司当时在那里已拥有行政权和警察权。正因公司拥有这种权力，所以詹姆森可以从贝专纳出发去袭击约翰内斯堡。但英政府的这个计划遭到茨瓦纳族各酋长尤其是卡玛三世的抵抗；卡玛同几个酋长去伦敦提出抗议，从而挫败了这个计划。

为敌对的两派；一派是次黑基迪和保守派，另一派是“欧化的”年青人以及一切由于种种原因不满意年老的次黑基迪执政的人们。英国用所罗门式的裁判[1]解决了这场争执，它把次黑基迪免职又把塞里次赶出国外(1950年)。

大约同时，由于英国的另一个创议，贝专纳又在自治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小步。在1920年设立的两个谘询会议合并为一；在这个会议中欧洲人还拥有与非洲人相等的席位(各占十席)；另外又为当地的一小撮亚洲人设立了一个谘询会议。但巴曼瓦托人的争执并未缓和，尤其是因为行政当局派去的新酋长克加马恩没有任何威信。塞里次一派人不断闹事。他们宣传说，塞里次被流放是南非施加压力的结果。1949年比勒陀利亚通过禁止不同种族间通婚的法案时，又确实在同一年刚刚宣布了不许塞里次进入南非国土的禁令。因之贝专纳人的怀疑就有了根据。某些酋长也转向塞里次这一派，而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谴责英

[1]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有名的国王，以智慧著称。传说他在位时曾对一件有两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案件作出巧妙正确的裁判。——译者

国屈服于南非的威胁。

到1956年英国政府终于允许塞里次返回贝专纳，但只能以私人的名义。1963年克加马恩灰心失望，提出辞职。当局于是改变1953年的安排，同意承认塞里次·卡玛的子孙有王位继承权，而在过渡时期指定塞里次的一个表兄弟利阿皮次韦·卡玛暂摄政事。塞里次由于被排除在部落领导人之外，逐渐倾向进行“现代的”政治活动，不再依靠酋长而以政党为基础。到1962年12月，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虽然有些具体的差别，但这部宪法看来却象是原英属西部非洲在1945年到1957年间的各部宪法的翻版。行政会议（政府）仍由“专员”领导，设四个委员（非洲人和欧洲人各半），由立法会议选出。立法会议仍然包括各个不同种族，虽然欧洲人和亚洲人在总人口中为数很少。

要求取得更大政治进展的压力很快加剧了。在1960年宪法颁布的当天，克加耳曼·莫策策成立了第一个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贝专纳人民党”。1964年英国组织了一个起草新宪法的会议，这个办法后来很快就推广到整个英联邦。在这部

宪法中第一次规定实行无种族区分的普选制。到1965年3月确实举行了大选。在大选中取得全胜的是塞里次·卡玛，他在1962年已建立了“贝专纳民主党”，较“人民党”温和。他的政党在三十一席中获得二十八席，人民党仅获三席，另外由民主党派生出来的“博兹瓦纳独立党”未获得任何席位。塞里次成为政府首脑后的最初措施之一是发表一个宣言，主张在各种族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的“多种族主义”（他的党选出的议员之一就是个欧洲人），反对种族隔离。但他又明确表示愿对南非共和国续继实行“睦邻”政策和传统上的贸易往来，然而不打算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态度缓和的演说发表后，南非对新任总理表示祝贺，而且取消了在1949年决定的禁止他进入南非的规定。

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

约在1966年末贝专纳将取得独立，这是已经确定的了。但应当说，独立将是很不牢靠的，因为经济上独立的可能性非常之小，牲畜差不多是它

唯一的资源。幸而开普—罗得西亚铁路穿过该国的东部地区，从而促进了专属欧洲人经营的“聚居区”柑桔种植业的发展。正在建设中的贝专纳新首都加贝罗内斯也位于铁路线上。几乎全部出口货都卖给南非，有三万多茨瓦纳人在南非境内工作。以上数字说明了该国依附的程度。

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对巴苏陀兰来说更为明显。但巴苏陀人早已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尽管莫特洛特勒希（国王）年青的莫谢希二世的岳母、格里菲思酋长的第一个妻子以国王的名义进行了很长时期的摄政，部落的组织依然原封未动。正好在莫谢希二世即将亲政（1960年）之时，英国政府授予巴苏陀兰以第一个宪法。宪法由欧籍顾问、开普大学考恩教授起草，在很大程度上以传统的组织为基础，但更加严格地对“国民会议”作出了规定。国民会议有议员八十名，四十名由地区会议选出，二十二名酋长为当然议员，另由最高酋长指定十四名酋长任议员，还有四名英国官员。设“执行会议”作为执行机关，从属于高级专员和最高酋长。象在贝专纳一样，这第一个宪法有助于政治生活的觉醒，开始出现不同倾向的

舆论。“大会党”实力最雄厚，占三十席，“马里马—特卢自由党”占五席，还有两个其他力量较小的团体。这第一个宪法原定仅是过渡性的。1964年，在伦敦进行了新的立宪磋商。新产生的根本法规定两院制：国民议会由六十名议员组成，通过普选产生；参议院由三十三名议员组成，其中有二十二名酋长系当然成员，另十一名由莫特洛特勒希选定。

巴苏陀人的政治独立实际上已经获得。也将于1966年正式宣布，莫特洛特勒希于是将得到国王的头衔。这个独立显然并未解决政治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的严重缺陷，而这些缺陷使巴苏陀兰必然要对南非采取极为慎重的政策。该国完全被包围在南非共和国中间，除非通过南非领土便不能同第三国进行联系。它的经济首先以玉米和粮食作物为主，只有一种值得一提的出口产品：安哥拉山羊毛和绵羊毛、肉类和皮革。对外交通是很不便的。从布隆方丹到德班的铁路的一条支线有几公里经过巴苏陀兰境内，将首都巴塞卢同南非铁路网连接起来。仅此而已。

贸易逆差仍然十分严重。1962年，巴苏陀兰

进口七百万兰特的物品，而出口值仅有三百五十万。为了恢复平衡，约有十五万巴苏陀人(整个人口约一百万)经常住在南非，在矿山、农庄和种植园里做工。1963年来由于发现了金刚石——数量不大——而产生的希望是否可靠，还有待观察。在1964年英国的领导人还认为该国，“对援助的需要似仍无限期”。

在文化教育方面，教会过去为响应莫谢希一世的呼吁已经进行了很久的努力，使巴苏陀兰比贝专纳培养了数目更多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干部。教皇庇护十二世学院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这必然使以后的干部不再依靠南非的班图人大学，也不再依靠距离太远、因而费用太高的欧洲大学。

在斯威士兰的进步要求

斯威士兰是南非的三个领地中最小的一个，它在经济方面从属南非的情况最不显著。但在这个国家中存在着欧洲人移民的问题。处于少数的欧洲人（二次大战后有三千人，现在约有一万人）

虽然数目不算多，但是自从翁班迪奈在位时就已将一大部分土地抓到手里。因之在1921年成立了一个“欧洲人谘询会议”，以便对有关欧洲人利益的一切问题向驻节专员提出意见。这一改革适逢布努之子、恩格温亚马（国王）索布虎查二世登上斯威士兰王位的时候，此前系由其祖母，即翁班迪奈之妻、非常能干的拉博特西贝尼摄政。

索布虎查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职责，设法限制欧洲人对部落属地的控制。他试图宣布某些从他先辈手里夺去但情况可疑的土地所有权为无效，并尽可能地赎回若干已经可以自由贩卖的土地。1923年，他甚至试图使法院宣布英国的保护制度为非法，但是他向英国法院提出的控诉当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然而，这些举动表明，在斯威士人当中已经产生非常明显的民族意识。斯威士当局也实际上一直处于自治地位，直到1951年时，司法机关进行了改组，剥夺了传统法庭的某些权力。

既然有了最高酋长所亲身倡导的民族意识，在斯威士兰较早地形成一些政治组织就不足为奇了。1929年，在英国当局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进步协会”。后来这个组织“并人”斯威士人国民

会议，以便将它纳入部落等级制度的范围以内；这样它便失去了其斗争性。只是到了1960年该协会才发展成为进步党，由前协会主席约翰·恩库库任领导人。两年以后，由于恩库库和总书记兹瓦讷博士发生冲突，该党的团结破裂了。1963年兹瓦讷创立了恩格瓦尼民族解放大会。最后，在各种政治力量中的左翼出现了一个最初不过是学生组织的团体“斯威士兰学生联合会”。随着这个团体的分裂，又成立了在原籍波兰的一个移民的影响下的“斯威士兰民主党”和代表保守主张的“姆班德泽尼国民大会”，后者的主张同在南非设立班图斯坦的意见差不了多少。南非在1962年似曾向斯威士人酋长建议做出某种安排：目前属于东德兰士瓦但由斯威士人居住的土地可重新归属斯威士兰。作为交换条件，斯威士兰接受同南非共和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并，或至少是某种形式的联盟。

姑且不管这些暗地里的活动究竟如何，为该领地多争取一些自由总是为大部分政党所同意的。闻到了风声的欧洲人谘询会议也于1960年提出某些关于宪法方面的修正方案，但是力图使

欧洲人保持最大限度的影响。同时它还试图把部落势力拉到自己一边。但是，英国当局还未来得及对这些建议作出答复，恩格温亚马索布虎查就已表示反对。他指出，上述办法把欧洲人简单的谘询地位变成了立法权，而斯威士人在立法方面已经取得的职权却并未扩大。欧洲人的建议确实意味着斯威士人相对地丧失了他们的权利。索布虎查提出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成立一个共同的立法会议，欧洲人在其中“平等地”派有代表，但没有说明平等一词应如何解释。欧洲人竭力想证明，这正是他们所建议的，但索布虎查反驳说，他所考虑的是地位平等，而不是代表人数的平等。争论的结果，成立了一个宪法谘询委员会，由十五个斯威士人、十个欧洲人和五个英国官员组成。1962年4月，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但是，在为讨论这一报告而召集的斯威士人全国会议上，意见纷纭，乱成一团，无结果而散。兹瓦纳博士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委员会的结论。进步党也表示反对。恩格瓦尼民族解放大会则于1962年6月组织了一次抗议罢工，致使当局从肯尼亚调来军队。

1963年1月，讨论斯威士兰前途问题的立宪

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完全失败。英国政府于是只好强制在该地实行一个多种族类型的宪法(1963年12月),同几年前在尼亚萨兰(马拉维)和肯尼亚实行的宪法相似。1964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同年9月首次召开了新的立法会议。

应当预料到在斯威士兰也将出现新的压力以使它在走向独立的路途上到达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它的邻国所缺少的长处,蕴藏着大量可以开采的资源,而且某些资源已在开发。贸易方面有顺差。对外贸易(进出口)为巴苏陀兰的四倍,贝专纳的三倍,尽管后两国的人口更多(斯威士人为二十八万、贝专纳人五十八万、巴苏陀人一百万)。

这一相对的繁荣来自不同的因素。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去更早以前已经发现的石棉矿和砂金以外,又找到了许多锡、重晶石和陶土矿层。但尤其是发现了蕴藏量很大的铁矿使该国的经济起了重大的变化。1954年人们了解到该国西部边界的蓬伍岭是一个巨大的含铁量高的赤铁矿结构。为了进行开发,一个英国康采恩正为矿山提供装备,并建造一条东西横贯整个斯威士

兰的铁路，以便在莫三鼻给边界连接上通往洛伦索—马贵斯的属于葡萄牙的铁路线。煤矿的发现更加便利了铁路的经营。根据一项合同的规定，蓬伍岭矿头十年出产的全部矿石都专卖给日本。

还有材料证实，斯威士兰境内山脉的东侧具有植树造林的理想条件。据了解，在那里某些松树生长得比最有名的加利福尼亚山谷的松树还要快。因此，人们种了一大片森林，面积同法国的郎德森林不相上下。已经建设了一些造纸厂，从而使国家的工业化更形加速。

英国高级专员所辖各领地最近在立宪方面取得了进展，独立的前景在望。面对着这一情况，南非共和国采取了不轻举妄动的政策，或者至少是这样一种策略。在试图进行兼并之后，南非总理维沃尔德于1962年9月——正当某些欧洲人和斯威士人酋长看来已经同南非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之时——宣称，同这些领地合并“是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的”。但是，翌年同一个维沃尔德博士又要求“紧密的联合”。在英国报刊发表评论表示不赞成之后，他又发表声明进行澄清，建议南非充当由各保护国自由接受的“助手、指导和监护者”。

显然，南非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三国的前途漠不关心。有好几次，受南非共和国通缉的一些人逃到这个或那个保护国去。似乎已经查明，在南非遭到取缔的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泛非主义大会在马塞卢改名为“波科运动”(意为只有非洲人参加)，重新建立了一个宣传机构。在帕尔和南非的德兰斯克发生了多起谋刺案(1963年7月)后，上述宣传机构遭受英国警察的搜查，被认为是索布克韦的接班人波特拉科·利巴洛当时在场。由于他得以逃脱，从而难以估计这一机构在帕尔骚乱中的确切作用。但是比勒陀利亚显然担心高级专员所辖各领地会成为煽动中心，从那里对以种族隔离主义组织起来的南非社会的基础发动进攻。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果英国必须援助巴苏陀兰和贝专纳，而前者孤立在南非共和国的领土当中，后者夹在南非和西南非洲之间，那么，英国将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关于西南非洲，南非自1946年以来便暗地里同联合国进行斗争。1948年后，国民党政府不过按照过去政府的样子办事罢了，可是在形式上态度更加强硬。追述双方冲突的经过，象读报纸上长篇连载的一个悲喜剧型的

故事。

兼并西南非洲

1948 年起成为南非驻联合国代表的埃里克·卢夫，正是那个曾经批评史末资向托管理事会提交西南非洲管理情况报告的人。但是反对兼并的人也设法使联合国听到他们的呼声。以次黑基迪·卡玛为首的茨瓦纳人酋长要求英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合并。在南非提出要求、而各方面表示抗议这样一个不协调的大合唱中，联合国只是简单地要求南非继续提供年度报告，直到作出最后决定。翌年，南非宣布拒绝这一决议。联合国于是提请国际法院判定南非对西南非洲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国际法院判定南非有义务向联合国提交居民的请愿书以及年度报告，然而南非并无义务将委任统治改为“托管”。这就是在八个法官投票赞成、六人反对下所得出的决定(六个法官认为有义务改为托管)。在最近一份半官方的刊物中，一个南非作家还以粗暴的口气强调指出，投票反对改

变的是"严肃的"法官，其他法官明显地不够严肃。这种论点显然等于说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了。

不管怎样，南非驻联合国代表东格斯博士在1950年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该国不认为自己受国际法院决定的约束。联合国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同比勒陀利亚协商审查请愿书和年度报告的方式。南非反驳说，它不反对就西南非洲的新的国际地位问题进行协商，但是它要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三大国即英、法、美协商。专门委员会拒绝接受上述提议。与此同时，托管理事会开始收到几份请愿书。理事会还约请好几个纳马人和赫雷罗人酋长到纽约去。南非拒绝发给他们护照。专门委员会于是决定听取赫雷罗人的代言人迈克尔·斯科特牧师的意见。东格斯博士于是当场退席。一直到1957年，事态毫无进展。后来在泰国代表的建议下，联合国大会决定组成一个斡旋委员会，以便重新同南非进行接触。1958年，该委员会提出两项解决办法。第一项办法以南非关于使"三大国"承认西南非洲具有"国际"性质的建议作为基础；第二项办法设想将该国分成两部分，仅将

南部并入南非。但是这两项办法都得不到多数的赞同。于是联合国不得不停止斡旋委员会的活动。同时，托管理事会继续听取请愿者的申诉。其中有一个是来自雷霍博斯的“私生混血”青年，名叫汉斯·博克斯，是由三个以研究植物为名到西南非洲去的美国青年秘密安排上路的。[1]其他几个证入则是通过没有那样奇特的办法到达的，他们向联合国报告了1959年12月在温得和克发生的流血事件。

从1960年起，由于新成立的各非洲国家的压力，终于促使联合国对西南非洲问题寻求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它又一次要求国际法院对南非是否有义务承认托管理事会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同时，托管理事会派去一个调查团。团员们到了贝专纳，但是英国试图要他们书面保证不准备进入西南非洲，[2]团员们拒绝屈从。英国就撤回了签

---

① 这次探险活动对在西南非洲进行科学研究的规定产生了一个离奇的后果。从1962年起，禁止私人研究人员搜集科学资料，只有“得到承认”的学会、大学和博物馆的代表才可以进行此类研究工作；每年仅批准三次探险活动。必须有当局指定的一名南非研究人员陪同，费用由探险者负担。

② 因为边境地带处于沙漠，边防人员很少。

证。当一个请愿者独自一人穿过卡拉哈里沙漠到达马翁要会见调查团时，该团已经离开贝专纳。翌年(1961年)，南非宣布愿意接待由联合国大会三个前任主席组成的代表团，但是人们未能找到三个这样的人自愿前去。接着，联大决定设立一个“七人委员会”，在同南非合作下，负责准备西南非洲的民族自决问题。在决议中还规定准备派人去该地访问。当时已成为南非外长的卢夫同意委员会主席菲律宾人卡皮欧先生和副主席墨西哥人马提内斯·德阿耳瓦博士入境。他们于1962年5月访问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声称代表团没有发现任何种族灭绝的痕迹、任何违反委任统治条例的军事设施以及对国际和平的任何威胁。但在访问的最后阶段生了病的卡皮欧先生后来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有参予草拟“联合”公报，也未在公报上签字。由于这一事件而大失面子的联合国不得不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试图澄清真相，但没有结果。

后来联大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联合国能切实过问西南非洲的事务。当然，这项决议只是一纸空文。1962年12

月，国际法院以八票对七票宣称该组织有权受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关于南非违反了委任统治条例的控诉。事实上还是南非当局在西南非洲掌有全权。由于亚非新独立国家的推动，联合国的注意力不久便从西南非洲转移到南非本身的局势上去。1962年11月，联大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注视……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的发展"，并对重要情况提出报告。该委员会在几内亚人迪亚洛·特利的主持下，提交了两本相当厚的报告。委员会不能进入南非，便专门从官方报告、报刊消息等方面搜集材料，对种族隔离所造成的局势作了一幅象新印象派"点描"的画面。它证实了南非给人如下的总印象：非欧洲人在南非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而失去这种安全，生存本身便成为侥幸的冒险；一个主宰一切的政权的代表们根本不考虑非欧洲人的尊严；法律本身已经非常严厉，可是执行的权力机构还总是践踏这些法律。

最后，联大在1962年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同南非联邦断绝外交关系，不许南非船只进入港口，抵制南非产品，拒绝南非飞机着陆。翌年（1963年8月），安全理事会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

卖军火给南非，同时向比勒陀利亚政府呼吁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这些建议取得的效果不算显著。好几个专门性的国际机构（国际劳工组织、非洲经济委员会等)将南非开除；好几个国家的政府保证说已经停止运送军火了；只有某些非洲国家拒绝南非飞机着陆；贸易方面的抵制很少得到遵守。当然，人们期待着非洲国家在实施联合国所建议的措施方面表现出最大的热情，因为这些国家的居民和在南非处于多数地位的班图人在人种上是类似的。

非洲和南非

国民党的领导人在1948年夺得政权时不会不注意到黑非洲对待南非局势的特殊立场。他们很快地派遣一系列的代表团跑遍当时英、法、比、葡等国的殖民地去搜集关于非洲情况的资料。当黑非洲出现获得解放的初步迹象时，南非便肯定表示愿意同新独立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1957年加纳获得独立，南非派代表团去向阿克拉政府表示祝贺。但是，这种一再表示的要同邻国搞好

关系的意愿并未能使非洲国家感到信服。它们认为这是旨在掩饰种族隔离政策而作的姿态。因此，已经建立的关系很快恶化了，而1960年后获得独立的国家普遍拒绝同南非建立关系。

一些半官方的泛非会议曾经常常指责种族隔离。显然，非洲国家官方组织也会采取同样明确的立场。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1964年2月在拉各斯举行的第二次常委会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严格执行联合国规定的关于对南非海空运输的报复措施；此外还决定详细研究贸易关系问题，以便抵制南非的商品。

然而，不得不承认，直至现在非洲国家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也同联合国的建议一样没有多大成效。诚然，南非和欧洲之间的飞机不能再沿最近便的航线飞行，而改经安哥拉和加那利群岛（从而由约翰内斯堡到伦敦航线要多飞二千五百公里）。“南非航空公司”却仍然宣布，1964年度获得利润四百万法国法郎以上，比前一年增加17.7%。[1]至于对南非货物的抵制，如果说不是根本没有实行，也是没有效果的。

① 如果没有政府的秘密津贴，很难讲会取得这样的结果。

还在1962年，作者在一个黑非洲国家的官方招待会的桌子上看到了南非产的桔子。南非人士肯定地说，南非的对外贸易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即使同亚非国家的贸易也是如此。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不得不在数字上玩弄一些花样。[1] 至于道义上的抵制，在非洲以外几乎不存在。在非洲大陆上，马拉维就不赞同泛非主义的主张。南非军事专家遍及刚果(利)各地，尤其是1964年在该国东部发生了卢蒙巴分子集团的叛乱以后。他们以私人名义应募，但是一大部分人负有考察的使命；他们有充分的机会研究游击战和丛林战的战术，这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会是有用的。

可以肯定地说，南非一面向非洲国家表示友谊而很少非洲国家接受这种友谊，一面确在军事上准备防务。正当联合国讨论旨在制止向南非运送武器的初步措施时，南非的国防预算（1962—1963年度）从七千一百五十万兰特猛增到一亿一千九百七十万兰特，增加了近70%。国防部长当时宣布，南非已开始购买制造重武器的专利权，并即将开始制造坦克。1965年初，甚至宣布在约翰

① 将对亚非国家的出口数字列到"其他"项目内。

内斯堡成立阿特拉斯飞机公司，专门制造和维修军用飞机。

同1935年世界各国力图制止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时所决定的制裁一样，对南非的抵制看来也不象有成功的希望。在内部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那么，是否应当认为现政权将永远持续下去呢？

出 路 何 在？

问题可能从某个方面得到解决，而对此南非外面好象还没有人很好探讨过。再过三十年，混血种人的人数将超过纯白种人。不过，这些混血种人却不能象班图人那样被禁锢在"民族之家"之中。他们是城市居民，不能被局限于"土著文化"里，加以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土著文化。混血种人问题直到如今一直是使国民党人感到棘手的问题。甚至在最顽固地维护种族隔离的人们当中，也愈来愈明显地酝酿着一种好象引以为耻、还不敢公开讲出来的想法："这些混血种人具有欧洲文化，生活在我们当中，把他们变为我们的盟友吧！

我们将使保卫‘我们的文明’的人数增加一倍！”

但是，如果混血种人在政治、经济和人格方面都取得平等，那么，从哲学的观点看来，整个种族隔离体系就要垮台。作为这一体系的基础——“按生物学观点划分”的民族，将由于混血种人的人口增加而遭到破坏。纯种的神话将要消失，而代之以“共同文明”这个灵活得多的概念。的确，南非今天在千方百计地不让班图人参加这一文明。可是混血种人呢？如果他们被允许享有平等地位，岂不将加强了特权者的阵线，而他们也要用保卫文明的名义去反对班图人的热望吗？

我们只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们将会知道其答案。

附录一 开普殖民地历届领导人名单

I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

(头衔为"司令官")

扬·范里贝克(1652—1662)

瓦格纳(1662—1666)

范夸尔贝(1666—1668)

博尔格霍斯特(1668—1670)

哈基乌斯(1670—1671)

领导人出缺(1671—1672)

范布罗赫尔(1672),暂代。

(头衔为"总督")

果斯克(1672—1676)

巴克斯(1676—1678)

克鲁多尔普(1678—1679),暂代。

西蒙·范·德·斯坦尔(1679—1699)

威廉·阿德里安·范·德·斯坦尔(1699—1707)

达布莱因格(1707—1708),暂代。

范阿森堡赫(1708—1711)

黑洛特(1711—1714),暂代。

德夏丰內斯(1714 1724)

德拉方丹(1724—1727),暂代。

诺特(1727—1729)

德拉方丹(1729—1737),暂代。

德拉方丹(1737)

范盖弗尔(1737)

范·顿·海格尔(1737—1739),暂代。

斯韦伦赫鲁弗耳(1739—1751)

里克·土耳巴格(1751—1771)

范普莱顿贝(1771—1774),暂代。

范普莱顿贝(1774—1785)

范德赫拉夫(1785—1791)

里尼乌斯(1791—1792),暂代。

(头衔为“总特派员”)
尼德布尔格和弗雷克尼乌斯(1792—1793)
斯吕斯肯斯(1793—1795)

II 第一次英国占领时期

(头衔为“司令官”)
埃尔芬斯通海军上将(1795)
克雷格将军(1795—1797)

(头衔为“总督”)
麦卡特尼伯爵(1797—1798)
邓达斯将军(1798—1799),暂代。
乔治·扬爵士(1799—1801)
邓达斯将军(1801—1803),暂代。

III 巴塔维亚共和国时期

(头衔为“总特派员”)
德密斯特(1803—1804)

(头衔为“总督”)
扬森斯将军(1803—1806)
(1803年至1804年,扬森斯总督归德密斯特指挥。)

IV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头衔为“总督”)
戴维·贝尔德爵士(1806—1807),暂代。
格雷将军(1807)
卡利登伯爵(1807—1811)
弗朗西斯·克拉多克爵士(1811—1814)
萨默塞特勋爵(1814—1826)
伯尔克将军(1826—1828)
加尔布雷思·科尔爵士(1828—1833)
本杰明·德班爵士(1834—1838)
乔治·内皮尔爵士(1838—1844)
佩里格林·梅特兰爵士(1844—1847)

(头衔为“高级专员”兼“开普总督”)
亨利·波廷杰爵士(1847)
哈里·史密斯爵士(1847—1852)
乔治·卡思卡特将军(1852—1854)

乔治·格雷爵士(1854—1861)

菲利普·沃德豪斯爵士(1862—1870)

亨利·巴克利爵士(1870—1872)

V 开普代议制政府时期

(头衔为"高级专员兼开普总督")

亨利·巴克利爵士(1872—1877)

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1877—1880)

赫尔克里士·鲁宾逊爵士(1881—1889)

亨利·洛赫爵士(1889—1895)

赫尔克里士·鲁宾逊爵士(1895—1897)

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1897—1901)

(从1901年起,头衔为"高级专员兼德兰士瓦及奥兰治殖民地总督")

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1901—1905)

塞尔伯恩伯爵(1905—1910)

(1906年废除奥兰治总督头衔)

附录二　南非联邦历届总督名单

格拉斯顿子爵(1910—1914)

巴克斯顿子爵(1914—1920)

康诺特王子(1920—1923)

阿思龙伯爵(1924—1930)

克拉伦登伯爵(1931—1937)

帕特里克·邓肯爵士(1937—1943)

德韦特(1943—1945),暂代。

布兰德·范济耳(1945—1950)

詹森(1951—1959)

查尔斯·罗伯茨·斯沃特(1960—1961)

附录二　南非联邦历届总理名单

路易·博塔将军(1910—1919)
史末资将军(1919—1924)
赫尔佐格将军(1924—1939)
史末资将军(1939—1948)
马兰博士(1948—1954)
斯揣敦(1954—1958)
维尔沃德博士(1958—1961)

附录四　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历届领导人名单

I　独立时期

（头衔为“总统”）

马提努斯·韦塞尔·比勒陀利乌斯（1857—1860）

舒曼（1860—1863）和范伦斯堡（1862—1863），两个相互对立的总统。①

范伦斯堡（1863—1864）

马提努斯·韦塞尔·比勒陀利乌斯（1864—1871）

埃拉斯穆斯（1871—1872），暂代。

伯格斯（1872—1877）

II　英国占领时期

（头衔为“行政长官”）

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1877—1879）

（头衔为“总督”）

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1879—1880）

（布尔人叛军三巨头）

克鲁格、儒贝尔、比勒陀利乌斯（1881—1883）

III　恢复独立时期

（头衔为“总统”）

保罗·克鲁格（1883—1902）

沙尔克·比格尔（1902），暂代。

---

① 有一段时间，德兰士瓦内部斗争激烈，出现了两个总统、两个政府的局面。——译者

附录五　奥兰治自由邦历任总统名单

霍夫曼(1854—1855)

博斯霍夫(1855—1859)

马提努斯·韦塞尔·比勒陀利乌斯(1860—1863)

布兰德(1864—1888)

赖茨(1889—1895)

斯太恩(1895—1902)

德韦特(1902),签订韦雷尼京条约之日暂代。

附录六　班图族主要王室名单

（括号所标年代系指国王或最高酋长在位年代，而不是出生和逝世的年代。）

I　祖卢族国王

丁吉斯瓦约（　—1816）
察卡（1816—1828）
丁刚（1828—1840）
潘达（1840—1873）
塞太瓦约（1873—1879）
（1879—1883期间，沒有公认的国王。）
塞太瓦约（1883—1884）
乌西贝普（1883—1884），发动叛乱，反对塞太瓦约。
迪尼祖路（1884—1887）
（1887—1897期间，沒有公认的国王。）
迪尼祖路（1897—1906）

II　斯威士族国王

恩格瓦恩三世（？）
恩德冯贡耶（　—1815）
索布虎查一世（1815—1839）
姆斯瓦提幼年时摄政（1839—1840）
姆斯瓦提（1840—1868）
路德冯加（1868—1874）
1874年有王位之争。
翁班迪奈（1875—1889）
布努（1889—1899）
拉博特西贝尼在索布虎查二世幼年时摄政（1899—1921）
索布虎查二世（1921—　）

III　巴苏陀族国王

莫谢希（1818—1870）
来特西一世（1870—1891）
利罗托利（1891—1905）
来特西二世（1905—1913）

西埃索·格里菲思(1913—1939)

曼菸博在莫谢希二世幼年时摄政(1939—1960)

莫谢希二世(1960—   )

IV 巴曼瓦托族最高酋长

西克果马(1840年以前—1872)

卡玛三世(1872—1922)

西克果马二世(1922—1925)

次黑基迪·卡玛在塞里次·卡玛幼年时摄政(1925—1950)

腊斯博米·克加马恩(1950—1963)

V 科萨族(西部)最高酋长

帕洛(—1775)

腊腊布(1775—1785)

恩德兰比先在盖卡幼年时摄政(1785—1828),后同盖卡争位。

盖卡(约1800—1828)

散迪勒(1828—1852)

(上述名单并不完全,仅列举有关王朝对南部非洲的历史发展确有影响的一段时期中的国王和酋长。)

附录七 参考书目

ABRAHAM D., *Ethno-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Mutapa*, communication au 4e séminaire international africain, Dakar 1961.

ARMSTRONG H. C., *Grey Steel*, J. C. Smuts Methuen & Co. Londres, 10 ed. de 1937 à 1946.

BIASIUTTI Antonio, *L'Africa*, vol. VI de *La Terra, Geografia Universale*, Vallardi, Turin 1898.

BIELEFELD Harald, *Südafrika*, dans *Welt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Francke-Verlag, Berne et Munich 1962.

CAMPBELL Rev. John, *Travels in South Africa*, Londres 1815.

CHILLON Bernard, *Notions sur les civilisations préhistoriques*, Serped, Paris 1963.

CORNEVIN Robert, *Histoire de l'Afrique*, tome I, Payot, Paris 1962.

DAVIDSON Basil, *L'Afrique avant les Blanc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2.

FIRST Ruth, *South West Africa*, Penguin, Londres 1963.

FEIT Edward, *South Africa, the dynamics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Londo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2.

GINIEWSKI Paul, *Une autre Afrique du Sud*, Berger-Levrault, Paris 1962.

HARTMANN Hans, *Streifzug durch Südafrika*, Neue Zürcher

Zeitung, Zurich 1948.
HOEK Gérard H., *Zuid-Afrika*, Zomer & Keming, Wageningen 1948.
ISNARD Hildebert, *L'Union sud-africaine*, dans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arousse, Paris 1959.
JONES Neville,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Rhodesia*,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49.
JOOS Louis C. D., *Brève histoire de l'Afrique*, Ed. Saint-Paul, Paris 1965.
LESOURD Jean-Alain, *La République d'Afrique du Su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Paris 1963.
KESTELL J. D., *Twee jaren met de Boerencommandos*. — *Die Voortrekkers*.
LOCKHART J. G., *Cecil Rhodes*, Duckworth, Londres 1946.
MACNAB Roy, *Journey into Yesterday*, Howard Timmins, Cape Town 1962.
MARSHALL Thomas E., *Des gens sans méchanceté*, Gallimard, Paris 1961.
MERWE van der, H. J. J. M., *Segregeer of sterf*, Johannesburg-Kaapstad Afrikaanse, Pers 1961.
MURIAS Manuel, *Brèv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portugaise*, Lisbonne 1940.
PAULME Denise, *Les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59.
ROSENTHAL Eric, *Encyclopaedia of Southern Africa*, Warne & Co., Londres 1961.
SEGAL R., *African profiles*, Penguin Books, London 1962.
SELIGMAN, *Races of Africa*, Thornton Butterworth, London 1930. -- *Les Races de l'Afrique*, Payot, Paris 1935.
STEVENS R. P., *Swazil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dan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 3, sept. 1963.

STEWARD Alexander, *La mission sacrée*, Ed. Da Gama, Johannesburg 1963.

TOIT du F. J., *Spies Van ons Land Suid-Afrika*, Voorland, Bruges 1947.

THEUNISSEN J. B., *Aanteekeningen eener reis door de binnenlanden van Zuid-Afrika*, Vermeirsch, Ostende 1824.

VERWOERD J. F., *Crise de la conscience internationale, la route de la liberté pour le B.B.S.*, publié par l'Ambassade à Paris (sans date).

WALKER E.,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dres 1957.

WET de Ch., *3 ans de guerre*, F. Juven éd., Paris 1903.

WIEDENER Donald E., *L'Afrique Noire avant la colonisation*, Ed. Internationales, Paris 1962.

Pictorial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Odhams Press, Londres 1938.

官方出版物:

Basutoland — 1958 et années suivantes, Annuaire. H. M. Stationery Office Londres.

Basutoland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Command Paper 2371, H. M. St. Off. Londres.

Bechuanaland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Command Paper 2378, H. M. St. Off. Londres.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1958 (et années suivantes), Annuaire H. M. St. Off. Londres.

Swaziland 1958 (et années suivantes), Annuaire. H. M. St. Off. Londres.

Fact sheets on the Commonwealth, Divers. 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 Londres.

Fact papers du gouvernement sud-africain depuis 1961, Govern-

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retoria.

South Africa. Annuaire 1963 (et années suivant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Rapport du comité spécial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partheid A/5497 du 16 septembre 1963 (stencilé).

Rapport du comité spécial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partheid A/5692 du 25 mars 1964.

Les peuples bantous deviennent des nations. Ministère de l'Information, Pretoria 1962 (?).

Transkei, emancipation without chaos, Ministère de l'Information, Pretoria (sans date de publication).

Each a roof of his own, Ministère de l'Information, Pretoria (sans date de publication).

L'Afrique du Sud d'aujourdhuie, mensuel de l'ambassade de l'Afrique du Sud à Paris.

附录八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二　画

丁刚　Dingaan
丁吉斯瓦约　Dinguiswayo

三　画

士耳巴格，里克　Ryk, Tulbagh
马兰　Malan
马兰加，雅各布　Marenga, Jacob
马卡纳　Makana
马卡潘　Makapan
马西洛　Masilo
马里茨，格雷特　Maritz, Gerrit
马拉波　Malapo
马洛普　Malope
马德利　Madeley
马克瓦纳　Makwana
马坦济马，凯泽　Matanzima, Kaizer
马赫雷罗　Mahéréro
马赫雷罗，塞缪尔　Mahéréro, Samuel

四　画

戈林　Göring
瓦内　Warnay
瓦格纳　Wagenaar
瓦特布尔　Waterboer
瓦特布尔，安德烈斯　Waterboer, Andries
韦塞尔斯　Wessels
内肖　Nechao
内皮尔，乔治　Napier, George
贝尔，查尔斯　Bell, Charles
贝尔德，戴维　Baird, David
贝恩斯　Baines
贝佐伊登霍特，扬　Bezuidenhout, Jan
贝佐伊登霍特，弗雷德里克　Bezuidenhout, Frederik
邓肯，帕特里克　Duncan, Patrick

卡文迪什，托马斯 Cavendish, Thomas
卡布拉尔 Cabral
卡思卡特，乔治 Cathcart, George
卡菲库纳 Kavikuna
卡希默努阿 Kahimenua
皮纳尔 Picnaar; Pinard
皮罗夫，奥斯瓦尔德 Pirow, Oswald
加贝马，阿布腊姆 Gabbema, Abram
尼德布尔格 Nederburgh
冯特罗塔 von Trotha
冯弗朗索瓦 von François
冯勒托夫-福贝克 von Lettow-Vorbeck

六画

安德森 Andersson
农夸斯 Nonquase
刘易斯 Lewis
刘恰斯 Leuchars
米林，格特鲁德 Millin, Gertrude
米尔纳 Milner
米尔纳，艾尔弗雷德 Milner, Alfred
考恩 Cowen
西蒙，皮埃尔 Simond, Pierre
西苏鲁，沃尔特 Sisulu, Walter
西克果马 Sekgoma
西科尼埃拉 Sikonyela
扬，乔治 Yonge, George
达伽马，瓦斯科 da Gama Vasco
达布莱因格 d'Ableing
亚历山大，查尔斯 Alexander, Charles
亚历山大六世博尔季阿 Alexandre VI Borgia
迈尔，卢卡斯 Meyer, Lukas
迈尔，约翰内斯·皮特勒斯 Meyer, Johannes Petrus
迈尼厄 Maynier
托姆林森 Tomlinson
乔治，劳合 George, Lloyd
伍德 Wood
伊诺克 Enoch
多里恩，霍勒斯·史密斯 Dorrien, Horace Smith
约斯，路易 Joos, Louis
约瑟夫 Joseph
约雷森 Jorissen
约翰王 le Prêtre Jean
约翰内斯 Johannes

七 画

库普曼 Koopman
庇护十二世 Pie XII
亨利（航海者亨利） Henri le Navigateur
亨德里克斯，安德烈斯 Hendricks. Andries
沙珀斯 Scheepers
沃登 Warden
沃伦，查尔斯 Warren, Charles
沃尔克 Walker
沃尔斯利，加尼特 Wolseley, Garnet
沃德豪斯，菲利普 Wodehouse, Philip
玛丽 Marie
玛-恩塔提西 Mma-Ntatisi
苏玛 Xuma
扬森斯 Janssens
扬斯宗，伦德特 Janszoon, Leendert
麦肯齐 MacKenzie
麦卡特尼 Macarteney
麦克马洪 Mac-Mahon
来特西 Letsie
来特西二世 Letsie II
来德斯 Leyds
克文纳 Kwena
克拉斯 Klaas
克隆日 Cronje
克勒特 Cloete
克勒滕 Cloeten
克雷格 Craig
克鲁兹 Cruse
克鲁格，保罗 Krüger, Paul
克加马恩 Kgamane
克加马恩，腊斯博来 Kgamane, Rasebolai
克里津格 Kritzinger
克里瑙夫 Krynauw
克拉多克，弗朗西斯 Cradock, Francis
克拉伦登 Clarendon
克哈特里 Khatri
克勒佩尔 Klopper
克罗斯尼埃 Crosnier
克雷斯韦尔 Creswell
克鲁多尔普 Crudorp
克鲁伊特霍夫 Cruythof
坎贝尔 Campbell
坎贝尔，约翰 Campbell, John
坎贝尔—班纳曼 Campbell-Bannerman
里尼乌斯 Rhenius
伯克 Bourke

伯格斯 Burgers
希林 Shilling
希特勒 Hitler
利基 Leakey
利奥(教皇) Léon, Pape
利巴洛，波特拉科 Leballo, Potlako
利文斯敦 Livingstone
利罗托利 Lerotholi
彻耳姆斯福特 Chelmsford
阿平顿 Upington
阿思龙 Athlone
阿诺特 Arnot
阿提拉 Attila
阿方斯五世 Alphonse V
阿弗里卡内，亚格 Afrikaner, Jager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阿尔布雷希特 Albrecht
张伯伦，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八 画

季涅夫斯基，保罗 Giniewski, Paul
法库 Fakou
法勒 Farrar
法里尼 Farini
波廷杰，亨利 Pottinger, Henry
波帕姆，霍姆 Popham, Home
波特吉特，彼得 Potgieter, Piet
波特吉特，赫尔马努斯 Potgieter, Hermanus
波特吉特，安德烈斯·亨德里克 Potgieter, Andries Hendrik
若昂二世 Jean II
坦博，奥立弗 Tambo, Oliver
拉博特西贝尼 Labotsibéni
杰克一世 Jacques Ier
杰维斯 Jervis
范里德 van Rheede
范济耳，布兰德 van Zyl, Brand
范维克，威廉 van Wyk, Willem
范维克，科内利乌斯 van Wyk, Cornelius
范尼盖克 van Niekerk
范伦斯堡，汉斯 van Rensburg, Hans
范德拜尔 van der Byl
范伦斯堡，尼科拉 van Rendsburg, Niklaas
范夸尔贝 van Quaelberg
范里贝克，扬 van Riebeeck, Jan

范梅霍夫 van Meerhoff
范盖弗尔 van Kervel
范布罗赫尔 van Breugel
范皮蒂乌斯 van Pittius
范阿森堡赫 van Assenburgh
范朗斯霍顿 van Linschoten
范普莱顿贝 van Plettenberg
范德赫拉夫 van de Graaff
范德盖姆普 van der Kemp
范雅尔斯弗尔特,阿德里安 van Jaarsveld, Adriaan
欧文 Owen
肯普 Kemp
果尼马 Gonnema
果斯克 Goske
果戈索阿 Gogosoa
罗朗,萨米埃尔 Rolland, Samuel
罗伯茨勋爵 Roberts
罗德斯,弗兰克 Rhodes, Frank
罗德斯、谢西尔 Rhodes, Cecil
罗森塔尔,埃里克 Rosenthal, Eric
凯利皮 Kailipi
帕洛 Palo
帕克,斯塔福德 Parker, Stafford
帕耳格雷夫 Palgrave
迪比 Duby
迪亚士,巴托洛梅乌 Dias, Bartolomeo
迪普雷 Dupré
迪尼祖路 Dinizoulou
迪普莱西斯 du Plessis
金,迪克 King, Dick
金伯利勋爵 Kimberly
佩顿,艾伦 Paton, Alan
所罗门 Salomon
姆班迪奈 Oumbandiné
姆斯瓦提 Mswati
姆斯瓦济 Mswazi

九 画

洛特 Lotter
洛赫,亨利 Loch, Henry
洛本古拉 Lobengoula
洛伊特魏因 Leutwein
兹瓦纳 Zwane
兹威德 Zwidé
兹旺根达巴 Zwangendaba
施内 Schnee
施佩 Spec
施密特 Schmidt
施梅伦 Schmelen
查特斯 Charters

查普曼 Chapman
拜特，艾尔弗雷德 Beit,Alfred
拜尔斯 Beyers
哈里 Harry
哈恩，胡戈 Hahn, Jugo
哈文加 Havenga
哈蒙德 Hammond
哈基乌斯 Hackius
科尔，加尔布雷思 Cole, Galbraith
科克，亚当 Kok, Adam
科克，科尼利斯 Kok,Cornelis
科利 Colley
科茨 Kotze
科伦索 Colenso
威廉二世 Guillaume II
威尔逊 Wilson
威廉斯，鲁思 Williams, Ruth
威廉敏娜女王 Wilhelmina
费雷腊 Ferreira
费尔贝恩 Fairbairn

十 画

席勒 Schiller
诺代 Naudé
诺特 Noodt
容克尔 Jonker
高尔顿，弗朗西斯 Galton, Francis
海格尔，范·顿 van den Hengel
唐金，鲁费恩 Donkin,Rufane
格雷 Grey
格雷，乔治 Grey, George
格罗茨 Gerotz
格雷格 Greig
格拉斯顿 Gladstone
格里菲思，西埃索 Griffith, Seeiso
莫克，扬 Mocke, Jan
莫里斯，萨穆埃尔 Morris, Samuel
莫罗卡，詹姆斯 Moroka, James
莫法特 Moffat
莫卧儿皇帝 Grand-Mogol
莫策策，克加耳曼 Motsétsé, Kgaleman
莫赛斯 Moses
莫谢希二世 Moshesh II
莫胡鲁奇 Mohouroutche
莫赛利卡策 Mosélikatsé
埃弗兰德 Everand
埃尔芬斯通 Elphinstone
埃拉斯穆斯 Erasmus
埃斯科巴尔，佩德罗 Escobar, Pedro

索布虎查一世 Sobhouza Ier
索布虎查二世 Sobhouza II
索布克韦，罗伯特 Sobukwe, Robert
夏娃 Eve
班巴塔 Bamhata
莱蒂夫 Rétif
贾巴武，约翰·顿果 Jabavu, John Tengo
恩杜贝 Ndubé
恩库库，约翰 Nquku, John
恩卡帕伊 Ncapai
恩格瓦托 Ngwato
恩格瓦克兹 Ngwaketse
恩格瓦恩三世 Ngwane III
恩德兰比 Ndhlambi
恩德冯贡耶 Ndvoungounyé
特里，爱德华 Terry, Edward
特利，迪亚洛 Telli, Diallo
特里卡特，路易 Trichardt, Louis
拿破仑 Napoléon
拿破仑三世 Napoléon III
钱皮恩，艾利森 Champion, Allison
爱德华七世 Edouard VII
翁赫兰加纳 Oumhlangana

十一画

康诺特 Connaught
菲利普 Philip
菲利普二世 Philippe II
菲舍尔 Fischer
菲利普斯 Philips
菲茨赫伯特 Fitzherbert
基特 Keate
基钦纳 Kitchener
萨金特 Sargent
萨默塞特 Somerset
盖卡 Gaika
勒谬，普罗斯佩 Lemue, Prosper
勒祖尔，让-阿兰 Lesourd, Jean-Alain
梅修因 Methuen
梅特兰，佩里格林 Maitland, Peregrine
曼杜姆 Mandume
曼蔡博 Mantsébo
曼努埃尔，绰号有福人 Manoel, le Fortuné
维洛佐，费尔南 Veloso, Fernão
维达穆素 Vedamuthu
维多利亚女王 Victoria la reine

维沃尔德 Verwoerd
维拉卡济，布尼迪克特 Vilakazi, Benedict
维特布伊，亨德里克 Witbooi, Hendrik

十 二 画

普拉特 Platt
普鲁特，尼克拉斯 Proot, Niklaas
普林格尔 Pringle
普林斯路 Prinsloo
普林斯路，马廷 Prinsloo, Martin
普兰西乌斯 Plancius
奥佩尔曼，戈特利布 Opperman, Gottlieb
奥伊迪西阿 Oedesea
富里 Fourie
谢普斯通，西奥菲勒斯 Shepstone, Theophilus
斯瓦次 Swatz
斯太恩 Steijn
斯坦尔，西蒙·范·德 Stel, Simon van der
斯坦尔，威廉·阿德里安·范·德 Stel, Willem Adriaan van der
斯沃特，查尔斯·罗伯茨 Swart, Charles Robberts
斯科特，迈克尔 Scott, Michael
斯密特 Smit
斯揣敦 Strydom
斯托拉德 Stallard
斯忍斯肯斯 Sluyskens
斯梅勒坎普 Smellekamp
斯托肯斯特龙，安德烈斯 Stockenstrom, Andries
斯韦伦赫鲁弗耳 Swellengrevel
塔斯 Tas
塔瓦纳 Tawane
散迪勒 Sandile
博塔，路易 Botha, Louis
博克斯，汉斯 Beukes, Hans
博伊德尔 Boydell
博斯霍夫 Boshof
博尔格霍斯特 Borghorst
黑洛特 Helot
斐迪南，弗朗茨 Ferdinand, François
舒曼 Schoeman
腊腊布 Rarabe
鲁斯，提耳曼 Roos, Tielman
鲁斯特 Rust
鲁宾逊，赫尔克里士 Robin-

son, Hercules
絮夫兰 Suffren

十三画

塞缪尔 Samuel
塞太瓦约 Cetewayo
塞尔伯恩 Selborne
塞克瓦提 Sekwati
塞利尔斯,萨雷耳 Celliers,Sarel
塞库库尼 Sekoukouni
塞巴斯蒂昂 Sébastien
福尔 Faure
雷提夫 Retief
雷提夫,彼特 Retief. Piet
蓝皮德,安东尼 Lambede, Antoine
蓝加利巴果果 Langalibalélé
赖茨 Reitz
路易 Louis
路易十六 Louis XVI
路德冯加 Loudvonga
詹森 Janson
詹姆森 Jameson

十四画

察卡 Tchaka
赫尔佐格 Hertzog

十五画

潘达 Panda
墨索里尼 Mussolini
德班,本杰明 d'Urban,Benjamin
德马雷 de Marais
德韦特 de Wet
德拉赖 de la Rey
德雷克,弗朗西斯 Drake, Francis
德阿耳瓦,马提内斯 de Alva, Martinez
德拉方丹 de la Fontaine
德科维朗,佩罗 de Covillâo, Pêro
德维利埃 de Villiers
德密斯特 de Mist
德霍特曼 de Houtman
德阿尔梅达 de Almeida
德阿伦克尔,佩罗 de Alenquer. Pêro
德拉凯勒里 de la Quellerie
德夏韦内斯 de Chavonnes
德萨尔达尼亚、安东尼奥 de Saldanha. Antonio

十六画

附录九　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三　画

广岛　Hiroshima

大西洋　Océan atlantique

大菲什河　Great Fish River

大湖地区　Grands Lacs (région des)

土格拉河　Touguela

小自由邦　Klein Vrvstaat (le petit Etat libre)

小纳马兰　Petit Namaland

凡尔赛　Versailles

土格拉 阿伦图尔　Touguela Alentour

马翁　Maun

马尤巴山　Majuba

马弗京　Mafeking

马拉维　Malawi

马普托河　Maputa

马塞卢　Maseru

马德里　Madrid

马肖纳兰　Machonaland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马格斯方丹　Magersfontein

马塔贝莱兰　Matabeleland

马蓬古布埃　Mapoungouboué

马卡潘斯加特　Makapansgat

四　画

太特　Tête

太格山　Tygerberg

韦格科普　Vegkop

韦雷尼京　Vereeniging

乌伦迪　Ouloundi

乌得勒支　Utrecht

乌姆津布武　Oumzimbouvou

瓦尔河　Vaal

瓦特伯格　Waterberg

瓦赫宁根　Wageningen

瓦尔姆巴德　Warmbad

瓦克斯特隆　Wakkerstroom

开普　le Cap

开普省　Province du Cap

不来梅　Brême

戈巴比斯 Gobabis
贝专纳 Bechouanaland
贝塔尼 Bethanie
贝塔尼安 Bethanien
贝瑟尔斯多普 Bethelsdorp
比勒陀利亚 Pretoria
比夏普斯-斯托尔弗德 Bishop's Stortford
日本 Japon
中东 Moyen-Orient
牛津 Oxford
风暴角 Cabo tormentoso(Cap des Tempêtes)
毛里求斯 Maurice
厄加勒斯角 les Aiguilles
巴门 Barmen
巴西 Brésil
巴格河 Berg
巴苏陀兰 Basoutoland
巴塔维亚 Batavia
巴塔维亚共和国 République batave
以色列 Israël
长崎 Nagasaki

五 画

汉堡 Hambourg
印度 Inde
印度洋 Océan Indien
兰德 Rand
兰德耶斯拉格特 Randjes-laagte
东伦敦 East London
本格拉 Benguela
布马 Boomah
布里德河 Breede
布鲁日 Brudges
布尔霍克 Bulhoek
布老山 Blaauwberg
布拉瓦约 Bulawayo
布赖德巴赫 Breidbach
布伦霍斯普鲁特 Bronkhorsts-pruit
布鲁因捷斯胡特 Bruintjes Hoogte
布隆方丹 Bloemfontein
北阿利瓦尔 Aliwal Nord
卡罗 Karroo
卡潘 Kapain
卡罗利纳 Carolina
卡拉哈里 Kalahari
旧金山 San-Francisco
卢得立次湾 Lüderitzbucht
尼罗河 Nil
尼亚萨湖 Nyassa
尼亚萨兰 Nyassaland

尼日利亚 Nigeria
尼尔斯特隆 Nylstroom
加纳 Ghana
加拿大 Canada
加那利群岛 Canaries
加尔德兰 Gueldre
加贝罗内斯 Gaberones
皮查尼 Pitsani
皮奎特伯格 Piquetberg
代尔维尔森林 Delville Wood
弗累尔 Flers
弗里斯兰 Friesland
弗赖海德 Vrijheid
圣卢西亚湾 Saint-Lucie (St Lucia Bay)
圣赫勒拿湾 baie Sainte-Hélène

六 画

安哥拉 Angola
安格腊·皮基那 Angra Pequenha
米多兰 Meadowlands
米德耳堡 Middleburg
汤加兰 Tongaland
亚眠 Amiens
吉贝翁 Gibéon
西班牙 Espagne
西南非洲 Afrique du Sud-Ouest
西蒙斯敦 Simonstown
托卜鲁克 Tobrouk
托尔代西拉斯 Tordesillas
达喀尔 Dakar
达马腊兰 Damaraland
考科弗尔德 Kaokoveld
吕特利 Rütli
吕斯腾堡 Rustenburg
刚果河 Congo
因芳太河 Infante
血河 Blood River (rivière de sang)
伊丽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伊散德尔瓦纳 Isandlhwana
多哥 Togo
多尔恩科普 Doornkop
休达 Ceuta
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
好望角 le cap de Bonne Espérance

七 画

沙佩维尔 Sharpville
沃尔巴尼 Albany
沃尔维斯贝 Walvis Bay
库鲁曼 Kuruman

库内内河 Counéné
库邦戈河 Coubango
杜多伊斯潘 Dutoitspan
坎贝尔敦 Campbelltown
苏伊士 Suez
芬果兰 Fingoland
克拉朗 Clarens
克罗斯角 Cap Cross
克里米亚 Crimée
克利普敦 Kliptown
克拉埃潘 Kraaipan
克龙斯塔德 Kroonstad
克罗姆德拉伊 Kromdraai
克特曼斯霍普 Keetmanshoop
克勒克斯多普 Klerksdorp
克鲁格斯多普 Krügersdorp
克利普河共和国 République de Klip River
来因格斯内克 Laingo Nek
欧佛赖塞耳 Overyssel
别撒尔 Bethal
里斯本 Lisbonne
利比里亚 Liberia
伯尔尼 Berne
佛得角 Cap Vert
阿戈湾 Algoa Bay
阿克拉 Accra
阿平顿 Upington
阿达曼塔 Adamanta
阿德累德 Adélaïde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平顿尼亚共和国 République d'Upingtonia
纳米布 Namib
纳塔尔 Natal
纳塔尔堡 Fort Natal
纳塔尔港 Port Natal
纳塔利亚 Natalia

八 画

郎德 Landes
庞多兰 Pondoland
泽兰 Zélande
法兰西角 Frans Hoek
波尔邦达尔 Porbandar
波切夫斯特隆 Potchefstroom
英属贝专纳 Brit. Bechouanaland
英属卡弗里亚 British Kaffraria
苦难角 Cabo de todos os tormantos (Cap de tous les tourments)
拉各斯 Lagos
拉果瓦 Lagoa
拉罗舍尔 La Rochelle

拉莫特代格 la Motte d'Aigue
林波波河 Limpopo
坦噶尼喀 Tanganyika
昆斯敦 Queenstown
果兴 Goshen
罗本岛 Robben
罗安达 Loanda
罗得西亚 Rhodésie
肯尼亚 Kenya
拉果阿湾 Delagoa Bay
旺德方丹 Wonderfontein
帕尔 Paarl
帕尔德伯格 Paardeberg
帕尔德克拉尔 Paardekraal
金伯利 Kimberley
舍曼斯达尔 Schoemansdaal
牧牛人湾 Bahia dos Vaqueiros (baie de Vachers)
彼得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
迦南 Canaan
姆伯格 M'berg
凯河 Kei
凯斯卡马河 Keiskama

九 画

须德海 Zuiderzee
洪帕塔 Humpata
洛克滩 Rorke's Drift
洛伦索—马贵斯 Lourenço Marques
津巴布韦 Zimbabwé
南特 Nantes
南非联邦 Union sud-africaine
南非共和国 République sud-africaine
南罗得西亚 Rhodésie du Sud
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e
威斯特敏斯特 Westminster
威特沃特斯兰德 Witwatersrand
哈尔茨河 Hartz River
哈马卡里 Hamakari
哈米斯山 Khamiesberg
科伦 Cologne
科西湾 Kosi-Bay
科伦索 Colenso
科洛本 Kolobeng
科腊布 Khorab
科克斯塔德 Kokstad
科累斯伯格 Colesberg
侯恩 Hoorn
侯恩克朗斯 Hoornkrans
剑桥 Cambridge
费特河 Vet River

十 画

朗加 Langa
莫德河 Modder
莫塞尔湾 Mossel Bay
莫三鼻给 Mozambique
莫诺莫塔帕 Monomotapa
莱索托 Lesotho
莱登堡 Lydenburg
莱蒙湖 Léman
索法拉 Sofala
索特潘斯贝赫 Zoutpansberg
泰国 Thailande
埃亚西湖 Eyassi
埃塞俄比亚 Ethiopie
都灵 Turin
格里夸兰 Griqualand
格里夸敦 Griquatown
格罗宁根 Groninque
格林威治 Greenwich
格纳登达尔 Genadendaal
格罗特丰坦 Grootfontein
格腊夫赖内特 Graaff-Reinet
格雷厄姆斯敦 Grahamstown
桌山 Table
桌湾 Baie de la Table
恩加米湖 Ngami
恩克霍伊曾 Enkhuizen
特尔巴赫 Tulbagh
特兰斯克 Transkei
特里尼达 Trinidad
瑙克鲁夫特 Naukluft
桑给巴尔 Zanzibar

十一画

鹿特丹 Rotterdam
谋杀峡谷 Moord Kuil (Gorge de l'assassinat)
康斯坦提亚 Constantia
萨伊斯 Saïs
萨拉也夫 Sarajevo
萨尔达尼亚湾 Saldanha Bay
萨达班代拉 Sà da Bandeira
菲什河 Fish River
菲利波利斯 Philippolis
梅斯 Metz
梅兰多尔 Mérindol
勒通德 Rethondes
曼恩 Maine
累迪史密斯 Ladysmith
维希 Vichy
维林根 Wieringen
维尔沃特 Viervoet
维尔绛斯德里夫特 Viljoens-drift

十二画

奥兰治 Orange
奥兰治自由邦 Etat libre d'Orange
奥尔良内 Orléanais
奥尔杜韦峡谷 Gorges d'Oldoway
奥卡汉贾 Okahandja
奥茨霍恩 Oudtshoorn
奥利凡茨河 Olifants
奥利凡茨山 Olifantsbergen
奥基埃普 O'kiep
奥斯坦德 Ostende
奥里格斯达德 Ohrigstad
奥马埃凯—赞韦尔德 Omaheke-zandveld
普鲁士 Prusse
普瓦提埃 Poitiers
普罗旺斯 Provence
黑尔堡 Fort Hare
温堡 Winburg
温得和克 Windhoek
惠特彻奇 Whitechapel
斯太拉兰 Stellaland
斯韦伦丹 Swellendam
斯坦德顿 Standerton
斯威士兰 Swaziland
斯托姆伯格 Stormberg
斯图特海姆 Stutterheim
斯特伦博希 Stellenbosch
斯特克方丹 Sterkfontein
斯瓦科普蒙德 Swakopmund
斯瓦特克兰斯 Swartkrans
斯拉格特斯内克 Slagtersnek
塔尔卡 Tarka
塔波拉 Tabora
散德河 Sand River
散迪兹河 Sundays River
雅温得 Yaoundé
喀麦隆 Cameroun
博克斯堡 Boksburg
博姆普拉斯 Boomplaas
策斯 Tses
犀牛河 Rhenoster rivier (rivière aux rhinocéros)

十三画

意大利 Italie
塞罗韦 Serowe
新荷兰 Nieus Holland (Nouvelle Hollande)
福尔斯湾 False Bay
瑞士 Suisse
蓬伍岭 Bomvu Ridge
雷霍博斯 Rehoboth

楚梅布 Tsumeb
楚尔费尔德 Zuurveld

十 四 画

豪特湾 Hout Bay
慕尼黑 Munich

十 五 画

鲨鱼岛 Requin
撤巴恩丘 Thaba Nchu
撤巴-温堡 Thaba-Winburg
撤巴博西戈 Thaba Bosigo
德班 Durban
德阿尔 De Aar
德兰士瓦 Transvaal
德耳夫特 Delft
德拉肯斯坦 Drakenstein
德拉肯斯堡山脉 les Drakens-bergen
德维尔德特 de Wildt

十 六 画

默塞加 Mosega
赞比亚 Zambie
赞比西河 Zambèse
穆什隆峡谷 Mushroom Valley
穆伊曾伯格 Muizenberg

十 七 画

魏玛共和国 République de Weimar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南非史
作者=
页数=418
SS号=0
出版日期=